

和谐社会中的差异性分析*

程建军¹ 翁明慧²

(1.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 差异是事物和谐发展的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种差异性社会。当前, 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却呈现出差异扩大的趋势。分析差异问题、厘清和谐社会与差异之间的关系, 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维度的差异控制机制,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 是保障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本。

[关键词] 差异; 差异性社会; 和谐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01-05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社会更加和谐”明确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从十六大提出“社会和谐”至今, 历经近10年的发展,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然而根据国际经验,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 就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时期,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 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 日趋严峻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房价、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以及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等问题相继出现, 社会差异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如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势必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和谐社会是一种差异性社会

1. 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比较。

根据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物质利益关系的不同, 社会分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和差异性社会三种类型。^[1]同质性社会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或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那种物质利益没有根本矛盾和冲

突的社会。同质性社会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没有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 社会发展目标完全一致的社会。《礼记·礼运》就曾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的大同社会。然而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 在皇权的极端统治下, “天下为公, 是谓大同”不过是往圣先贤的美好夙愿与空想。“大同”思想, 在《礼运》篇中只是作为一种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而叙述的, 并认为它已不可能再实现。^{[2] (P. 30)}“乌托邦里的生活, 会单调枯燥得受不了。参差多样, 对幸福来讲是命脉, 在乌托邦中几乎丝毫见不到。”^{[3] (P. 40)}

异质性社会, 是指社会群体间物质利益相互对抗, 充满对立与斗争, 存在着大量阶级对抗、阶级斗争的社会, 即从奴隶社会走到今天的大部分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中阶级对立, 阶级利益对立, 物质利益表现为对抗。这种对抗性矛盾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冲突不断, 并有很强的不稳定性,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难以体现。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程建军(1956-), 男, 江苏南通人,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翁明慧(1987-),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差异性社会是指群体间的根本的、长远的物质利益是一致的,而部分性的、局部性的、暂时性的利益则呈现出多样性,具有差异。这种根本物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部分或局部不一致的社会形态就是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不同就在于根本利益是否一致,差异性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异质性社会的根本利益是相对立的。差异性社会与同质性社会的区别在于具体物质利益的差别,在同质性社会中,“天下大同”,其具体物质利益是趋同的、一致的,整个社会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而差异性社会是允许具体物质利益存在差异的。

2. 和谐社会的差异性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整齐划一的同质性社会,当然更不可能是根本利益对抗的异质性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根本利益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包容和肯定具体、局部利益有差异的社会。

首先,和谐社会以承认差异为前提。所谓差异(或多样性)即不同的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各自独立,与他物发生关系后互不影响,因而这种关系对于双方都是外在的。^{[4] P. 251}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各有其区别于他物的特点,即差异。差异是事物存在、变化和发展的基础,和谐是差异性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并能保持平衡的结果。“君子和而不同”和谐是在有差异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事物之间所能达到的统一、协调、和睦相处的状态。有差异才有协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是没有意义的,同质意味着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利益需要协调。因此只有在差异性社会中才有和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差异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差异中的和谐。

因此,和谐社会不仅不否认差异,而且应当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社会,是在差异中追求平衡的一种结果。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到的和谐状态。^[5]

其次,和谐社会以控制差异为过程。社会存在差异,社会才有活力,社会中的差异会激励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生产,人们才有生产的动力,才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具体物质利益引起的差异具有自发性,一旦失去调节和控制,差异就会无限量膨胀,从合理、适度性差异走向不合理的差异,进而转变为对抗性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最终影响甚至破坏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追求和谐,不是要取消矛盾,而应当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差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差异双方各自独立,差异度保持在彼此双方“可容忍”的范围内,保持和谐的差异,阻止差异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第三,和谐社会以追求平衡为目的。和谐是差异的和谐,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差异是和谐的差异,差异只有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是可以推动事物健康有序发展的差异,才能达到最终的和谐。漠视和放纵差异,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否认和抹杀差异又会导致绝对的平均主义,两者都会挫伤人民的积极性,都不利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故而,我们只有承认差异,控制差异的“度”,在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解决差异的问题,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

二、和谐社会中的差异

既然和谐社会是一种差异性社会,而我国又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与阻碍,此时正确认识和谐社会中的差异性,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差异,处理好差异性与和谐状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GDP不断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基本尺度,基尼系数超过0.4就说明这个社会的稳定状况很可能会受到影响与威胁,而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5,高出警戒线甚多。不仅如此,2010年第一、二两个季度CPI持续走高,第三季度甚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2%,一、二线城市房价依然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日趋明显;与此同时近年来地方上频发群体性事件,这些都与社会差异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面对差异的扩大和群众的质疑,我们必须明确现在出现的差异哪些是合理的差异,哪些差异是不合理的,哪些差异对于和谐社会是必然存在的,将差异分类,做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差异。

1. 合理差异与不合理差异。

我们从能否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角度可以将差异分为合理差异与不合理差异。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为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有市场就会有差异。差异引起利润,导致竞争,市场要求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导致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从而推动社会资源的集中和集聚。同样的,对于个人,因为能力的差异而形成分工差异以及收入差异,这种以社会公正原则为基础的差异,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经济利益差异,因而这种差异是合理的。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合理的差异机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正是差异的存在,为我们的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带来巨大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对于那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扩大化问题,只需保证其稳定在合理、合法,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范围内即可。

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差异,譬如,由贪污受贿、非法走私、偷税漏税等行为造成的不公平的贫富差距,这种不合理差异不但会引起群众的不满,也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必须通过强制力进行打击和控制,绝不容许此类差异进一步扩大,危害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

差异本身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有现在合理将来可能不合理的差异,也有现在不合理将来可能合理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差异。对于合理差异,也必须坚持“适度原则”,警惕合理差异扩大、演变为不合理差异。

2. 主观差异与客观差异。

从客观上说,社会发展到今天,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必然差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差异是对客观差异的反映,主观差异能否准确反映客观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能力和主体感受。从主观上看,客观差异是受主观影响的。一方面,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差异的感受和认知是不同的。例如,一般人对于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差异敏感度比较高,而对于奢侈品的敏感度要低得多;对于政治待遇差异的敏感度要大大高于经济待遇差异的敏感度。另一方面,面对同一个客观差异时有差异的个体会根据自身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与结果。简单地说,同样面对贫富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富人的敏感度比穷人要小得多;同样的,穷人对于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的敏感度也比富人要高得多。

贵州瓮安事件、马鞍山611事件等这些近年来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群体性事件显现出由于群众与政府间主观差异不同而导致的矛盾冲突。某些地方政府在面对差异问题时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不适当地使用强制手段,这样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群众感觉到公平缺失、政府公信力低下。事实上,这只是在面对一个客观差异问题时,政府忽视了主观差异在此类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处理方法简单草率,从而使得事件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新的差异,或者扩大原始的差异,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在承认差异客观性、把握其发展状态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人们对于现实差异的主观认知和承受能力。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时,在坚持权责对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的基础上,更要注意方式、方法、严谨措辞,把握人们对于客观差异的主观感知能力、敏感程度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尽可能地淡化主观差异,帮助群众理解、接受客观差异,进而实现实际层面与认知层面的对等,将主观差异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清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6] P.180-181}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地区和民族冲突不断,社会分化日趋扩大,自然界变化万千,在这复杂的社会、自然背景下,和谐越来越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取向。而公平正义正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尺度之一,以社会公正调控差异的限度,以求达到和谐状态。

三、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差异控制机制的基本维度

差异性的方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现实问题。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差异可能已经超过了“度”,如果再任由差异继续扩大,一旦转变为对抗性矛盾,将大大影响甚至危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以期构建一种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维度的差异控制机制,让差异为和谐服务。

1. 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指标,也是有

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各种差异与矛盾并实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试金石。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思想。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某些方面的差异似乎已经超出了“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失业率过高容易诱发社会的不稳定,房价的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公平饱受质疑,如果放任这些差异继续发展下去,最终必将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的全面进步。

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追求效率,同时绝不能忽视公平。过去,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我们错误的将公平片面的理解为绝对的平均,人民公社的教训已经说明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早已过去;同样的,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效率,在一定时期确实有利于个人能力的发挥,但同时却也带来了差异的不断扩大,从而会引起底层群众的不满,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动荡。因此,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维度的差异控制机制,在坚持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控制差异成为当务之急。

2. 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维度的差异控制机制。

其一,促成合理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

适度的收入差距是一种正常现象,是社会的进步,但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会激化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保持稳定的隐患。因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现存的收入分配体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分配制度的一大特征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从实际国民收入结构上看,劳动要素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我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标准较低,同时我国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经过不断上调,但是依然是偏低的。贫困线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偏低,意味着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偏小。另外,税收这一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调节贫富差距问题上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一个具体表现是,中低收入者承担了过大比例的总税负,这不但不能控制贫富差距,反而有可能使得贫

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合理优化的分配制度是为了实现收入公平,在秉承社会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调节过高收入,特别是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完善税收制度,使税收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推进反贫困战略,缩小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政府工作报告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出安排,提出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更多的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要求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其二,构建全方位的社会援助的机制。

实现社会和谐,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键在于全社会中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体现和保障社会中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平等”,只有“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援助困难者”才能保障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我国,市场调节初次分配存在某些不公的问题,政府宏观调控再分配在范围和力度上也存在缺陷。第三次分配是克服第一次分配的弊端,以及弥补第二次分配不足的重要社会分配方式,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7]在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大力构建社会援助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真正地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一些市场和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们的社会援助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完全形成体系,这不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投入,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国自古“贵和”,孔子说“仁者爱人”,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而中国的慈善援助事业必定具有中国特色。首先是推广慈善文化的普及,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元素,效仿西方社会,将慈善、援助转变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其次要增强企业家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在重大灾害面前,我们的企业家们一直做得很好,但是援助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一劳永逸,我们社会需要企业提供的帮助绝不仅仅是物资,更多是机遇。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培训机遇给需要的人特

别是贫困大学生,企业得到人才,大学生得到工作,才是真正双赢、真正的和谐。最后,要鼓励志愿者活动,推广志愿者服务社会。在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红十字协会各种志愿服务进行得如火如荼,苏北计划、绵竹计划、西部计划也得到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响应。同样的,这种志愿服务也应该推向社会、推向大众,人人都献出一份力量,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3. 政府应成为控制和调节差异的主导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对这样的变化,政府职能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调节和控制“差异”,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保护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促进社会与经济和谐发展已成为各级政府追求的价值和目标。

由于市场机制的本身缺失与不足,造成各种“差异”,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差异”麻烦的“制造者”。依靠市场自发平衡“差异”是不现实的。必须发挥政府在调节和控制差异上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平衡差异,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在分配领域,国家通过所得税调整、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取缔非法收入等措施,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政府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加大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的扶持力度,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在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领域,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并辅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事实证明,只要政府重视、方法得当、措施到位,调节和控制“差异”是完全可能的。

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把握合适的调控“度”,做到调控到位但不“越位”,采取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从2009年至今的国家对投机性等不合理购房

需求控制上可说是一个成功例证。在调控过程中把市场行为和投机行为相区别、刚性需求与虚假需求相区别。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支持中小户型普通商品房建设,并能根据市场反映逐步加大调控力度。现在可以说投机性购房需求已得到明显遏制,房价走稳指日可待。可见任何差异的调控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在保持合理差异的基础上,政府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调节的方式和力度,才能将差异控制在公平合理的范围之内。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区别、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在这些差异与统一中寻求一个动态平衡的点,使得这些差异可以成为促进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推动力。和谐与差异是一种良性互动,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运动发展着的社会只能在动态中达到平衡。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逐步适应差异,科学理性地对待差异,进而正确合理处理差异。

[参考文献]

- [1]任平. 差异性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J]. 阅江学刊 2010(3).
- [2]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二)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3.
- [3] [英]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0.
- [4] [德]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0.
- [5]顾骏. 差异与和谐的必要张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N]. 解放日报 2004 - 11 - 15(4).
- [6] [德]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79.
- [7]宋林飞. 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J]. 学海 2007(3).

(责任编辑 光 翟)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刘建宁

(江苏教育学院政教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现代化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美好追求。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但都没有如愿。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领导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使国家独立,民族统一,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 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06-0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近百年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是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引向现代化的中国,而中国共产党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坚定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实现现代化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美好追求,许多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却未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肩负起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统一、国家独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开辟了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纪元。尽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挫折和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现代化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它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为动力,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等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这个宏伟的历史变革发端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西欧作为它的历史舞台。19

世纪,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开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随后,一股由政治大革命推动经济大革命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了西欧、北美。法国、美国、德国、北欧诸国也都相继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殖民侵略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围剿,被奴役和被埋葬在矿井,对东印度开始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了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P.819)}

中国现代化历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也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国面对工业文明的西方,被动挨打,不堪一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开始丧失独立地位,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的局势更加恶化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国家的出路。19世纪的后30年洋务运动是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洋务运动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的“求强”到创办民用工业“求富”,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已经建立起一支人员达一万数千名、当时号

*[收稿日期] 2011-02-28

[作者简介] 刘建宁(1957-),女,江苏扬州人,江苏教育学院政教系副教授。

称远东最强大的舰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保留封建专制同时,使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甲午战争一战葬送了改革派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起来的现代海军,也终结了中国人想通过器物技能层面的现代化拯救民族的尝试。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企图通过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进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很快胎死腹中。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按照西方民主政治的蓝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划时代的一步。辛亥革命是成功的,但又是失败的,它成功在终结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但同时,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未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富强之路,而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这是由于此时中国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太强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而只是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尽管有着实现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并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它却无力担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艰巨重任。历史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比之更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取而代之,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必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有关决议,选举出党的中央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P.1514)“;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2〕}(P.1357)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近代中

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现代化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国家要顺利有效地推进其现代化的进程,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国家的主权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能够享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权。”^{〔3〕}(P.99)旧中国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对内长期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更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是仿效德国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但由于该政权的性质仍旧是一种传统政权形式的内在延续,是一种家天下式的官僚集权政体,代表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的历史重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然要通过革命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将革命与现代化紧密联系,以推动现代化为己任,从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统一。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充满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他又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门。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统一无疑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明显受外在压力的制约,因此必然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历经坎坷与挫折,其间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几乎都进行了选择与尝试,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这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指

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4〕}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开辟了现代化的新里程。以现代化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里，就提出了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的任务。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使中国的现代化保持社会主义方向。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用5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5〕}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该任务于1956年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1964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把原来提法中的交通运输现代化改变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批大型的工厂、矿山、铁路得以建设，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增长较大，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56、1957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的著作，为毛泽东后的继任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前提。但由于其后在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十年文革”几乎终止了现代化的进程。究其原因：一是在50年代后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顾生产力发展的

实际，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赶超思想；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6〕}1957年毛泽东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针对赫鲁晓夫提出了“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结果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相背离的困境。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加快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旧中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自然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从自然经济一下子跳入了产品经济，违反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三是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失误，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20世纪后半半个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此时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往那种靠战争解决矛盾的方法就不适用了，同时核武器的产生又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核大战的结果是没有赢家和输家，最终会同归于尽。总之，战后的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朝着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各国人民建设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确没有能够及时把握住时代主题的转换，仍然抱着战争和革命这一时代主题不放。在战争问题上总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迫在眉睫，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并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政策。不仅立足以早打，而且要大打；不仅要打常规战，而且要打核大战。在革命问题上，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并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由于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失误，延误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三、1978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征程。

1.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党对邓小平做出了全面的评价,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领导了拨乱反正,主持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重新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再认识,提出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及根本保证。与此同时,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并用党的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党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道路探索的结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被一些传统的观念束缚,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然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体制基础。1978年我们虽然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并严重束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认真倾听实践的呼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

场”,^{[7] P.373)}从而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的前景。”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人类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经验上升为理论并指导实践,如此反复就会得出真理性的认识,真理即对规律的揭示,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理论。正确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少走弯路,并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党是一贯重视理论建设的党,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党根据党情、世情和国情的新变化,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把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了科学阐释,这是十七大树立的理论丰碑。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开创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重要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发展,有力地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3.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相结合是中

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中国现代化事业,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这是党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高明之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8] P.150}。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大特色和成功经验。就这次改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并有力带动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体制的改革,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变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由曾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快速滑落至只有世界的二十分之一。60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也已从建国之初的不到1%,提高到1978年的1.8%,再到2008年的6.4%,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0年来,经济总量增加7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4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5倍,外汇储备增加近14000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放眼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以60年走过发达国家工业化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4. 党的领导是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中国近现代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的事情“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8] P.266}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美国企图独霸世界并存,各国发展的愿望和环境、资源矛盾日趋尖锐,世界各国的矛盾日趋复杂,世界仍很不安宁。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国际金融海啸余波未尽,中美间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再起,美国某些势力借口对华贸易逆差冲击美国制造业造成国内大量失业,企图压人民币升值。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来看,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还是不高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已经成为中国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大课题。从国内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但在经济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矛盾:一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分化呈加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尽快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已刻不容缓;三是社会思想文化进入多元碰撞期,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四是腐败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超出公众忍耐的底线。总之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为世界所罕见。

2009年9月15日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我国相继实现了 (下转第28页)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党建理论的创新*

张琴芬

(江苏教育学院思政中心,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毛泽东党建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理论精华。邓小平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党建学说。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党建理论,领会其精神实质,对于在新时代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毛泽东; 党建理论; 创新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11-03

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壮大、发展历程中,提出了独特的党建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邓小平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根据不同时期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面临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党建理论,既继承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但又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

一、党建战略思路的创新: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党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建党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指导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左”的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影响,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认识不清,党的建设逐渐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才刚刚完成,党内便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开始,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用革命的思维定势

和工作方法来处理问题,把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甚至在党建问题上不惜打破整个党的机构以达到“不破不立”的目的,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发生,以至于党的领导被削弱,党群关系遭到严重损害,党的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经验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转折的重大会议,它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告诫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并把能否搞好经济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样的战略思想的转换,首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一贯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来抓。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之后,必须“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

*[收稿日期] 2011-02-20

[作者简介] 张琴芬(1961-),女,江苏宜兴人,江苏教育学院思政中心副教授。

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列宁讲得更形象:“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其次,这种战略思想的转换对国内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由于受苏联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地摆正发展生产力的位置,而是人为地陷入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变革超前,拼命追求“一大二公”经济发展战略完全服从、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其结果是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次,这种战略思想的转换基于我国面临的现实状况的考虑。就国内状况而言,我国还处在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完善、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如果不发展,就很难完成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等重任;就国际而言,我们面临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等发展趋势,综合国力较量的核心是经济和科技,如果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我们则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二、党建方式的创新:从“运动建党”到“制度建党”

民主革命时期,为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毛泽东采取了以整风化解党内错误的方法。他首创性地发起并组织了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好形式——党内整风运动,首次提出了党内思想教育的科学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3〕}延安整风运动始终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个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延安整风虽然是一个全面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但它最主要的特点还是着重思想教育,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思

想进行了批评和斗争,使广大党员真正从思想上分清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使党员的思想在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党建的方式依然以“运动”为主。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强调:“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此后,“运动建党”日益凸现,党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相反,国内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针对以往党的制度不完善和某些弊端给党的事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明确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他认为“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要“从改革制度入手”,从而开创了“制度建党”的新路子。针对党内在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组织状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改进党的作风、改进党的思想和宣传工作、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革党的工作方法等新观念,并且主张要“改得好一点、快一点。”^{〔4〕}他不断告诫我们:“个人专断是阻碍党内力量发展壮大和发挥党内积极性的要害。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制去发动党的积极性。”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因此,他认为一定要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保障制度,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严格杜绝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党的管理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良状况。全党要克服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缺陷,按党章办事,完善党规党纪;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废除

领导终身制,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要求选拔和培养干部,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邓小平探索的从制度上建党的新途径,以党的制度建设为重点,旨在实现党内组织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从而真正增强党执政的生命力。

三、党建着力点的创新:从“反右”到“主要防止‘左’”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遇到来自于“左”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给革命和建设带来深重灾难。如何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摆脱“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从国情和党情出发,认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是不行的;但对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姑息迁就、放任自流的态度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关于“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等理论为依据,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建国后,“左”倾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愈演愈烈,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至巅峰状态。从脱离中国国情的赶英超美、盲目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人性的扭曲,用阶级斗争拼个你死我活,历史证明:“左”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危险。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进而得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的结论。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特殊的国情能为“左”提供生存的空间和土壤,另一方面“左”也往往带有革命色彩的伪装,更具欺骗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4〕}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如何认识和处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

着来自于“左”和右的因素的严重干扰。一方面,部分同志或者用过去那种“左”的尺子来衡量当前的改革,尤其是对党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企改革等举措心存疑虑,或者不能辩证地认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负面效应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往往以此来怀疑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用右的尺子来认识和对待改革,如只讲初级阶段而不讲社会主义,只讲无限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不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只讲市场经济而不讲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甚至公然鼓吹私有化,并为此要求改变党的性质,从而直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两种倾向实质都是把两个基本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都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偏离,如不加以克服和纠正,势必妨碍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现在,有些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6〕}他认为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党员和干部正确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以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决心和恒心,学会在实际工作中全面、辩证地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的本领。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党建理论,都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党建的沃土中产生的,是我党的行动指南。邓小平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认真对待党的建设,把改革作为完善党的自身建设的动力,不断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只有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党建理论,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充分展现党的生机活力,也才能符合新世纪推进党建工程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列宁选集(第4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列宁选集(第1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光 翟)

生命关怀视域中的语文知识教学改革探索*

陈尚达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安徽六安 237012)

[摘要] 生命关怀是新课程改革下语文知识教学的重要课题。语文知识是一个客主同一性的媒介物,生命关怀是对以人为本与因材施教的深情呼唤。与文本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是生命关怀视域中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长善救失是生命关怀视域中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核心思想,其中内含一种双向交流的师生关系,一种理智挑战的问题情境,一种灵活应变的教学智慧。

[关键词] 生命关怀; 语文知识; 教学改革; 长善救失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14-06

教育的旨趣在于求得人心灵的自由与解放,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如何才能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善于选择与主动探究,拥有学习的快感与生存的诗意?有学者指出:“知识的本原性关照就是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幸福。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用知识守护人性、孕育德性,促进个体存在的完美,开启个体人生的尊严感与幸福。”^[1]如何唤起学习者的求知欲望,谋求‘学校知识’的活力,以求得学校知识的‘整合化’和‘人性化’,是课堂教学革新的应有之义。^[2]本文以语文学科为例,从生命关怀的视角,探讨新课改下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问题。

一、生命关怀:新课改下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了语文课程的1个“出发点”,2个“性质”,3个“目标”,4个“理念”和5个“板块”。《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此基础上强调学生关于语文的自主选择、审美探究与生活应用。总体上看,新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语文教学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语文教学要能够将民族提出的社会要求,转化为儿童内在的生命需要,使得母语学习成为儿童终身自主

自觉的德性实践与快乐行动。语文知识教学要从利于学生主动发展的高度慎重选择与创造实施,要从片面强调语文知识转向关怀学生生命成长,生命关怀是新课改下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1. 语文知识:一个客主同一性的媒介物。

语文教育是一个重建学生语文经验的文化再生产过程,这种重建经验与数理化不同,不同学生面对相同文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思维过程与语言形式,后者则需要有大体一致的思维过程与符号形式。其中的缘由,在于语词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一对多关系,以及大量同义词、近义词与反义词的可替代性,与修辞的审美创造性,构成“神与物游”的自由想象游戏的现实基础。自然,学生语文经验的重建无法绕开语文知识这个中介。对学生而言,语文知识是一种从未知到能知的学问,一个从先验存在到经验存在的变化。语文知识,不论是作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信息知识(即知道“是什么”的知识),还是作为对信息知识加以运用的程序知识(即知道“如何做”的知识),以及作为从容驾驭信息知识与程序知识的策略知识(即知道“如何做得更好”的知识),从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课改下的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研究:生命关怀的视角”(项目编号:FHB080451)。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陈尚达(1970-),男,安徽潜山人,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其发生认识论上讲,都是个人主观心智的产物;后来广为流传,才转变成为人们认识的客观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语文知识,都体现了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的统一。信息知识、程序知识与策略知识,似乎存在一个层级性问题。比方说,知道什么是比喻,和知道如何造比喻句,以及如何造出生动形象的比喻句,的确不是一回事。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连什么是比喻都不知道,就不可能造出生动形象的比喻句。比较而言,应试语文教学过多关注信息知识,而相对忽视了程序知识与策略知识,后者便需要学生大量的读写实践,即以学生个人主观化的语词选择、信息重组与知识整合作为依托。

语文知识学习是个体主观建构与公共理性寻求的一体化,包含“我—它”关系的主客间对象性实践与“我—你”关系的主体间沟通性实践。由于人及其理解的互不雷同的深刻历史性,语文知识学习就必然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视野融合。哪怕就是理解一个词语,如“宴会”,学生头脑中本来存在诸如生日、谢师、结婚等宴会的生活图景,词典中的释义正是对具体生活图景的高度概括;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生活图景的回忆过渡到词典中的解释,一些教师对词语理解仅停留在让学生掌握词典的解释,恰恰忽视与遮蔽了学生丰富多样的具体生活图景维度。问题不在于记住词典上的解释,而是追求词语的生活情境义、文本语境义与词典义的有机结合,对词语进行个性化阐释,并能灵活运用。因此,语文教学要关注的不是客观语文知识的授受过程,而是教师引导下学生自我主观语文知识的赋形过程,并经过教师的合理协调、学生自我主观建构的语文知识又要经历一个公共理性的客观检验过程。语文知识要有一个为他人所理解与接受的客观形态,但也必须是学生思维所赋予的主观产品。或者说,学生尽管要接受相同的语文知识,但是这个相同语文知识能引起学生不尽相同的感受、体验与理解。如同靳玉乐教授指出的,课程知识存在客主同一性问题,即课程知识的客观表征与主观建构。^[3]知识传授必然包含着学生的思维重建过程,一旦离开了学生的心灵感受与主观建构,教师向学生传授的任何知识都将跌落为枯燥的文字符号,不具有实在的价值和意义。

2. 生命关怀:对以人为本与因材施教的深情呼唤。

《学记》中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应试语文课堂并没有得到传承与应用;一些教师

的知识讲授恰恰在“牵、抑、达”上着紧用力,而在“道、强、开”上鲜有作为。应试语文教学的标准答案情结,导致教师用专家所学代替学生学,让学生真实的身份、思想、情感、意志等都处于遮蔽与漠视状态。教师以对学生考试负责的“善意”行为扼杀学生创造力的“恶果”,酿造了学生的依赖与自卑心理。虽然专家的解读具有权威性,但那是由专家的经验视域所支撑的解读方式,对经验视域有限的学生而言,怎么可能理解?脱离了学生学的具体境域的专家定论,对学生而言,可能就是“不生育的瘪籽或死道”。语文知识教学不是让学生屈从于他人权威,而是要帮助学生建立自我权威。

教师对课本客观语文知识世界的关注要让位于对儿童主观精神世界的激励。“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反对固定与拘泥于所学,并还原掉所学而只讲学,因为这极易为现成者所遮蔽,而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形成一种僵持自闭的心态。学贵有疑,专家解读也应成为学生怀疑的对象,让学生经历一个实实在在的思维过程,并从专家解读中得出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对学生而言,语文知识要从一个客观对象物,转变为教师引导下自我的主观生成物。从客观对象物到主观生成物,要能够体现出儿童思维果实的发展变化,一个对语文知识意义的表述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充分见证学生理智努力所赢得的思想转变与思维提升。教师要能从学生关于语文知识意义主动建构的参差多态中,感悟学生语文经验的历史性脉络,并引导学生谋求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超越,而不能满足于对或错的简单评判。这是追求学生内部心智能量的自然释放,主动学习意识的深度觉醒,以及语文学习自信心的逐步长进。

二、三种对话:生命关怀视域中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日本佐藤学教授指出,学习是“借助同物质世界的沟通与对话(形成世界)、借助同他人的沟通与对话(形成朋友)、借助同自身的沟通与对话(形成自我)三位一体地实现‘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永恒的过程。”^{[4] (P.332)}学习就是师生与文本、师生与他人、师生与自我的3种对话性实践的统一体,教学就是要谋求对话性交互作用,教师帮助学生构筑与文本、他人以及自身的反思性关系。应试语文教学大多只关注了认知维度,而忽视了交往维度与自我维度,就连

认知维度,大多也是单向传递与控制,而非双向交流与沟通。因此,认真贯彻实施这3种对话,是生命关怀视域中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也体现出新课程向教师和学生赋权的特征。3种对话中,师生与文本对话,就是指学生预习与教师备课;师生与他人对话,就是师生的合作协商与互动交流;师生与自我对话,就是师生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三者合流,体现出师生从各自行动到合作行动再到自我超越的递进过程。倡导儿童自主、合作与探究的意义,就是让儿童自我的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理性与非理性共同在场,并通过与文本、他人及自身的相互作用,在不同认识的思辨游戏与语文思维的复杂博弈中,实现自我转变与自我超越,成为他自己。

1. 与文本对话:回归生活与学习的境域关怀。

语文知识教学要向学生的生活世界回归,回归生活是教师的教向学生的学主动贴近的一个鲜明标志。回归生活只是一个迂回策略,它不是简单地回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中去,而是以学生的生活世界作为基础与桥梁,追求儿童经验世界与人类文化世界之间的沟通与转换。这是引导学生通过对生活世界与符号世界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发现与构筑生活世界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回归生活的教学,其实涉及到维果茨基指出的“人类外部文化世界作为‘概括化意义’的‘科学概念’与儿童内部经验世界作为‘感受性意义’的‘自发概念’之间的互动与转化问题;‘科学概念’和‘自发概念’是儿童沟通学习中的合作者”^{[4] P.16}。“启示不可能来自外部,而只能来自于生活本身的教导与经验。”^{[5] P.92}离开学生的生活经验视域,教师、专家与文献的解读,对学生而言,都不过是“不生育的瘪籽或死道”。前述对“宴会”一词的理解便体现了向生活的回归,这正是杜威所谓“教育即生活”(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并为了生活)的生动体现。

因此,回归生活高度体现出对学生语文学习的境域关怀。如同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自由想象和自由联想的能力,将学生的成长建立在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演化的基础上。”^[6]缺失回归生活这一环节,就会导致学生难以对课本“科学概念”同化与顺应;“学以致用”的意义也在于此。“科学概念”对应于书本性知识、符号性知识,“自发概念”则对应于生活性知识、体验性知识,一般而言,前者得益于教育空间的“学”,后者得益于自然空间的“习”。问题是,应试语文教学让学生过多地

滞留在教室与课本,而较少地徜徉在自然与社会。学生作文的假、大、空虽与成人思想意识的控制与干预有染,但也与学生缺乏在大自然中的生活体验有关。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蕴含着一种教育批判与启示;“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代表和象征的是两种空间:自然空间和教育空间。它所揭示的,是教育空间对自然空间的剥夺、对儿童心灵的创伤。这不仅是鲁迅那个时代,更是今天我们教育的问题。而且被剥夺的不仅是自然的空间,更是自由的空间。现在中小学生的天空越来越小了,他们没有仰望星空的权利。^[7]语文新课改设置综合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就是要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参观、调查与访谈等方式,在自然中学,在活动中学,在社区中学,在社会中学,丰富与扩展学生的“体验性知识”,这既是让教育空间中多一些自然空间的影像,也让一些自然空间存在转变为教育空间的可能性,谋求自然空间与教育空间的融通与平衡。

2. 与他人对话:让学生自我的理智与意志在场。

佐藤学指出其关于学习的定义是与旧体字“學”的结构相通的,其上部中间的两个“×”意味着同文化与朋友的交会,它的两边是关照与引导儿童交会的成人的双手。没有交会就没有学习,不关注儿童交会的教师的地方就不会有学习。^{[4] P.332}师生互动就是旧体字“學”的上部生动形象的写照,师生合作的实质在于构筑一个学习共同体,在构筑知识的同时构筑个体与群体的内部和谐。而应试语文教学中的答案与分数情结,教师大多用知识控制取代师生交流,课堂中的共同体漠视差异而寻求同一性。其实,和而不同才是语文知识教学的至高境界,一种差异性与共同性相结合的意义机制,正好体现语文知识个人心智与公共理性的有机统一。

学习不只是人际竞争,更是互惠与合作。学生在与课文相互作用中,生成多样化的主观语文知识;而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合理性并不都能加以自我确证,这就需要教师的指导。教师要就语文知识的合理性问题与学生互动,帮助学生生成个性化语文知识。这种师生互动,旨在引起学生就自我或他人语文知识进行深刻反思,并促使其与文本的进一步互动,实现心性的能动生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和孔子的启发教学,都是一种沟通与对话。“基于沟通的学习,其实就是实现意义与关系的编织”;“意义不是赐予的,而是借助沟通不断地生成变化的。”^{[4] P.13}正是在这种沟通与对话过程中,观点的对峙拓展新

的思维空间,思辨的睿智和游戏的快乐涌动其中。语文知识学习就是关于语言文字符号的思辨游戏,这种思辨游戏并非轻而易举;“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道出了学习苦乐转化的艰难过程。这种师生互动,是为了让学生自我的理智与意志在场,谋求学生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语文学习实践。

3. 与自我对话:追求学生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

新课标倡导学生个性化阅读与写作,语文教学要摆脱由教师分析讲解的划一化模式,转而追求学生的原生态言语实践活动。应试语文知识教学中,学生大多成为语文知识的旁观者,缺失了语文学习的自我感。新课改下,教师要从“讲知识”走向“引导学”。语文知识不过是促进学生主观能动性生长的重要中介,它只有和学生的探索活动发生关联才产生意义。探索过程中,收获的并不仅仅是语文知识的内容与形式,学生关于语文知识学习的欲望、意志、态度、习惯、兴趣与能力也都会有所生长。语文知识教学中,教师要学会悬置专家和自己的见解,谨慎使用自己的主观意志,转而促成学生运用自我理智的自由意志。教师要让学生经受大量的语文思维磨砺行动,并主动接受来自学生的思维挑战,师生一起在艰难磨砺中变得富有斗志,学会坚强,拥有自信,催生强悍而阳光自我。当然,这里必然会涉及一个语文知识的确定性寻求问题,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探索是一个成己成物的双重性实践。语文知识的确定性必须从教师、学生、经验与教材等相互联结的关系性活动的自身内部去寻求,而不在于外部规定性的强加。

教师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他正是通过自己故意装作无知,让对方放弃依赖心理,转而诉诸自我理性。教师也应像孔子那样,指导建立在学生的愤、悱状态,且做到“能近取譬”,增强教学的隐喻性、生活性与游戏性。对学生而言,教师只能起到支持与帮助作用,而支持与帮助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责任感与自信心生长。这种个性生长,并不能依靠外部强加,而只能依靠学生的自主行动与自我觉知。换言之,学生个性发展的根本在于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教学的关键在于培植学生的“自否定”精神。如同邓晓芒教授指出的:“‘自否定’是人性之根,因而也是万物之根……自否定不同于自肯定,如中国传统所谓‘诚’;也不同于‘他否定’,如道德上的他律。这是自己与自己拉开距离,把现成的自己看做只是一个有待于完成、甚至有待于创造出

来的潜在的存在者,即看做这个存在着的有待于否定与重塑的质料。”^[8]语文知识教学要尊重学生的自身语文经验,并帮助学生超越自身语文经验的历史性局限,使得语文知识学习成为学生的自愿与自律行动,而不能像许多应试语文教学那样,将他者语文知识凌驾于学生自身语文经验之上,导致学生对语文知识学习的厌倦与他律行动。

三、长善救失:生命关怀视域中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核心思想

应试教育下的许多教师注重精讲教材(“一言堂”),至少存在3个偏失:一是斩除学生的主动思考与学习愤、悱状态,以致知识“得来全不费工夫”,学生主观探索精神与自我理智力量逐渐萎缩;二是局限于教材以内知识,教材以外的教师少讲甚至不讲,这就割裂了教材知识同儿童经验与人类文化丰富复杂的关联,以致学生领悟不出知识学习的融会贯通,体验不到其中的游戏兴味;三是教学变得轻而易举,由于缺少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不会受到来自学生方面的理智挑战,情境教学智慧无从谈起。更为主要的是,教师的这种精讲无视学生自身的历史语文经验,不考虑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动机、情感与意志等心理转变。这正是英国的霍布豪斯曾批评的:“他们的注意多半不是放在如何鼓励、帮助孩子独立自主地判断、行事,而是放在如何提防孩子们犯错,如何扫清孩子们前行道路上的可能性障碍,为他们提供一条简捷、平坦的光明大道。这种不使孩子发生任何错误与过失的教育,是一种安全的教育,但绝不是一种好的教育,因为它剥夺了孩子们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也就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9](P.211)}语文知识教学要从教师单独讲解转变为师生共同探索,《学记》曰:“知其心,然后教其失也;教也者,长善救失者也。”长善救失虽从教师的角度议论,但是学生自主探究与教师有效回应的一体化交织,它和教师的“道、强、开”相结合,高度体现教师服务于学生主动学习的立场,是生命关怀视域中语文知识教学改革的核心思想。

1. 上下呼应:一种双向交流的师生关系。

长善救失的重要前提是“知其心”,以教师对学生的倾听与接纳行动为依托,这与应试语文教学中过多强调学生对教师的倾听与接纳大异其趣。应试语文知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大多构成一种布伯所指出的“我一它”关系,教师对学生与知识从事所谓

“及物动词”的活动,学生完全是被动的,对教师没有回应,教学成为教师对学生的知识控制。^[10]长善救失,要求教师学会区分“我—它”关系的主客间对象性实践与“我—你”关系的主体间沟通性实践。师生相互尊重,就语文知识问题从事设身处地地理解,语文课堂表现为自由主体的相互回应,教师和学生之间构成一种呼应交流的融通和谐关系。

强调呼应与交流,既是语文知识教学程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深刻体现,也是语文教学谋求语文知识生成的个人心智与公共理性有机统整的必然要求。海德格尔指出:教,意味着让学生去学;学习就是呼应所学对象的亲切的召唤过程。^[11]这与孔子讲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异曲同工。强调呼应与交流,目的也在于促进学生与文本的呼应与交流行动,借助学生的知识探索以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快乐体验与思想觉悟。语文知识生成就是文本、专家与教师的他者性与学生自我性的融通与互渗结果,体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体间性相互作用过程。

2. 认知落差:一种理智挑战的问题情境。

语文课堂的开放应该是一种“有向开放”,“‘向’之内涵涉及‘心向’(心中要有学生);‘定向’(教学内容、学生状态、目标等的确定);‘返向’(返回学生的原始资源);‘调向’(在多种资源的利用中调整教学进程);‘多向’(尽可能向多数学生开放);‘走向’(走向学生的未来发展)。^[12]它体现出教学对学生发展可能性的关心取向,并促使学生自身已有的语文经验发生有意义转变。杜威曾经说过:“当教师从事直接的教学活动时,他要精通教材,他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学生的态度和学生的反应上。”^[13]换言之:“教师不应注意教材本身,而应注意教材与学生当前的需要和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14]语文教学要从关注教材知识,转向关注学生经验与教材知识之间的认知落差。例如,学习《背影》,并不只是为了把握朱自清眼中的父子深情,而是要由学生现实中的父子关系的认识与反思,促动学生关于亲情文化的新思考,并形成一种对长辈的感恩心态;学习《孔雀东南飞》,许多教师喜欢向学生传授朱东润先生的文本解读,认为那是反对封建礼教与批判封建家长制,赞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如果能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因婆媳关系不和与恋爱关系断裂而发生的生命惨案入手,就能引导学生感悟出文本深刻的当代教育价值,要学会善待他人与

珍视生命,对爱情、家庭、交往与生命等都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学习《祝福》也并不限于了解批判封建礼教的主题,而是要引导学生从人们对寡妇的社会歧视中激起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从而形成对不良社会习俗的强烈批判精神;学习那些优美散文,则要引导学生从自己对身边熟悉的景物描写能力出发,去感悟自己与作者在观察、想象、表达等方面的某种距离,进而通过写作行动努力去缩小这种距离。

学生经验与教材知识之间的认知落差,主要是通过问题意识或问题情境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具有一种向理智挑战的味道,是确保学习质量与效率的关键因素。一些应试语文教学恰恰缺乏问题意识,许多教师用先在的答案锁定问题教学进程,使得问题成为伪问题。杜威曾经指出:“引导儿童将一个问题作为他自己的问题去认识,使他自动地去注意以找到它的答案。”^[14]这种问题是开放性的,强调个人的历史情境与思维推理。问题前要加上“你认为”,问题后要加上“请说明理由”,这就要求学生个性化的语词选择、信息重组与知识整合,体现个体心智与公共理性的有机结合。如“你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是什么?请说明理由。”这种开放性问题的答案不能是固定的,而是多种可能性的。教师要根据教学的具体境域,运用教学智慧,帮助学生谋求一种合理的确定性观点。这个具体的教学境域,是文本意义域、师生经验域、时空场景域与专家经验域等的复杂组合与交叉。

3. 激励支援:一种灵活应变的教学智慧。

“长善救失”是教师对学生主动建构的语文知识所进行的规范性行动,体现出教师从关注学生关于教材语文知识的主观性生成,到运用教学机智帮助学生实现反思性生成的深刻转变。某种程度上言,长善救失作为一种针对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激励性与支援性行动,正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知识传授的最本质内容。叶圣陶曾经指出:“上课做什么呢?在学生是报告讨论,不再是一味听讲;在教师是指导和订正,不再是一味讲解。”^[15]“预习得对不对,充分不充分,由学生与学生讨论,学生与教师讨论,求得解决。……学生预习如有错误,他得纠正,如有缺漏,他得补充,如有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得指示出来,加以阐发。”^[15]“教师所讲述的,只是学生想要‘领悟’而‘领悟’不到,曾经‘研究’而‘研究’不出的部分”^[15]。教师讲授并不

限于为了学生的意义接受,更是对学生主动学习存在困惑时的一种支援,以转变学生的思维视角与方法。教师讲授要体现出对学生作品解读权的尊重与呵护,体现出鲜明的为学生立场。专家与教师的理解是作为学生思维视域的开新与拓展而存在的,即是作为一种支援性语文课程资源而存在,而不是用来遮蔽与取代学生自我思维视域。

一次《诗经·卫风·氓》教学活动中,对于“你认为是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女生与男生的回答截然不同,体现出鲜明的性别差异。女生认为,氓虚伪、狡诈,一开始骗得女方信任,而阴谋得逞之后,便原形毕露;而男生认为,氓一开始是个憨厚的小伙子,是深爱着对方的,只是后来由于生活琐事的纠缠,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磨损,两人感情逐渐冷却。显然,对氓的同情与批判的对立观点显示出文本解读上的鲜明性别差异。由于两人从相爱到离弃的过程中,许多细节与情境均已失落,我们只能根据文本的有限文字进行推测。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教师不能简单地去评判谁对谁错,要通过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引导男生和女生分别对自己思想认识的根本前提加以反思,促使他们实现某种经验性转变。

作为一种灵活应变的教学智慧,更多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长善救失中。它指向教育现象学,“教育现象学就是想让我们摆脱理论与预设的概念,将我们的成见和已有看法、观点先搁置起来。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就是将它们先括弧起来、悬置起来。让我们直接面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并对它们做有益的反思,从而形成一种对教育具体情况的敏感性和果断性。”^[16]激励行动使学生认识到自我智慧,并受到鼓舞,有助于学生建立学习自信;支援行动主要不在于确立一种正确的答案,而是在尊重学生语文经验基础上,帮助学生转变认识角度与知识经验,这仍然是帮助学生寻觅自我理智力量,找回学习信心。语文知识教学中,教师既要精通课文,更要尊重、关爱、信任、理解与宽容儿童,充分体现关注学生学习语境、尊重学生语文经验、服务学生个性发展

的思想旨趣。通过规范性教学行动,教师积极作用于孩子的心灵世界,教师的语文教学智慧与学生的语文学习主动性之间便产生密切关联,它们是一个同步生长与相互促进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刘铁芳.重申知识即美德:古典主义教育的意蕴[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4).
- [2]钟启泉.“知识教学”辨[J].上海教育科研,2007(4).
- [3]靳玉乐,董小平.课程知识的客观表征与主观建构[J].教育研究,2009(11).
- [4] [日]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5]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6]王富仁.通往庄子哲学之路[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 [7]钱理群.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J].班主任之友,2009(2).
- [8]邓晓芒.“成人”的哲学:邓晓芒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5(5).
- [9] [英]霍布斯.自由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0]张世英.我们—自我—他人[J].河南社会科学,2010(1).
- [11]张华.教育重建论[J].全球教育展望,2008(1).
- [12]李政涛.重建语文教学的过程逻辑:以“新基础教育”研究历程为例[J].课程·教材·教法,2010(1).
- [13]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4] [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1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 [16]李树英.教育现象学:一门新型的教育学——访国际教育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范梅南教授[J].开放教育研究,2005(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论校本课程的品质特性^{*①}

卜以楼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校本课程开发的成效取决于对校本课程品质特性的认识。“以学校为本”、“以学校为基础”的校本课程,有适切性、发展性、综合性、实效性这4个方面的品质特性。

[关键词] 校本课程; 品质特性; 适切性; 发展性; 综合性; 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 G4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20-04

校本课程的开发从本质上说是学校教育共同体在学校一级对课程的规划、设计、实施与评价的所有活动。校本课程开发的成效取决于对校本课程品质特性的认识。经过几年的实践,笔者认为,校本课程品质特性主要表现在适切性、发展性、综合性和实效性几个方面。

一、适切性

校本课程的适切性是校本课程重要的品质特性之一,主要指校本课程开发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切合学校实际,满足学生的兴趣和发展需要,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

1. 体现时代特色。

创新是21世纪的主旋律,基础教育要突出创新教育,校本课程可为此搭建平台。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以下简称“分校”)开发的校本课程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结合课程特点,培养学生质疑精神,在教学中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比如“生活中的艺术”强调“让学生自己动手创造生活的艺术”;“名嘴训练营”强调“在提供的朗诵、演讲、辩论的舞台上,让学生的口头表达进入新境界”。

2. 符合学校实情。

分校在“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办学目标下,提出了“提升教育品质,打造品质教育”的办学理念,这些都要通过具体的课程体系来实现。分校努力开发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其主导价值就在于通过课程来体现学校的办学目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分校先后开设了近40门的校本课程,力图让每一位学生从中受益。经过多年开发与研究,分校校本课程日臻成熟,课程管理科学合理,在南京市乃至全省、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3. 彰显教师优势。

教师资源是开发校本课程的根本。在课程开发中,教师是参与设计的主体,他们能够体验到自己所享有的课程权利以及运用这种权利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校本课程开发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教师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和专业特色自主申报,将学科的专业优势转化为课程资源。

4. 关注学生主体。

校本课程开发依据主要是学生的兴趣或需求。分析学生的兴趣或需要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进行座谈等形式,低年级的学生最好邀请家长参加。在调查、了解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时,要特别注意以下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都市初中校本课程品质提升的行动研究”(项目编号:D/2008/02/087)。

[收稿日期] 2011-03-11

[作者简介] 卜以楼(1962-)男,江苏建湖人,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教师,中学特级教师。

① 本成果根据张会齐、王德庆、刘宏业、吴鹏、陈曦、王晟、孙国良、张弘、曹金枝、达海宁、陈松等同志研究成果整理而成,特表鸣谢。

几个问题：一是在判断学生的需求时，学校、教师要避免过度自信的做法；二是学生的需求在不同时期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进行定期评估和修正；三是学生的需求有可能和学校教育发生冲突，要在课程框架中得到有效解决。

二、发展性

校本课程的发展性主要指通过校本课程的实施，有效促进学生、教师、课程和学校的发展，实现教育质量的提高，这也是校本课程的价值追求所在。

1. 促进学生的发展。

习惯培养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培养和发展良好习惯是教育学生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在校本课程中，应主要培养和发展学生以下几种良好习惯。

敢于猜想。根据教育学原理，课堂上既要给学生想的机会，又要留给学生想的余地，还要教给他们想的办法。教学时要留给学生更大的思维空间，允许学生走一些弯路，真正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这种良好的习惯有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勤于实践。动手实践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会用科学的眼光看世界，也就是说动手操作必须有“学科和科学味”。在动手操作中，学生通过手工操作，发现现象，揭示本质，积累经验，形成感性认识，再由感性提升到理性，生成新的科学知识。

勇于探究。在校本课程中，教师应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积极投入到探究活动中，使学生在学习中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品质，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主人，促进学生的发展。

善于交流。学校教育应该把培养学生与人共处、合作交流和完善的人格品质放到首位。校本课程能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参与意识、表达交流的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让学生在充满情趣、疑问而又宽松的学习情境中去独立思考，合作交流，展示自己对知识的理解。

2. 促进教师的发展。

校本课程实施充分赋予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权，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政策保障。教师在校本课程中获得了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的权利，促进了教师的发展。

在校本课程设计中，教师必须独立分析和概括学生的特点与需要，分析国家课程与学生实际状况间的差距，提出自己的意见，由此提高教师对课程的

兴趣和满意程度，增加他们的自主意识。在实施中，当教师实施自己亲自参与设计的课程，并使学生取得进步时，容易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校本课程实施扩大了教师自主权，为教师提供了展示才干的机会。伴随着校本课程的生成，教师能清晰地体验到自身诸多方面正在更新，看到自身生命力的涌动和展现，从而体验到源于内心的尊严与快乐。因此，校本课程的实施能帮助教师进一步内化专业价值、认同专业规范、培育专业精神，从而为其专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分校开设的40门品质课和趣味课都是教师根据自身特长，结合学生需求自行设计、实施的，学校只是对校本课程进行宏观管理，在几年的实施和积累中由上课教师不断完善，充分体现了教师的自主原则。这种赋权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专业自主性，提高教师专业地位，促进教师专业的个性化发展。

3. 促进课程的发展。

校本课程尽管是以校为本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也是而且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课程政策和国家课程标准的框架内进行的，要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目标特别是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确保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实现。因此，可以认为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的改造、创新。

分校根据国家课程标准开发的适合本校实际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科学课程，不再选用某些出版社的教材，而是以关注生活为主线，培养学生的观察意识，关注和思考生活。比如“生活中的数学”、“生活中的艺术”、“探索与发现”等校本课程；也可以是学校在国家课程所确定的课程门类以外，新开发、开设的独具特色的课程，如分校根据本校学生的情感特点及其学校周边的课程资源而开发了“校园动漫社”、“语文嘉年华”、“灌篮高手”等。无论哪一种，都要求学校、教师要树立课程意识，了解、熟悉国家课程政策和课程标准。因此，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实施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促进了课程的发展。

4. 促进学校的发展。

校本课程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学校多元环境下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是学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有效推进新课程实施的需要，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分校自2000年建校以来，立足“校本课程”，努力发展“校本课程”，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一步活化了分校“一切

为了学生发展”的办学思想,体现了分校打造品质教育的办学理念,使分校的办学思想根植于课程的土壤之中,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通过学生素质的提高,教师素养的提升,课程体系功能的充分发挥,彰显了分校办学特色,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学校的独特校园文化。

三、综合性

校本课程的综合性主要指在内容的选择整合上关注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将课内与课外紧密结合,实现书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的融合,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

校本课程内容要超越学科界限,淡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人为划分,以主题形式呈现,涵盖的知识不囿于一个学科,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加以整合,注重不同学科领域知识、技能的融会贯通,帮助学生从各学科、多角度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现象和规律,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

分校校本课程设置充分体现学科间的综合性,主要表现为几个方向。“心智训练营”、“探索与发现”、“健与美”等课程的设置体现了两门乃至多门学科的综合,克服了单一学科认识、体验的局限性、片面性,改变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名嘴训练营”、“数学与思维”、“英语脱口秀”、“英语沙龙”、“生活中的数学”、“靓装 show”等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综合,通过知识的迁移,为学生今后生活、工作拓展了思路,初步培养了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旅游爱好者”、“探索古代文明”等课程的设置体现了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综合,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整合,形成了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关联。“数学欣赏”、“电脑应用艺术”、“DIY”等课程的设置体现了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或艺术学科的综合,实现了科学、技术、艺术、道德的内整合。

2. 重视课内课外知识的结合。

校本课程的特征之一是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的传授,而是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主动实践,在实践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解、认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学生自主选择 and 主动实践,为学生发展个性创造空间。

分校校本课程在设置上非常重视课内课外知识的衔接。比如“英语报刊阅读”课上,教师指导学生

通过大量的英语报刊阅读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和阅读量,培养学生的阅读品质,增进对英美文化的了解;在“名嘴训练营”课堂上,教师教给学生的仅是一些朗诵、演讲、辩论方面基础知识,学生要想真正实现能力提高这一目的,就需要在课外不断模仿、练习,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3. 关注书本知识和生活实际的融合。

分校校本课程的设置上,充分考虑课程开发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力求把教科书上的知识激活,实现书本知识与人类生活世界沟通,给课堂以“生活”的活水,把无声的“教材文本”演绎成鲜活的“生活文本”。

要让校本课程链接到学生生活中去,因为生活经验源于生活。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列举一些与所学内容相关的生活常识,学生会饶有兴趣地听课并积极参与思考和发言。通过发言,他们一方面可以和同学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也可展现自己积累的知识,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分校的校本课程如“靓装 show”、“英语脱口秀”等在设置上重视运用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教学资源,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实效性

校本课程的实效性是校本课程结果方面的品质特性,主要指校本课程实施对学生成长所引发的实际效果。这是校本课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具体体现,是校本课程实施的归宿。

作为校本课程的品质特性之一的实效性的内涵极其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激发学习兴趣。

校本课程是基于学校立场,以教师为开发主体,旨在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兴趣和发展需求的课程。因此,关注学生的兴趣,是校本课程的实效性之本。

始于学生兴趣。与国家课程及地方课程截然不同的是,分校校本课程的开设完全是基于学生自愿、学生自由、自主选课的结果。参与者不论成绩,不分班级,只要是对本课程充满兴趣,都可以自主、自愿地参与其中。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从“要他学”变成了“他要学”,体验了学习与获得的乐趣。

贯穿操作过程。第一,校本课程的开发坚持让学生和学生家长参加,并有效保障学生及其家长对校本课程开发的决定权。第二,采用观察、访谈、问卷等手段获取学生的兴趣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评估,明确学生兴趣的范围、层次和类型,从而

形成基于学生兴趣的各类品质与趣味课程。第三,充分挖掘校内外可用资源,如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多方面需求,为学生提供多种表现的机会。

终于个性发展。学生有了主动权,有了兴趣,就为个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我们为学生提供探索问题的经历,让其运用智慧去研究学科问题,刺激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2. 拓展学科知识。

分校校本课程中有不少是以拓展学生知识为主要功能的课程,这些课程旨在深化学生有关学科领域的知识,开阔学生视野,让学生广泛接触各个学科领域,广泛接触各类科学,让学生在广泛的知识视野里发展自己的才能、特长,认识自己的发展方向,逐渐形成职业理想。

比如“数学欣赏”课程的理念为:数学是人类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价值内涵和文化底蕴已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势必要引起我们进行挖掘、欣赏、继承和发展。因此,数学教育要使学生形成理性思维,感受数学价值,体验数学的精神力量,用数学的眼光欣赏世界。内容为:数学与文学(对偶——对称;数学——词语;数学——文学;数学——诗歌);数学精神与文字魅力;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数学在其他学科中的体现;数学与其他学科形成的结点);数学小论文(对原始问题的发展和延伸;对原始问题的改造和整合;对现有问题的反思和修编;对新问题的发现和论证)等。

3. 夯实基本技能。

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空谈培养能力是奢侈的;只谈基础知识,不涉及知识的应用,学生只能纸上谈兵,能力无从发展,从而造就了更多的“高分低能”。随着校本课程在分校的进一步发展,分校专门成立了课程研发小组,开发了品质与趣味两大类校本课程。分校的“探索与发现”、“阅读先锋”、“生活中的艺术”、“DIY”、“动漫社”、“化学与生活”、“灌篮高手”、“服装秀”等校本课程的开发意在夯实基础,注重过程,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主动发现,学会应对,培养技能。

在分校校本课程的“英语脱口秀”中,喜爱英语的学生有意识、有目的地聚集在一起,在这类的校本课程中,没有语法的专门讲解,没有习题的巩固训练,而是就某一话题或某一社会现象,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4. 强化过程体验,积累学习方法。

分校在校本课程实践中,注重对创设情境、引导探索、合作交流这3个过程体验环节的强化,以“互动”、“探究”和“合作”为核心,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设计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思考,调动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发扬合作精神,充分认识知识的发生、发展、形成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感知学科精神,品尝学科文化内涵,体验学科价值,从中获得进步的过程体验,彰显了体验的特征。

在过程中积累方法。某个学科知识的教学可以在短期内完成,某个学科技能也可通过集中训练形成,而掌握学习的规律,则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渐进达到。在校本课程教学中,我们注意引导学生从探索、反思中加以提炼,揭示规律的形成过程,去体验得到规律或结论的学科思想方法,掌握解决该类问题的通法,日积月累,产生飞跃,形成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

5. 形成积极的情感。

分校在校本课程实践中,突出对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性。通过选择教学内容、创造情景、营造氛围等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情感的体验、感知、理解、升华、内化而后外显。强调通过校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形成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喜爱质疑、乐于探究、努力求知的心理倾向,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正确的科学观念。分校的校本课程,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培养了学生对事物现象、本质的观察、判断能力以及获取及灵活运用信息的能力,还激发了学生对社会生活研究的兴趣,关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健康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等。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从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反思我国的重点学校制*

肖体慧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然而在我国教育实践中,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制学校却脱离了义务教育应有的培养目标。本文在反思了我国重点学校制在实施过程中与义务教育培养目标背离的基础上,力图提出一些改革我国义务教育重点学校制的建议,以期能够在促进我国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全面实现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义务教育; 培养目标; 重点学校制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24-05

建国初期,国家创办重点学校目的是使重点学校发挥其示范作用,带动一般学校的发展,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重点学校非但没有发挥预期的示范作用,反而成为应试教育的“桥头堡”,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发展成了空喊的口号。为此,必须从我国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发,深刻反思我国的重点学校制。

一、我国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其特点

1. 我国法律关于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2006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强调实施素质教育,重点要使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学生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具体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立志于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要使学生学好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能力、

发展智力。要使学生的身心得到正常的发展,具有健康的体质。同时,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初步掌握一些劳动技能。”^[1]义务教育要促使人的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素质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构,促进人的素质发展的教育亦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人的素质的第一个层次是身体和心理的发展,相应地需要有体育和心理素质教育;第二个层次是把心理层次划分为智力、道德、情感3个方面,相应地需要智育、德育、美育来分别培养真、善、美这3种对应于智、德、情的崇高境界;第三个层次是将前两个层次的各方面运用到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中,“整合”为劳动技术,相应地需要劳动技术教育。”^[2](P. 235-236)

2. 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特点。

(1)基础性。义务教育,就是“向每个人提供的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幸福,并成为一个有益的公民和生产者,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3](P. 59)这种教育“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是“每一个人——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

*[收稿日期] 2011-03-20

[作者简介] 肖体慧(1986-),女,四川内江人,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2009级硕士研究生。

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而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地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明智地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4] P.145}这表明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教育,它强调的是每个少年儿童最基本素质的培养,而不是专职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义务教育是一种全民性的教育,而不是英才教育。义务教育是要让学生拥有一般学识,而不是成为某一专门领域的“小专家”或某一行业的“小行家”。

(2)全面性。全面性是义务教育的本质特征。义务教育的全面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求所有的学生的素质都得到发展。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为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它不是面向个别学生而是面向全体学生,不是英才教育而是全民教育,不是选拔教育而是普及教育。它要使每个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充分发展。另外一方面它要求每一个学生各个方面的素质都得到发展。义务教育是一种使每一个人都到发展的教育,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都能在其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不过义务教育也不赞成教育上的平均主义和“一刀切”,全面发展并不等于平均发展或同步发展。从本质上讲,义务教育既是全体受教育者各种素质的共性教育,又是每个个体个性素质的差异教育,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德才兼备又各有千秋的学生。

(3)全体性。义务教育的全体性以提高全体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为其根本目的,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全体性是由以下3点决定的:一是我国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的教育,它不分民族、性别、种族,它是真正的全民教育,每个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应该接受规定年限的教育;二是提高民族素质的目标本身就包含了要提高全体受教育者的素质的含义,只抓少数的精英教育,是无法完成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这一重任的;三是所有受教育者都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所有受教育者都能够掌握教师所教的内容,在掌握标准上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他们只是在掌握速度的快慢上有差异。义务教育学校的最重要任

务之一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在全体学生包括差生的发展上下工夫,让所有的学生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重点学校制的实施与义务教育现有培养目标的背离

时至今日,重点学校已经成为我国办学的一大特色,不仅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有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分,甚至连小学、幼儿园也仍然有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分。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许多家长更是为自己的孩子设计的是“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受教育模式,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进入所谓的重点学校。的确,重点学校这种以“应试教育”为灵魂的学校,确实创造了很好的升学率,然而我国的教育界却演绎了层出不穷的“高分低能”,思想素质败坏,高科技犯罪的故事。因此,在谈到“重点学校制”的时候,我们要关心它体现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这种体制会导致什么样的目标追求。

1. 重点学校面向少数“精英”,过分强调教育的淘汰、选拔功能。

在教育实践中,作为适应考试需要和“精英主义教育”取向基础上的重点学校制,它们追求的教育培养目标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通过考试(主要以智育知识为主)把所谓的聪明与不聪明的学生区分开来,让那些高分学生即所谓的“人才”接受更好的教育,使他们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和社会的“精英”。如果说多年来重点学校确实培育出了一批可造之材,那么,这个代价也是牺牲了绝大多数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换来的。正如《学会生存》所言:“学校承担着一种筛子的任务,在各个教育阶段,为挑选未来杰出人才而进行筛选。”^[5]教育无疑具有选拔功能,但具体到义务教育;学校的主要资源应当用于增加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不是用于预测或选拔英才。^{[6] P.237}义务教育不能过多地强调淘汰性选拔,不能让义务教育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

2. 重点学校重视应试知识的传授,造成多数学生的片面发展。

虽然整个社会反应应试教育的呼声很高,但“高升学率”依然成为我国重点学校最基本的特征。许多重点学校都围绕高考和各级统考、竞赛的指挥棒转,其培养目标带有明显地急功近利色彩。智育是传授知识、发展智力的教育,发展各种能力是智育的重要目标。然而,不少重点学校从应试这一角度出发,过

分强调应试知识的传授,强调应试知识的熟练程度,大多采取强化训练的手段,把学习局限于课堂之内。许多重点学校特别是毕业班更是大量挤压体育、音乐、美术、劳动技术等非升学考试科目的课时时间,致使学生无暇参与课外各种有益于发展学生各种能力的活动。重点学校疯狂的追捧“应试教育”,所谓“应试教育”是指“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偏离受教育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7] P.78}只为升学而教育,忽视了学生多方面知识的掌握和各种能力的培养,忽视其思想道德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的全面培养和提高,造成了绝大多数学生的片面发展,即使是那些受到重视的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他们各方面的发展也是片面的。

3. 重点学校学生学习压力大,身心健康受到极大影响。

为了高升学率,重点学校的学生要承受来自于家长、老师、同学还有来自于自己对自己不甘落后所施加的压力。在重点学校里,又以“因材施教”的理由,在学校内通过考试再次将学生分化,让一部分“高分”优秀学生进入“实验班”、“重点班”、“火箭班”,而被迫转到普通班的学生往往备受打击。学校的这种做法忽略了义务教育的对象——“儿童青少年尚处于身心发展和个性形成阶段,处于多方面潜能发展的关键期,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有着多种发展的需求。”^[8]这些可塑性极强的学生在最需要教育帮助的时候,却被他们贴上了“差生”、“后进生”的标签,为了优秀生的利益,他们处在集体陪读的状态,加剧了他们紧张和厌学的心理,有的甚至还患上了恐校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另外,重点学校制也增加了义务教育后各级各类教育的难度,造成了教育的发展性不足。重点制学校向高校输送的许多学生知识丰富,能力却不足;能考高分,但实践能力差;善于接受式学习,却难以参与式、研究式学习,基本素质存在缺陷。素质缺陷的补偿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要付出更多代价,如果说知识方面的素质缺陷可在一定时间内得到补偿,那么,能力、思想品德、身体各心理、审美、劳动技能以及个性等方面素质的补偿就显得相当困难。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受教育者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

三、改革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的策略

在我国的实践中,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背离义务教育应有的培养目标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义务教育肩负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则必须改革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以促进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全面实现。

1. 改革义务教育评价体系,优化育人机制。

(1)改革义务教育学校的评价标准。在一些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抓重点学校,不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政绩思维下的教育亮点和标志性工程。重点学校成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形象工程,他们往往以升学率、竞赛得奖率来评价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有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采用各种方法向学校下达升学指标,并以此为依据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因此,要促进重点学校在培育学生时能够实现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就要转变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观,要根据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以评估作为促进学校发展的手段。对一所学校进行评价时,主要以“学校管理水平、办学水平、师资水平等办学合格度为评价基准,以教师工作质量、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要内容,以促进学校教育工作的全面改进、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为目的。”^[9]

(2)改革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评价指标。重点学校要取消教师头上“以分数论教绩”的“紧箍咒”,从德、能、勤、绩4个方面制订指标体系来评价教师。第一,在指标“绩”的要素设置上,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既有教书成绩,更有育人成绩;另一方面,在教学成绩的指向上面向全体,即要加大学生愿学、勤学、乐学、会学的百分率、合格率和提高这些指标的权重,引导教师由只重视少数优秀生转为面向全体学生。第二,在突出素质教育的主要指标时,对一些教师补课、滥印发资料、占用音、体、美课程的教学时间(指语、数、外等任课教师)、搞“题海战”,打“疲劳仗”等不良现象也应予以调控。可以设置教育指导思想指标并适当加大权重,以引导教师切实提高自身素质,落实教学常规,加强教育研究,讲求课堂教学效益。

(3)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评价原则。在重点制学校,要引导教师、学生和家长从片面追求分数中解脱出来,把评价的着眼点、落脚点放在学生素质

的全面提高上。如:对学生的评价结构可以采用合格加特长的结构,主要包括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合格率、提高率以及特长发展水平。确立“合格加特长”的学生就是优秀学生的标准。即德、智、体、美、劳均合格,且其中一方面被县市级以上认定为特长的学生就是优秀学生。要改变喜尖子生、厌后进生的倾向,不把分数当成控制学生学习的法宝和惩罚学生的手段。变控制因素为激励因素,只要不是竞赛性的选拔考试,在诊断性或激励性的单元测试中,在日常的书面作业中,教师评分要有弹性,把分数用活。后进生题目做错了,允许订正,订正后取消先前的评分,重新给予高分,给他们以成功的喜悦,增强学习的信心。

2. 形成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正确舆论导向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全面促进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仅靠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社会、政府、家庭等方面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别是社会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能否坚持正确的方向,即是否充分体现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全面实现。舆论导向应在人们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形成上发挥积极作用,转变教育观念,端正教育思想。使只有升学的人才能成才,考上重点学校的人才是人才的人才观,转变到靠各种途径都能成才上来;使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衡量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教育质量观,转变到以全面提高学生各种基本素质、发展学生个性特长的质量观上来。

以应试教育为灵魂的精英主义教育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隋文帝高科取士,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到现在父母的望子成龙,考大学,跳龙门,所有这些都一脉相承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重点学校成了人们吹捧的对象,在人们眼里凡是重点学校就是好的,进重点学校前程才光明。再加上高考制度的存在,这种进重点学校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学前教育阶段。为此,我们要在现实的文化构建中剔除那些影响义务教育学生全面发展的消极因素,营造良好的、有利于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全面实施的文化氛围。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各方面都付出努力。

3. 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教师的整体素质。

处于“知识爆炸”时代的青少年学生,教师不应

当是单纯的“教书匠”,而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结构,一专多能,博闻强记,尤其应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善于解决实际问题。

(1)创造条件让教师参加各种业务进修,更新知识结构。为教师提供多途径、多形式、多层次的进修机会和条件,真正使进修成为全体教师的权利。教师通过进修“充电”,不但可以在知识储备上查缺补漏,而且可以拓展视野,更新知识结构。进修的目的应以提高文化业务素质为宗旨,改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倾向,要努力掌握当代文化科学技术的新知识、新成果。

(2)科学管理,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首先,学校要倡导良好的尊师风尚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使教师觉得自己在学校中有地位、有价值,进而形成尽职尽责的信念;其次,学校管理者要以人文组织模式的观点调整策略,改变领导方式,努力做到能够维护教师利益,听取教师意见,帮助教师进步,真正使教师感到学校属于自己;再次,要充分尊重教师的智慧和能力,鼓励教师借鉴创新,支持教师从事多种专业活动,真正把教师的专业自主性发挥出来。

(3)通过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學能力。要把搞好学校的教学教研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全体教师共同的目标来抓。要让各科教研组长明确自身的职责及近期目标,制订好计划,同时依靠各学科的教学骨干,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做到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教学水平。与此同时,学校还应加强横向联系,与外校对口听课、评课;邀请领导、专家、特级教师来校进行专题讲座,使全体教师不断吸取教学的新信息和好经验,提高教师的教研、教学能力和理论水平。

(4)教师要转变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模式已倡导了多年,但在“应试教育”下的重点学校里,学生为主体是难以实现。除了公开课、观摩课可见到考虑学生的积极参与外,大量的日常教学中“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学处处可见。然而未来人才应具备的对他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更高的道德水准,自主的、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独立获取知识、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丰富的个性、特长和适应性等品质,不可能没有学生的主体参与而被动形成。因而,教师要集中主要精力改进教法、研究学法,从善于“会教”到善于指导学生“会学”,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逐

步形成适应素质教育的新教学模式。

4. 改革课程设置,增设具有自身特色的选修课程和活动课程。

重点学校要充分处理好基础学校与一般学科,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之间的关系:

(1)学科开齐,课时开足,课程开好,全面落实课程计划。国家课程计划所规定的各门课程,对于奠定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以国家课程计划保证语、数、外等基础文化学科的前提下,注意对体育、音乐、美术、劳动技术等非升学考试科目保护和强化,在保证这些学科课时的基础上提高其教学质量。

(2)建设具有校本特色的选修课和活动课。选修课和活动课是义务教育阶段比较具有弹性的课程,也是能够适应学生身心发展,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创造与实践能力的重点课程。因此,应是重点学校改革课程结构需要加大力度的地方,是一个学校办学特色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国家教委办公厅. 基础教育法规文件选编 [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2] 桑新民. 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
- [3] 谢宁.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 [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2.
- [4] 赵中建. 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和行动纲领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 [5] 联合国教育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Z].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 [6] [美] B. S. 布卢姆. 教育评价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7] 朱开轩. 面向 21 世纪, 开创基础教育的新局面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8] 彭泽平. 培养公民还是人才——对我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2(7).
- [9] 刘远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问题及思考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8(12).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上接第 10 页)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 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党的领导, 才能坚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才能完成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 才能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 才能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才能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到本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完成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段治文. 中国现代化进程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6] 毛泽东选集(第 6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光 翟)

“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对课堂教学系统的认识*

余景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教师以何种思维范式认识课堂教学系统,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进而关系到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课堂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有非线性、自组织性、不可还原性、开放性等特点,因此,教师必须以“复杂范式”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课堂教学系统,从新的视角审视与理解课堂教学系统的若干要素,包括教师自己、学生、知识、教学等。

[关键词] 课堂教学系统;“简单范式”思维;“复杂范式”思维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29-03

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使课堂教学系统日益复杂。教师审视课堂教学系统的思维范式直接影响着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师生之间的互动等,进而关系到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日趋复杂的课堂教学系统,呼唤教师对其认识的思维范式应向“复杂范式”转变。

一、课堂教学系统的复杂特征

1. 非线性。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精神世界,都由若干错综复杂的内涵不断丰富且外延不断扩展的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是由众多要素构成,每一个要素都可以当作变量,任何一个所谓“结果”的涌现必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性”是系统的常态。反观课堂教学系统,它是由诸多不同的要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系统保持着整体的开放性。同时,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也保持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关系。在课堂教学系统当中,要素具有“易变”性。例如:教师的情绪因时空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学生的成长过程是持续变化的,课程内容是不断更新的,师生、生生之间的关系时刻保持着微妙的波动等,正是诸多具有“易变”性的要素发生交互作用,使得课堂教学的过程呈现出非线性的特性,任何课堂教学现象的出现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

由多个要素以交互、多向建构的方式造成的,所以,非线性是课堂教学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

2. 自组织性。自组织的活动“是一个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能自行按照某种规则形成一定的结构与功能,并以其特定方式协同地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客观过程。有机系统总是处于一个永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之中的”(P.167)。在不受外部强制指令要求的课堂教学中,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由要素构成的网络系统自觉地塑造课堂教学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维持系统的存在,并促进系统的发展。该自组织性有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效用,积极的效用表现为:师生之间的关爱,生生之间的友爱,营造班级内部和谐氛围,学生之间的积极交流与合作,保持学生之间和睦共处,正确理解竞争性学习,促使学生能够辨清动力与压力、竞争与分数等之间的关系。消极的效用表现为:对分数的追求,导致合作学习的缺失,伴随着学习经验难以得到共享,物质消费上的攀比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

3. 不可还原性。与不可还原性相对应的是还原性,还原性是指在认识人/事物时,将其分解为若干部分,最后,对细分的部分进行认识,从而达到

*[收稿日期] 2011-02-21

[作者简介] 余景丽(1986-),男,江西九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对整体的认识。还原性理念,即对整体的认识还原成对部分或要素的认识,事实上,整体并不是部分或要素的简单堆积,整体的结构、功能和性质不等同于各部分或要素的简单相加。不可还原性要求主体认识客体时,主体不仅要掌握全面的信息,更要考虑内部之间的有机联系,整体地去认识与理解客体。学生某学科成绩不佳,并不代表学生缺乏学好该学科的能力,也不代表学生学习能力较差,它只说明某种测验方式反映出此学生某一阶段的学习状况。同样,考试成绩落后、沉默寡言的学生,并不能说明该学生资质愚笨等。要准确地认识人/事物,并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仅仅依靠孤立的信息或资料是不合理的,应该把它们放置于其所处的环境当中,直视事物的本来面目,从整体的视角去认识、评价人/事物。

4. 开放性。课堂教学系统脱离不了社会,它是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依据系统论观点,子系统和母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只有不断地保持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才能维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和稳定^[2]。课堂教学系统在教育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管理模式和班级文化等方面都映射着外界对其无形的影响与控制。课堂教学系统的开放性,既有正向效应又有负向效应,正向效应表现有:通过课程的设置来实现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将社会问题渗透到教育内容中,让学生了解、认识、分析社会问题,进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解决社会问题分担社会责任意识。负向效应表现有:社会人才的选拔制度(如高考)严重干涉课堂教学的原生态;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影响班级规模大小、课程资源的配备等,进而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不要输在起跑线”理念的错误导向,使扭曲的竞争充斥课堂等。

二、“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对若干系统要素的认识

“简单范式”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还原与分离两种逻辑操作基础上,这两种逻辑操作都是粗糙地对待事物和导致残缺的^{[3] P.79}而“复杂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时,呈现出多个意义不确定、非线性、开放性等特性,保持与现实进行良好的“商谈”与“对话”的思想方法,在课堂教学当中,教师基于“复杂范式”的思维方式从新的视角去审视与理解教师自己、学生、知识与教学等。

1. 认识教师。以“简单范式”的思维方式审视教

师职业,往往倾向于把教师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与工具,这与教育育人的理念相悖。“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能够从新的视角审视教师职业,认为对教师职业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其他职业(如医生、律师等)的要求,因为教师职业面对的对象是复杂的人,所以;“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能够时刻意识到自身的职责,不断地反思与认识自己,保持持续性的专业发展。“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从3个方面来认识与完善自己。一是检验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能够从深度与广度等维度有效地检验自己的知识结构,学科知识掌握程度如何,渊博与否,不仅影响教师课堂教学效果,也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与教学自信心。其二是改进课堂教学方式。“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能够在深入了解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学生生活世界等基础上,以有效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应对复杂多变的课堂教学系统,开展高质量的课堂教学,而不是固守在“安全地带”固守传统的、不变的教学方式。三是提高教师自身的学习能力。知识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广泛与便利等,需要教师保持持续性的专业发展,教师自身知识结构能否及时更新与教师教学方式能否及时发展,关键在于教师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能够不断地总结教学经验,反思与审视自身的学习进展,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2. 认识学生。在课堂教学系统中,教师与学生作为主体进行双向认识,这种认识的作用具有“不对称”性。教师对学生的认识,对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认识是时刻带有不确定性的,它本身永久地包含着幻觉和错误的危险^{[4] P.68}有些教师基于还原性理念去认识与评价学生,其原则是“对一个整体的认识引导到对其部分的认识,仿佛一个整体的组织并不产生相对于被孤立看待的部分的崭新的性质或属性^{[4] P.30}”,这等同于将复杂的事物化归为简单的事物,并对其进行认识。如,教师注重某一品质,假如某学生在这方面表现良好,教师可能看不到学生消极方面的品质;反之亦然。莫兰指出:“把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化归为对它的一个被认为足以说明问题的要素的认识,在伦理学中具有比在物理认识中更糟糕的后果^{[4] P.78}”,教育是以人(学生)为本的人道主义事业;“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以一种实事求是、多样化视角去认识、评价、理解学生,一是教师既能发现学生的优点与长处,又能看到学生

的缺点与不足。面对学生的缺点与不足,教师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指导并监督学生对其进行改进。二是教师转向学生言语与行为的背后,不停留于对学生言语和行为的观察与认识,而是深究言语与行为的背后如产生言语与行为的动因、过程及特定的环境等,试图全面认识学生。三是理解学生。理解“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交流、感情移入,甚至同情的基础上”(41 P.179),这尤其体现在教师如何对待班级中的后进生;“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基于人性中爱的流露,会情不自禁地给予后进生更多的关注、鼓励与指导;“迷恋”后进生的成长。

3. 审视知识。“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或问题日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41 P.101)。学生学习的知识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知识体系缺乏连贯性与关联性;学科内部的知识是经过筛选的、过滤的,以较为抽象的、远离实际生活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从新的视角去审视知识,表现出两点。一是向往知识的整体性。在课堂教学系统中,“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不仅重视对学科内部的知识进行综合,而且也强调对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联结。二是向往知识的背景化。将知识与相应的知识背景建立联系,包括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背景建立联系、与产生知识的历史背景建立联系、与社会生产的背景建立联系等,使知识的呈现方式符合学生的认知方式,摆脱知识过于抽象与“高位”的现象。向往知识整体性与背景化的愿景,促使“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以面向自己的方式去审视与知识相关的方方面面,表现为以下几点:在学习方面,教师不局限于掌握所教学科的知识,也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了解学生先前的知识水平,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等;在教学方面,调动学生求知的欲望,同时,将知识变得“生动活泼”符合学生认知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主动挖掘学生生活世界中富有意义的课程资源;在评价方面,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建构,不强调识记知识等。基于“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对知识的审视,超越知识的分离性与抽象化,向往整体性与背景(情景)化,将知识以原本的面目,且适合学生“口味”的方式呈现,让学生能够在情

境中“触摸”知识。

4. 反思教学。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扮演着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按部就班地讲授专家设计好的课程内容,力求达到专家预设的目标;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学生接受,学生的学习处于被动位置,并非主动地建构知识,课堂教学呈现出“单向流”的形态。“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能够在复杂、多变的课堂教学系统中,保持师生之间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平等分享语言与经验,使得课堂教学呈现出“双向流”的形态,面对学生的发展,教师能够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与发展的可能性,开展有效的课堂教学,满足个体与整体的需求,面对教学中的“意外事件”,教师能以机智性的行动将可能产生危害的学习情景变得富有意义与价值;面对问题,师生之间通过讨论、质疑、启发、对话、探究等方式解决遇到的问题;面对厌学的学生,教师通过创设富有诗意与美感、具有安全感的课堂教学环境,使其能够看到并享受到学习的乐趣等。两种教学形态的区别,就如同古典乐演奏与爵士乐演奏的区别;“古典乐往往是由作曲家精心编撰、力求做到每一个音符的精确和完善……演奏者几乎没有诠释的空间,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忠实……”(5),而爵士乐演奏者并非完全忠实于作曲者编撰的每一个音符;“注意与现场的互动,根据现场的气氛、状况来即兴发挥”(5),很多情况下;“复杂范式”思维的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一种默契的现编、现导、现演的过程,在乎所选择的教学方式能否在某一特定的教育情境当中满足课堂教学中个体和整体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 [1]张铁明. 教学信息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 [2]杨辉. 课堂教学活动系统的复杂性探索[J]. 教师教育研究 2007(19).
- [3] [法]埃德加·莫兰. 复杂性思想导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4] [法]埃德加·莫兰.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5]钟启泉, 刘徽. 教学机智新论——兼谈课堂教学的机智[J]. 教育研究 2008(9).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国际视野中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演变与启示*

王淑芬

(江苏教育学院分院管理办公室,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小学教师培养模式进行了诸多有益的研究与改革,其发展方向趋于开放化和高学历化。比较各国小学教师培养的范式,借鉴其成功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小学教师培养制度,改革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提高培养质量。

[关键词] 世界; 小学教师; 培养模式; 演变;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32-05

所谓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理念的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培养过程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小学教师培养模式涉及小学教师培养学制的选择、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机构的配备、为培养培训小学教师而采取的教学活动的组织运行机制和不同课程模块的组合方式等等。

一、世界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历史演变

下面以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为例,谈谈世界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历史演变。

1. 美英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演变。美国、英国是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代表,其培养模式均具开放性。

美国是实行开放性教师培养模式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规定小学教师必须达到本科学历的国家,其小学师资的培养是“大学+师范”模式。即新生入学后,先在大学的各院系接受3至4年的文理学科教育,然后在综合大学中的教师学院或教育系接受1至2年的教师专业教育。

1986年,美国的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工作小组、霍姆斯小组相继发表了《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明天的教师》两个报告,呼吁“以文理学士学位作为教育专业训练的前提”、“在教育研究

院中实施新的教育专业课程,颁发教育硕士学位^[1]。近年来,美国各州不仅快速提高了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以本科、研究生学历为主,还提高了职前小学教育专业标准。根据美国教育信息中心1999年的统计报告,美国的师范生要比其他专业学生修更多的学分。美国一般本科生只要修完120个左右的学分即可毕业,而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则须修完134个学分。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十分重视小学教师的人文性、师范性和实践性的并重,一般来说,通识类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育专业课程和教育实践的比例约为4:3:2:1。

美国注重小学教师培养标准的制定,对小学教师培养的要求具体而明确,对每一标准的内涵都有细致的解释与说明,指标内容清晰,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全美教师教育评估委员会(简称NCATE)和全国教学专业标准委员会(简称NBPTS)就是合法、规范的评估认证机构,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

英国小学师资的培养是“3+X”合成制模式,前3年为攻读学位,第4年为专业训练。中途采用淘汰制,在第一年结束时,举行一场考试,未通过者,第2年进行专业训练,以2年制师范生毕业。学习课程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江苏省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项目编号:D/2009/01/046)。

[收稿日期] 2011-01-13

[作者简介] 王淑芬(1975-),女,江苏宜兴人,江苏教育学院分院管理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硕士。

各不相同。师范学院学生前3年所学学科,或为文科或为理科,学习文科者,高年级时则前往大学听课,学理科者与普通大学生无异,只是增加了音乐、体育、艺术等课程,以及假期中进行教学实习,最后1年进行专业训练。师范学院的学生4年结束时参加考试,通过者由教育部授予教师资格证书。1975年英国颁布的《继续教育法规》规定,取得教育学士学位或研究生教育证书者,可获得试用教师资格,经1年试用期,并经教育和科学大臣承认其为合格教师(颁发合格教师证书)后,才可被录用在公立学校任教,并规定只有获得教育学士学位的或获得教师证书的人,国家才承认其为合格教师。

英国重视教师进修,实行教师教育一体化。1970年,英国的《詹姆斯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师范教育新模式——师资培训三段制。它将师范教育分为3个连续的阶段,即普通高等教育阶段、专业训练阶段和在职培训阶段,使师范教育中的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体现了非定向型师范教育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英国的师范教育课程注重与中小学实践相结合。英国师范教育课程并非单一的课堂讲授形式,而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有报告会、讨论会、研究会、实践调查、导师个别辅导、自学和课题研究等。教育实习占总课时的比例为20%,约32周,是目前世界教育实习所占课时比重最多的国家之一。

英国注重教育政策的合法性,规范职前教师培训机构的认证制度。英国政府在制定或颁布教育政策时,一般都预先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充分体现公众的意愿,这对于英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比如规范职前教师培训机构的认证制度,新的职前教师培训机构必须通过教师培训管理署的资格认证方能办学,而且要经常接受教师培训管理署的检查,由教师培训管理署根据教育标准办公室检查等级给培训机构评定质量类别。

2. 日韩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演变。日本、韩国是亚洲教育发达国家的代表,了解他们的师资培养模式对我国小学教师的培养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日本自1872年在东京创办第一所师范学校以来,师资培养已有130多年历史。在这13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日本有过封闭式师范教育的经历,也有开放型师资培养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初日本受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把一些

原来的师范学院合并为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其余的则被发展为侧重教育的县市级大学。在《教育职员资格法案》中明确提出: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师一律由新制大学培养,由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做法被废除。《教育职员资格法案》规定中小学教师均以学完4年制大学课程为原则,获得学士学位。日本是继美国之后在历史上第二个实施小学教师必须都是本科毕业生制度的国家。进入新世纪,日本教师教育机构呈现出向更高层次——研究生院发展的趋势。自此,日本的教师教育模式由封闭走向开放,允许各级各类具备条件和资格的大学培养小学教师。但是,对小学教师的认证权力还是掌握在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有权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入职考试,然后采取优胜劣汰的原则来决定他们在学校中的岗位。一般来说,每年只有20%合格的高校毕业生能够成功通过考试被聘为教师。日本教师属于公务员,享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因而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职业。^[2]1974年通过的《确保教育人才法案》要求政府提高教师工资,达到比具有相同资历的公务员工资高出30%~40%的水平,这样,教师这一职业就变得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了。

日本的开放式教师教育体系涉及主要的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也涉及地方和地区性的教育大学。教育大学一方面致力于制定教师职业的高标准,着力把教育作为一个主要领域,尽量保留原有师范学校的价值理念,开设了包括所有小学的课程,为当地培养了大部分的小学教师;另一方面还开设了许多新兴学科,为社区的发展提供多种服务,如为一些其他的机构和组织提供培训、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服务,为当地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日本的教育大学与综合大学虽然都承担着培养小学师资的责任,但风格迥异,在培养的功能上起到互补的作用。

日本小学教师的培养重视教育课程和教育实习。教育课程分为一般教养科目、学科教育专业科目、教职专门科目,每门科目至少修18个学分,占总课时的比例为13%。教育实习则注重现场研究,将原来职前培养阶段的一次性集中实习分散到大学4年之中进行,每一年都安排内容不同的教育实习,以期增加学生的教育实践能力及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指导能力。日本的这种做法虽然与美英两国不同,但各有侧重,呈现出多样、创新的特征。他们都能根

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教育课程的内容,课程面向未来。他们所强调的是不仅要求师范生具备丰富的文化底蕴,更要使他们具有从事未来职业的能力和素质,对小学教师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

韩国小学师资的培养目前也是开放型的,也经历了“中师——大专——大学本科”3个层次的过渡阶段。二战后,韩国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师资培养体制,以独立设置的教育大学取代独立设置的师范学院。培养机构为专门性的4年制国立教育大学。同时还在综合大学和教育大学内设置了“教育研究生院”,培养优秀的具备研究生学历的小学教师。1984年建立了集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为一体、能承担培养师资、教育科学研究人员与教育管理工作等多种职能的新型教师综合培养机构——“韩国国立教员大学”。

二、世界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世界各国小学教师培养的发展历程,都经过了一个由低学历向高学历,由中师向高师,由师范独立体系向开放体系转化的过程。其培养体制的多元化、开放化和综合化,培养范式的一体化和终身化,课程设置的均衡化和可操作化,都为我国制定小学教师的培养方案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世界教师教育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性的教师培养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使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教师培养模式已经和正在走向开放化。

近年来,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大大拓宽了小学教师的培养渠道,除了高师院校外,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也参与培养小学教师,使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发展呈多元化特征。我国现行小学教师的培养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应从基础教育需要与可能的国情出发,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我们认为,应当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和小学一线教师对现行模式进行大量的比较、分析和研究,积极优化培养制度,改革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以便为基础教育培养高质量的小学教师。

1. 完善培养制度,确保培养质量。(1) 出台优惠政策,选择优质生源。第一,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确立小学教育的专业地位;二是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自2009年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以来,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实实在在得

以提高,吸引和鼓励了大批优秀人才自愿从事小教工作,但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待进一步公开化、均衡化和法制化。

第二,明确“免费定向培养”的层次和范围。2007年,教育部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试行“免费师范教育”,表明了教师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再次体现免费定向培养的意义和价值,这并不是教师教育的倒退,而是促进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有益补充。“免费定向培养”的优势一是抓住了培养优秀小学教师的源头,能够招到较好的生源;二是有利于学生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但是,根据近年来实施该项政策的情况反馈来看,也出现了不良现象,如部属师范大学存在“留得住人却留不住心”的现象。“免费定向培养”本身是件好事,但要明确具体的培养层次和范围,我们认为“免费定向培养”的层次拟为省级本专科院校,定向范围宜为落后区县或偏远农村。

(2) 严格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严格对教师的考核与任用,通过颁发教师资格证书来任免教师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如美国教师资格证书由各州颁发,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但无论哪一个州,在颁发教师资格证书时,都会严格按照本州规定的教师质量标准进行考核。日本由于教师地位很高,并不是所有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人都能谋得教师的职业,他们还要参加由各县教育委员会组织的每年一度的教师聘用考试,通过者可被任命为该县的试用教师,经过一年试用合格后,方可成为该地区的正式教师。

我国教师资格认定制度虽然实施多年,但缺乏发达国家那样的对教师资格认定的严格考评管理制度,一般来说,只要具备相应条件并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都能获得证书,并且一旦认定终身有效。这与教师专业化的要求相背离,因为教师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社会的日新月异,知识的加速更新,教师资格终身制显然不利于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为此,要进一步规范教师资格认证体制,引导行业的学术团体和中介组织加入认证工作,以保证认证的专业性。同时要改变一次教师资格认证就终身有效的状况,积极建立教师资格再认证制度。

(3) 建立小学教师培养培训机构资格认定制度。发达国家小学教师培养培训机构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认定。如美国,机构要获得教师培养资格必须通过3种评估:一是机构注册评估,二是机构质量认证,三是专业质量评估。如英国,机构只有通过教师培训

管理署的认证才能获得办学许可,并且要定期接受其检查和评定。由此可见,对教师培养培训机构的资格认证是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以国际教师教育质量保证制度为参照,我国尚没有完善的小学教师培养培训机构资格认定制度,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办学条件和要求,导致小学教师培养机构的授权与高等院校的机构授权相混淆的现象,只要具备高等院校办学资格的都可开办小学教育专业,这一方面不利于强化小学教育专业建设,另一方面会降低小学教师的培养质量。因此,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小学教师的培养培训机构,以提高小学教师培养质量为核心,采取政府宏观管理和专门机构督查相结合的认证评估制度。比如由政府核定机构的数量、规模和标准,再由专职部门定期评估认定。

2. 改革培养模式,适应社会需求。随着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我国小学教育的培养模式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定向走向非定向,由分离走向综合。逐步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带来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多元发展,高质量、高层次的小学教师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欢迎,目前我国小学教师的培养主要分为3个层次:以大专学历为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以本科学历为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以研究生学历为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

(1)以大专学历为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机构主要由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承担,按招生对象不同分为3种学制:一是“五年一贯制”,二是“三二分段制”,三是高中起点二年制专科生。^[3]

前两种学制在我国部分省份生命力依然旺盛,如江苏、湖南就办得很有特色,应该来说目前仍是我国农村小学教师培养的主渠道。但是,由于他们在构建培养模式时是在中师的基础上架构的,因此,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等方面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刻上原有办学模式的烙印,办学思路不开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缺乏大学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精神,不利于小学教师将来的专业发展。而后一种学制则不建议推广,因为该类学校一是生源较差,大多是考不上大学的才选择上专科;二是毕业生不受用人单位欢迎,师范素养和教学基本功薄弱。从目前我国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小学教师本科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专科学历的小学教师仍然会在部分小中城市、农村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逐步向本科化过渡。因此,当前特别要做好该类学校的结构调整,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加强学校软硬件的建设。

(2)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随着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深入,小学教师本科化已提上新的议事日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小学阶段不仅是孩子情感、态度和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而且也是脑神经系统成长发育的关键期。可见,高质量的小学教师对孩子的成长是何等重要。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开始联合招生试办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并且在全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推广,自此,高师院校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已成为大势所趋。^[4]

我们在培养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时必须注重“综合培养,定向发展”。即强调综合培养,明确方向,将小学教育专业确定为文、理两个专业方向,分别以中文、数学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为主,适当辅予以文、理相通的若干课程进行分科教学和专业训练,使学生成为具有小学文科或理科方向课程教学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教师。这一模式淡化了学科专业界限,强调文理均通,符合我国小学教育现状和小学课程国际趋势。

(3)以研究生学历为主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随着国际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目前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已经开始设立“小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点,构建与试行本硕连读的“4+2”模式,即前4年学习本科专业的所有课程,既可以就读师范院校的本科,也可以就读综合性大学的本科,由大学各系管理,后两年学习小学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课程,由大学教育学院管理。

这种模式类似美国的“大学+师范”模式,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处于分离的平行状态,学生具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深厚的学科专业背景,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能够主动吸收国际小学教育前沿的理论和观点,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对小学教师的要求,是我国目前研究型、专家型小学教师培养的理想途径。但由于此类毕业生一般定位较高,多数在教育研究机构或决策咨询机构工作,属于精英式的小学教师培养,因此,尚未大规模招生。

国际教师教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培养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我国小学教师的培养,应根据我国的国情,视具体情况而定,应分地区、分层次、分步骤进行,由点到面,

渐进改革,逐步铺开,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

3. 优化课程体系,突出小教特点。课程是整个教育活动的核心内容,统领着整个教育过程。要提高小学教师的培养质量,不仅要在制度上给予保障、模式上加以改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课程体系上予以优化,通过调整课程结构和充实课程内容来促进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1) 课程结构。目前,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结构通常分为4个模块: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育专业课程、教育实践课程。在课程设置上,要坚持3个并重,即科学与人文并重,以促进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综合;知识与技能并重,以促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综合;理论与实践并重,以促进知识学习与实践体悟的综合。根据这3个并重,建议将课程结构的比例调整为35%、25%、25%、15%。从这个比例分配可以看出,它重视学生普通文化知识的学习,突出小学教育的双专业性(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师范性和实践性等特点,体现了课程体系的综合性,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为一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学科专业课程所占比重略低,因为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它不刻意追求某一学科的深度,而在意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教育专业课程与教育实践课程所占比重略高,因为未来的小学教师是复合型人才,要求教师能够执教多个科目、多个年级,因此要精通各类教育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如日本和韩国,有的小学就实行“包班制”教学。此外,加强教育实践课程能使学生尽早熟悉小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较快适应岗位,进入角色,有利于缩短毕业生专业成长的周期,符合国际小学教师培养的基本做法和我国的基本国情。

(2)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变更、扩展的。小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专业,在课程内容上应贴近社会生活、贴近时代需求,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的小学教师。因此,要在课程结构的基础上明确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

第一,注重课程内容的基础性。所谓基础性就是要重视学生基本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使他们具备丰富自己知识的能力,体现课程的基础价值。由于小学教育的基础性和全面性,要求小学教育专业课程内容要广博,能够覆盖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并且要根据学科需要增加通识选

修课程,使所学内容尽量横跨多个学科专业。

第二,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就是重视加强课程同社会生活的联系,重视同小学的教学环境和特点相联系,体现课程的实用价值。小学教师不同于中学教师,他们不仅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要突出小学教育的艺术性和趣味性,重视课程内容与小学教育实际相联系。为了充分体现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我们认为要在以下4个方面努力:一要加强教师职业技能教育,突出师范性;二要提高活动课程的比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三要增设儿童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课程;四要重视教育实践。以上这些课程都是现代小学教师从业的基本工具,必须在课程体系中确立应有的位置,不能厚此薄彼。

第三,注重课程内容的开放性。所谓开放性,就是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收各国小学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新成就、课程改革的新成果,加强与发达国家交流与学习,体现课程的国际视野。如增设综合课程,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开设具有本国专业特色的综合课程,它一方面开发了学生学习的迁移能力,另一方面大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尽量多的信息,学习尽量多的知识。如增设网络课程,充分利用世界教师教育的优质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知识空间。如开设环境卫生课、法制教育课、社交技能课等,这些课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地理、卫生、生物、法律、劳动等各门学科,更为关键的是与学生的生活内容有关,容易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这是学科课程无法拥有的优势。

[参考文献]

- [1] 谢攀峰. 美、俄、日三国教师职前培养模式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9(3).
- [2] 许美德, 李军. 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比较[J]. 教育研究, 2009(6).
- [3] 黄幼言, 吴言明. 新时期我国小学教师培养模式探讨[J]. 现代教育科学, 2006(2).
- [4] 谢培松. 本专科小学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的研究与构建[J]. 课程·教材·教法, 2004(3).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军人心理的研究进展*

陈友庆 耿海艳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 军事需求促进军人心理研究的发展。军人心理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军事人员选拔、战争应激心理、军事工效学、士气和心理战等方面。制定航天员的选拔标准,帮助退伍军人建立积极的评价方式,改善军队指挥系统的人机互动效应,增强士兵对组织的认同感、提升军队士气等方面是未来军人心理研究和实践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 军人; 心理战; 航天心理学; 军事工效学; 军人士气

[中图分类号] B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37-05

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军事心理研究机构,从事军人心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人心理学的研究和运用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当前,军人心理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以下是笔者对成就较多方面的介绍和述评。

二、军人心理研究几个主要方面的进展

1. 军事人员选拔及心理适应性研究。航天员选拔是军人心理研究中一个新的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一系列航天员选拔计划的实施,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始意识到心理问题在航天员选拔中的重要性。1989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专门小组,讨论制定了航天员心理选拔标准,包括精神病筛查和心理选拔两个方面,保证航天活动的安全性。研究小组认为,有3组心理特质具有重要意义:职业能力倾向、动机、对自己和他人的敏感性。有两个综合性人格模型被证明具有实际意义:一是人格特征测量表,它包括工具性和表达性两个维度。工具性包括制胜

需要、工作需要和竞争性3种成分。表达性包括同情心、言语冒犯、消极交往、无耐性和易激惹等成分;另一是NEO人格调查表评定的大五模型,用于评定正常成年人的5种人格维度,即神经质(N)、外向性(EX)、对经验的开放性(O)、宜人性(A)和责任心(C)。^{[1] P. 150-170}

航天员选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关于人格特征测量表和NEO人格调查表是否在选拔最后阶段具有预测作用,Musson等认为,人格特质测验无法预测哪些人更可能被选拔进入航天员队伍,因为选拔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回答两种量表的成绩没有差异。^[2]但研究同时发现,高绩效人群在成就动机相关的特质方面与一般人群确有不同:男性竞争性得分高于女性,但是表达性和成就奋斗的得分低于女性。

同样,研究者也尝试用各种测验来筛选合格的军事人才。例如,美国军事研究所与其他3家研究机构合作,在武装部队职业能力倾向测验(armed services vocational aptitude battery, ASVAB)的基础上,研究出军队人员选拔和分类项目(the Army's se-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D/2009/01/022);河海大学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正常儿童与聋儿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及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84/407008);河海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课题“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2084/40601133)。

[收稿日期] 2011-02-01

[作者简介] 陈友庆(1964-),男,江苏南京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

耿海艳(1984-),女,江苏徐州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roject (Project A), 为美军的质量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目前, ASVAB 多采用计算机自适应测验的形式, 这样既提高了测量效果, 又节约了经费和时间。^[3]但目前对军人的心理测验与训练绩效间的关系还不是很明确。例如, 研究显示, 能力测验、大五测验与特种部队训练绩效间的相关不显著, 而罗夏墨迹测验的成绩与训练绩效间相关显著, 表明使用罗夏墨迹测验能够预测特种部队的训练绩效。^[4]这有可能是罗夏墨迹测验情境和特种部队训练程序的环境类似, 即都复杂且充满压力, 对被试的防御和应对机制都是个挑战。

中国研究者立足国情和军情, 也编制了一些军队心理选拔测验。例如在招募新兵方面, 有《连续加法测验》《数字搜索测验》^[5]和《中国士兵人格问卷》^[7]; 在军官选拔方面, 有《军官职业人格量表》, 该量表包括“武德取向”(包括忠诚、果敢、牺牲精神和集体意识等方面)、“任务取向”和“人际取向”3个维度, 建立了中国军官职业人格理论模型。^[8]

适应性考察是军人选拔的一项重要指标。影响军人适应的因素有: 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收入水平、训练成绩等。^[9]在入伍意向方面, 父母似乎是通过效能信念对孩子产生最大的影响, 进而在态度与青少年的规范信念之间建立联结。^[11]在预测因素方面, 吸烟状况可以比较有效地评估现役人员服役的适应性。^[12]与从未吸烟者相比, 吸烟者的适应情况很糟。在服役的适应性评估中包含吸烟状况并进行甄选, 可能会提高军队在加强战斗准备性方面的能力。

2. 战争应激心理研究。研究表明, 各种应激源(包括战争应激和非战争应激, 例如家人分离、工作要求等)都会影响军人的生活功能和心理健康。^[13]研究显示, 不同的军事应激阶段及不同地区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皆存在差异。在非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军人常模差不多; 而在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应激前高于军人常模, 应激中低于军人常模, 应激后与军人常模差不多。其中城镇驻军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高原驻军和边防驻军。有研究者还分析了在应激环境中(例如戈壁沙漠、高原、高海拔等环境)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结果是: 边防军人的睡眠质量比一般人群要差, 部分军人存在抑郁、焦虑及躯体性不适等较明显的问题。^[14]信息过剩或信息爆炸, 信息缺失或信息封闭, 虚假信息或恐吓信息等, 都会造成军人身心功能

障碍, 丧失训练能力或战斗力。研究者将这种由于信息引起的个体心态失衡、社会群体效能下降, 称为信息损伤。^[15]

相对于其他的应激, 战斗应激(属于战争应激的一种)应该是军人经历的最严重的一种应激。战斗应激的进程一般有即时、急性和慢性3个阶段。战斗应激反应(combat stress reaction, CSR)的病员(指不是由于敌人射击、炮弹或爆炸而退出战场的伤员)在创伤情境中会立即进入即时阶段, 典型表现是不定型的弥散性焦虑, 并伴有躯体、行为和情感上的一些症状。若未能自发恢复或治疗失败, 就会转入急性阶段。慢性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创伤后综合征的症状, 主要形式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及其他表现。^[16]对于急性应激症状, 个体以下几种稳定的特征可以作为预测因素: 知觉的应激, 被动应对和情绪取向应对方式。^[17]PTSD的症状表现为: 反复回忆创伤性体验, 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 情感麻木及警觉性增高。

研究者对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给予了更多关注, 其中退伍军人 PTSD 的症状, PTSD 对生理、心理的影响, 如何通过评估、干预和有效的治疗措施来提高退伍军人的身心健康等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发现, 这些退伍军人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较差,^[18]在退休期间经历了心理和生理症状的较大增加。^[19]PTSD 症状和攻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警觉性增高症状与攻击呈正相关, 回避或麻木症状与攻击呈负相关。重新体验症状通过生理反应和酗酒问题(alcohol problems)间接与攻击相关。^[20]PTSD 症状的改善会同步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 但是治疗初期的症状改变与后来生活质量的改变相关不显著。^[21]此外, 研究揭示不同性别的 PTSD 患者的症状表现有所不同, 男性更多地显示为退却或麻木, 女性则显示为唤醒或缺乏控制和自我迫害。女性退伍军人是否参加过战争与家庭生活适应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22]

利用心理素质训练、心理干预、心理支持综合性措施, 可以提高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了提高 PTSD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可用治疗资源的影响(治疗时的短期影响或治疗后的长期影响), 需要更好地理解治疗的经济因素和其他的治疗方法, 以确定不同治疗方案的相对效益。^[23]外伤风险管理(Trauma risk management, TRIM)是一种短期集中进行的心理教育管理战略, 寻求改变个体对 PTSD、压力和寻找帮助

的态度,训练军事人员识别处于危险的个体,针对他们进行早期干预。^[24]

3. 军事工效学研究。军事工效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系统设计,优化人类工作绩效来提高武器系统的效能。^[16]目前军事工效学研究领域逐渐从高技术含量的航空准备扩展到陆、海军常规武器装备上。^[25]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操作人员的认知加工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许为以认知工作分析(Cognitive work analysis,CWA)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人机认知系统框架,强调飞行员的认知加工能力(知识——驱动式监控、自动化意识和心理模型)对人——自动化交互作用的影响;通过有效的人——显示器界面及人——控制器界面设计所构成的人机反馈式环路,强调飞行员和自动化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对飞行安全的贡献。^[26]这一框架的开发,进一步完善了飞行员关于自动化系统的心理模型,提高了其自动化意识。研究者发现,触觉线索有助于提高多重任务的绩效,提高虚拟环境(virtual environment,VE)中操作人员的空间意识。^[27]Rönkkö等研究表明,以投射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环境系统和恰当的交互技术可以成功地应用于航天员的零重力训练。^[29]

由自动化带来的操作人员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增加的问题也在引起研究者的注意。Grootjen等开发了一种在复杂环境中测评认知任务负荷水平的工具,它包括3个维度:时间占用、任务设置转换和信息加工水平。^[30]实践表明,它可以有效地预测任务负荷。李金波和许百华的研究得出对认知负荷变化敏感的6个评估指标:主任务反应时、主任务正确率、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心理努力及任务主观难度,建立了认知负荷多维综合评估模型。^[31]他们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持续作业过程中认知负荷变化预测模型。该模型的构建有助于动态监控和预测操作人员的认知负荷情况,使操作人员保持最佳认知负荷状态,从而提高操作人员绩效,促进其身心健康。^[32]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每种模型都不可能达到对人机系统中所有的认知负荷进行预测。

4. 军人士气研究。士气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普遍将士气看作是一种个体特征,多数关于士气的定义里涉及群体中个体的积极性和坚持性品质。而凝聚力作为士气的一个影响因素,被视为一种群体特征。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小群体的凝聚力。

关于凝聚力的发展和影响因素,Bartone和Adler

研究发现,在维和行动的3个阶段(部署早期、部署中期和部署后期),凝聚力水平的发展呈倒U型。不同的环境变量,随着时间推移会影响凝聚力。在部署早期,主要是领导者的信心及对士兵的信赖的影响;在部署中期,同伴士兵的信任和执行任务的成功更重要;在部署后期,领导者的信任和后方家庭的信赖成为最强的影响因素。^[33]Bartone等认为,促进小群体凝聚力提高的因素有:应激演习的体验,个体与小群体其他成员的熟悉感。个体坚强的个性品质和小群体的领导力同样对群体凝聚力产生积极影响。^[34]Oliver等开展的元分析表明,凝聚力与团体或个体绩效、工作或军队满意度、幸福、准备状态等内容呈正相关,与违反纪律行为呈负相关。^[35]研究表明,感知的与群体任务相关的凝聚力能预测工作满意度,这反映出群体的凝聚力与心理困扰负相关。^[36]

5. 心理战研究。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明确地把“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简称“三战”)载入其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重视它们在信息化条件下的重要作用。“三战”在美、英、法等国军队中被统称为“心理战”或“心理作战”。有研究者认为心理战的实质是以有效的信息刺激引起预期的心理反应,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斗争目标的实现。^[37]对于心理战的基本成分,Schleifer认为有3种: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s)、信息和宣传手段。^[38]蒋杰认为,心理战运行由心理战的主体、心理战的信息、心理战的传媒、心理战的环境、心理战的对象、心理战的效果与反馈6个基本成分构成。^[39]

心理战已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一种全方位、全时空、多层次的战略行动。随着对信息化条件下心理战研究的不断深入,联合心理战、震慑心理战、信息心理战、心理中心战等战略思想被不断构建和完善中。^[40]

三、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军人心理的研究,在人员选拔、临床心理、人机系统、心理战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些成果为军队的建设以及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当然,一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

1. 进一步制定有效的航天员选拔标准。现有的心理测验可以将一些预期日后发病的候选人排除在航天员外,但是一系列测验还无法预测哪些个体将在判断、合作功能、易激惹或者破坏性的人际行为中表现异常。^[41]飞行中遇到的多元化因素,对航天员的

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研究需要制定更加有效的,甚至是国际通用的航天员选拔标准和评定方法,以提高航天员飞行工作的绩效。另外,随着女航天员的增多,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针对女性特点的方案。

2. 退伍军人自身积极特性的开发。以往的研究更多倾向于从创伤后应激障碍角度研究退伍军人,忽略了他们自身具有的积极特性。研究者对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男性退伍军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那些认为在越南的服役对现在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并且感觉战争对现在生活影响不大的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最低,他们更可能成功适应战时和战后生活,而防御性否认(认为服役对现在生活没有负面影响)则与适应不良相关。^[42]因此,是否可以通过改变退伍军人的消极评价方式,使他们积极地评价过去的创伤事件,从而帮助他们适应现在的生活,还有待进一步实践。

3. 建立军事指挥控制操作系统和用户间的相互“理解”。军队指挥控制操作系统属于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它必须适时调整,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Roth等在空运指挥和控制组织中开发了“工作中心支持系统”(work-centred support system,WCSS),以帮助进行天气预报和监测。^[43]对于系统而言,其最佳设计是能够根据用户不断变化的需要及时做出反应,而对于用户来说,能够适应工作系统的不断变革则是必须的。

4. 增强士兵对组织的认同感,提升军队士气。Griffith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个体还是群体层面上,支持型领导和合作型同伴都能够帮助士兵建立起对组织的认同感,减少他们离开组织或部队的可能性,增强其对战斗准备状态的感知。^[44]李春苗认为,增加团队的互动程度,进行目标强化和提高领导个人水平有利于形成高昂的士气。^[45]这些内容,都需要军队工作者开展深入的实践才能够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 [1]Santy P A. 航天员必备心理素质的鉴别——航天员的心理选拔 [M].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0.
- [2]Musson D M, Sandal G M, Helmreich R 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t Clusters in Final Stage Astronaut Selection [J].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04(4).
- [3]田健全. Project A 对我军心理选拔的启示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2).
- [4]Hartmann E, Sunde T, Kristensen W, Martinussen M. Psychological Measures As Predictors of Military Training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3(1).
- [5]肖玮, 苗丹民, 贡京京, 武圣君. 征兵用连续加法测验的研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8).
- [6]肖玮, 苗丹民, 贡京京, 武圣君. 征兵用数字搜索测验的研制 [J]. 心理科学, 2007(1).
- [7]肖利军, 苗丹民, 肖玮, 武圣君, 李红政. 应征公民心理选拔的人格评估 [J]. 心理学报, 2007(2).
- [8]王芙蓉, 陶嵘, 张亚林. 中国军官职业人格模型的初步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2).
- [9]张军胜, 吴凯, 王家同, 肖玮. 某部新兵心理健康状况及适应性研究 [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9(11).
- [10]李文姣, 符明弘, 王雪松. 入伍新兵适应性问题的质化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6).
- [11]Gibson J L, Griepentrog B K, Marsh S M. Parental influence on youth propensity to join the military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7(3).
- [12]Haddock C K, Pyle S A, Poston W S C, Bray R M, Stein, R J. Smoking and body weight as markers of fitness for duty among U. S [J]. Military personnel. Military Medicine, 2007(5).
- [13]冯正直, 戴琴. 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 [J]. 心理学报, 2008(3).
- [14]王燕, 解亚宁. 驻戈壁边防军人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3).
- [15]苗丹民, 朱霞. 心理战信息损伤的概念与研究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2).
- [16]Gal R, Mangelsdorff A D. 军事心理学手册 [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 [17]Taylor M K, Mujica-Parodi L R, Padilla G A, Markham A E, Potterat E G, Momen N, et al. Behavioral Predictors of Acute Stress Symptoms During Intense Military Training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09(3).
- [18]Murphy D, Hooper R, French C, Jones M, Rona R, Wessely S. Is the increased reporting of symptomatic ill health in Gulf War veterans related to how one asks the question? [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6(2).
- [19]Schnurr P P, Lunney C A, Sengupta A, Spiro A.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tirement in Older Male Veterans [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3).
- [20]Taft C T, Kaloupek D G, Schumm J A, Marshall A D, Panuzio J, King D W,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der symptoms , physiological reactivity , alcohol problems , and aggression among military veterans[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 2007(3).
- [21] Schnurr P P , Hayes A F , Lunney C A , McFall M.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Veterans Treated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2006(4).
- [22] Taft C T , Schumm J A , Panuzio J , Proctor S P. An Examination of Family Adjustment Among Operation Desert Storm Veterans[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2008(4).
- [23] McCrone P , Knapp M , Cawkill P.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n the Armed Forces : Health Economic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 2003(5).
- [24] Gould M , Greenberg N , Hetherington J. Stigma and the military : Evaluation of a PTSD psychoeducational program[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 2007(4).
- [25] 苗丹民. 军事心理学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 2006(2).
- [26] 许为. 自动化飞机驾驶舱中人——自动化系统交互作用的心理学研究[J]. 心理科学 , 2003(3).
- [27] Chen J Y C , Terrence P I. Effects of tactile cueing on concurrent performance of military and robotics tasks in a simulated multitasking environment[J]. Ergonomics , 2008(8).
- [28] Hale K S , Stanney K M , Malone L. Enhancing virtual environment spatial awareness training and transfer through tactile and vestibular cues[J]. Ergonomics , 2009(2).
- [29] Rönkkö J , Markkanen J , Launonen R , Ferrino M , Gaia E , Valter B , et al. Multimodal astronaut virtual training prototy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 2006(3).
- [30] Grootjen M , Neerincx M A , Veltman J A. Cognitive task load in a naval ship control centre : from identification to prediction[J]. Ergonomics , 2006(12 - 13).
- [31] 李金波 , 许百华. 人机交互中认知负荷的综合测评方法[J]. 心理学报 , 2009(1).
- [32] 李金波 , 许百华 , 田学红. 人机交互中认知负荷变化预测模型的构建[J]. 心理学报 , 2010(5).
- [33] Bartone P T , Adler A B. Cohesion Over Time Peacekeeping Medical Task Force[J]. Military Psychology , 1999(1).
- [34] Bartone P T , Johnsen B H , Eid J , Brun W , Laberg J C. Factors Influencing Small-Unit Cohesion in Norwegian Navy Officer Cadets[J]. Military Psychology , 2002(1).
- [35] Oliver L W , Harman J , Hoover E. A Quantitative Integration of the Military Cohesion Literature[J]. Military Psychology , 1999(1).
- [36] Ahronson A , Cameron J E.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Group Cohesion in a Military Sample[J]. Military Psychology , 2007(1).
- [37] 于家洋. 心理战的心理学理论依据探析[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 2002(3).
- [38] Schleifer 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 A New Variation on an Age Old Art : Hezbollah versus Israel[J].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 2006(1).
- [39] 蒋杰. 我军心理战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概要[J]. 心理科学进展 , 2006(3).
- [40] 武军仓 , 纪程飞. 信息化条件下心理战研究综述[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 2006(3).
- [41] Collins D L. Psychological Issues Relevant to Astronaut Selection For Long-Duration Space Flight :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Human Performance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 2003(1).
- [42] Dohrenwend B P , Neria Y , Turner J B , Turse N , Marshall R , Lewis-Fernandez R , et al. Positive Tertiary Appraisal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U. S. Male Veterans of the War in Vietnam : The Roles of Positive Affirmation , Positive Reformulation , and Defensive Denial[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2004(3).
- [43] Roth E , Scott R , Deutsch S , Kuper S , Schmidt V , Stilson M , et al. Evolvable work-centred support systems for command and control : creating systems users can adapt to meet changing demands[J]. Ergonomics , 2006(7).
- [44] Griffith J.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ohesion's Relation to Stress , Well-Being , Identification , Disintegration , and Perceived Combat Readiness[J]. Military Psychology , 2002(3).
- [45] 李春苗. 军队士气模型、影响因素及其激励机制研究[D]. 广州 :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 2006.

(责任编辑 刘敏慧)

新生研讨课上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效果调查研究^{*①}

——基于国内研究型大学M的调查

何华春¹ 余忠亮²

(1.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3 2.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如何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已成为教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本研究通过准实验法,对新生研讨课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新生研讨课可以促进新生批判性思维发展,小班化教学和跨学科选修制度,师生互动、合作学习、研讨式教学、灵活考核等教育教学方式是实现新生研讨课促进效果的保证。

[关键词] 新生研讨课; 批判性思维;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42-04

一、前言

2010年7月29日国家正式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1]。2010年2月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年度讲座发言时指出:“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2]研究型大学要想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在人才培养上必须强调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二、文献回顾

虽然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大致上都有共同看法,即认为批判性思维既包括批判性思维技能,又包括批判性思维的人格特质。^[3]具体说来,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在思维技能方面往往表现为有目的、有目标地去思考,藉以解决问题、推理、计算成功率及做出决策。^[4]在人格特

质方面,这类人往往表现为好奇心强、见多识广、信任性强,而且开明。^[5]

近些年,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受到了重视,探讨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途径成为了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应从大学的学习方式与教育方式变革入手,创建良好课堂学习环境,鼓励学生批判质疑,采用案例教学方式。^{[6][7]}还有学者提出重在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技能,通过学科教学来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培养模式。^[8]探讨如何通过课程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案例研究开始出现。^[9]纵观这些研究的一大不足之处是缺乏实证研究。

新生研讨课是指由各学科领域的知名教授担任主导教师,专门为全校大一本科新生开设的小班研讨课。其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术品质、感受研究的乐趣、接触著名教授、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同时,认识大学和熟悉学校环境、资源,以此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习阶段的转换过程。^[10]新生研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构建适应与引导创新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体系”(项目编号: A12009107)。

[收稿日期] 2011-02-22

[作者简介] 何华春(1985-),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余忠亮(1984-),男,江西乐平人,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硕士研究生。

① 感谢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教授的指导。

讨课普遍具有小班教学、学习内容灵活、注重研讨、师生互动、鼓励质疑等教学特点。^{[11][12]}它是我国近几年新兴的课程,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新生教育途径,可以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发挥积极作用。^[13]自2003年清华大学首次开设新生研讨课以来,全国研究型大学纷纷响应。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对新生研讨课上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效果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以期寻找规律,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提供参考依据。

三、研究设计与过程

1. 研究思路。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的研究思路。研究中涉及3个组,一组是实验组,另外两组是控制组。研究人员对实验组新生实施前测和后测;对一组控制组学生(上了新生研讨课)只实施后测,目的是检测出前测与实验刺激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影响;对剩下的一组控制组学生(没有上新生研讨课)也只实施后测,目的是检测出实验以外的因素影响的结果。计算实验结果时用实验组的差分分别减去两控制组的差分,所得结果就是实验刺激的影响。本研究中,如果实验结果大于零,则表明新生研讨课可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否则表示没有促进效果。研究思路图示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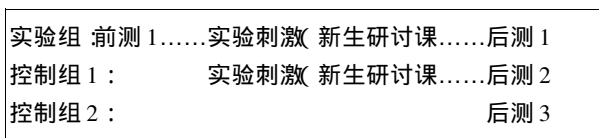


图1 新生研讨课准实验设计研究思路

计算公式如下:

实验刺激的影响 = 实验组的差分 - 控制组 1 的差分 - 控制组 2 的差分 = (后测 1 - 前测 1) - (后测 2 - 前测 2^①) - (后测 3 - 前测 3)

2. 研究对象。本研究以 M 大学 2009 级新生为总体。M 大学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1994 年,被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支持的大学;1999 年,该大学进入国家“985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

学行列。2006 年,教育部和该大学所在的省再次签订重点共建 M 大学的协议,共同支持 M 大学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2009 至 2010 学年, M 大学首次面向全校一年级本科生推出 70 门新生研讨课。该校派出最强的本科教学阵容打造这批课程,要求课程主持人是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新生研讨课来自该校几乎所有院系,并且打破院系门槛、专业壁垒,实现每门课程面向全校新生开放,实施小班化教学(班级人数不超过 30 人)。

3. 测量工具。自编批判性思维测量问题,但没有单独制成测量量表,而是把这些问题融于新生适应问卷中,将其作为新生适应问卷中的一部分一起测量。批判性思维测量问题编制以美国比较成熟而且应用较广泛的测量个体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的量表 CCTDI(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为参照,根据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生特点,将批判性思维的维度设定为“系统性”、“分析性”、“求真”和“开放性”4 个维度,前两个维度代表了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后两个维度代表了批判性思维人格特质方面。各维度题目形式为自陈量表,以李克特量表五点计分法来测量学生对题目所描述的情况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②前测 1、后测 1、后测 2 及后测 3 各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672、0.673、0.775 和 0.586。

4. 抽样方法及过程。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抽样。在新生研讨课开始前,抽取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总计 174 人);在新生研讨课结束之际又抽取新生进行问卷调查(总计 130 人)。此次的调查问卷中增加了一道问学生是否参与过前测的题,从而区分出参与了前测的学生(总计 47 人,作为实验组)和没有参与前测的学生(总计 83 人,作为控制组 1)。大一下学期开学初,我们又问卷调查了刚选上新生研讨课的新生(总计 86 人,作为控制组 2)。^③

四、研究结果

大一上学期开学初所测新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

① 前测 2 由前测 1 代替。同样的,前测 3 也由前测 1 代替。

② 各维度问题举例:求真——“我经常因为担心我的观点遭别人反对而选择沉默”;开放性——“与高中老师相比,我喜欢大学老师的教学方法”;系统性——“我不清楚大一上的课与今后的专业学习有什么关系”;分析性——“我能够分辨出老师的讲解思路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

③ 有两点要说明。第一,每个新生只可选修一次新生研讨课。也就是说如果你大一上学期选修了,那么大一下学期就不能再选了,只能让那些上学期没选上的去选修。第二,按理说,控制组 2 的学生也应在大一上学期结束时测量,但由于受实际情况限制,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大一开学初再测。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一般来说批判性思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如果在假设控制组 2 学生批判性思维已经增长即控制组 2 的差分增大的情况下,实验组差分减去它仍能大于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增强说明了新生研讨课的效果。我们的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维度得分见表 1。这些数据将作为新生入学时批判性思维得分初值。

表 1 新生入学时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①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58285	.636548
求真	3.786	.7927
开放性	3.434	.9389
系统性	3.537	.8669
分析性	3.549	.9878

实验组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得分见表 2。

表 2 实验组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67663	.737665
求真	3.837	.8169
开放性	3.809	1.0711
系统性	3.511	1.0859
分析性	3.585	.9798

控制组 1 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得分见表 3。

表 3 控制组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57470	.595398
求真	3.849	.6929
开放性	3.355	.9707
系统性	3.494	.8392
分析性	3.622	.8224

控制组 2 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得分见表 4。

表 4 控制组 2 后测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各维度的平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批判性思维	3.46726	.544385
求真	3.631	.7203
开放性	3.384	.7695
系统性	3.413	.7978
分析性	3.465	.8771

我们利用测出的平均值进行计算进而可判断出新生研讨课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是否起促进作用。依据计算公式有如下等式：

$$\text{新生研讨课效果} = (3.67663 - 3.58285) - (3.57470 - 3.58285) - (3.46726 - 3.58285) = 0.21752 > 0$$

因为最后结果大于零,所以可以说新生研讨课

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上了新生研讨课的新生其批判性思维可提高 4%(计算过程 $0.21752 \div 5 \times 100\% = 4\%$)。同理,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出批判性思维 4 个维度的提高结果,分别是 0.143(求真 $\chi 2.9\%$)、0.504(开放性 $\chi 10\%$)、0.141(系统性 $\chi 2.8\%$)、0.047(分析性 $\chi 1\%$)。由此可见,新生研讨课对新生的开放性促进作用最大。

五、讨论与结论

1. 新生研讨课上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效果分析。本研究数据显示新生研讨课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起促进作用。笔者在随后对上了新生研讨课的新生进行访谈时,学生们普遍反映,上新生研讨课后他们对研究探索有了初步感性认识,不再感觉那么神秘,并且产生了兴趣,敢于并且愿意跟老师和同学交流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改变了对知识学习的认识,培养了分析意识,学会了怎样找资料,分析资料;锻炼了写论文、做研究报告的能力。学生们的体会和评价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新生研讨课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课堂学习经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具有显著性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大一学年结束时新生的批判性思维得分上)。^[14]美国等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将批判性思维融入各门学科的教学,通过课程教学的潜移默化来强化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训练是非常有效的途径。^[15]国内进行的一项对我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调查研究显示,与美国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得分明显偏低,并且从总体上看,中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偏于消极。^[13]

综上,本研究认为,新生研讨课作为一类课程可以发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作用的观点是可信的。针对国内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偏低这一事实,开设新生研讨课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2. 新生研讨课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原因分析。笔者在随后对上了新生研讨课的新生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学生谈到了新生研讨课让他们感到满意的方面。归纳如下:跨学科选修,学习内容新颖,吸引人;老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性强;教学方式灵活,研讨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教学方式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经常讨论问题,课堂氛围活跃,考核方式灵活,如写读书报告、小组做 PPT 向全

^① 批判性思维及其各维度得分都以 5 分作为满分。每个维度的得分是该维度下所有问题得分之和的平均值,批判性思维总分是各维度得分之和的平均值。

班学生做 Presentation ;课后一般有搜集资料的学习任务,锻炼了自主学习能力。

已有研究表明,跨学科课程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有帮助。^[16]M 大学新生研讨课来自该校几乎所有院系,并且打破院系门槛、专业壁垒,实现每门课程面向全校新生开放,为学生跨学科选修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一些教学方式也被证明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积极作用,如学生写读书报告,教师点评,小组合作就某一问题进行研究,班上公开做研究报告,以写论文的考核方式代替笔试,等。^{[16][17]}上述教学方式在 M 大学的新生研讨课上都有体现,也被学生认可。

小班化教学制度为上述灵活的教育教学方式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条件。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是大班上课,那么上述的教育教学方式一般很难开展。

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只是准实验,没能做到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如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的选择、教师因素的考虑、学科因素的考虑,等等。这些势必影响实验测量结果。其次,本研究在测量新生的批判性思维时没有编制单独的量表,而是将其融合于新生适应量表中。这导致测量的维度和问题的数量有限,不能很全面地测量出新生批判性思维。最后,本次研究只选取了一所研究型大学,样本数有限,代表性有待商榷。期待更完善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新生研讨课可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要发挥新生研讨课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这一作用,应做到两点。课程开设方面,要求课程开设多样,以利于学生跨学科选修,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同时做到小班化教学。教学方式方面,要求做到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师生积极互动,鼓励质疑;采用研讨式教学方式,鼓励小组合作学习,考核方式灵活多样,提倡采用写读书报告、写论文、课上做研究报告等考核方式,同时教师应积极给予学生反馈。

新生研讨课为新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其小班化教学、跨学科选修等特点是其他一般课程所没有的。如果学校能合理开设新生研讨课,对教师教学方式进行正确引导,那么新生研讨课将积极促进新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从而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高水平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

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 [EB/O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01_zcwj/201008/xxgk_93785.html 2010 - 7 - 29/2011 - 1 - 15.

- [2] [美] 理查德·莱文. 亚洲大学的崛起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4).
- [3] 罗清旭, 杨鑫辉.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3).
- [4] Halpern, D. F. (2003). Thought and knowledge :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4th ed.) [C]. Mahwah, NJ : Lawrence Erlbaum.
- [5] Facione, P. A. (1990). Critical thinking :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or(The Delphi Report) [C]. Millbrae, CA : California Academic. (ERIC Document No. ED315423)
- [6] 朱新秤. 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 [J]. 高教探索, 2002(2).
- [7] 左洪亮. 努力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J]. 江苏高教, 2004(6).
- [8] 罗清旭. 批判性思维的结构、培养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3).
- [9] 王君超. 媒介批评课程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5).
- [10] 张红霞. 美国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及其启示 [J]. 中国大学教学, 2009(11).
- [11] 马启民. “ seminar ” 教学范式的结构、功能、特征及其对中国大学文科教学的启示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3(2).
- [12] 刘宝存. 美国研究型大学一年级习明纳尔课程 [J]. 外国教育研究, 2005(3).
- [13] 刘俊霞, 张文雪. 新生研讨课 : 一种有效的新生教育途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6).
- [14] Patrick, H. T., Leonard, S., Ernest, T. P. & Amaury, N. Influenc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5(1).
- [15] 岳晓东. 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培养 : 西方现代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 [J]. 教育研究, 2000(8).
- [16] Lisa Tsui. Courses and Instruction Affecting Critical Thinking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9(2).
- [17] Lisa Tsui. Fostering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Effective Pedagogy [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2(6).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小学生学业归因倾向调查研究*

林颖¹ 李诺² 李军³

(1.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 2.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重庆 400715 ;
3. 河北邢台市第二十三中学, 河北邢台 054000)

[摘要] 运用韦纳的归因理论, 编制了的学生学业成就归因问卷, 调查小学生面对成功与失败两种情况的归因状况, 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小学生的归因倾向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即无论成功与失败,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比小学中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归因于内因。说明小学生的学业成就归因模式发展趋势是积极的, 这就为学校的教育工作提供了指导意义。教师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应了解学生的归因特点, 给予学生适当的评价, 把握好教材和考题难度, 进行正确的归因训练, 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学习的动机和自信心, 提高学业成绩。

[关键词] 小学生; 学业成就; 归因理论

[中图分类号] B849.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46-04

一、引言

归因理论首先由海德(Heider)(1950, 1958)提出, 此后就迅速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 我国学者在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对国内各阶段学生的成就归因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发现结果与韦纳结论相似, 但有一些呈现出我国的特点。例如韩仁生(1996)探讨了中小学生对考试结果的归因、期望和情感反应的特点。结果发现, 中小学生对考试成败原因存在不同的认知: 成功后, 高中生觉察的主要原因是心境、临时努力、教学质量、持久努力; 初中生认为主要原因是运气、心境、他人帮助; 小学生认为是教学质量、持久努力、运气。失败后, 高中生觉察到的主要原因是能力、持久努力、心境; 初中生认为主要是持久努力、教学质量; 小学生认为主要是他人帮助、心境、临时努力, 并且年级差异显著, 性别差不显著。学生失败后的期望显著高于成功后的期望, 且显著地认为失败的结果是可以改变的, 成功后主要产生了感激、自豪与欣慰, 失败后内疚、自卑, 成功后的情感反应更强烈。^[1]

金岐凤、郑丽(2005)对中学生学业成就归因进

行了研究, 得出: 我国学生理想的归因模式是按下列主次顺序排列的: 努力、方法、能力、教师教学水平、家庭环境、任务难度和运气。^[2] 归因中有年龄因素的作用, 总体上学生对努力的作用都高于对能力的归因,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能力的作用逐渐重视。

目前国内研究者关于成就归因的研究侧重于中学某一学科上的调查研究, 对小学生学业成就归因状况的调查研究却显空白。本研究以归因理论为指导, 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 以河北邢台市第二十三中学的中、高年级的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小学生学业成败的主要归因, 不同年级、性别的学生是否存在归因倾向差异,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为有效指导小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归因, 了解其归因特点及偏差, 使之发挥积极的学习态度与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并为教师、家长及学生自己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帮助小学生对自己学业更好地进行归因, 评价自己, 促使他们有效地学习, 身心健康成长。

二、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客观性、代表性及科学性, 被试选自邢台市第二十三中学的小

*[收稿日期] 2011-03-06

[作者简介] 林颖(1987-), 女, 河北邢台人,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李诺(1983-), 男, 安徽宿州人,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李军(1972-), 男, 河北邢台人, 河北邢台市第二十三中学教师。

学生,考虑到小学低年级学习内容及理解水平的局限,仅从三、四、五、六4个年级分层随机抽取。从各年级随即抽取一个班,并在已选班级中随机选36名学生进行调查,男女各半,共144名学生。共收回问卷131份,有效问卷为125份,有效率为95.4%。其中男生有70人,女生55人。

2. 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小学生学业归因倾向调查问卷。问卷是在韦纳的归因理论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分为成功和失败两大部分,各部分包括内因和外因2个因素,每个因素又分为6个项目,分别是能力高低、努力程度、兴趣程度、身心状态、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任务难度、老师影响、运气好坏、家长关心、同学帮助和学习氛围。其中前6个项目属于内部因素,后6个项目属于外部因素。问卷中每个项目各有2题,共计48道题。

本问卷以内部一致性系数作为信度考验依据。问卷在正式调查前先进行了前测。根据样本在48题的填答结果求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为0.7139,所得系数均达0.01显著水平,代表本量表的信度较佳。

3. 研究程序。问卷调查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和注意事项并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指导语,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填写,由主试收回并整理问卷,同时辅以个别访谈。对调查材料从不同维度进行整理分析,得出结论。最后,根据结果讨论提出相关针对性措施与方法。

4. 研究方法。运用SPSS15.0软件,由研究者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统计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三、结果分析

1. 小学生学业成绩归因的总体调查结果。(1)小学生学业归因总体得分情况(见表1)。

表1 小学生成败归因分析

	内因		外因		T
	M	SD	M	SD	
成功	29.51	7.4	30.3	8.1	-1.67
失败	41.1	7.6	47.6	11.1	-1.93

注:* $p < 0.05$,** $p < 0.01$,下同

根据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本文分别调查了小学生在成功与失败归因上的总体情况,并分析了其在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的性别差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小学生面对成功还是失败,其归因的内因得分均低于外因得分($29.51 < 30.3$; $41.1 < 47.6$),而问卷中得分越低代表越赞同此归因。但差异并不显著($t > 0.05$)。说明小学生无论成功与失败,并

没有明显的归于内因或归于外因的态度,即小学生没有形成固定的归因模式,其归因倾向的可塑性很强。

(2)小学生成败归因得分分布情况(见表2、表3)。

表2 成功时小学生归因的分布状况

内因		外因	
因子	平均百分数%	因子	平均百分数%
能力	40.0	任务难度	38.8
努力	59.6	老师影响	70.0
兴趣	63.6	运气好坏	54.4
身心状态	42.2	家长关心	74.0
学习态度	48.0	同学帮助	59.2
学习习惯	70.0	学习氛围	54.4

表3 失败时小学生归因的分布状况

内因		外因	
因子	平均百分数%	因子	平均百分数%
能力	20.8	任务难度	14.4
努力	34.0	老师影响	11.2
兴趣	15.6	运气好坏	10.8
身心状态	14.8	家长关心	10.8
学习态度	22.0	同学帮助	13.2
学习习惯	43.2	学习氛围	13.2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小学生对学业成就归因的整体分布情况:成功情况下,小学生归因的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任务难度、能力、身心状态、学习态度、运气好坏和学习氛围、同学帮助、努力、兴趣、学习习惯和老师影响、家长关心。而失败情况下,归因的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运气好坏和家长关心、老师影响、同学帮助和学习氛围、任务难度、身心状态、兴趣、能力、学习习惯、努力、学习态度。

2. 小学生学业成绩归因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1)小学生学业成败归因的年级差异(见表4)。

表4 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业成败归因的方差分析

年级	成功内因	成功外因	失败内因	失败外因
	平均差	平均差	平均差	平均差
3 4	3.82 *	6.03 *	-8.21 *	-17.06 *
5	7.85 *	6.97 *	-11.38 *	-17.03 *
6	4.63 *	5.62 *	-8.06 *	-15.11 *
4 3	-3.82 *	-6.03 *	8.21 *	17.06 *
5	4.03 *	0.93	-3.17	0.03
6	0.81	-0.41	0.15	1.96
5 3	-7.85 *	-6.97 *	11.38 *	17.03 *
4	-4.03 *	-0.93	3.17	-0.03
6	-3.22	-1.35	3.32	1.92
6 3	-4.62 *	-5.62 *	8.06 *	15.11 *
4	-0.81	0.41	-0.15	-1.96
5	3.22	1.35	-3.30	-1.92

根据表4可得知:成败归因在不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成功与失败,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比

小学中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归因于内因,统计分析达到相当显著水平($p < 0.05$)。归纳起来,小学高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刻苦努力、学习态度,将失败更多地归因于努力程度、学习方法等内部可控因素。这种归因状况要比小学中年级学生理想、积极得多。这充分说明中小学生对学业成败的归因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年级的学生具有不同的归因认知和归因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生的归因趋向于合理。

此外,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归因于内因还是外因,三年级的学生与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归因都有显著差异,且成功时三年级同四五六年的平均差都为正,而失败时都为负,说明成功时三年级学生的归因分数都高于四五六六年级,而失败时三年级学生的归因分数都低于四五六六年级。由于问卷中分数越低代表越赞同此类归因,因此,相比之下,三年级的学生更倾向于做失败归因,而四五六六年级更倾向于做成功归因。

(2) 小学生学业成败归因的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在小学生成就归因上,虽然存在年级差异,但不存在性别差异。根据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见表5),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男女生的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的平均分数和标准差都相差无几,并没有达到统计中的显著水平(各归因中 $|t| > 0.05$)。

表5 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业成败归因分析

	男		女		t
	M	SD	M	SD	
成功内因	29.97	7.54	29.42	7.43	0.410
失败内因	40.47	9.96	41.64	9.16	-0.672
成功外因	30.17	8.55	29.55	7.66	0.425
失败外因	47.14	11.56	48.27	10.70	-0.559

四、讨论

1. 小学生学业成败归因不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人在进行成败归因时,有相似的归因倾向。本调查表明,小学生在学业成绩归因上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原因可能是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受社会习惯、传统观念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平等的呼声越发强烈,特别是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以来,男女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价值标准趋于一致,有些家长还特别注意女孩子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锻炼培养,这都会影响女孩子在学习行为上对自我的评价,使男女生在学业成就上的归因特点趋于一致。

2. 小学生学业成败归因年级差异显著。研究表

明,小学生对成功和失败归因在不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归纳起来,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比小学中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归因于内部原因,统计分析达到显著水平($p < 0.05$)。小学生高年级更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刻苦努力、学习态度,将失败更多地归因于努力程度、学习方法等内部可控因素。中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做失败归因,而高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做成功归因,其中小学四年级是转折期。

对于这一结果,主要原因可能是,小学低中年级的儿童由于对自身的理解与生活经验不丰富,关于自我的认识也主要从外界(如教师和家长的评价)信息中获得,从而造成他们在学业归因中更倾向于将原因归于外界因素。而高年级学生由于积累了多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趋向于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概念,对自己学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有着比较固定的认识,因此更倾向归因于内部可控制因素。而高年级学生之所以更善于做成功归因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生越来越重视尊重的需要,因此,对成功的内部归因,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满足感,这也是一种受到同学和老师尊重的方式。

3. 小学生的学业成就归因模式发展趋势是积极的。本研究对不同归因与不同年级、性别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成败归因在不同年级存在差异,性别无显著差异。无论成功与失败,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比小学中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归因于内因,统计分析达到相当显著水平($p < 0.05$)。归纳起来,小学高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刻苦努力、学习态度,将失败更多归因于努力程度、学习方法等内部可控因素。这种归因状况要比小学中年级学生理想、积极得多。这充分说明中小学生对学业成败的归因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年级的学生具有不同的归因认知和归因模式(详见表4)。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生的归因趋向于合理。

4. 小学生学业成败归因中的偏差。根据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学生若把成功的原因归于内部,如能力、学习态度、努力等因素,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就会感到骄傲、满意、信心十足,将来类似行为的动机也会得到大大加强,若把成功归于外部因素,如任务难度、老师影响和家庭因素等,就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否定,由此产生的满意感较少,只会体验到宽慰和感激,对后来的行为和动机影响不大。

因此,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小学生的正确归因能力还不成熟。面对成功,小学儿童倾向于归因于

不可控因素如任务难度、能力、身心状态排在前3位,而最理想的归因如努力、学习方法等内部可控因素却比较靠后。此外,当面对失败时,小学生归于外因要更加明显。运气好坏、家长关心、老师影响、同学帮助和学习氛围、任务难度这6个排在前面的因素都是外部因素,而身心状态、兴趣、能力、学习习惯、努力、学习态度这些排列在后的均属于内因。这充分说明小学生的归因倾向不太理想,同时对家长和老师也是启示,既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又不应有过高的期望,不应该是包办代替,更不应粗暴地管、压,而是给予理解、鼓励和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的归因态度与倾向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加以帮助,提高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五、结论

1. 小学生的归因存在一定偏差。面对成功,小学儿童倾向于归因于不可控因素如任务难度、能力、身心状态排在前3位,而最理想的归因如努力、学习方法等内部可控因素则比较靠后。此外,当面对失败时,小学生归于外因要更加明显。运气好坏、家长关心、老师影响、同学帮助和学习氛围、任务难度这6个排在前面的因素都是外部因素,而身心状态、兴趣、能力、学习习惯、努力、学习态度这些排列在后的均属于内因。这表明小学生的归因倾向不够理想,当然这有可能和小学儿童思维发展有限有关。

2. 小学四年级是儿童学业归因特点的转折期。三年级的儿童倾向于做出外部归因,而高年级学生则更倾向于做出内部归因,且三年级学生善于做失败归因,而高年级善于做成功归因。这有可能是因为儿童在三四年级道德发展水平从他律阶段到自律阶段发展,对自我在学业方面的要求趋于严格自律,再加上小学中高年级开始学业任务逐渐变大,老师的教育与升学的要求增加了学生的学业压力,使学生更加关注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因素。

六、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学习结果的归因不仅解释了以往学习结果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以通过改变学生的归因方式来改变今后的学习行为。这对于学校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应重视学生学业归因倾向对学业成绩的

影响。

1. 了解学生的归因特点。每个学生对其学业成败的归因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归因方式。这是对行为结果归因的前提,并影响随后的行为、归因、期望和情感,也影响已有信念体系的维持和改变。所以,教师对有不同归因倾向的学生应加以区别对待。

2. 给予学生适当的评价。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学生从教师的评价和自己的体验中获知自己的学习结果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从而逐渐形成关于自己能力水平、努力程度和自己在学习中能否成功的信念。教师对学生评价的情感反应和行为表现直接影响学生的自我归因倾向,进而影响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对学业上成功可能性的信念,甚至影响其个性的发展。为此,教师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给予学生以适当的评价,避免产生不良影响。

3. 把握好教材和考题难度。教师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教学行为直接影响学生的归因,还可以借助其他方式间接影响学生的归因。教师要依据大多数学生的水平,适当地把握教学内容或考题难度,做到难易适中,既使学生感到力所能及,又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个人努力才能取得好成绩。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持续稳定发展。

4. 进行正确的归因训练。归因的变化可引起行为上的相应变化,而这种新的行为又会改变归因。根据归因理论,人们在活动中由于错误的、不准确的归因方式会表现出不良的情绪、期望和行为,因此,我们应采用归因训练纠正或改善不良的归因方式,进而改变其情绪和行为,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提高学业成绩。

[参考文献]

- [1] 韩仁生,王毓岫.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成就归因的特点与教育建议[J].中国教育学刊,2003(6).
- [2] 金岐凤,郑丽.中学生学习成就归因的研究[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中学生的学习归因、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谭彩霞 史海云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本研究随机抽取苏州市4所普通中学共838名中学生,以中学生学习归因问卷、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和中学生学习倦怠问卷为工具,探讨了中学生的学习归因、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其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学习归因的4个维度与学习倦怠呈显著相关。其中,内外部可控因素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内外部不可控因素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存在显著负相关;中学生的学习归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相关;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关键词] 中学生; 学习归因;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习倦怠

[中图分类号] B849.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50-06

一、前言

能力会使人产生一定的动力。个体如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某件事情时,就会感到沮丧、厌倦、挫折以及缺乏热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倦怠状态。学习倦怠指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或者缺乏动力却又为外部因素所迫不得不为之时,其对学习的有关认识就会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厌倦、疲惫、沮丧、挫折和缺乏热情等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并以消极或者逃避的态度对待学习的一系列行为。对于自我效能与倦怠的关系,从以往研究的结果来看,一般自我效能感都与倦怠呈负相关。魏珍指出,学习动力、学习兴趣及学习信心三者对学业自我效能影响最大,从而影响到学习倦怠。^[1]还有很多研究也指出了二者存在紧密关系,Brissie(1988),Greenglass(1988),Chwalisz(1992)均发现,自我效能感能够预测个体的倦怠水平,低效能感者倦怠水平高。^{[2][3][4]}Perrewe等(2002)进行的跨文化的研究也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5]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在具体的学习活动中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或达到某种学习目标的期望和判断。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通过自我效能的信息来确定的。

而个体对效能的判断,除了受过去成就的影响以外,在一定程度上还与觉察到的行为结果的各种原因有关联。Bandura(2000)认为,成功的行为结果如果觉察为是由技能而不是命运或他人的帮助造成时,更能强化自我效能。自我效能理论也认为,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坚持性、努力程度、认知投入与学习策略的运用,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6](pp.120-136)

学习归因指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及结果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推论,它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深刻影响。能力归因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Schunk, 1984);^[7]自我效能感与对成功作任务容易的归因呈正相关,与运气归因呈负相关(Schunk&Gunn, 1986)。^[8]黎兵和杨嘉乐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力归因和时间监控观直接影响学业成绩,而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分别通过自我效能感和能力归因的作用间接影响学业成绩,同时努力归因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作用间接影响学业成绩。^[9]胡桂英和许百华(2002)的研究表明,初中生的学习归因、学习自我效能感、学习策略相互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10]王婷

*[收稿日期] 2011-02-26

[作者简介] 谭彩霞(1984-),女,山东潍坊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史海云(1982-),女,山西临汾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婷从控制性维度探讨学生消极情绪形成的原因,认为归因维度会对学生的情绪进一步产生影响。^[11]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对学习归因、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各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而且以往的研究要么对每个因素自身进行研究,要么围绕学业成就展开研究,或者围绕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没有对它们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三者之间怎样产生作用进行研究。本研究拟探讨中学生学习归因、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充实学习倦怠的内容,完善学习倦怠的理论体系。本研究力求研究中学生的学习归因与学习倦怠的关系,找出中学生不良归因倾向,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引导学生对所遇到的、可能影响学习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合理的归因,使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心理健康水平。

二、研究方法

1. 被试。随机抽取苏州市4所普通中学(景范中学、相城实验中学、陆慕高级中学、苏大附中)共838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792份,男生403名,女生390名。被试年龄在11~19岁之间,平均年龄15岁。

2. 研究工具。(1)中学生学习归因问卷。自编《中学生学习归因问卷》,共20个题项,共有4个因素,即内部可控因素6个项目、内部不可控因素6个项目、外部可控因素4个项目、外部不可控因素4个项目。因素得分越高,说明越倾向于这个维度的归因。该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79。

(2)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问卷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梁宇颂、周宗奎参考Pintrich和De Groot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问卷中的有关维度编制而成的,把学业自我效能感分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对应的维度,共22个项目,每个维度有11个项目,该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03。^[12]

(3)中学生学习倦怠问卷。该问卷是由胡俏、戴春林(2007)编制。共21个项目,包含4个因素,即情绪耗竭8个项目、低效能感5个项目、师生疏离4个项目、生理耗竭4个项目。该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1。^[13]

以上3个问卷均采用五点记分,要求学生将题项中的描述与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完全不符合”记1分;“基本不符合”记2分;“有时符合有时不

符合”记3分;“基本符合”记4分;“完全符合”记5分。学生在某一维度上得分越高,说明这一维度所代表的特点越明显。

3. 施测。以班级为单位对被试进行集体施测。所有问卷一次完成,回收率为97.38%,有效率为94.39%。

4. 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和AMOS4.0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1. 不同学习归因方式下中学生学习倦怠的比较。为考察不同学习归因方式下中学生学习倦怠的表现,将被试分别按4种学习归因方式的得分从高到低排列,上27%为高分组,下27%为低分组,这样每种归因方式均分为高、低两组,即高内部可控组、低内部可控组;高内部不可控组、低内部不可控组;高外部可控组、低外部可控组;高外部不可控组、低外部不可控组。然后,对每种归因方式的不同水平组的学习倦怠进行 t 检验。结果发现,高内部可控组被试的学习倦怠感显著低于低内部可控组被试($t = -12.857$ $p < 0.05$);高内部不可控组被试的学习倦怠感显著高于低内部不可控组被试($t = 27.024$ $p < 0.05$);高外部可控组被试的学习倦怠感显著低于低外部可控组被试($t = -53.848$ $p < 0.05$);高外部不可控组被试的学习倦怠感显著高于低外部不可控组被试($t = 7.400$ $p < 0.05$)。

2. 不同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下中学生学习倦怠的比较。对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及其各个因素的测量结果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及其各个因素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 < 0.01$)。为进一步验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之间的相互影响,使用27%为临界点,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分为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组和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组。结果发现,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组被试的学习倦怠及其各个因素的水平低于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组的被试($p < 0.05$)。即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其学习倦怠水平越低,被试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对学习倦怠有显著影响($t = -20.797$ $p < 0.05$)。

3. 中学生学习归因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相关检验。考察中学生学习归因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

及其各个因素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4种归因方式内部可控、内部不可控、外部可控、外部不可控与学习倦怠及其各个因素情绪耗竭、低成就感、师生疏离、生理耗竭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其中,内部可控、外部可控归因与学习倦怠及其各因素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内部不可控、外部不可控归因与学习倦怠及其各因素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4. 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预测作用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三步回归的分析进行,首先分别用4种归因方式对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行回归(方程1),接着以学习倦怠对4种归因方式进行回归(方程2),最后,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以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同时以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归因方式为自变量,以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方程3)4种归因方式的中介作用分析的结果表明,方程1以学业自我效能为自变量,以归因方式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 < 0.01$)。方程2以归因方式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也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 < 0.01$)。方程3中,先以学业自我效能为自变量,以学习倦怠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同时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归因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也很显著($p < 0.01$),且比其单独进入回归方程时降低了。由此可见,4种归因方式在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习倦怠之间都起到了中介作用。

5. 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效应验证。本研究根据已有的理论探讨和上述相关研究结论,假设归因方式是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间的中介变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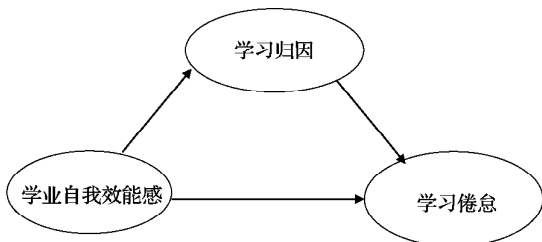


图1 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作用图

先前研究表明,本研究理论构思所涉及的几个因素之间大多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那么,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归因与学习倦怠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归因方式是如何共同作用于中学生的学习倦怠的呢?本研究将运用

Amos4.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以对上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

(1)模型的建立。依据上文对文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相关分析结果,建立了以归因方式为中介变量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倦怠的基本假设模型,如图2所示。从该模型里可以看出,学业自我效能感除了可以直接对学习倦怠产生影响效应外,还可以通过归因方式产生间接影响效应。

(2)模型的评价。通过对归因方式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影响的路径模型的拟合指数分析发现, χ^2 / df 值为2.355小于3,从其他一些拟合指标来看, $CFI = 0.927 > 0.9$, $TLI = 0.964 > 0.9$, $RMSEA = 0.074 < 0.1$,说明该构想模型总体比较合理。

(3)模型的结果。本研究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倦怠产生直接效应的通径系数为-0.48,学业自我效能感通过学习归因的4种方式对学习倦怠产生间接效应的通径系数为-0.02 [$0.57 \times (-0.06) + 0.45 \times (-0.03) + 0.68 \times 0.01 + 0.58 \times 0.02$],总体效应系数为-0.50。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对学习倦怠产生-0.50的影响效应。由以上研究可知,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仅单独对学习倦怠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还可以通过中介学习归因影响到学习倦怠,累积总效应为-0.50。但是,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单独作用要比通过中介学习归因对学习倦怠的作用显著得多。学业自我效能感单独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为-0.48,通过学习归因4种方式对学习倦怠的间接效应仅为-0.02。

四、讨论

1. 不同学习归因方式下中学生学习倦怠的比较。以往研究表明,适当的归因方式能够调节和缓解考试成败对个体的冲击,但是究竟哪种归因方式有利,哪种归因方式不利,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研究发现,内外部可控的归因方式与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内外部不可控的归因方式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结构模型显示归因方式也能直接对学习倦怠产生负影响效应,说明归因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缓解学习倦怠状况的加重。如果个体倾向于把学习的成功看作是自己努力行为的结果,则有利于提高学习的自信心,调动主体能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努力的程度,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如果个体倾向于把学习的失败看作是自己行为或努力不够的结果,这就能促使其为了避免学习失败而更多地增大努力程度、想方设法去提高自己的效率,也就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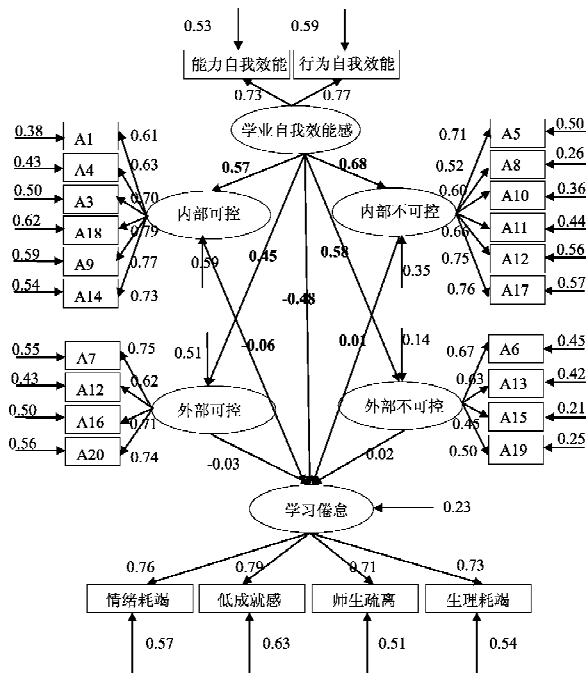


图2 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模式图

出现学习倦怠的状况。如果个体倾向于认为那些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因索如机遇、教师的水平是自己的学习成功的原因,那么他(她)就会很少去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学习行为。如果倾向于把学习的失败看作是不可控因素(如教师没教好、运气)的结果,那么这将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习倦怠现象的产生。

2. 不同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下中学生学习倦怠的比较。Villa 和 Calvete(2001)从不同侧面考察了教师的自我效能与倦怠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与倦怠呈显著的负相关。^[14]本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对一个自己能否完成某一活动缺乏自信的人来说,同样的失败结果更容易使他(她)产生倦怠,也就是说,自我效能会对学习倦怠的作用过程产生影响。Jex 和 Bliese(1999)认为自我效能感之所以会对应激产生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在个体评价应激源时,自我效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即具有更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一般不会把一些应激源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他们倾向于对应激做出积极的反应。^[15]根据这一观点,结合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论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中学生,学习倦怠的程度越轻。其原因可能在于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心理资源丰裕,能更积极有效地处理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使个体经历更多的成功体验。高自我效能感与成功体验两

者循环利用,共同增加个体的心理资源,使得个体的倦怠水平降到最低。

3. 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归因的内部可控归因、外部可控归因呈正相关,高自我效能感者倾向于采取可控归因,其学习倦怠的程度相对低一些。与之相反,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一般不会采取“内部可控、外部可控”的学习归因方式,他们倾向于采用“内部不可控、外部不可控”的学习归因方式,相对来说,他们的学习倦怠程度高一些。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着学生对待学习的行为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学生,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学习行为,把注意力放在该集中的地方,他们相信自己能对考试这样的应激事件施以有效的控制,认为学习的结果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改变或控制的。因此,不会在应对过程中犹豫不决或担惊受怕,从而也不容易产生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水平低的学生,对学习结果缺乏控制感,觉得自己无力改变现状,产生行为结果不可控的结果期望,从而导致“无力感”。这种无力感限制和妨碍了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正常功能的发挥,也就不容易获取好的学习成绩,他(她)因此会经常体验到消极和焦虑的情绪,并以各种保护性的退缩行为或防卫行为的方式来应对环境,使其产生自我管理和控制上的混乱,产生认识上、情绪上的障碍,也更容易产生学习倦怠。

中学生是否会出现学习倦怠依赖于他们所面对的应激事件,而且归因于不可控因素是引发学习倦怠状态的关键因素,长期的归因不当会使个体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特质性的个体资源,是学习倦怠的重要资源之一,影响着人们面对应激事件时使用的归因方式。对自己是否具有完成学习任务所需的技能有自信的个体,能够更有效地选择学习归因方式来应对像考试、学业压力这样的应激事件。自我效能高的个体倾向于选择可控的学习归因方式。但是高自我效能的个体不一定会采取可控的归因方式去应对应激事件,从而导致自我效能并不都如事先假设的那样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对于中学生来讲,选择不可控的归因方式不一定是消极的归因方式。这是由于考试失败的时候将其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可以缓解个体暂时无法解决这个事件的压力,不影响以后的学习,所以采取不可控的归因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暂时有效的归

因方式。

由于归因方式的选择在学习倦怠产生和作用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归因方式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影响归因方式的选择,对学习倦怠产生作用。所以说,学业自我效能感既可以直接影响学习倦怠,也可以通过归因方式的选择对学习倦怠产生间接影响作用。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发现(1)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对学习倦怠起负影响效应,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中学生,出现学习倦怠的机率越少,这个结果与前人的研究观点大概一致(2)中学生归因于可控因素可以起减少学习倦怠出现的机会,若中学生归因于不可控因素则会起到增加学习倦怠状况出现的机会的作用(3)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归因方式对学习倦怠产生影响效应。

综上所述,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既能直接对学习倦怠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学习归因影响到学习倦怠。模型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不过,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的实证研究,我们的结论还有待更深入的验证。

五、结论

第一,中学生的学习归因的4个维度与学习倦怠呈显著相关。其中,内外部可控因素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内外部不可控因素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

第二,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存在显著负相关。

第三,中学生的学习归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相关。

第四,学习归因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表1 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相关检验

	学习倦怠	情绪耗竭	低成就感	师生疏离	生理耗竭
学业自我效能感	-0.609**	-0.574**	-0.533**	-0.375**	-0.427**

注:* $p < 0.05$, ** $p < 0.01$,下同。

表2 中学生学习归因、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矩阵相关

	1	2	3	4	5	6	7	8	9
1 学习倦怠									
2 情绪耗竭	0.840**								
3 低成就感	0.811**	0.591**							
4 师生疏离	0.679**	0.434**	0.407**						
5 生理耗竭	0.732**	0.416**	0.484**	0.420**					
6 学业自我效能	-0.609**	-0.574**	-0.533**	-0.275**	-0.427**				
7 内部可控	-0.602**	-0.524**	-0.543**	-0.359**	-0.403**	0.525**			
8 内部不可控	0.668**	0.517**	0.568**	0.479**	0.511**	-0.358**	-0.413**		
9 外部可控	-0.252**	-0.306**	-0.214**	-0.116**	-0.145**	0.291**	0.152**	-0.065	
10 外部不可控	0.389**	0.365**	0.267**	0.291**	0.267**	-0.145**	-0.044	0.317**	-0.013

[参考文献]

- [1]魏珍. 中学生学习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个别差异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7.
- [2]Brissie, Jane S., Hoover-Dempsey, Kathleen V. & Bassler, Otto C. . Individual Situational Contributors to Teacher Burnou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8(2).
- [3]RJ Burke, ER Greenglass. Career orient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burnout in teachers[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88(1).
- [4]K Chwalisz, EM Altmaier, &DW Russell. Causal attributions, self-efficacy cognitions, and coping with stress [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2 (4).
- [5]JB Thatcher, &PL Perrew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traits as antecedents to computer anxiety and computer self-efficacy[J]. MIS Quarterly, 2002(4).

(下转第 103 页)

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及其培养*

王亚琼

(山西大同大学数计学院, 山西大同 037009)

[摘要] 元认知也被称为反省认知或反审认知。元认知能力是个体对自我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调节和控制能力。元认知能力能够促进个体学业的发展、人格的成长以及主体性的发挥,而在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却存在着影响中小学生元认知能力形成的现象。消除这些现象的负面效应,培养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元认知; 元认知能力; 中小学生学习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55-04

元认知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莱维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是“关于认知的认知,是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加工过程的自我觉察、自我评价、自我调节”^[1](P.249)]有时也被称做反省认知或反审认知。元认知由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3个部分组成;元认知能力是个体对自我的心智有效监控和调节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良好习惯和个性形成的有力保障,同时还能促进他们主体性的发挥。在倡导终身学习的今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成熟使学习完全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掌握学习的方法和学会学习比掌握知识更为重要。尤其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人生成长和发展的奠基阶段,提高他们的元认知能力对他们的学习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元认知能力对中小学生学习成长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证明,个体的元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养成、人格发展和主体性发展呈明显的正相关。中小学生学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主体性意识不强及人格还处于塑造和形成之中;而且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同时还要进行其身心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元认知能力是个体

对自我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监控和调节,提高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思索,并进一步形成积极的人生信念。

1. 元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

1985年斯登伯格(Sternberg)在《超越智商》^[2](P.67)]一书中将元认知列入智力范畴,认为元认知是智力的3种成分(操作成分、知识获得成分和元认知)中最重要的成分,始终处于高层次的管理地位,在智力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元认知的发展直接反映与促进着一个人的智力发展,而智力又是学习能力获得的基础。从元认知的角度看待学习过程,它不仅是对学习材料的识别、加工和理解过程,也是对这一过程进行积极的监控、调节的元认知过程。学习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元认知水平的高低。

研究证明,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具有较多的有关学习及学习策略方面的知识,并善于控制自己的学习过程,能灵活运用各种策略来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形成较强的学习能力;而元认知水平低的学生则正好相反,他们关于学习及学习策略方面的知识十分缺乏,也不善于根据教材、学习任务的变化而灵活

*[收稿日期] 2010-11-14

[作者简介] 王亚琼(1982-),女,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同大学数计学院助教。

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通常表现出学习能力较差。^[3] I P. 249-264)在教育教学中,教师们也通常感到,那些元认知能力强的学生,学习自觉性高,学习目标明确,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并随着情境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而那些元认知能力差的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表现出盲目性和被动性,选择和运用学习策略也很单一和呆板。由此可见,学生的元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他们学习能力的形成。

2. 元认知能力与人格形成。

有关元认知和人格的相关实证研究是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的。^[3] 这项研究是采用心理量表(元认知量表、MCG量表和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测评大学生的元认知和人格结构中的5个较为概括的人格因素的相互关系,对元认知和人格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征。优秀的人格特征为其元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和更多的发挥认知潜能的机会,同时为元认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心理环境,而高水平的元认知使人的社会化更为顺利和深刻,使个体更易于理解和内化优秀的人格品质,更易于习得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古希腊有“认识你自己”的警世箴言,在中国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个体要不断地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思,并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调整自己不恰当的认识和观点,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控,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进而赢得成功的人生。

3. 元认知能力与主体性发展。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主流,也就是说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置于中心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主体性强的学生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并能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学习策略,而这些能力正好是元认知核心功能的体现。元认知恰好为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4] I P. 180),可以说元认知的培养与主体性教育相辅相成。^[5] 加强学生的元认知能力训练,可以发展他们对自身学习过程的意识,以及如何确定学习目标和选择学习策略,如何调控认知过程,这样能够激发他们对自我的意识和体验,从而树立起主体意识。学生的主体意识一旦形成,他们的主体性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学习策略的掌握和运用更加灵活,同时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二、影响中小学生学习元认知能力形成的现象分析

元认知能力对中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培养他们的元认知能力应是中小学阶段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然而,在目前的教育教学实践领域却存在着诸多的影响因素,甚至阻碍中小学生学习元认知能力形成的现象,以下以3个较为典型的现象为例进行分析。

1. 家教。

近年来,家教市场异常火爆。究其原因,有家长“望儿成龙,望女成凤”思想的作祟,有市场经济下的就业压力等,大家都想从增加知识的筹码中获得成功的机会。据调查,现在全国城市里的大多数中小学生学习都聘请家教,主要辅导语数外等考试科目,而且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有些家长也开始为孩子聘请家教。从根本上讲,家教是课堂教学向课外的延伸。一位有3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在《关于家教问题》一文中写到:“我发现有些学生上课不专心听课……后来经过观察并和学生谈心后才知道,学生有家长给请了家教,他想反正课堂上学不学好,回家后有家教呢?使学生产生了依赖感。结果呢?学生浪费了最宝贵的时间,晚上回去再补课,真是得不偿失”。^[6]从元认知能力培养的角度来看,中小学生学习聘请家教致使他们产生严重的学习依赖心理倾向而不利于他们的元认知能力的形成。在元认知知识方面,本应该在课堂内学会的内容却要延伸到课外去完成,容易使学生对学习材料和内容的认识肤浅、学习目的和意义概念模糊、对自我的学习能力估计不到位而产生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在元认知体验方面,家教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完成学习任务的机会,他们也就难以有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在元认知监控方面,由于学生能够得到家庭教师的指导,学生对自己解题思维过程的调节和控制能力难以养成。

2. 家长签字。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小学校里家长签字现象非常普遍。通常教师要求家长在学生的家庭作业后签字;另外,英语教师要求背诵的单词、课文、数理化教师要求背诵的公式定理,家长也要在课文或公式定理旁写上“已背”二字和自己的姓名及日期,以备教师检查之用。有些学生没有完成背诵任务,就会模仿家长的笔迹签字。要求家长签字可能是教师出于联合家庭教育力量共同促进学生学习的愿望。虽然

家长签字在一定程度上会敦促学生学习,起到某些效果,但同时又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不利于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培养。家长签字阻碍了学生自主意识和能力、自我管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的习惯的养成,容易让学生形成依赖心理,甚至在没有家长监督时会偷懒。而且,家长签字会使学生把学习当成任务来完成,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还会以为是为家长而学习,学习责任感难以形成,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也不容易被激发。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做完题目后都应该自己回顾解题的思维过程,判断结论的正误。这个过程能够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而它正是元认知能力的核心部分,家长签字却剥夺了学生进行自我反思的机会。

3. 考试。

知识的学习和掌握需要一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和策略,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频繁的考试只是机械性的知识操练,完全忽视了学生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认知训练。而且,承受考试的重压,学生对人生的意义等根本性的问题就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他们所有的时间被各种功课,被各种考试考题所代替,就像机器人一样在这个社会中生存。”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成长比成绩重要”。^[7]中小学生在人生的奠基阶段,频繁的考试不仅不利于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的培养,并且严重影响着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在教育教学现实中,影响学生元认知能力培养的现象还很多。作为教师和家长,他们必须对自己施加给学生和孩子的教育影响多加反省,真正创造能培养他们元认知能力的良好环境。

三、培养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的途径和策略

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要做到切实有效,就必须既要遵循元认知能力形成的规律和特点,又能从中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寻求和设计培养他们元认知能力的途径和策略。

1.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有研究证明,元认知与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元认知受动机变量的调节和制约。^[8]为了提高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应该努力改善学生的动机状况,而且,在影响元认知的动机变量中,学业自我概

念发挥着关键和核心作用,一方面良好的学业自我概念可以抑制考试焦虑,为元认知活动的进行排除障碍,另一方面,良好的学业自我概念可以促使个体在认知活动中进行掌握定向,而掌握定向又能促进元认知活动的进行。此外,内部归因、目标定向等动机变量的改善都能够起到对元认知的激活作用。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业自我概念、通过心理辅导等使其考试焦虑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并促进他们进行内部归因等。这样,通过改善整个动机系统变量而促进其元认知能力的形成。

2.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

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通常具有这样的特点:能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及学习材料和学习环境的特点计划和安排学习活动,并且会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扰;具有反思能力,会对自己的认知活动不断进行监控和调节,并及时总结经验;具有责任意识,学习活动中富有创造性等。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学习活动的过程需要积极地投入学习,对学习材料和学习任务进行识别,考虑采用哪种学习策略,还要对自己的解题思维过程进行自我调控。当他们能够顺利地开展学习活动时,就会产生积极的元认知体验,并能使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得到强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让学生自己去制定学习计划、设定学习目标、独立完成作业并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反思等。元认知能力是个体对自己的认知活动的认知能力。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认知活动的认知,也就能够促进元认知能力的形成。

3. 传授学生元认知策略。

教师在向学生教授学习策略时,还要传授元认知策略,渗透元认知策略的知识和策略训练的内容,让学生明白什么情况下运用哪种学习策略的效果最佳。教师要给学生多设置问题情境,让他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完成,强化他们的认知体验,培养起他们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有意识监控的反省认知能力。例如,在英语学习中对学生进行元认知策略训练时,教师让学生自己对题目先进行分析和识别,确定需要运用到的知识点和完成题目的步骤,之后再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反省。

4. 营造民主轻松的学习生活氛围。

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是弥散于学习和生活之中的,处处和时时都可以对 (下转第69页)

试论社会转型期高校师生关系的建构*

陶 然^{1 2}

(1.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江苏南京 211800;
2.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 新形势下, 社会转型这一客观现实日益成为建构高校师生关系必须观照的要素。高校师生关系不但是建构于教与学的知识互动中, 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实现大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的全过程中。从角色定位、发展需求、新媒体冲击、权威维护、师德考量等多维审视当下师生关系的困境, 试图以一种共同体的理念引领、建构一种着眼于实现师生共同发展、合力互动的新模式。

[关键词] 社会转型; 师生关系; 多维观照;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58-04

高校师生健康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于和谐校园建设而言至关重要。随着高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高校办学理念、育人方向以及教育重心等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着相应的调整。教师与学生的价值观、角色认知水平与行为方式等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各因素的影响。这些给师生关系的建立提出了全新的命题。社会转型这一客观现实日益成为建构高校师生关系必须观照的要素。

一、社会转型: 高校师生关系的语境转换

现代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期, 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均发生着深刻变化。人, 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 经历着传统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方式的冲击与交锋, 思想与行动也自觉或自发地以各种矛盾组合体的形式表征出来。一方面, 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价值, 对生命的意义不断进行着深入的思考与追寻, 努力追求着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互动, 有着强烈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诉求, 渴望回归生活世界的

本真。另一方面, 人们却又被推入经济利益与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在物质世界的忙碌奔波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追求享乐与个体需求的满足。

教师与学生, 这一对耳熟能详的称呼体现着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角色与使命。师生在进入角色和履行承载的使命时, 也同时演绎着其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作为社会个体, 他们很自然受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诚然, 这些变化有利有弊, 且不论利弊如何, 它都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师生的个体社会化过程, 也势必对师生关系的建立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可以看出, 在社会转型期, 师生的工作、学习及生活状态正呈现出复杂态势。教师一方面形而上地追问着学问的意义, 探究着“象牙塔”内的“方程式”与“理论推导”, 享受着沉静学问与不倦育人的快乐; 另一方面也形而下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 体味着柴米油盐的现实, 不惜为夯实物质基础而难免世俗与功利。学生则一方面“幸福”地沉浸于相对纯净的校园生活中, 另一方面又“幸或不幸”地接受着来自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类信息, 被其牵引和影响。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和谐高校师生关系建构的多维视角研究”(项目编号: SGSY2009YB058)。

[收稿日期] 2011-04-06

[作者简介] 陶 然(1976-),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高校,在社会转型期,从曾经的“象牙塔”一跃成为给予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需支撑力量的“智力库”,与此同时,也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转型紧密联系起来。在“市场”“竞争”“效益”“需求”等逐渐成为一些高校管理者所青睐的热门词汇时,我们仍需清醒地意识到,大学要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帮助建构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这才是大学存在的价值。^[1]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所指出的,育人是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这样的人是有公民意识、民主法制观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因此,新形势下,高校师生关系不但是建构于教与学的知识互动中,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实现大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的全过程中。

二、多维观照:高校师生关系的解惑视角

1. 角色认知存在偏差。

正确的角色认知对于高校师生关系的和谐建立十分重要。随着高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高校教师这一职业所承载的责任也不再局限于“传道、授业、解惑”,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再是学生这一单一的群体,他们需要完成科研任务,需要了解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学会将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所服务的对象范围不断拓展,有企业、政府、科研院所、学术期刊等等。这对高校教师而言,是挑战,同时也是巨大的压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当社会越来越强调经济效益,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时,我们忧心地发现,高校教师的教育行为越来越表征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也就是说,以效果最大化为目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价值诉求。教师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往往忽略了学生的人生成长导师这一角色,而把自己较多地定位为写文章、做科研的“机器”。

学生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也存在偏差。一方面,他们有着较强的追求独立、自由,渴望平等对话、参与管理的意识,而另一方面,他们行为上并没有从被动地接受状态中积极主动地调整过来,还处于学习和生活上“等、靠、要”的依赖层面。将教育效果和师生关系的不理想简单归结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水

平、职业道德和人格魅力显然是片面的。

2. 需求互动契合不足。

哈贝马斯说,理解意味着交往的参与者在话语的有效性上达到了统一。这种一致是主体间对于言说者对他的言语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相互认同。^{[2](P.184)}在高校师生关系中,强调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教师与学生应是平等互动的。双方对彼此都有需求,也都有责任。从两者需求的契合度上来说,高校师生和谐关系的建构有必要厘清两者彼此的需求和期待,以及在互动关系中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学生背负着学习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既要完成学业任务,还要忙于提高实践本领,增强就业竞争力。对于教师而言,教学也不是单向的知识传输的过程,需要来自学生的问题互动与研讨推进。而这些需求恰恰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得不到很好地满足,这就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需求与供应关系的脱节,使得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相互之间抱怨沟通难理解难。

3. 新媒体挑战传统沟通模式。

社会转型带来了人们对沟通理念与方式的革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短信、博客、微博、QQ等已经成为大学生们所热衷的交流平台。有趣的是,虚拟的网络世界逐渐真实化,从博客、微博陆续广泛地使用真实姓名、头像等可窥一斑。大学生乐于通过这样的平台诉说自己的心情故事,分享生活中的变化,表达对周围事物的观点,期待着受人关注。但回到真实的校园生活,他们反而“羞涩”起来,看似不“善于”表达,不愿意主动与教师交流思想,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着自己。这迫使教师不得不反思传统的面对面沟通交流方式如何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此外,除了沟通方式,新媒体对于师生沟通的内容也提出了新要求。教师要很好地发挥沟通引领作用,就必须先了解他们所引领的对象,提高他们对沟通内容的兴趣,达成对沟通内容的共识,才能促使其将沟通内容有效“吸收”与“内化”。

4. 维护师道尊严步入误区。

在高考竞争中获得成功,步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大学生正处于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渴望了解世界,了解自我,展示个性,得到认同的年龄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开拓了大学生的视野,使得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增多,使得学习不再拘泥于教师、书本、课堂。与此同时,虚

拟社区的存在,扩大了大学生的接触面,使得他们不再单纯地需要向家长、教师倾诉心里话。广大高校教师已经认识到这对于原有的教师权威、教师的言语权力、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地位是个威胁,甚至有的开始质疑21世纪高校教师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意识到加强师生之间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性,但实际上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真正意义上地建构起来,高校教师的影响力正逐步在淡化,对于大学生来说,高校教师大多依旧摆出严肃的面孔,端着说教的架势,宣讲不变的讲义。有的高校教师将以学生为本、给予他们平等自由的发展空间等同于降低标准,听之任之。在课堂上,只要求形式上的秩序井然,在考试中则大笔一挥,将学分轻松赠予。以这种方式达到表层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的和谐,结果是学生不再关注学习,教师也不再关注上课,教学质量、学生质量都令人担忧。

5. 师德考量缺位。

虽然说师生关系的好坏与教师、学生双方素质均有关联,但教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试想一位师德受到学生质疑的教师又如何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如何能与学生构建良好关系呢?然而,就目前的教师考评体系而言,教师应聘或者职称评审时,高校的注意力仍多集中于学识水平、科研能力等,而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并未或者说无从进行过多的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师生关系健康良性发展设置了不确定因素。

三、形成共同体:高校师生关系的合力建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高校师生关系的建构需要以一种共同体的理念引领,着眼于实现师生共同发展、合力互动,着眼于推动高校学术科研与思想文化建设、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与大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以及大学使命与责任履行。

1. 独立与平等:共同体的前提。

高校师生共同体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共同的认识、共同的努力,单靠任何一方都是无法持续进行下去的。在人格上,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是独立而平等的,应互相尊重,高校教师需要树立权威,但这不是行政意义上的权威,而是学术意义上的权威,是学术上的造诣、人格上的魅力而使教师自己获得的权威;在学业上,高校教师通过系统的、深入的教学,传授学科领域的经典、科学研究的方法,相比较于大

学生从网上或者其他渠道获得的零碎资料要翔实、有价值得多,帮助大学生学会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大学生应将课堂上教师所传授的内容认真领会,并在课后进行有益的融会贯通,将课后学习与课堂学习进行密切关联,相互补充。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仍要做好严格教育、引导,既要规范课堂教学秩序,杜绝任何逃课、开小差等行为,又要提高自身的授课水平,以内在的优秀教学质量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使之认真投入到学习的全过程中,以学习型氛围为特征的外部环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并不是一味地迎合甚至是放纵学生的个性“自由”与“张扬”。只有这样,高校教师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非但不会降低,反而使得尊重教师这一基本要求可以“内化”为他们的情感需要。

2. 爱与责任:共同体的基础。

建立师生共同体,需要爱与责任的投入。首先,教师与学生之间应以爱与责任影响各自的教育态度与学术态度;“尊重教师”与“以学生为本”双线并进。促成师生学术和情感交流的双重良性互动,在学术交流中建立深厚的师生情感,并以此推动学术共建的进行。在情感上的接近,有利于师生在学术上的互动。在高等教育中,强调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大学生勇敢地向学术权威挑战,高校教师要不断地对他们的挑战做出应答,这种呼应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是为了学术建设考虑,在积极的学术对话中,师生双方都在学术、心灵上得到升华。和大学生的和谐相处,有助于激发高校教师职业使命感和学术荣誉感,若大学生在情感上愿意亲近教师,他们在与教师的学术切磋和交流中则会表现得更自然,更活跃,从而在这种学术对话中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增强学术研究的信心,丰富自己的学术体验。其次,教师与学生应共同以爱与责任看待并从事高等教育事业,将个人的发展与高校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教师要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教育任务,不但传授知识,而且要以国家发展需要、社会公民责任等引导教育学生。学生应树立对自己、对家庭、对教师、对学校、对社会的责任感,与教师一起,负责任地走好自己成长的每一步。

3. 分工与合作:共同体的表达方式。

高校管理者需要将教师与学生作为平等、独立、自由的两个群体来对待。要重视他们各自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声音,帮助他们明晰在合作中的分工内容,进一步增强高校师生既独立又互动的合作意识。

要让师生不但关注自己的需求,还要正确认识到自己在满足对方需求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只有当个体真正在教育过程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才能最佳地实现教育效果,有利于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持续进行,真正在教育过程中体现“教是为了不教”、“授人鱼不如授人渔”。从教育者这方面来说,在敦促大学生刻苦学习的同时,高校教师自身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再将自己凌驾于大学生之上,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以纯净、向上的精神面貌感染大学生。教师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教育中的主体位置,积极备课,把客观的知识内化,以形象生动的方式认真传授给学生,并且在授课过程中,能主动发现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加以完善,才能有利于教学效果的优化。教师要乐于将从实践中、从理论研究中获得的成果与学生分享,引领学生步入学术殿堂,教他们学会搜集资料,学会做研究,学会发挥创造性。在这种引导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教学相长氛围。从受教育者这方面来说,学生更是在接受信息的时候,积极进行“个体建构”,与已获得的知识进行比较,若发现所学知识是原有不足的,要及时“吸收”;发现是有冲突的,要及时“设疑”“解疑”。

4. 多方交融:共同体的内在活动。

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的建立也是相当重要的。“教学相长”体现的是积极的师生关系,因为人的知识层面、知识结构、生活背景等都不尽相同,需要互相补充,需要交流。集体备课、授课竞赛等则是教育者之间交流的形式。在学生中培养团队精神、合作做实验、开展课堂讨论等形式更好地体现了受

教育者之间的交流。新型的授课方式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注重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及时掌握,并不停留在简单的“讲课”、“听课”上,多媒体教学软件也为这种“互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5. 共同成长:共同体的发展诉求。

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双重维度考量下,教师与学生成为思想与行动均有着丰富色彩的主体。师生关系也因此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从人的成长意义上来说,成长是永恒与动态的,不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时间、空间、事件等都记录着他们的成长。与此同时,作为密切发生交互行为的师生双方而言,彼此成就着对方的成长。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教师的知识、品格、行为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影响与引导着学生的成长,但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学生课堂上传递的有声或无声的信息也在影响着教师的成长与变化。因此从成长意义上来说,师生是有着成长需求的平等个体。而我们经常会将教师的成长需求或者说将教师从学生的交互行为中获得的成长体验忽略了。这也启示着我们在关注学生成长的同时,也应关注教师个体发展的需求与动向,以及师生交互行为对于教师、学生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郝志东. 大学不大,皆因价值观出了问题 [N]. 南方周末, 2011-03-17(F31).
- [2] [德]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论社会角色理论视域中的大学生全面发展*

章 诚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江苏南京 211816)

[摘要] 从社会角色理论视域认识大学生全面发展进而探寻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路径,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大学生社会角色的基本构成要素有身份、权利义务、习惯、人格,大学生全面发展既要实现各要素的发展又要实现整体优化。大学生全面发展是一种角色发展过程,包括角色期待、角色学习和角色扮演。大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会发生角色紧张、角色冲突、角色混同和角色失败等角色失调现象。

[关键词] 大学生; 全面发展; 社会角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62-05

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纪,人才已经成为国家、民族在新世纪的竞争中保持主动、赢得优势的重要砝码。各国为了加重这一砝码,纷纷加强本国人才队伍的建设。这其中高等教育是人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从1999年起,为了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2009年全国在校大学生达到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1]。大学是一个平台,大学生在学校学习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担当社会人的角色。大学生能否担任合格的社会人的角色受在校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很大的影响。大学生在学校期间能否真正、有效地践行大学生的角色,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关系到自身的全面发展。社会角色理论可以为分析大学生角色及其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分析方法。因此,从社会角色理论框架研究大学生的社会角色对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角色理论与大学生全面发展研究

“角色”又称之为“社会角色”。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戏剧领域,后来被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引用。角色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是由社会心理

学家米德创立,经过罗伯特·帕克、默雷诺、林顿、特纳、戈夫曼、弗·兹纳涅茨基、帕森斯、默顿等社会学家发展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通过这些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卓有成效的研究,社会角色理论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例如角色的概念、角色和角色集、角色与地位、角色与权利义务、角色的特征和类型、角色互动、角色观念、角色期望、角色规范、角色转换、角色学习、角色扮演、角色紧张、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形象和性别角色等^[2]。

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角色与大学生全面发展关系的研究很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针对大学生角色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李光禄、周如东在《大学生角色定位教育》中认为要运用角色理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大学生进行智能素质定位外,还应着力对进行大学生的政治定位、事业定位和道德定位教育^[3]。匡促联、张娟在《大学生角色认知的偏差的哲学矫治》中首次在教育界明确提出了学生角色认知偏差的哲学矫治问题。认为大学生角色认知偏差虽然由个体对大学生角色规范和角色评价同化不足或顺应无力而直接引起,但其中深刻原因却在于个体对其大学生这一角色本质的一知半解,对其矛盾运动的把握欠准,以

*[收稿日期] 2011-03-13

[作者简介] 章 诚(1984-),男,安徽青阳人,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硕士。

及进行角色实践后对角色评价的重视程度不够。^[4]万宗喜在《大学生角色失败的社会心理分析》中认为大学生自身素质与社会期望不符、人们的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存在差距,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造成大学生角色失败的重要原因。^[5]张兴福、赵敏在《论大学生社会角色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中认为目前大学生社会角色素质存在着理想与现实、期待与行为、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的矛盾。因此,大学生角色素质的培养必须提高大学生对角色环境、角色生理、角色心理和角色技能的适应性,必须着重解决好大学生世界观与人生观、情感智力、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以及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6]。游佳清在《谈角色扮演法在大学生发展中的作用》中论述角色扮演技术可以促进大学生自我概念的继续发展,可以促进大学生社会性发展,可以帮助大学生缓解压力、释放不良情绪,可以促进大学生创造性的发展。^[7]这些研究是针对某一方面的研究,还不能全面的把握大学生的社会角色。

2. 针对大学生全面发展进行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又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1)从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张华玲在《试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文中认为应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强化大学生的个性教育,并针对实现个性教育的目标提出改革学籍制度等措施。^[8]陈素红在《“两课”教育大学生全面发展研究》中认为大学生全面发展有两种观点即“三结合”说和“综合素质说”。^[9](2)关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风险研究。叶育旺、郑永廷在《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风险及其成因》《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风险及其类型》《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风险特点及个体差异性》3篇文章中分别论述了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风险的成因、风险类型、风险特点和个体差异性^{[10][11][12]}。(3)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全面发展。王芳在《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全面发展》一文中从分析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入手,对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全面发展间的内在关系加以论述和阐释,进而对如何以科学发展观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出对策思考^[13]。黄宇弦在《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中阐述了新形势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指出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指导作用,并从3个方面来具体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14]。

本文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社会角色理论为框架,尝试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作出阐释。

二、角色的基本构成与大学生全面发展分析

社会角色是由一系列的要素构成的,关于社会角色的构成要素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尝试。郑杭生将社会角色定义为与人们对具有某种社会地位、身份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15][P.107]}。在他看来,地位、权利与义务规范、行为模式是构成社会角色的要素。波兰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在其《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创建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类方法。他在书中认为角色范式就是由“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四个概念构成的,认为“尽管不同种类的社会角色各自有相当不同的成分,但上述几个方面是所有社会角色都拥有的基本成分”^{[16][P.12]}。我国学者温信泉在《角色:人的行为选择》一书也将角色的基本构成划分为四要素,即“身份、义务和权利、习惯及人格。”^{[17][P.4]}。只有了解了大学生社会角色的基本构成,才能更好地认识大学生的角色进而指导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对大学生角色的基本构成划分采用温信泉的观点。

1. 身份。所谓身份就是指在社会或法律上的地位,身份是构成角色的前提和基础^{[17][P.4]}。个体只有了解、认识并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后,才能扮演与这一身份相适应的角色,个体的身份决定了与这个个体相关角色的其他一系列要素,如一个个体的身份决定其所要承担的与这种身份相符合的义务、按照这种身份的道德要求来要求自己、享受这种身份所带来的一些权利,在不同时间、地点、情景下个体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因而其所要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基本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按照公民角色的要求来行动,但大学生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学生的身份;“大学生”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除了公民身份和学生身份之外,大学生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份,如在宿舍里是舍友的身份,在伴侣面前是恋人的身份,在学生会等社团中是社团成员的身份等。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处理好这些身份,牢记自己的学生身份,在扮演好学生角色的同时,兼顾其他身份所要扮演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2. 权利和义务。任何一个角色,都具有隶属于某个社会或团体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当他把组成这一地位的义务和权利付诸实践时,他就是在扮演某种角色^{[17 I P.5)}。所谓角色义务可以理解为社会对社会角色所规定的应尽的责任。角色义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确定性,有些角色所要承担的义务是通过习惯、法律法规等形式确立下来的。角色义务的履行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扮演者认识角色义务、按规定操作方式支付劳动和社会承认3个阶段^{[18 I P.46)}。对于大学生角色来说除了要履行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应尽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履行作为一个大学生的义务。根据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公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在校大学生以下义务需要履行: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的义务,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的义务,缴纳学费的义务,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义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目前在校大学生大多数能够履行上述义务,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但也有少数大学生不能做到,例如一些大学生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不能履行信用合约,甚至触犯了法律,这些大学生的角色义务没有得到很好地履行,因而没有扮演一个合格的大学生角色,更谈不上实现全面发展了。

角色权利包含角色权力和角色权益两个方面的内容。角色权力是指角色扮演者履行角色义务时必须具有的支配他人或使用所需物质条件的权力。它包括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的权力、同交往对象进行交往的权力等,角色权力具有目标性、限定性、确定性3个特点。角色权益是在社会角色履行角色义务后应当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报酬^{[18 I P.48)}。社会只有赋予某一角色一定的权利才能激发人们扮演该角色的积极性。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应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条件,保障他们权利的实现,使得他们可以在大学校园这个舞台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使自己得到充分的锻炼,实现全面发展。根据新《规定》的有关内容大学生的权利主要有宪法权、行政权、民事权三大方面的内容^[19]。虽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但大学生对自身的权利知道的不是很清楚,权利意识还比较淡薄。谢华汉通过对广东5所高校的调查发现有94%的大学生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和实际享有的权利仅了解

一点或了解甚少,有22.3%大学生认为自己周围同学的权利意识比较弱,70.5%的大学生认为一般,只有7.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同学的权利意识较强^[20]。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教育的传统理念影响、权利立法的不明确,学校管理的不到位,学生自主意识不强有很大的关联。

3. 习惯。习惯是社会或团体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它是人们长期重复,并逐渐养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任何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并要求该团体的成员保持和延续这种习惯^{[17 I P.5)}。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积淀,它要求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学生能够理解并习得这种文化积淀,按照本校的文化积淀来发展自己。这种文化积淀有一部分体现在各所大学的校训上,例如北京大学的校训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河海大学的校训是“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各个大学的校训都指出了各个学校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发展方向。

4. 人格。各种职业都不同程度的要求其成员具有特定的相对稳定的品格,即具有特定的人格要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们形成不同的形象和风格。角色所规定的人格,与职业的特殊性要求相适应,是构成角色的重要因素之一^{[17 I P.5)}。角色人格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化的要求和个性化要求。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缺少了社会性,角色人格就失去了生成和展现的场所,缺少了个性,角色人格就会失去独有的光泽。对于社会来说,角色人格是有个性的人格;对于个体来说,角色人格又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格^[21]。对于大学生来说,其所要扮演的大学生这一社会角色,既要有社会性要求,也要有个性。大学生社会性的角色人格要求应该包括具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具有正确的自我意识,具有良好的自我调控能力,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具有正确的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内容。个性的角色人格要求要在实现社会性人格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大学生的特点来发展。只有将社会性的角色人格要求和个性角色人格要求结合在一起,大学生才具备了良好的角色人格,才能扮演好大学生角色,从而实现全面发展。

三、角色过程与大学生全面发展分析

一个社会角色的扮演一般都要经过角色期待→

角色学习→角色实践,这3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能否成功的实现,都关系到大学生角色的扮演与发展,关系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下面简要分析这3个阶段。

1. 角色期待。角色期待又称之为角色期望,它是指社会对某一社会角色的期望和要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角色构成的实体和本质所在,即角色是一种由角色期待所构成的行为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即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角色期待内容,而不同的角色期待内容又构成了不同的角色行为模式,没有角色期待就无所谓社会角色,这种构成是内在的^[18 I P. 128],角色期待有社会性、变动性、外在性的特点。对于大学生社会角色来讲,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是外在的同时也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群体,被看做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天之骄子”,他们可以安心的在校园里读书,很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政策的改变,大学教育向大众化发展,大学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子骄子”,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从过去以智的发展为主转变为综合素质的提高。

2. 角色学习。在认同了社会对这一角色的期待后,就进入了角色学习阶段。所谓角色学习是指角色扮演者对其角色规范和角色要求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学习顺利完成角色扮演任务,履行角色义务和权利,塑造良好的角色人格,所必备的知识、能力、智慧及经验的过程。角色学习包括两个方面:角色权利、义务、规范的学习和角色情感、角色态度的学习^[18 I P. 110]。角色学习的过程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角色认知和角色意识形成的过程。对于刚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来说,从中学时代到大学生活是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继续社会化的体现,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对于刚进校门的大学生来说,要了解大学生角色,实现角色转变。对于在学校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大学生来说,培养对大学生这一角色的认同,形成大学生角色意识,在学习和生活中按照现代大学生的角色期望来要求自己,使自己在学校期间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内容,从而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十分重要。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要学会转变自己的大学生角色,学习社会上的相关规范,为顺利走上工作岗位、适应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做好准备。

3. 角色扮演。在理解了角色期待和学习了角色的相关内容后,就开始了角色实践过程,这也就是角色扮演的过程。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当一个人具备了充当某种角色的条件,去担任这一角色,并按照这一角色的要求的行为规范去活动。^[15 I P. 113]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在熟悉、了解大学生生活后,就要开始大学生角色的扮演,这种角色的扮演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角色丛。大学生首要的是进行学生角色的扮演,认真学习知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角色如大学生社团成员、社区成员、社会公民等相关角色的扮演。只有成功扮演这些角色,大学生才能从中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使之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四、角色失调与大学生全面发展分析

在大学生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学生在角色扮演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和矛盾,甚至会出现失败的情况,这就是角色失调。在大学生中出现角色失调的现象不是少数,是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遇到的突出难题,大学生的角色失调限制了大学生的角色扮演,影响大学生的顺利成长和全面发展。由此可见,认识并调适大学生角色失调是大学生角色发展中的一大课题。当代中国大学生角色失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角色紧张。个人在其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时间和精力的不充足称之为角色紧张。当一个大学生需要同时承担很多角色时,可能会出现精力不够用的情况,例如一个大学生既是班级的干部,又是院学生会的成员,同时还是几个学生社团的理事,这样他就扮演了太多的角色,各种角色都会有时间要求,这可能使得这位大学生无法集中精力去学习,虽然在其他方面可能做得很好,但大学生最基本的学生角色却无法扮演好。

2. 角色冲突。角色冲突是指在日常的角色扮演过程中,由于不同角色规范的要求,引起人们某一具体角色扮演的矛盾和冲突。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不能很好扮演社会角色,引起角色冲突。角色冲突有3种类型:(1)角色内的冲突。所谓角色内的冲突是指同一个角色扮演者在扮演同一角色时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角色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例如父母对大学生这一角色的期待和社会上其他人对大学生角色的期待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期待对大学生形成了困扰,让他们无所适从。(2)角色间的冲突。所谓角色间的冲突是同一个角色扮演者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时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一位

大学生准备晚上去教室上自习,但舍友拉他去打牌,这时这位大学生的学生角色和舍友角色就发生冲突了,这位大学生如果去上自习就有可能损害了舍友感情,要是陪舍友打牌就耽误了学习,这位大学生就陷入两难境地。(3)角色外的冲突。角色外冲突是指两个角色扮演者发生的角色冲突。它常常是由于不同的角色期望、不同的角色领悟以及按不同的角色规范行事引起的。例如,大学生甲和大学生乙、大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冲突。

角色冲突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积极作用是推动角色要素的完善、角色规范的更新,消极作用则破坏了原有的角色规范,使得社会角色发生失调。

3. 角色混同。如果我们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不遵从其相应的规范或行为模式,在扮演A角色的时候采用了B角色的行为模式,而在扮演B角色时又采用了A角色的行为模式,这就出现了角色混同。角色混同在大学生角色扮演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例如一位大学生在家里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什么事都要以他(她)为中心,此时作为子女角色尚且无碍家庭关系,但学校里如果继续用他(她)在家里的那套行为模式来与老师、同学交往时,必然产生角色之间的冲突,这就发生了角色混同。

4. 角色失败。角色失败是角色失调的最严重的情况。它是指角色扮演者由于种种情况无法进行角色的扮演的情况。角色失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角色扮演者中途退出,例如因考试作弊、盗窃等原因被学校劝退或开除的大学生,他们无法继续扮演大学生的角色;一种是角色扮演者虽然还在进行扮演,但实践证明他已经失败了,考试经常不及格、经常旷课或网络成瘾的大学生都属于此类。

综上所述,社会角色理论为研究大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大学生角色与大学生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角色的引入使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容脱离了抽象层面,落实到大学生角色上。大学生角色扮演与发展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生全面发展是大学生角色扮演与发展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 教育部. 200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 年 8 月) [EB/OL]. <http://www.moe.edu.cn/edoas/>

website18[2010-11-24].

- [2] 奚从清. 关于建立角色社会学的几个问题[J].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4(3).
- [3] 李光禄, 周如东. 大学生角色定位教育[J]. 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 1998(1).
- [4] 匡促联, 张娟. 大学生角色认知的偏差的哲学矫治[J]. 温州大学学报, 2000(2).
- [5] 万宗喜. 大学生角色失败的社会心理分析[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1998(4).
- [6] 张兴福, 赵敏. 论大学生社会角色素质的培养和提高[J]. 甘肃高师学报(社科版), 1999(4).
- [7] 游佳清. 谈角色扮演法在大学生发展中的作用[J]. 甘肃科技纵横, 2005(4).
- [8] 张华玲. 试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J]. 教育与职业, 2005(11).
- [9] 陈素红. “两课”教育大学生全面发展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 [10] 叶育旺. 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风险及其成因[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6(6).
- [11] 叶育旺, 郑永廷. 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风险及其类型[J]. 教育探索, 2007(3).
- [12] 叶育旺, 郑永廷. 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风险特点及个体差异性[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6(11).
- [13] 王芳. 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全面发展[J]. 当代青年研究, 2005(12).
- [14] 黄宇弦.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大学生的全面发展[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7).
- [15]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6] I 波·弗·兹纳涅茨基.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7] 温泉信. 角色: 人的行为选择[M]. 北京: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
- [18] 丁水木, 张绪山. 社会角色论[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19] 冉益群. 新“规定”中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6).
- [20] 谢华汉. 大学生权利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广东大学生为调查对象[J]. 青年探索, 2005(11).
- [21] 高韞芳. 当代大学生角色人格之民主关怀[D]. 太原: 山西大学政治学系, 200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坚持德育为先 创新工作机制*

——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

邹建芬

(南京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德育为先,创新工作机制,要把握主流思想,找准创新工作机制的“基础面”,要分析主要矛盾,找准创新工作机制的“切入点”,要开展主体活动,找准创新工作机制的“新平台”。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德育为先; 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4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67-03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当代大学生(即“90后”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他们满怀憧憬又充满矛盾地走进大学,因此,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牢固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在大学生工作中坚持德育为先,必须创新工作机制,取得工作实效。

一、把握主流思想

坚持德育为先,创新工作机制,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大学生,把握他们的主流思想,找准创新工作机制的“基础面”。当代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鼓舞下,他们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他们热爱祖国、志向远大,团结友爱、文明礼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美好的憧憬。他们接触新事物多、信息面广,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和担当意识强,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更加强烈的渴望,对自我发展有着更多的期待。

应当看到,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主体心理是健康的。他们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关心父母,爱憎分明,充满阳光。据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对上海市“90后”学生的调查显示,“90后”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集体主义精神。69.8%的人在奏国歌、升国旗时会产生神圣感觉;对世博会能在上海召开,81.2%的人内心感到很自豪。对闯红灯、乱扔垃圾、破坏校园公共设施、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和乘车不给孕妇或老人让座等不文明言行,“90后”选择“非常生气”和“有点生气”的在七成以上。调查表明,“90后”最讨厌的社会现象,其中位列前三名的分别是见死不救(34.2%)、吸毒贩毒(31.4%)和贪污腐败(27.6%)。这说明,道德意识淡漠、物质至上、拜金主义并非是“90后”群体的特点,相反,他们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重视健康,讲诚信、守规矩。“90后”绝大多数对父母非常关心。其中最关心的是父母的身体状况(94.1%);其次,对父母间的关系、父母的工作、父母的心理,选择非常关心和较为关心的分别占86%、73.5%和73.2%。调查认为,“90后”不仅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还较为重视家庭关系是否和睦融洽,主动感知父母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并且在在意父母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和心理变化。

*[收稿日期] 2011-02-10

[作者简介] 邹建芬(1962-),女,江苏无锡人,南京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此外“90后”学生还较为重视同学友谊“与班上的同学相处愉快”这一陈述,选择非常符合和较为符合的高达94%以上。调查发现,认为同学关系基本和谐和有时和谐的人数占总数的98%左右。^[1]

近年来,各高校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加强教材建设,教学质量明显提高。通过大力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得以巩固。通过不断推进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实效性。通过广泛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专业服务活动、支援西部等活动,增强了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坚持为大学生办实事、解难事,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感召力。通过各项工作和努力,大学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爱国热情持续高涨,社会责任感显著增强,道德素质和现代文明素质明显提升。这既是近年来广泛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也是今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我们应当认识主流、把握主流、立足主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创新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二、分析主要矛盾

坚持德育为先,创新工作机制,必须认真分析当代大学生成长环境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客观分析他们思想中的主要矛盾,找准创新工作机制的“切入点”。当前,社会发展到了关键时期,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更加凸显。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导致一部分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迷茫、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感不强等现象,尤其是很多大学生是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有的人协作精神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比较突出。同时在大学生工作实际中,德育为先的理念还没有被所有高校、所有教育工作者所确立,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才轻德、重知识轻德育的倾向,培养目标过于笼统、单一。反映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身上存在的突出矛盾主要有:

1. 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的矛盾。

我们的教育理想很高尚,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我们面对的

教育现实很复杂。在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位很高但工作不实、渠道很多但路径不畅、方法很多但效果不佳、队伍很大但能力不强等情况。反映在大学生身上往往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成才与成人的矛盾,求知与求职的矛盾,自主与自律的矛盾等等。

2.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矛盾。

学校教育的正规性和正统性与社会对学生的不良影响始终是一对矛盾。特别是社会上一些不良、消极甚至丑恶现象对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学校教育所形成的积极效果往往被社会的消极因素所抵消。这些都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带来负面影响。学校教育的育人环境有待优化,对大学生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

3. 大学生思想与心理的矛盾。

当代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们身上充满着许多矛盾心理,比如,他们是成人但不成熟;要自主但不能自律;有理想但不理性;思想活跃但没有质的飞跃;有真情但没有掌握真谛。特别是有少数大学生存在一些不良心理,突出表现为:一是有些人不相信社会主流趋势。在思想上,胸无大志,缺乏理想信念,缺少远大志向,没有社会责任;在认识上,以偏概全,不看主流看支流,无限放大社会丑恶现象;在方法上,孤芳自赏,认为举世皆浊,惟我独清。二是有些人以自我为中心,好胜心、虚荣心、妒忌心、攀比心集于一身,成功时认为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失败时认为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三是有些人挡不住社会各种诱惑。赶时髦、迷网络、讲攀比,沉溺其中,消磨了斗志。难辨真伪,有的甚至道德沦丧、走上犯罪的道路。四是有些人心理承受能力差。有些大学生经不起挫折,挨不起批评、碰不得困难,遇到一点挫折,就会出走、轻生,不能直面艰难困苦的人生,看不到人间充满的阳光。

三、突出主体活动

坚持德育为先,创新工作机制,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结合他们的实际状况,找准创新工作机制的“新平台”。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和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现状,高校在学生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的原则,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在具体工作中要突出5项主体活动。

1. 弘扬主旋律。

要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高校学生

工作的主旋律,高举这面伟大旗帜,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高扬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坚定不移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不移地把提高学生的道德文明素质作为突出任务,抓紧抓好、常抓不懈、抓出成效。

2. 坚守主阵地。

要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要强化第一课堂,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既教书又育人。要丰富第二课堂,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渗透到第二课堂之中。要优化宿舍食堂,从文明就寝、文明就餐做起,把思想教育、行为指导、生活服务、文化熏陶融为一体。要净化网络内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建设,主动占领网络教育阵地。

3. 坚持主渠道。

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这条渠道要坚持而不是取消,要强化而不是削弱,要改进而不是改变,要完善而不是“完事”。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身边的事解释理论,做到以理服人,用典型的事例讲解理论,做到以情动人,增强时代性,提高实效性。

(上接第57页)他们进行元认知能力的养成训练。在民主轻松的氛围中,学生的思维活动比较活跃,参与学习生活的意识相对要强,他们的主体性发挥得就很充分。尤其对于家长来说,不能一味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强加给孩子,按照成人的逻辑思路为孩子设计人生发展的轨道。而是必须尊重孩子,留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促使其积极地思考,体会和感受生活的滋味,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养成对自身进行反省认知的习惯并增加生活的智慧,从而促进其元认知能力的养成和提高。

元认知能力能够促进个体学业的发展、人格的成长以及主体性的发挥,作为教师和家长应该剔除教育教学现实中不利学生元认知能力形成的现象的负面效应,把培养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不断推动和促进中小学生的元认知能力的发展。

4. 开展主活动。

要根据重大节日和学校的实际,开展好党团组织主题活动、高品质的校园文化活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慈善公益活动、课外体育活动等,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净化学生心灵、陶冶情操、磨炼意志。

5. 创设主文化。

大学应当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策源地,每所大学不论历史长短都应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大学生不仅是教出来的,也是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化”出来的。要充分发挥校训、校风、教风、学风作为校园文化主文化的作用,不断建设和积淀校园文化,营造浓郁的文化育人氛围。

总之,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德育为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以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机制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 走近“90后”——上海市青少年情感调查[EB/OL]. <http://www.sina.com.cn>. 2010-01-08.

(责任编辑 晨晓)

[参考文献]

- [1] 张庆林. 当代认知心理学在教学中的应用[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2] Sternberg R. J. Beyond IQ[M].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张胜华. 元认知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 [4] 郭亨杰. 心理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5] 师保国, 廖承琳. 个性化教育中元认知训练的意义及其实施[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2002(6).
- [6] <http://lg591018.bokee.com/viewdiary.10722137.html>. 2010-03-06[OL].
- [7] 卢勤. 孩子呼唤什么样的素质教育[J]. 现代教育论丛, 2007(1).
- [8] 汪玲, 郭德俊. 元认知与学习动机关系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03(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试论多元价值时代高等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教育*

顾 莉

(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 江苏盐城 224051)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社会呈现出多元价值并存现象。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在应对就业压力和职业选择时, 更是体现出多元价值的冲突, 本文着重探讨在这一新背景下, 高等师范院校是否还有必要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以及如何重构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模式等问题。

[关键词] 职业价值观; 多元价值; 高等师范生; 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70-03

一、多元价值时代高师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趋深入, 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中国社会逐渐展现出多元价值形态, 多元文化、多元思想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在高校, 由于青年学生大多数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 而他们却具有思维活跃、知识面广、易接受新知识这些特点, 使得大学生成为多元价值社会表现最为突出的群体之一。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以下简称“高师生”)除具有以上高校学生的普遍性以外, 还具有其职业价值观上的特殊性:

1. 市场经济赋予高师生多元职业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师范生就业已经完成了从统包统分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选择的转变。在统包统分阶段, 职业价值选择主要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完成, 作为选择主体的学生, 大多数是由家长代为决定, 高校就读期间几乎不再重新作选择, 而由相关部门作统一工作安排。而在自主选择阶段, 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双向选择上, 就师范毕业生而言, 既可以选择从教与不从教, 也可以选择到哪里执教。这种转变既带给师范生在就读期间提高职业技能的动力, 同时也给师范生带来择业的广

阔空间, 教师不再是师范生唯一的职业选择。

2. 教师职业地位的上升增加高师生执教期望。

改革开放以后, 教师地位的提升逐步受到国家的重视, 1987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 明确把提高教师待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93年, 教师职业的法律地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而得以确立, 同时也为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因此, 在就业严峻的形势下, 具有工作稳定、收入提高、社会地位上升等特点的教师职业, 越来越受到高校毕业生的青睐。尤其是在较发达地区, 教师更成为竞争比较激烈的职业。

3. 就业压力降低高师生择业信心。

在更多的高师毕业生倾向于选择教师职业的同时, 教师的入行门槛也水涨船高。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小学招生总人数下降、校舍合并, 对教师的需求量降低, 而师范类学校的招生规模却没有缩减所带来的矛盾。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报道称, 2010年, 全国高等院校师范类毕业生总数超过60万, 而整个教育系统提供的用人需求不足30万。^[1]在这个特殊的人才市场中, 逐渐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格局, 各地中小学在新教师招聘中, 逐步采取公开招聘、择优录用的方式, 对师范毕业生的各项能力和素质要求

*[收稿日期] 2011-01-10

[作者简介] 顾莉(1977-), 女, 江苏盐城人, 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讲师。

越来越高。这对在读的高师生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部分学生因此努力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以应对将来严峻的就业形势,而同时,越来越多的师范生对将来能否到中小学任教缺乏信心。因此,在师范生中出现了从主观“愿不愿意”到客观“能不能”去做教师的转变。

二、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现状

1. 学生难以树立明确的职业价值观。

正因为高师生面临如上的机遇和挑战,使得大多数高师生不能明确自身的就业方向,他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就业渠道来缓解自身的压力,如报考研究生、报考各级公务员、报考村官、进企业甚至是自主创业。他们也不敢把全部的筹码押在从事教师职业上,因此,在高校就读阶段不能也无暇树立明确的职业价值观。这种现象对师范类院校进行相关职业价值观教育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师范类院校在不能保证学生将来可以做教师的情况下,强行进行教师职业价值观教育似乎有些“理不直气不壮”。

2. 学校缺乏科学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模式。

大多数师范院校在逐步融入市场的过程中,也不再是单纯的培养师范类人才,就专业设置上,几乎所有的师范院校都设有非师范专业。即使是师范专业,从学生就业现状上看,很大一部分学生并没有从事教师职业。师范院校在考虑就业率的前提下,并不鼓励师范生立志从事教师职业,而是提供各种条件(包括课程设置,如有的高校甚至专门开设了面向考研的课程)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升学渠道。这就进一步从客观上导致了师范生职业价值观的模糊。而各类师范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几乎都没有专门关于职业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也没有明确的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在我国大多数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主要包括3类: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以及教育专业课程。其中教育专业课程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如在所有课程比重上有所上升,也更能注重实践。但这些都还是从教学手段和方法这样的技术层面上进行的教师教育,其成功的标志是培养一名合格的“教书匠”,而忽视对一名师范生应有的职业人格和职业修养的培养。面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在高师专业开设教师伦理课程^[2],希望以此来提高除教师技术外的其他教师职业素养。

三、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教育模式探讨

1. 明确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尽管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师生将来并不一定都能步入教师的行业,但这不是放松对其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的理由。师范院校的宗旨是培养教师的准备人才,最优的模式就是择优入行,而不是所有师范生都必然可以成为教师。而师范院校应当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从业人员,这既包括职业技能方面,也包括职业态度方面即职业价值观的确立。

对于应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当代美国教育界知名学者古德莱德认为:“首先是培养教师对于民主社会对公民的要求以及学校在帮助市民满足民主社会的期望中的角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其次,教师必须掌握一种有效参与人类对话并介绍学生参与这种对话的智力工具;再次,教师应该拥有为教育青年人而创造最佳的条件所必需的教学知识和技能;最后,教师必须理解有关学校教育的普遍要素:目标、组织、课程、教学、评价等。教师教育可以努力达成第三、第四个目标,但对于第一、第二个目标,教师教育方案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在于,教师教育往往错误地认为教学只是单纯的、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努力,而第一、第二个目标恰恰是深层的价值观念的体现。”^{[3] P.6}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非常重视对师范生的师德教育,他一贯主张“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个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他把“培养合理的人生”作为自己的宗旨,重视教师的人格培养。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精神、献身精神、求真精神、好学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今天的教师教育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4] P.17}由此可见,对高师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值得重视,在就业竞争激烈的今天,师范院校和师范类学生更应当有意识地提高各方面的素质,包括道德素养,以应对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的需要。

2. 加强科学合理的理论教育。

加强高师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可以通过开设一门专门的理论课程,如职业伦理(或道德)课程实现,但这绝不仅仅是传统的理论灌输,或者仅仅是道德规范上的简单告知。鉴于目前整个社会呈现的价值多元的现状以及当前高师生特殊的就业形势,高校教育者在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时,应结合当前的实际,走进学生的生活,在了解学生多元价值冲突的

前提下,尊重学生价值选择的自由,但教师自身应能明确辨别不同的价值观所处的层次,如属于批判性价值观、容许性价值观还是倡导性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真正明白这些价值观之所以值得追求和倡导的原因,从而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导向。

高师生职业价值观的理论教育,首先应当突出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无论是从事教师职业还是从事其他任何职业都无法脱离对该问题的思考。爱因斯坦说:“关于‘是什么’这类知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能有关于‘是什么’的最明晰最完备的知识,但还不能由此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5]这另一源泉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切价值观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具有普适性和持久性的价值观教育,更是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的价值观教育的根基所在。教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更应当担任人文精神的传递者。其次,应当在理论教育中强调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职业价值观。尽管部分学生将来存在不做教师可能性,但并不是必然性,只要存在成为教师的可能,就必须确保将来的从业人员有较清晰的职业价值观。在教育过程中,应从实际和现实出发,以启发引导为主要方式,让学生自己思考个人兴趣与职业理想、个人抱负与职业精神等相关问题,明确教师职业要求和职业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能力,能够明辨是非、分清良莠。

3. 提升师范院校的人文环境。

师范院校的人文环境既包括学校的硬件环境,更包括软环境。硬件环境主要是指师范院校的校园建设和设施配备应当体现师范院校应有的特色,但由于很多师范院校都向综合性院校发展,忽视了自身的师范性环境建设,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不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无法转变自己的角色,不能把自己与教师职业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应加强师范性校园环境的建设。

相比硬件环境而言,师范院校对于职业价值观教育的软环境建设更为重要。软环境建设主要是在师范院校中除课程设置以外,学校中各类教师,尤其是各课程的任课教师所起的作用。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任务仅仅落在个别职业道德理论课的教师

身上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各类课程教师都应当担负起模范的作用。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认为:“教育者在陶冶被教育者时,不只是给他一定的知识,而主要的是要以自己对日常事物的态度去影响他们。”^[6]除了任课教师以外,辅导员、学工领导,包括学校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同样在对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因为所有这些人员在大多数学生心目中都代表着教师的形象。

4. 实现教育实践的多重功效。

高师生在高校期间参与的教育实践,是其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高师生开始以实习者的身份进入中小学的实际教学,在实践中不仅提高了教学的技能,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了教师职业的工作职责、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问题,这与其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职业期望可能会产生差距甚至矛盾;在与在职中小学教师的交往过程中,也可能再次感受到职业价值观的冲突,再次面临着职业价值观的评价和选择问题。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能否正确认识教师职业,能否辨别社会上现存的不合理教师职业价值观,对学生将来能否胜任教师职业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师范院校在安排教育实践之前,不仅要重视学生可能遇到的教学技术上的问题,更要预测到学生可能出现的职业价值观上的问题,提前做好学生的思想认识工作,帮助学生提高辨别能力,对一些社会现象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让教育实践真正成为提高学生各项技能和职业修养的大课堂。

[参考文献]

- [1]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2/01/content_2960746.htm [OL] .
- [2] 李西君. 高师专业教师伦理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初探 [J]. 继续教育研究 2010(1) .
- [3] 李其龙,陈永明. 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比较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4] 《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苏课题组.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 [5]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6] 杨德广,晏开利. 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构建高校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对策及思考*

张其飞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纪监审办公室,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近年来,随着教育投入的大幅增加,教育与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高校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当前高校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分析其产生的真正原因,并从营造高校廉政文化氛围、提高制度执行力、健全完善制度监督体系、构建社会信用等级制度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腐败。

[关键词] 高校; 反腐倡廉; 长效机制;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03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73-04

一、当前高校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

1. 高校腐败呈权力与资本勾结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初,高校腐败的主要特点在职称评定、招生、学生分配等方面,表现为握有特权的官员与请托人之间“吃吃喝喝,拿点礼”,从事“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简单而直接的交易。随着高校的规模扩张和基建的巨大投入,在房地产开发热,民营、私营企业发展热的经济发展热潮中,腐败形式也进一步升级。此时的校园已不再是远离腐败的净土,而成了不法商家逐利的乐园、经济资本获利的战场。如2009年的武汉大学领导腐败案,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皆因与建筑地产商勾结而贪腐下水。^[1]此案表明,这种官商勾结的背后是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实质是商利用官的权力使其资本效益最大化;官则利用商的资本,使其权力金钱化。同时也反映了部分掌握实权的高校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发生了异化,严重背离了党性的要求,演变成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

2. 作案手段多样,隐性腐败增多,时间跨度比较长。

当前,随着腐败现象打击力度的加大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系统的关注,明目张胆的显性腐败有所收

敛,而钻法律空子、打政策擦边球、利用各种手段掩饰腐败意图的隐性腐败增多。如江苏某高校后勤管理处的副处长,利用学校基建工程的监管和物资设备采购等权力,从2001年至2009年,先后多次收受相关单位财物,累计达10多万元。此案集中反映了受贿呈现的几种典型的特点:(1)细水长流式。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收受大额贿赂的风险大,问题暴露的可能性也大,于是部分贪官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拒收“大钱”改收“小钱”,变集中大收为分散小收,细水常流。(2)感情联络式。职务升迁、子女就学、贵体欠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符合了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往往成为一些腐败分子收钱敛财的绝好时机。在人情味的掩饰下,淡化受贿色彩。(3)利用时间间隔。有些腐败分子在为请托人办事时,办成事后或隔段时间再索要。他们认为在长达八到十年时间里,随着时空变化自然会冲淡腐败的印记。(4)变相收受贿赂。现在给领导和实权者送礼,已不再是传统的大包小包的烟、酒、土特产等实物,取而代之的是信用卡、消费卡、字画、古玩等一些即时尚高雅、又不易被察觉的新型贿赂物品。

虽然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涵盖了

*[收稿日期] 2010-11-28

[作者简介] 张其飞(1975-),男,江苏淮阴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纪监审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当前腐败的新形式,但是腐败分子的新花样,还将不断地涌现,查处腐败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3. 由个体作案向群体性作案蔓延,反腐败阻力加大。

当前,腐败分子往往不是单兵作战,而是诸多腐败分子结合在一起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结成腐败利益共同体。因此,查处的窝案、串案、案中案在所有案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如河南省一所高校一个党委书记发案之后,他的八位干部被抓进去。再如武汉大学的后勤窝案,从部长、副部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到一般干部纷纷倒下。^[2]这种群体性腐败一方面会对高校的政治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还会给反腐败斗争带来非常大的阻力,因为在这种地方不仅缺乏反腐败的内在动力,而且腐败利益同盟还极力维护自身利益干扰外力查案。

4. 高校涉案的主体和领域集中。

这些年高校涉案的人员主要是学校的领导干部或某些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均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权和资金支配权,且多数在同一岗位上工作5年以上。涉案领域有基建工程、后勤集团、招生考试、人事管理还有校办工厂等等,但是主要集中在基建维修的项目建设过程当中。据统计,近5年来,犯错误的高校领导干部,大约有60%在工程建设领域。

二、高校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1.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党员干部的侵蚀。

近年来,由于一些领域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客观上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3] (P.111)}随着教育投入的大幅增加,教育与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同时高校的招生、物资采购等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宽,教育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教育市场的前景广阔,充满着诱惑。在这样的形势与背景下,教育成为建筑业、书刊发行商、电教设备商等商家竞相进攻的目标。一些不法分子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拉拢、腐蚀、行贿高校的领导和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个别党员干部在利益面前经不起诱惑,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

2. 传统亚文化影响和社会潜规则盛行。

中国古代形成的不健康的文化,我们称之为亚文化,比如现在流行的“厚黑学”,至今仍深深影响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社会就是一张网,每一个成员就是网上的一个结。在我们这个崇尚礼让的国度,人情关系也成为一些腐败分子敛财的借口。一些腐败分子在人情味的掩饰下,运用符合中国传

统习俗的“礼尚往来”方式,借机迎来送往,大肆敛财。一旦问题暴露,可以假借人情往来的名义逃避法律追究。另有少数人价值观扭曲,在“法不责众”的想法下,善于利用朋友、亲戚、熟人等各种机会为自己编织“关系网”。遇到问题不求正规途径解决,而是请客送礼拉关系,按社会“潜规则”办事。在此风气下,守规则的办事成本往往高于通过非正规途径办事的成本,因而腐败有一定的空间。这种社会流行亚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正式制度的规范性要求。

3. 制度体系不健全且执行难。

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治本之策。^[4]但在现实生活中还存有制度体系不完善、不科学的问题。许多方面没有真正按照客观的要求做好制度的“废、改、立”工作。有些制度过时,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难以操作;有的制度试行十几年了还没有修订,还有些制度政出多门,对同一问题的规定,正面要求多,责任追究少。即使如《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八条规定》虽然规定详细,但是如何执行没有配套措施,致使在实践应用中无从把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给了领导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俗话说“制度的生命就在于执行”。制度执行力不强,除了制度本身缺乏操作性、难以执行以外,个别主要领导干部带头破坏制度,在制度的执行上对下不对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是导致制度难以执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4. 监督体系薄弱,难以发挥作用。

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5]一些高校的少数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上级对下级监督不到位。有人怕“过份监督”影响本单位政绩;也有人因为拉不开情面而放弃监督;也有些领导认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没有贪污腐败的土壤,犯一点小错误没什么;还有的领导认为抓党风廉政建设容易得罪人,丢选票;“谁认真抓谁吃亏”。

下级对上级监督乏力。有人认为信息不对称,基层群众对领导干部无法监督;有人认为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尽量顺从领导,不愿监督;也有人担心因监督领导,而害怕领导给自己穿小鞋,不敢监督。因此,除了主观上怕影响个人利益而不愿监督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客观上无法监督。

领导班子内部有时因一团和气、好人主义盛行,

或因一把手霸道而党内组织生活不正常使得监督形同虚设,或因怕影响工作、影响前程而放弃监督。

三、构建高校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对策及思考

高校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校园和社会风气,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当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而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构建高校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1. 强化廉政教育,营造高校廉政文化氛围。

首先,强化廉政教育在反腐败中的净化功能。一方面,制度在反腐倡廉中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作用。但是,法规制度如果不被执行,就犹如一纸空文。因此,加强廉政教育有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增加对制度的敬畏心理,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另一方面,制度并非万能的、及时的,在某些领域,再好的制度、再高超的技术仍然会让腐败分子有漏洞可钻。在此情况下,加强以教师的职业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教育、促使个人内心自律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实现廉政教育的常态化。廉政教育的功能是起到警钟长鸣、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这种教育不是一次性行为,而应当经常性、长期性的开展。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宣传优势,把廉政教育纳入学校的“大宣教”格局。

再次,廉政教育要有针对性。廉政教育最好的内容是身边案例的警示教育。积极组织高校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参加“参观监狱”等警示教育活动。同时,廉政教育要注意分层实施,实行科级对科级、处级对处级、校级对校级的针对性教育,避免产生错误对比。

最后,以“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为载体,构建校园的廉洁文化氛围。一个国家若是腐败文化盛行,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社会对于官员搞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需求,并使得社会的腐朽落后思想与官员的消极腐败意识之间相互激发,最终使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败有积极作用,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克服腐败文化的消极作用,通过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干部、教师廉洁从政、廉洁从教,净化校园环境,减少社会大众对腐败行为的需求,直至营造不能容忍腐败的校园环境,使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从而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2.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

实践反复说明,制度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质量和效果。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要在制度的制定上持慎重态度。要防止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制定制度之前应尽量多听取专家学者、师生员工等各方意见;可进行理论研讨,对制定制度的依据、涵盖的范围、实现的目标、运行实施条件等作出详细论证;也可发放征求意见稿,广泛吸纳民意,让群众参与,使制度真正成为实践所需要、反腐倡廉可操作的有力武器。

其二,制度的体系要严密。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不在于制度之多,重要的是要构成有机的制度体系,发挥制度的整体效应。制度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关的单个要素,而是各要素之间要有内在联系,构成完整的要素链。要按照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梳理现行的各种制度,使制度之间相互矛盾、重复的部分修正过来。同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尤其是要使党内规范与制度衔接起来。

其三,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制度执行中应不断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对于不完善之处要及时补充、修订。对于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约束效果的制度应大胆清理。对无视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要严惩,严格执行责任追究。

3. 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督体系。

加强监督是保障公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条件。关键是发挥各种监督的有效力量,构建完整高效的监督体系。^[6]

一是强化自上而下的巡视制度。巡视制度作为自上而下的派遣制度,一定程度上割断了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有利于巡视监督工作的独立开展,对于高校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班子主要负责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的监督真空地带。为保证巡视工作的实效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高校巡视工作的机制,完善巡视工作的信息以及巡视结果的公开等制度。

二是逐步完善新闻舆论监督。从实践看来,新闻舆论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形式之一。在西方国家,很多腐败案件首先由新闻媒体曝光,再由监察机关介入查处,起到了非常大的舆论先导作用。如南京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就是一个网络反腐的

典型。建立一个网络的反腐平台,允许网民发表评论和提供有根据的线索。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大社会舆论对官员的监督,也有利于舆论监督在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下有序地开展。

三是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纪检监察体制,加大监督的力度。当前,纪检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大纪委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探索建立高校专职纪检监察干部异校任职制度。^[7]在高校相对集中地方(如大学城),高校的专职纪检干部在上级纪委(教育纪工委)的领导协调下,进行校际间的交错任职,所交错任职的纪检干部的人事关系、待遇等保留在原单位,按相关要求参加新单位的工作(如列席新学校的党委会),受新的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部门(教育纪工委)的双重领导。

笔者认为,探索建立专职纪检干部异校任职制度,是在不增加行政投入的情况下,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加强了监督的执行力,对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实行高校纪检专职干部异校任职,首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央纪委、省纪委对中直机关、省厅局实行纪检组长派驻制度的有效补充;其次是保证了监管渠道的畅通,有利于整合有效的监督资源;再次是使监督主体由内部监督变为外部监督,确保了监督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专职纪检干部异校任职制度的实质是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结合,强化了监督的系统性。

四是整合各反腐败倡廉资源,形成监督合力。把高校的经济监督机构审计处、程序监督机构监察处和党风廉政教育机构纪委办整合起来,实行三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样既克服了单个职能部门履行监督职能时力不从心的局限,同时又发挥了自己在反腐败中特有的优势。整合这些部门的监督力量,对高校而言,无论是工程项目招标还是物资采购,都能从开始的立项程序到终结的验收、付款,形成了统一、高效、互动的监督网络,有利于监督的系统性。

4. 构建信用等级黑名单制度,提高对腐败的“零容忍度”。

廉政建设是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前高校迫切需要重点加强研究的领域是反腐败的惩治机制。只有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教育才有说服力、制度才有约束力、监督才有威慑力。^[8]一方面,治理腐败要彻底,既要打老虎也要抓苍蝇。反腐败不仅要抓大的腐败案件,也要查小的违纪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有绝不姑息、绝不放过的坚强态度。从

党纪、政纪和法纪上提高对腐败的“零容忍度”。

从高校反腐败实践看,我们打击腐败的重点对象是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校办企业领导人员等体制内的人,而对于工程项目经理、私企老板等体制外的违规者打击力度不足。针对此,有必要建立校外单位及人员信用等级黑名单制度。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高校纪委监察机构要依据查处的案件实际,对高校负责基建、维修或物资采购的工作人员进行行贿的单位人员或工程项目中偷工减料的工程队,建立相应的行贿黑名单和信用等级制度,凡是榜上有名的个人或单位,在此后高校的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等方面,在一定期限内(如5年)一律实行“一票否决制”。同时,以高校廉政监察协会等组织为纽带,在高校间设立信用等级黑名单信息共享平台。这样,客观上增大工程公司或个人的腐败成本,主观上减少了腐败机会。与此相对应,高校内部建立相应的受贿“黑名单”,并把此作为对干部考核任用的客观依据。这不仅是对搞腐败者应有的惩罚,同时也让重点岗位的关键人员的受贿行为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客观上也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公正行使权力,起到威慑作用。如此,前一个信用评价系统形成对行贿者的约束,后一个评价系统形成对权力掌握者的约束,两个约束合力虽说不一定能完全肃清流弊,但至少能产生相当的威慑力。

[参考文献]

- [1] 刘炎迅. 武汉大学腐败案调查:两被捕领导2003年就被举报[EB/OL].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0-27/1932332.shtml>.
- [2] 雷宇. 武汉大学后勤系统出现腐败窝案[EB/OL]. <http://news.163.com/10/1214/10/6NS0ETN100014AED.html>.
- [3] 中纪委、中央党校编写组. 新时期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程[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 [4] 薛冰. 论加强与完善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J]. 中国商界,2010(9).
- [5] 陶进. 完善我国公务员监督法规制度的思考[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
- [6] 吴海红. 问题与出路:我国反腐败现状实证研究[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1).
- [7] 张其飞. 探索专职纪检干部异校任职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J]. 管理观察,2008(10).
- [8] 唐俊昌. 坚持以惩促防推进反腐倡廉——查办案件要从四处着眼[J]. 党风廉政,2010(10).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苏霍姆林斯基爱情教育思想的当代适切性*

金 荷 华

(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从道德上培育青少年对爱情、婚姻、家庭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学校在关怀个人幸福的同时,也在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苏霍姆林斯基关于爱的教育思想与我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和谐教育、和谐发展”的发展目标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但学习借鉴时必须与时俱进,既要善于研习和提炼苏氏教育思想的深刻实质,又要善于把握和丰富时代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 苏霍姆林斯基; 爱情教育; 中国; 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77-04

顾明远先生指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具有普适性、先进性、丰富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是符合教育的普遍规律,符合儿童的成长规律的。”^[1]苏霍姆林斯基是主张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家、实践家,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性心理健康和爱情教育,他把这个问题同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尤其是学校德育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全面阐述,这些思想与我国当前社会和教育发展追求的目标“和谐社会、和谐教育、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和方向,要求把德育融入教育的全过程。从道德上培育青少年对爱情、婚姻、家庭做好充分准备,是学校在关怀个人幸福的同时,也在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受到多方面干扰,而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面对形形色色的爱情观、婚姻观以及男女性关系的认识,往往无所适从。因此,重新解读并借鉴苏霍姆林斯基关于爱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工作者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和作品,必定有它特定的思想方向、思考主题、思维惯式。尽管苏霍姆林

斯基的爱情教育思想很丰富,产生的社会影响十分广泛,但在当代仍然需要丰富和发展。正如肖甦教授所言:“既要善于研习和提炼苏氏教育思想的深刻实质,又要善于把握和丰富时代的本质内涵。只有将教育大师精到的教育判断和感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核心精神及时、妥善、有效地结合,才能够使我们今天的教育富有时代的使命感和强大的生命力。”^[2]

一、苏霍姆林斯基的爱情教育思想及其实施策略

苏氏爱情观可概括为:相互爱慕,彼此忠诚,生死不渝。他一再强调“爱情是一种责任,首先是尽责任,然后才能获得快乐,包括爱情生活的幸福”^{[3](P.174)}。其爱情教育的旨归体现在:第一,爱情教育是造就个人幸福人生的重要环节;爱情教育能促进个人道德面貌和个性的形成,帮助学生养成高尚的个性;爱情的道德纯洁性是人类灵魂的一面镜子。第二,爱情教育对家庭的稳固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父母之间情深意笃的爱情,这种爱情显示的榜样作用,以及他们在日常生

*[基金项目]江苏教育学院教学改革重点研究课题“新世纪语文教学论的理论视野及实践指向研究”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课改视野下语文教师素养的价值追求”(项目编号 2010SJB880012)。

[收稿日期] 2011-03-02

[作者简介] 金荷花(1960-),女,江苏涟水人,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全国优秀教师。

活中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都是巨大无比的教育力量。^{[3] P.183}第三,爱情教育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爱情从一开始,就对道德进步、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爱情不能以遗传学的方式留给人们,爱情需要创造、培养。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爱情教育。

1. 培养男女相互关系的道德美感。首先,从小培养纯洁高尚的道德审美情感,认为美是培养善良、热爱劳动、热忱和爱情的主要手段。其次,发展女性美、珍视女性美,认为女性美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外形美与心灵美的统一。再次,正确认识心灵美与外表美的统一,是高尚的一种美的反映,是人的道德尊严在审美方面的表现,是一个人由于有着崇高的生活目的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形成的。

2. 树立崇高的生活目的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首先,教育青少年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因为高尚的爱情来自崇高的生活目的,崇高的生活目的是爱情的道德与感情基础。其次,让青少年在造福他人的劳动中获得快乐,一个有着崇高生活目的的人,对其他人的这种品质也极为敏感,他所追求的意中人,是不谋求个人私利、一心为崇高的社会目的而献身的人,这就是道德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再次,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家人和社会,教育孩子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人群中的,一个人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影响,要学会为他人负责。

3. 对青少年进行科学而健康的性教育。首先,要注重身体的发育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一致;“在男孩子把女孩子当作女人来爱之前,他就应该把她作为一个人来爱,并怀有一种敬佩、自豪和充满高度人类快乐的崇高精神的感情——一种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与美感方面的交流的快乐。”^{[4] P.501}其次,将性教育渗透在崇敬母亲的教育当中,主张学校要积极提倡崇敬母亲,认为“这是对待妇女(人类生活和美的源泉)的一种崇高而又纯洁的精神,可以使人的自然的性欲变得高尚起来,消除掉人类心灵中的那种兽性的、粗野的本能。”^{[4] P.496}

二、苏霍姆林斯基爱情教育思想在当下中国的适切性

苏氏爱情教育思想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上,其精髓就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关于爱的教

育思想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其著作《爱情的教育》《关于爱的思考》以及《给儿子的信》《给女儿的信》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是颇受中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青睐的读物,有的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但是,由于它形成于价值观体系较为单一的时代,一些教育观点尤其是涉及德育方面的某些观点,是带有明显一元化的历史局限性的。他对爱情婚姻中一些问题的论述,现在看来其观点不无偏激之处。

因此,学习借鉴苏氏爱情教育思想,要正视当今一元与多元价值观共存的社会现实。限于篇幅,以下选择两个视角加以讨论。

1. 要与时俱进地分析爱情婚姻中的道德问题。当今社会,一元与多元价值观共存,这就打破了教育预设目的和内在结构的单一性、确定性、工具性,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探索如何通过教育,使每个学生主体能坚守基础的、共同的、符合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并善于在多样纷呈的价值流域中对各种价值观念进行认识、辨别、理解和选择。爱情教育,更加需要在坚持其“永恒的道德价值教育”的基础上,明智地适应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爱情婚姻观念。

例如,怎样对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问题,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这句话中含有某种有害的东西,表示“决不允许滥用这一概念”。此观点源于尤·留里科夫的《三种吸引》一书中的“爱情消逝论”,大意是:爱情随着时间的延长会消逝,既然爱情会消逝,夫妻过上一段时间,觉得不再相爱了就分手,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年轻夫妇不善于安排生活,不善于调理彼此的关系,而把它当作观点、性格、习惯不合等来看待,变成轻率离婚的借口。^{[5] P.483-484}当下我国爱情婚姻方面的问题令人忧虑:非法同居,未婚先孕;家庭不和,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子女身心发展状况堪忧,青少年性犯罪案件频发;一些人视婚姻如儿戏,闪恋、闪婚、闪离似乎已经司空见惯,称为“好合好散”,有的也标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些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而学校对此更应该有较强的防止和抵御意识。教师应该结合这些社会现象对青少年进行情感素养教育,引导他们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思考、分析、辨别、判断,从而形成正确的爱情婚姻观念。从该角度来看,苏霍姆林斯基“决不允许滥用这一概念”的决绝态度,在今天当然仍具有教育意义。

但是,要防止过犹不及。当今中国的婚姻家庭现实已经发生变迁,如夫妻因性格不合或感情确已破裂而要求离婚的行为,是受到相关法律支持和保护的,这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进行爱情教育,就要客观辩证地看待爱情婚姻中的道德问题,不可一味认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的说法,也不能一概否定离婚现象。男女之间一旦爱确已死亡,而一方死缠硬拖、维持一个貌合神离的关系,或者保留一个危机四伏的家庭,也是有损个人尊严、不利于生活和工作的。因此,提高恋爱婚姻中抗挫折的心理能力,也应该成为当今爱情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在婚前的慎重选择和婚后如何经营婚姻、调理夫妻感情等方面,加强教育和引导。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爱情经历着复杂的历程,青春的热情、青春的欢乐将逐渐让位于发自内心的眷恋,让位于责任心和义务感。这种情况在那些对婚姻没有做好道德准备的人和思想狭隘的人看来,仿佛就是爱情在消亡。”互相倾心的人应该使自己做好合得来的准备,不要任性和乖张,而要宽容、忍让、随和、明智和慎重。^{〔6〕}这些论断,对引导当今的青年男女怎样认识爱情、呵护爱情,从而规避爱情死亡的风险,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2. 要客观对待爱情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苏霍姆林斯基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变得越好,人特别是女人占有的物越多,文化水平就应该越高,整个精神需求的范围就应越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才不至于被物吞噬,而在人们相互关系特别是男女的精神心理和道德审美关系中,物才不起决定性作用。”^{〔3〕}此论断对那些正梦想着做、或已经做了“全职太太”的人们,无疑具有忠告和警醒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有所改变,当今人们更加相信:在爱情婚姻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缺一不可,不少年轻人发出无奈的慨叹:爱情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但是,教育者应该让青少年明白,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爱情婚姻一旦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便埋下了爱情悲剧的种子。

当然,生活中另一种极端的现象也不能忽视,就是爱情选择中的“另类”现象。如大学生因爱上一个流浪汉而毅然辍学;善良女用自己的爱和青春去拯救一个在逃犯;妙龄少女因无力救治重病亲人,就以嫁给对方为条件公开招募提供救命钱的人。诸如此类的行为,尽管可能有诸多理由或无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行为都是在冒险,都在给自己和他人的未

来生活酿制悲剧。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告诫:“不要相信‘跟爱的人在一起住窝棚也是天堂’的鬼话。”^{〔5〕}因为“人类的爱情不仅是美好的、忠实的、真诚的,而且是明智的、审慎的、机警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3〕}

三、在借鉴中探寻适合中国当今国情民意的爱情教育途径

苏霍姆林斯基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始终流淌着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教育成为人性化的教育。这也正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

1. 遵循尊重、关怀、细心、掌握分寸的爱情教育原则。首先,要尊重和关怀男女生之间的爱慕之情。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中视男女生爱慕为洪水猛兽,处心积虑地遏制,有的无视学生尊严,甚至违规犯法,将“早恋”学生的信息“上墙”或“上网”以“示众”。然而,现在随着西方开放的性教育观念的引介,教师中又不乏另一种极端现象:对男女生交往过密的行为,态度是眼不见心不烦,或干脆视而不见。殊不知,对青少年性心理问题的不闻不问,或对一些“出轨”行为的“默许”甚至“放纵”,就是教育者的失职!因此,教育者的教育艺术在于“善于轻轻地碰一下,而又不干涉人与人的关系中这个脆弱、娇嫩的领域。”^{〔6〕}

其次,细心、善于掌握分寸,要有敏锐、体贴入微的态度。教师要“同少年男女、青年男女亲切地、坦率地,最重要的是机智地谈论爱情问题,谈话要始终贯穿一条红线:感情要受思想、理智、意识的支配,不能让感情冲动占上风,必须让理智、悟性来主宰。以自觉的、理智的态度对待欲望。”^{〔3〕}只有“我想”和“应当”两者在人的行为中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时候,爱情才会是高尚的。教师要掌握策略:面向学生群体提出规范要求;对少数“恋爱先行者”进行个别疏导;对一些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个别学生,则实施挽救教育,绝不能放弃,更不可歧视。教师还要善于倾听和理解学生提出的涉及男女爱慕的问题,回答还要很机智,善于概括生活中的现象,通过活生生的事例,分析其中利害得失,并鼓励学生自己去抉择。

2. 以适应时代发展为前提,以人格教育为依托。爱情教育不能脱离人格教育单独进行,因为它只是人格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让青少年逐渐把握成长才是良策,把握成长就是在体验中学习选择,在选择中承担责任。

要让青少年认识并理解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两厢情愿的。现在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婚姻爱情观：“找不到我爱的人，就找一个爱我的人结婚吧。”有的甚至说：“聪明的女人嫁给爱她的人，愚蠢的女人嫁给她爱的人。”这其实是不道德的爱情观，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相互倾慕的。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强调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在爱情中不应考虑得到多少，而应考虑给予对方多少。然而，这样的爱情教育论断，当今看来不无苍白。现在各类相亲会、婚介机构以及多种为青年男女提供婚配机会的社会活动或电视节目，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不少嘉宾“索取”的甚多，有的女生直言不讳地提出满足自身诸多方面的诉求，可谓自私自利。这些生活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要比学校教育大得多。

因此，进行爱情教育既要坚持教育原则，又要符合生活实际，要充分利用社会主流文化的丰富积淀，把年轻人的本能的欲望引入健康的爱情范畴。教育者可以根据学生特点选择多种教育途径，可以借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品德修养教育；也可以结合现当代文艺作品进行爱情教育，如婚姻问题剧《中国式离婚》中女主角的悔恨顿悟之语“爱是要有能力的，这能力就是要使我爱的人爱我”。爱是相互的，不能强求，自己必须变得可爱，才有可能真正被自己所爱的人爱。

3. 将性心理教育和爱情教育与培养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教育部在2008年12月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各阶段应该进行的性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值得忧虑的是，当前我国中小学关于性心理的教育，通行的方式是开设“生理卫生”课程，内容及形式往往过于理性和生硬直白，其教育效果有时适得其反，会使男女生对“性”产生更大的好奇感，以致自行借助网络等媒体来满足心理需求，这就难以规避不良媒体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侵害。鉴于当前学校该项工作的实际状况，我们不妨作以下探索。

第一，将性心理教育渗透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之中。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的道德美感作为一个长期的常规教育目标，贯穿于教育的各个关节，渗透在德、智、体各科教学当中。至于实施的方式，可因地制宜，因教学内容而异，充分利用校本资源，或渗透到相关学科课堂教学中，或结合在综合

性学习活动中，尤其要充分发挥语文等人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将性心理健康教育与培养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结合起来，容易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第二，将爱情教育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关注社会、体悟人生中，提高情感素养，使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需要在生活中得以实现。我国学校教育的积习弊端现在仍然没有消除，学生的智力学习与道德养成往往相互分离。应该使学生所受的教育和生活中的表现一致起来，而不是“应该怎样”和“实际怎样”形成两张皮。引导学生关注社会、解读生活，是培养学生情感道德的一个有效途径。

例如，选择什么样的爱情婚姻，今天完全是多元化的，似乎只要“你情我愿”即可。但是要以利人利己、获得真正的爱情幸福为底线。充当“小三”、甘做“二奶”，为人类情感道德所不容，而出于一时的同情怜悯，就和自己并不爱的人结婚，是拿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的幸福去冒险，也是不能提倡的，因为这同样会引发家庭的灾难，或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近年来，我国很多婚姻问题剧，如电视剧《蜗居》等，这些来自生活的爱情、婚姻、道德问题，在学生身边可谓俯拾即是。这些作品探讨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其扬弃的道德价值也容易引起青年人的深刻思考。结合教育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评价，乃至做出选择的意见或建议，就是很好的教育过程，这些思想内容将积淀成他们的情感素养，成为他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现实意义[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4).
- [2] 肖甦.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探索的永恒财富[J]. 比较教育研究, 2010(3).
- [3] 苏 [苏霍姆林斯基. 爱情的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4] 苏 [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 3 卷)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5] 苏 [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6] 苏 [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刘敏慧)

退还庚款与留美教育研究*

——以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为中心

张英谋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庚款留学缘起于中美庚款支付方式之交涉,时任驻美公使、留学出身的梁诚,在交涉过程中得知美国超收庚款信息后,便立即主动与美国交涉促使其退还超收庚款,并首倡将庚款用于留美教育。其更深一层意义则是促使其他各国纷纷退还庚款,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赔款负担,由此引发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留美运动,并肇始了今天的清华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留学生; 梁诚; 退还庚款; 留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81-05

近年来学术界对庚款、庚款退还以及庚款留学研究不断深入,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究竟何人为首倡退还庚款、何人首先提出将退还庚款用于中国教育(留学教育)事业,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认识。^①本文尝试分析梁诚在庚款退还中的作为,为澄清历史事实提供历史启示。

一、梁诚与退还庚款之交涉

所谓“庚子赔款”,即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西方列强赔款4.5亿白银,赔款期限为39年,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美国从中获得本金3293.9055万两,合计24440778.81美元,约占总数的7.3%。1901年年末一则消息称美国有意把1800万美元的赔款退还给中国。1901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和1902年1月美国《CASS CITY CHRONICLE》周刊对此事分别澄清,说绝无此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声明美国索赔是正当的和合理的。那么到底是谁首先获悉美国超收庚款,史

料证明是梁诚。梁诚(1864-1917),字震东,广东番禺人,1875年作为第四批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回国。1886年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升任使馆参赞。1903年起担任驻美公使。正是由于梁诚的不懈努力,才促使美国退还了超收庚款。

第一,梁诚率先引导美国政府承认“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确定“退还赔款”的依据。《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开始向各国逐年赔付庚款,起初是以付银方式赔付庚款,1904年底银价大跌,各国纷纷要求以付金方式赔付。由于中美之间曾有用银还款协议,于是外务部于1904年11月30日电告梁诚“各国赔款,不允还银。惟美曾久照和约第六款甲字所定汇价办理,有康使(驻华公使康格)照会及零票载明为据。现与各国另议还金办法,康使颇有须一例均待之言。……此事美政府既慨允于前,未必因各国办法不同,遽变宗旨,希尊处向美政府声明。”^{[1] P.279}

*[收稿日期] 2011-02-18

[作者简介] 张英谋(1984-),男,河南焦作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关于首倡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为首倡者,可参阅张乐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决策过程》,《史林》,1987年第2期;二是认为驻美公使梁诚为首倡者,可参阅徐建平《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关于首提庚款留美教育,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梁克义首先提出,可参阅朱卫斌《试论美国“庚款兴学”——以西奥多·罗斯福与梁克义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5期;二是认为梁诚首先提出,可参阅茆诗珍、徐飞《庚款留美发端考——梁诚首倡庚款留美计划的历史考察》,《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1期。

劝说美国同意付银。

12月1日,梁诚会晤海约翰,海约翰说前已“电嘱康使按照各国一律办理。”^{〔2〕}但梁诚仍劝说美国同意付银,告以金银相抵“出入虽属无多,惟美国苟允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若一律用金,更难翻案,我政府所争者只在此点。”^{〔3〕}建议海约翰将此事再向总统汇报。12月5日,他与海约翰再次会晤,得到的答复是美国将与各国保持一致。见此情形,梁诚从中国国情、实情出发,以减轻中国负担为由,慷慨激昂地说道:“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於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约翰为之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4〕}庚款付金已成定议,但却使美国承认“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第二,梁诚率先游说美国政府“赔款核减”,启动“退还赔款”。梁诚在得知庚款过多后,当机立断,立刻放弃付费方式讨论,转而主动劝说退还超收庚款,言道:“各国若将赔款核减,於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约翰乃言:“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5〕}12月5日,梁诚便电告外务部:“总统廷议,谓各国还金,美独否,议会必不允。外部言:出入无多,不便两歧。诚讽以减收偿款。外部语意虽缓,办冀可成,较之金亏,所省尤巨。惟暂宜秘密,免别国沮惑。俟成后或可援令照办。”^{〔6〕}次日,海约翰便指示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7〕}后因海约翰病逝未能提交国会。梁诚也向清政府言道:“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且美国定议之后,援案商令各国核实减收,当易为力,即使不尽照行,苟得什五,财力亦可稍纾。”^{〔8〕}建议清政府将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

第三,梁诚率先核查“庚款”之数,夯实“退还赔款”的依据。梁诚在提出争取赔款核减之后,本着“能得一分之核实,即可少一分之本利,即可纾一分之财力”^{〔9〕}的原则,积极核查“庚款”之数。他“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密之档案,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得知美国政府1901年

向中国索取庚子赔款时,其所提出美国人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事实不尽正确。故由此根据而造成之赔款数目,亦是曾经妄为扩大,实嫌太多。”^{〔10〕}并询问其所识美国国务院及其他部门官员,终于查出“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二百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菲律宾)防次全案报销。”因此“此项赔款,……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元。”但在其后交涉中,美国坚持海陆军费应属庚款,所以梁诚在1907年6月28日的奏折中,即正式改为美国应收赔款“实不及额派之半”^{〔11〕}。

第四,梁诚积极争取美国舆论支持,寻找“退还赔款”的助力。梁诚积极四处奔走游说美国上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得美国上层纷纷表示愿将多收庚款退还中国。其游说劝说颇见成效:“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即固执如户部大臣疏氏者,亦不复显然拒绝。观其机兆,似可图成。美使柔克义于此举尚表同情。”^{〔12〕}

第五,梁诚巧妙与美国政府斡旋,终于获得“退还赔款”结果。在取得积极进展之时,中美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事件,如收回粤汉路权、抵制美货运动及连州教案事件。罗斯福总统多次强调因目前中国发生的收回粤汉路权、抵制美货运动及杀害传教士事件,使退还庚子赔款成为不可能之事。^{〔13〕}并认为此时退款“中国人是否会将此解释为一种软弱的行动”。于是将退款之事搁置不提。但梁诚却矢志不渝,继续斡旋其中。他频频招待记者,四处奔走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利用报刊舆论对美国政府及罗斯福施压,积极“运动官绅报馆发言相照,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函报在案”^{〔14〕}但却遭到新任国务卿鲁特的拒绝。于是,梁诚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绕过鲁特;“托与素厚新任内部大臣格斐路与工商部大臣士脱老士,再向总统,密申前议”,两人在1907年4月向总统陈述重核美国损失;“总统允为支持,大约与外部路提,商榷妥当”^{〔15〕}后,便于5月2日正式通知梁诚同意核实。6月15日,鲁特致函梁诚“公私支恤各项核实计算,不过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奉总统谕,即飭国会授权,将中国还款原意更正(为本利共计美金两千七百九十二万余元),照数减收等情”^{〔16〕}。至此,美国退还庚款一事已成不争之事实。梁诚在离美返国前,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讲述美国答应退还超收庚款的详细经过,从中可知梁诚“对于交涉退回超额部分的庚

子赔款,真是成功匪易了”。^{[1] P.12)}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咨文中宣布同意退款,但“另保留二百万美金为或有未经查出应偿之疑之用”^{[8] P.72)}。至此,美国同意将索赔之款由24440778.81美元减为13655492.69美元,退还中国10785286.12美元。后来,美国将其保留之二百万美金,续经查明应扣付八十三万八千一百四十美金三六外,其余仍交还中国^{[8] P.74)},所以实际退款总数为11961121.76美元。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案,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实施法令。12月31日,鲁特致函梁诚(已离任):“我在此荣幸地转呈一份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该法令根据1908年5月25日国会两院联合决议,将有关1900年北京义和团骚乱所造成的损失及花费的部分赔款予以退还。我高兴的通知您,该项退款将从1909年1月1日起始。”^{[2] P.109)}鲁特的这份特别致函,反映出梁诚在此事中所起作用至为重要。可以说这是美国对梁诚为促成退还庚款所起作用的肯定。由此证明,梁诚是最早获悉美国超收庚款之人,亦是最早要求美国退还庚款之人。

二、梁诚与庚款留学之促成

关于退还庚款的用途,罗斯福曾通过柔克义试探梁诚,如果退还,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置这笔款金,是摊还民间抑或是移作他用。梁诚以“交还不应当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2] P.77)}的外交辞令作答。

其实,梁诚对庚款的用途心中早有打算。据1907年6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采访梁诚的访谈录可知,梁诚与海约翰几经筹议之后而“得减收赔款之法。海氏闻之大悟,谓当以此法言之总统,……予因电告吾政府,随接政府训令,详示办法。”^{[1] P.11)}从上述情况可知梁诚的减收赔款之法应形成于1904年底至1905年初。(因为海约翰于1905年3月中旬去欧洲养病,所以退还庚款的交涉时间应在1904年12月至1905年3月间。)在访谈录中他没有公开他的减收赔款之法,但根据清政府训令其“详示办法”可知,其“减收赔款之法”就是后来实行的庚款留美教育计划。

梁诚在致外务部函(1905年5月13日外务部收)中详示其庚款留美教育计划之办法。在致外务部函中建言:“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还,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可见,梁诚心中早有主意,用作教育、留学之用;又言:“在美廷既喜得

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美国)欢迎”,可见,梁诚心知,如若向美国宣称此款用于教育及留学,必可获得美国之欢迎;再言:“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可见,梁诚深信,这一计划将为中国造就无穷之人才;未言:“况风声所树,薄海同欢,中兴有基,莫或余悔,其为益又岂可以尺寸计耶”,这是梁诚告诫清政府,切勿错失良机。他同时请示外务部:“迅赐训示,俾得禀承一切,相机照会美外部办理,或能於秋间议院开会即行交议,早日告成,於大局不无裨益。柔使抵京谒见,倘蒙将此宗旨明白宣示,俾得接洽。则机轴愈紧,成功愈易。”^{[2] P.77)}梁诚建议清廷告诉柔克义将庚款用于教育事业。

梁诚之所以大力倡议将庚款用于留学教育,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源于自身对留学教育的推崇。梁诚是120名“留美幼童”之一。1875年,梁诚被派往美国留学,1881年回国。后随张荫桓使美,一面工作,一面求学,毕业于耶鲁大学。留美期间正是其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学习和思想观念不断成熟的黄金时期,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同时对美国的社会风情、政治制度、史地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一留学经历为其积累了许多一生都享用不完财富,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即得益于此。因此,梁诚正是从其自身留学经历出发,才大力倡导留学教育的。

其次,继承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容闳留美期间就立志于“留学教育”即“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富强文明之境。”^{[8] P.89)}容闳历经18年终于实现其“留学教育”,而梁诚就是成果之一。梁诚虽以外交见长,但时刻关心留学生及留学教育。1903年,梁公使震东,奉使是帮,同行学生有二十六人之多^{[1] P.6)},同年,梁诚送了7个中国男孩到阿姆赫斯特读预科。在休假期间,他从华盛顿来到阿姆赫斯特消暑,并且继续给这些孩子父亲般的照顾。^{[10] P.247)}1905年梁诚应邀参加了东美中国学生会第一次大会,对那些学生讲述了他在美国期间的留学经历。^{[10] P.248)}在1906年7月举行的东美中国学生会第二次大会上,梁诚亲自出席,致词两次,并担任演说比赛的裁判员。^{[1] P.8)}1907年举行东美中国学生会第三次大会,梁诚当选为四名荣誉会员之一。^{[10] P.249)}可见,其与留学生之

关系非同寻常,其对留学教育和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因此,梁诚积极主张将退还庚款用于留学教育也就不足为奇。

再次,顺应国内出现的“留学热潮”。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人大惊,开始效法日本,以图振兴。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劝学篇》一出,留学大潮伊始。特别是1903年张之洞奉命制订《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和1905年废除科举制,出国留学更被国人视为入仕的终南捷径,从而将中国留学教育推向了高潮,这更加坚定了梁诚将退还庚款用于留学教育的决心。正因如此,梁诚才大胆地在致外务部函中,力陈将退还庚款用于留学教育之用。

由此可知,梁诚实是首倡庚款留学之人,并始终致力于庚款留学之交涉。为中国近代教育和近代留学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罗香林所述:“其所以为外交界与教育界所特别重视,也就在此。”^{[11] P.12)}

三、梁诚促成庚款留学之成效

梁诚促成庚款留学教育的成效有以下3点:

第一,促进留学热潮。庚款留学的实施促进了中国的留学热潮,拉开了第二次留美热潮的序幕。1909年“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即开始留学生的考选工作。留学生的派遣“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8] P.76)}为宗旨,清政府共考选了三批留美生,基本符合上面的比例。1909年派遣梅贻琦等47人,1910年派遣胡适等70人,1911年派遣姜立夫等63人,三年共计180人。“自1909年至1929年间,清华共选派留美学生1279人”^{[11] P.19)},清华大学时期共组织了六届公费留美考试,考取公费留美生132人。这些留美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美国退还庚款用于留学教育之举,也促使了其他国家将庚款用于培养留学生,其中庚款留英教育成效颇大。从1933年到1947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先后举办了九届庚款留英考试,共选派庚款留英生193人,其中习理科147人,习文科46人。

第二,转变留学方向。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是从“留美幼童”开始的,幼童派出不久,清政府又派出“军事留欧生”。留学的目的地是西方欧美国家。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国人大惊,将目光转向了隔

海而望的日本,一时间国内效仿日本之风盛行,中国的有识之士更是负笈东渡。从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至辛亥革命时留日学生总数当在22000人以上。^{[12] P.4)}费正清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13] P.341-342)}庚款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将留学方向由日本再次转向了欧美。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人才,出国留学成为解决人才匮乏的主要途径。在庚款留学教育影响下,各种留学生纷纷出国留学,主要以欧美国家为目的,以学习理工、科技、文化教育为主。民国建立后,由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日本出台了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政策,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纵观民国时期,留学方向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

第三,督促他国退款。梁诚在促使美国退还庚款之时,就知此可起连锁反应之效果。“各国闻此举动,争相劝勉,次第减收,亦在意计之中。”^{[1] P.10)}美国决定退还超收庚款后,其余国家纷纷响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各国纷纷开始退还庚款。其中德国和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国随即停止赔款。日本始终没有“退还”庚款,直到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才停付庚款。美国共退还3493.0万美元,法国退还331.5万美元,比利时退还675.4万美元,意大利退还650.0万美元,荷兰退还35.6万美元,俄国退还1719.5万美元,英国退还3684.3万美元,总计退还10589.3万美元。退还庚款纷纷用于中国的教育和其它各项如铁路、矿产、水利、银行等事业上。^①

四、结语

退还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最终决定权在美国方面。其更深一层原因则是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梁诚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凭借其过人的智慧胆略和灵活的外交技巧,首倡并促成庚款留美教育,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和留学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由此引发了其它国家纷纷退还庚款,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赔款负担。同时庚款留学教育亦可被视为“留美幼童”的延续,虽然幼童留美计划半途夭折, (下转第87页)

^① 各国退还庚款及使用情况,详见宓汝成《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使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八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698—751页。

《儒林外史》的“反体制”思想*

鲍鹏山

(上海电视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明清以后专制统治日趋强化,对权力日益崇拜。《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背景,对清代体制进行了辛辣讽刺。《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反体制思想”。

[关键词] 《儒林外史》; 体制; 思想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85-03

《儒林外史》的主题,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再作深入的思考。一个就是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的“功名富贵”说,另一个是胡适先生提出来又为当今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反科举”说。胡适认为此书是“批判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且指出科举功名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吴敬梓传》)。客观地说,“功名富贵”说有较大的包容性,而反科举反礼教说则有其深刻性。但问题是,为什么追求功名富贵这一人类的正常欲望最终却促成了道德堕落?天下人又为什么唯科举升官是求,甚至于不择手段,最终导致了儒林整体性的道德崩溃?

《儒林外史》主题之深刻伟大,在于他的“反体制”思想,是对过度膨胀的体制及其造成的儒林整体堕落,日趋丑陋的沉痛反思。一连串的儒林人物,只要攀附体制,必然可怜、可鄙、可恶、可厌,这是中国明清时代的“变形记”。而超脱体制之外的所谓“真儒”,则被作为作者的理想加以歌颂;“反体制”思想十分明显。写出儒林之堕落、蜕变且揭示出这种堕落与蜕变的根由在于体制对于人的压榨,这才是《儒林外史》最伟大的价值。

明清以来,随着专制统治的日趋强化,权力对社会、人生的侵蚀日趋全面,整体道德水准也日趋下降,整个民族越来越没有体面、尊严与光荣,而谄谀、

狭媚、虚伪、奴颜媚骨、奸诈阴险却日益滋蔓。明清时期的中国,就是我们民族奴性日深、体面与尊严渐失的时代。吴敬梓生长于清代,而《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背景,他给我们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下流的社会及营营于其中的众多下流人生。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肮脏丑陋卑鄙下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是什么东西促成了人的堕落——那就是无孔不入的世俗权力及人们对体制的屈从和膜拜。在体制中获取地位,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追求,这种庸俗的现世价值观直接否定了彼岸价值,世俗“成功”否定了“成人”,从而导致一个民族彻底失去了信仰的力量,彻底拒绝了信仰女神对我们的向上提携——无须什么超验的彼岸世界的追求,无须什么精神的向往,在现世之中,我们可以通过体制提供的阶梯,爬到别人的头上,在别人的头上建立自己的天堂。

一个民族,如果在世俗政权之外,没有更高的信仰,是可怕的。一个人,如果除了追求世俗政权的承认,追求体制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的利益,别无更高的精神追求与支撑,也不免要堕落。所以,孔子才说“士志于道”,而且即使是做官,出仕,也是“行其义”;而孟子更明确地提出在世俗政权的“人爵”之外,要有“天爵”,而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天爵”,是人的最高使命。先知先觉们通过自身的修炼性命,敏锐地

*[收稿日期] 2011-02-10

[作者简介] 鲍鹏山(1963-),男,安徽六安人,上海电视大学教授。

发觉了这个道德大问题：没有信仰的追求，没有对精神的尊崇，一个民族就没有精神力量；只有升官发财的世俗追求，只有成功发达的功利理性，一个民族必然日趋下流。《儒林外史》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也就是说，这样的悲剧性的民族生存状况，我们已经经历过。并且，我们的杰出的前辈已经对我们发出过警告。

在全书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提及明太祖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作者借王冕之口评点说：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最后一回，五十五回（卧闲堂本），作者索性自己出面议论：

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些贫贱的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一切以世俗“成功”为最高目标，最终目标，而这世俗成功，又不过是“功名富贵”四个字，是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物质享受社会地位和名望——而这“名望”，或者说受人传扬与尊敬的东西，不是人格修养，不是知识智慧，不是道德水平，而仍然是他在这个高度体制化了的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与此地位相关联的攫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与事实。需要说明的是，在那样的社会里，财富也主要是由体制支配并按照体制中的地位分配的。胡屠户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权力社会里，不可能建立像现代社会里的肉食品公司并创造利润，他永远只能是社会下层的个体小生产者，为体制中的“张老爷”等等提供低价值的服务。一句话，只有体制体系中的政治上“贵”，才能保证一个人经济上的“富”，富是贵的另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尊敬什么人？我们尊敬体制中有权势有钱财的人。我们惧怕什么人？我们惧怕体制中有权势有钱财的人。什么人可以骄人？体制中有权势有钱财的人。孔子所特别厌弃的贫谄富骄不仅成为这个社会的黑暗现状，而且获得了充分合理性的证明，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可，获得了道德上的通行证、荣誉证书、资格证。

其书开篇写一夏总甲，已是体制高塔之最底层，但仍洋洋自得且傲慢骄人；中间写一牛浦郎，读书学写诗，只是想以此“相与老爷”；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其书末尾写一妓女聘娘，见嫖客是官，便欢喜不尽，曲意奉迎侍候，至夜梦见做了官太太。这是贯穿全书的讽刺，体制对人的控制，对人性的戕害，以及导致全社会的日趋下流狭媚，跃然纸上。

被卧闲草堂评为“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的牛浦郎，行为恶劣，品性下流。偷窃，冒名顶替，休妻娶妻，只把这世界当成他招摇撞骗的大舞台，而问题在于他竟然处处得手，时时顺遂，往往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些做法，是个体在那个高度体制化了的社会里合乎理性的选择，所以，也自然为一般人所认可。存在就是合理的，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可见，如果出现全社会或社会中某一阶级整体性的道德堕落，那就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了。与他一样令人生厌百端的还有一个严贡生，他骗诈穷乡邻王小二的一头猪，还唆使自己的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把这个王小二“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诈骗乡下老人黄梦统的银子，还把黄梦统的驴子和米粮都抢到家中；他狡计诈骗船家，欺凌弟妇，强占家产……这无赖恶棍，卑鄙下流之徒，之所以可以横行乡里，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贡生”，有一个体制中的头衔。极具讽刺色彩的是，他还是被体制鉴定为“优行”之人。这社会的评价系统还有什么可信？他自己在多行不义之时，也毫无愧疚。外在的道德舆论，内省的道德反思，全部失效，是因为国家体制的道貌岸然，已然遮隔了私密处的淫狭恶行。不仅一个人的地位与财富是由体制给的，而且一个人的体面与品行，也由体制给予了。一个人，只要进入体制，体制不仅保障他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还保障他的体面。体制不仅给予体制中人地位与财富，还顺带给予了体制中人一块道德遮羞布。这是一个社会彻底烂掉的原因，也是一个社会彻底烂掉的结果。

比较一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是很有意思的。西门庆和严贡生都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坏人，但两者的区别是：西门庆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语境中，就是一个“坏人”。而严贡生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语境中，却是一个受人尊敬，被体制认可的乡绅。这不仅体现了《金瓶梅》与《儒林外史》

手法上的差异《金瓶梅》是批判,而《儒林外史》是讽刺,更深刻的启示是:就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而言,《金瓶梅》是写“一个坏的人”,而《儒林外史》是写“一个坏的社会”。好的社会会判断出坏人并阻止他,而坏的社会则不能。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坏的社会”呢?因为,这是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

匡超人 是作者刻意描写的又一典型人物。这个本性纯朴的人,只因了向往体制,试图通过科举走进体制以谋求体制许诺的功名富贵,自踏上科举之途的那一刻起,便一天天堕落起来,他在体制中的升迁过程就是在道德上的堕落的过程,地位、官职的提升与道德的堕落同步。作者用这个形象生动而深刻地说明当体制至高无上,体制不再作为人类走向彼岸的阶梯,体制自身成为目的与终极关怀时,体制阶梯上的上升之路,就是道德人品上的堕落之路。

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只是体制章鱼的一个最大的触角而已,体制才是章鱼的那个血盆大口。体制

通过科举支付富贵,欲求富贵者,也通过科举而进入体制。人类当然不可能没有体制,但体制的无限膨胀以至垄断了社会的所有资源——无论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则无疑是中国明清以后社会的一大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体制以外没有成功,体制以外没有光荣,体制以外没有体面,体制以外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没有肯定,没有追求,没有结局,没有出路。这种高度垄断的体制,无孔不入的体制,傲慢霸道的体制,挤占了所有社会空间,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社会,从而使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媚俗的世界,一个邪恶的世界,一个丑陋的世界!

写出这样的大主题,写出了这样的既属于古代,又警醒现代社会,警醒整个人类历史的大主题,《儒林外史》不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一流的小说,即使置于世界文明史,也是一部警醒人生的艺术大吕!

(责任编辑 南山)

(上接第84页)但是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梁诚,则在国难当头之时,凭借其智慧和胆略,以遣派留美学生的方式,争取了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14]。由此掀起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二次留美高潮。舒新城曾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既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8] P.2)}那么在这里亦可以说:“无梁诚,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庚款留学,既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参考文献]

- [1] 罗香林. 梁诚的出使美国[M]. 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9.
- [2]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Z].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 [3] 清代外务部收发文类存稿交档案[Z].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 [4] Memorandum[N]. Dec 6, 1904, Rockhill Papers; W. Rockhill to Mr. Secretary[N]. December 12, 1904, John Hay Papers, Microfilm, Roll No. 9.
- [5] 吴宓. 吴宓自编年谱[Z]. 北京:三联书店, 1995.

- [6] 李守郡. 试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J]. 历史档案, 1987(3)
- [7]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M]. New York, 1907.
- [8]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 [9]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10] 美[史黛西·比勒. 中国留美学生史[M]. 北京:三联书店, 2010.
- [11] 王奇生.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872—1949[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 [12] 周棉. 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7.
- [13] 美[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4] 徐建平.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阅微草堂笔记》“以理胜”的特质及其志人小说精神*

张 瑞

(上海电视大学文学艺术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议论尤其是对话式的议论,能够包容不同层次的“理”,显示出小说“以理性”的特质。同时,这种对话也是对言说者本身的刻画,使得小说具有了志人小说精神。

[关键词] 《阅微草堂笔记》;议论;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88-03

对于《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的体例,清人邱炜萋云“《阅微五种》,体例较严,略于叙事,而议论之宏拓平实,自成一家”^[1],鲁迅先生认为“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于偏于论议”^[2](P.151)。论者都指出了《阅微》叙事简、议论丰的形式特征,叙事简源于其体例之“严”,即走魏晋以来笔记小说的路子;议论丰则似乎逸出了常规,乃是“自成一家”。恰好是这自成一家的议论,历来评价不一,其命运沉沉浮浮。清人包括邱氏多给予极高评价,如“敷宣妙义,舌可粲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3](P.576),及邱氏所谓“宏拓平实”。后来的学术界则攻击纪昀的封建思想从而认定《阅微》价值不高,至好也不过是“故事和形象的客观意义却远远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1],仍旧认定其议论是糟粕。只是近年来,学术界对《阅微》的评价才渐渐复归于鲁迅的思路:一方面确实偏于议论,显得太多,另一方面又是以理胜,且理中有情、理中有趣。但目前还仅限于评价本身,在论述上显未达到与评价一致的程度,多论述其议论的“理”的思想内涵,而未能说明《阅微》究竟是如何“以理胜”的。

《阅微》的议论有两类,一类是纪昀本人的直接议论,长时可达二百字;一类则不只是纪氏一人的议论,有时是两人甚至三人的议论。后者数量不多,在纪氏较晚创作的《滦阳续录》中更少,却显得格外生

动,且也是《阅微》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这一类作品入手,初步考察《阅微》一书议论的特征乃至全书的精神特质。

这类作品在故事之后引入两人或三人的议论,形成了有意思的“对话”:一方面是议论与故事的对话,一方面是议论者之间的对话。之所以有此状况,大概在于这类作品的故事本身具有思想冲突,以至听闻者(包括纪昀、其友、其长辈等)逐一发表见解。

《滦阳消夏录》(一)一则笔记叙雍正年间一游士妾寡后衣食无着,遵遗命再嫁,然“恒郁郁忆旧恩”,病渐缠绵以至于亡,嘱后夫还己尸于故夫墓,后夫亦许之。故事后的议论如下:

“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贰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励庵先生则曰:《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故事本身是无奈而伤感的,此女子“故人情重”,为了生存再嫁,但嫁后才发现原来那份情竟重到无法面对现有生活;“为了生存”这一当初的缘由已不再有意义,肉体遂伴随精神的痛苦渐渐消亡。纪氏得出“此妇进退无据”的结论,乃是从夫妻之“义”的角度着眼,忽略了此妇及其故夫是从情的角度来实

*[收稿日期] 2011-02-10

[作者简介] 张 瑞(1983-),女,安徽淮南人,上海电视大学文学艺术系讲师。

践其人生的,故而纪氏更像在就再嫁问题而讨论“义”,空有框架而无血肉。何子山说“忆而死”则是注意到了情,但以为“殉而死”才是更高一层的选择。因情而殉死不比单纯的为殉节而殉节,不应受到太多认定为思想糟粕的斥责。但问题是,因情重而后殉死是要当事人经历情感波澜的过程的,这过程可能有各种复杂的情形,比如此处的“恒郁郁忆旧恩”,旁观者或后来者可因此总结出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却无法笼盖过程中的丰富性,何子山的议论正是如此。唯有何励庵能够“哀其遇”“悯其志”,看到此妇的具体遭遇、具体情感,否定了前二者的“宏论”。同时,何励庵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宏论”,具有普遍性,即“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

故而,这则笔记的议论实际上是分别从3个层次来评价人物、阐明道理的,为读者解读这则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角度;与此同时,3个层次彼此间的“对话”最终导致第3个层次通过否定前两个层次来包容了前者,带有总结性地结束了这则笔记。这一通过否定来包容前者的“理”的展现方式还有不少例证,如《如是我闻》(四)一则笔记叙老儒刘君琢以理逐狐出宅,又有狐以理逐刘景南移宅,其议论如下:

“何励庵先生曰:君琢所遇之狐,能为理屈;景南所遇之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于狐难。’”

前者的议论是对故事的一种分析,后者的议论则就这种平行的分析给出了判断评价,分出了高下,在否定其平行的意义上包容了前者的分析。

同时《阅微》也存在着另一种“理”的展现方式。《如是我闻》(三)一则笔记叙儒家子方俊官少时梦入闺阁身为新妇,后被诱为伶人,冠绝一时,老而为贩贾自叹身世。后之议论如下:

“馮疆曰:卫洗马问乐令梦,乐云是想。汝殆积有是想,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因由心造,安可委诸夙命耶?’余谓此辈沈沦贱秽,当亦前身业报,受在今生,未可谓全无冥数。馮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论耳。后苏杏村闻之,曰:‘晓岚以三生论因果,惕以未来。馮疆以一念论因果,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吾终以馮疆之论,可使人不放其心。’”

最后的议论者点出了前面议论各自的要害,但又肯定不同的理各有其合适的位置,即“各明一义”,只是最终从劝惩修身的角度更加肯定了馮疆之论。《溧阳消暑录》(四)一则笔记叙一妇不堪婆婆虐待自

杀,申苍岭劝妇之父兄息讼,引来妇之鬼魂哭诉,申遂以大义责之使去。在申氏之兄议论后,纪昀父亲对此作了同样意义的总结:

“苍岭之言,子与子言孝。谦居之言,父与父言慈。”

这一种“理”的展现方式是通过肯定包容各种不同层次的理,以安排其合适的位置来进行总结。

必须指出的是,这类多人议论的故事在《阅微》中数量虽不多,但其“以理胜”的特质是可以辐射到全书的。但凡纪氏本人或他人一人议论的,或与故事中的人物言论“对话”,或“每设疑难”进行自我对话,从而最终达到持平之理。当然,有一些篇目最终并未得出总结性的结论,纪氏对多种评价结以“竟不可位置,录以待君子论定之”等语,另一些不可解之事则遵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样一种寻求包容性的“理”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认识到其“以理胜”的议论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其批判程朱理学、讽刺社会弊端等思想意蕴,也不仅仅在于是理中有情、理中有趣,更在于它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这一点的。而惟后者才真正彰显了《阅微》在文言小说中的独特地位,让读者感受到它那“以理胜”的气息。

二

其实,这样一种“对话”,这样一种“理”的展现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世说》言语篇有

“……毓面有汗,帝曰:‘卿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慄慄,汗不敢出。’”又有“……见佛般泥洹象,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皆是和上述《阅微》的“理”的展开方式类似。在对话辩难中,人物的智慧风貌从中凸显出来,而上文所引《阅微》的例子,亦可作如是观。一批智者的形象及其精彩言论在“理”的展开过程中同步呈现,这几则笔记除后半部分的议论与前半部分的故事之联系而自有的意味外,又因后半部分而具有了志人小说的意味。如果说以上例子常常显示出一种类似的温柔敦厚的智者形象,远远不及《世说》中诸种人物风流,那也是因为魏晋六朝那样一个时代在悄然远逝后已不可能重返了,后世的志人小说或具有志人小说意味的小说也就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了。

但这仅仅是抽出了《阅微》的议论部分,尤其是其中论“理”的部分,并不能就此认定《阅微》具有志人小说的精神,那么,《阅微》的其他篇目、其他部分又可不可以这样对待呢?

《阅微》记狐鬼事亦多,但显然不能仅以志怪目之。如《姑妄听之》(一)一则笔记云:

“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置书十馀篋于庭。似闻树后小语曰:‘三十馀年,此间不见此物也。’视之闾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语,狐亦大佳。’”

陈氏固然显现出从容的风度,狐也显现出高雅孤洁的品格,完全是“人间言动”,充满了志人小说的韵味。鲁迅先生在分析魏晋六朝小说时,认为同样是掇拾旧闻、记述近事,同样为丛残小语,志人小说的特质就在于“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21 P.37)。

纪昀亦是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为之的,《滦阳续录》(三)记董天士狐妾事,对于狐女温玉,纪氏评论说:

“岂明季山人声价最重,此狐女亦移于风气乎?然襟怀爽朗,有王夫人林下风,宜天士之不拒也。”

直接将狐女温玉与志人小说中独特的谢道韞对等起来了。我们阅读温玉故事后,也确实能够喜爱、敬佩这个襟怀爽朗的女子。记狐鬼是写人间,记人间当然更不乏精彩的“人间言动”了。《如是我闻》(一)记竹吟、朱青雷方拟议一书法真伪:

“一丐者在旁睨视,微笑曰:‘黄鲁直乃书杨诚斋诗,大是异闻。’掉臂竟去。青雷讶曰:‘能作此语,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能作此语,又安得不乞食!’”

丐者之恃才兀傲、青雷对文人的折服、惊异与惋惜及竹吟之愤激,在短短数句记述中全出,显现出了人物的个性、风度。由此,我们可以说,《阅微》中相

当篇目完全可以作为志人小说来看待,因而全书也就具有了志人小说的精神。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阅微》更多体现了志怪精神。事实上,不少论者都是以志怪来为《阅微》定位的,如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就将《阅微》置于“清代志怪小说”一类中进行论述,也有论者将其作为笔记小说(即囊括了志怪、志人两类)来评述,但总是着重论述其志怪的一面,志人的一面未被提及。

志怪、志人的概念是鲁迅先生针对魏晋六朝小说提出的,为我们厘清了彼时小说的门类。而《阅微》的作者纪昀“追踪晋宋”,自然无意在创作中区分这二者来“纯洁”其作品,而是囊括这二者的。这一点,纪昀本人的小说观也是可以印证的。在他看来,小说“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31 P.31)。《世说》等被列入杂事类,《搜神记》等被列入异闻类,《博物志》等被列入琐语类。在《姑妄听之》自序中,纪昀表明他“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辩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则他欲拟的前修包括了小说的三派,当然此处的小说是传统小说意义上的小说,以今天的小说观来看就是既有博物考证,也有志怪、志人的笔记了。纪昀也正是如此实践的,故而以今人眼光来看,《阅微》具有志人小说精神也就可以得到理解了。

[参考文献]

- [1] 汪龙麟. 20世纪《阅微草堂笔记》研究综述[J]. 殷都学刊, 2000(1).
-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侯忠义. 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责任编辑 南山)

桐叶意象考论*

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桐叶临秋而陨,是秋至的典型物候。“梧桐夜雨”与“荷叶雨声”“芭蕉夜雨”等是契合中唐文化心理、审美变化而产生的听觉意象。宋朝,在意志理性与民本情怀的合力下,桐叶的悲秋功能被消解。桐叶飘落时正是稻花飘香时,南宋诗歌中“桐叶”与“稻花”的组合具有时代特色,洋溢着岁稔的欣悦。桐叶阔大,可以题诗;“桐叶题诗”体现了文人雅趣与女子心绪;“红叶题诗”意象则由“桐叶题诗”演变而来。“桐叶封弟”宣扬了兄弟之义,其可信性、合理性建立在“封建制”的基础之上;唐代柳宗元否定了“桐叶封弟”及“封建制”的合理性。“分桐”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比喻意义,既指事物可以续合,也指事物不可复合。

[关键词] 桐叶; 桐叶秋声; 桐叶题诗; 桐叶封弟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91-07

梧桐是中国文学中重要的植物意象,笔者曾撰文《中国文学中的梧桐意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探讨梧桐的文学、宗教、民俗内涵,梧桐与音乐、人格、爱情之间的关系,本系列则较为细致深入地研究梧桐的“分支”桐花、桐叶、桐枝、桐阴、桐实等。^①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梧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梧桐(青桐)与泡桐(白桐)两种。在现代植物分类学中,梧桐(青桐)与泡桐(白桐)既不同科也不同属,前者是梧桐科梧桐属,后者是玄参科泡桐属;但是二者在形态、习性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所用的梧桐概念是广义。

在树叶族类中,桐叶以阔大而醒目。桐叶临秋而陨,“桐叶秋声”是常见的悲秋意象;“桐叶题诗”兼具雅人深致与女子心曲;“桐叶封弟”则关于兄弟之义。

一、桐叶的物理与物候特点:阔大、临秋而陨

梧桐树叶阔大,加之树身高耸,所以在树叶族类

中显得落落出群,汪琬《题同宗蛟门百尺梧桐阁画卷》即云:“桐华馥馥桐叶大,最便凉天与炎夜”^[1];苏轼甚至用扇子来形容桐叶《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桐轩》:“桐身青琅玕,桐叶蒲葵扇。”^[2](P.988)

梧桐树冠广覆,桐叶层层叠叠,如同片片碧云,布下绿阴,白居易《和答诗十首·答桐花》:“叶重碧云片”^[3](P.4693),《云居寺孤桐》:“千叶绿云委”^[3](P.4669);刘义恭《桐树赋》:“密叶垂蔭而增茂”^[4](P.101);顾瑛《和繆叔正灯字韵》:“梧桐叶大午阴垂”^[5]。如果说桐叶是“复数”名词,那么桐阴则是“单数”名词;如果说桐叶是“体”,桐阴则是“用”。桐叶与桐阴不可分离,但是因为桐阴与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特表而出之,将另有《桐阴意象考论》一文专门论述。

梧桐修干弱枝、阔叶疏枝,所以梧桐树密而不实、通透疏朗,桐叶迎风舒展、婀娜生姿,如谢朓《东堂咏桐诗》:“叶生既婀娜”^[6](P.1452)、夏侯湛《愍桐赋》曰:“纳谷风以疏叶,含春雨以濯茎。濯茎夭夭,布叶蔼蔼”^[7](P.713)。

*[收稿日期] 2011-03-01

[作者简介] 俞香顺(1971-),男,江苏溧水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笔者《桐花意象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桐枝·桐孙·疏桐”意象考论》(《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桐子·桐乳”意象考论》(《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梧桐是落叶乔木,秋天桐叶颜色转深、转黄以至凋零。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开创了中国文学中悲秋的传统;宋玉描写萧瑟的秋景即云:“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阔大的桐叶从高空飞舞、飘坠,枝干光秃、高耸,格外醒目而惊心,梧桐叶落遂成为秋至的象征性景物。《广群芳谱》卷七十三引《遁甲书》:“梧桐可知月正闰。岁生十二叶,一边六叶,从下数,一叶为一月。有闰则十三叶,视叶小处则知闰何月。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叶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古人认为,梧桐能够感知、感应秋天的来临,如《广群芳谱》卷七十三引陈翥《桐叶》“但有知心时,应候常弗迷”,陆游《早秋》“桐叶知时拂井床”^{〔2〕}(P.24868)。

二、桐叶悲秋:中唐桐叶秋声意象涌现、宋代桐叶悲秋功能被否定与超越

梧桐虽然很早就作为秋至的典型物候来描写,但基本是粗陈梗概、视觉呈现,梧桐叶落并未与作者情绪水乳交融,更未成为悲怀的“催化剂”。桐叶秋声是随着审美认识的深入、诗歌艺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听觉意象。

1. 桐叶秋声:梧桐夜雨、梧桐风鸣、梧桐坠地。

孟浩然已有从听觉角度描写梧桐之例,王士源《孟浩然集序》:“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滴”字是细微、敏锐的听觉捕捉,体现了孟浩然超异同侪的艺术感受与表现能力,营造“清绝”之境,我们可以用孟浩然的其他用“滴”的诗例来参证《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荷枯雨滴闻”^{〔3〕}(P.1641)、《齿坐呈山南诸隐》“竹露闲夜滴。”^{〔3〕}(P.1667)

孟浩然诗歌中的雨滴梧桐并非悲秋意象。中唐时期,情形发生了变化,桐叶秋声,尤其是“梧桐夜雨”成为诗歌中摹写悲秋情绪的重要听觉意象。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精辟地说道:“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P.32)意象是作品的构件,也取决于“时代精神”。中唐以后国势日下,盛唐时期张扬外放的精神让位于退缩内敛,文人的心态视野、审美趣味、艺术主题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走进了“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注意“呈现的是人的心境和意绪。”^{〔9〕}(PP.145-146)

“梧桐夜雨”与“枯荷雨声”、“芭蕉夜雨”等适合刻画心情、心绪的听觉意象应运而生。黑夜的笼罩、空间的阻隔等都会导致视觉意象的遮蔽,而听觉意象可以洞穿黑夜、度越空间,让人无所遁逃。而且,“梧桐夜雨”等不是乍来乍去,而是绵延不绝的“时间艺术”。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沙漏”,黑夜中的每一滴微响都似乎落在心头,伴人无眠。“梧桐夜雨”等是中唐特定的时代氛围中所产生的特定意象。请看中晚唐诗歌中的这一类听觉意象:

白居易《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3〕}(P.4829)

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3〕}(P.4848)

刘媛《长门怨》“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到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3〕}(P.9109)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3〕}(P.6204)

朱长文《句》“夜静忽疑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3〕}(P.3509)

徐凝《宿冽上人房》“浮生不定若蓬飘,林下真僧偶见招。觉后始知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3〕}(P.5419)

梧桐与荷、芭蕉都是属于阔叶形的植物,雨滴落在上面的声音清晰可闻,这是这一系列的听觉意象所产生的植物学基础。相比较而言,桐叶雨声更为习见。芭蕉是亚热带植物,地域色彩较强,荷叶虽然也分布广泛,但是一般不近屋居。梧桐的栽植范围则很广,无论是南方或是北方,无论庭院、官衙、驿站都往往有梧桐,而且梧桐高耸,雨落桐叶,“居高声自远”。

三更时分,万籁俱寂,夜正未央,梧桐雨声更是助人寂寥。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3〕}(P.10138),“叶叶”与“声声”的叠字运用刻画出雨声的单调、重复以及绵长。三更的梧桐雨声几乎成了渲染离情别绪、孤寂情感的不可或缺的意象,或曰“道具”,如周紫芝《鹧鸪天》:“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10〕}(P.1207)、赵长卿《一剪梅》:“梧桐叶上三更雨,别是人间一段愁。”^{〔10〕}(P.1134)、张耒《崇化寺三首》:“梧桐叶上三更雨,亦有愁人独自眠。”^{〔2〕}(P.13254)倏忽而至

的梧桐雨声几乎如“无声处”的“惊雷”，苏轼《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10〕} P. 2324）“梧桐夜雨”这一听觉意象更契合词的体性，所以在词中更为常见。

此外，桐叶坠落以及桐叶风鸣也是常见的桐叶秋声类型。桐叶阔大，秋天枯瘁、凋零，凝神寂虑处似乎落地有声，如韩愈《秋怀诗》：“霜风侵梧桐，众叶著树干。空阶一片下，琤若摧琅玕。”^{〔3〕} P. 377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细微的听觉意象也是中唐时期才出现的，再如武元衡《长安秋夜怀陈京昆季》：“闲听叶坠桐。”^{〔3〕} P. 3565），白居易《何处难忘酒七首》：“暗声听蟋蟀，干叶落梧桐。”^{〔3〕} P. 5103）。韩愈对桐叶坠落的声音摹写影响了后代，黄庭坚《宿广惠寺》：“风乱竹枝垂地影，霜干桐叶落阶声。”^{〔2〕} P. 11652）、冯山《独坐》：“兀坐窗牖寂，桐叶掷瓦响。哀弹动秋听，远寄劳夜想。”^{〔2〕} P. 8627）黄庭坚的描写尚可称平实，而韩、冯诗歌中的“摧”与“掷”却是夸饰、重狠。

梧桐树身高大、树枝疏朗，迎风而疏风，正如相传薛涛童稚时所咏：“叶送往来风。”^{〔3〕} P. 9143）无独有偶，中唐时期的卢纶较早敏锐捕捉了风吹桐叶的声音，《和太常王卿立秋日即事》：“阶桐叶有声。”^{〔3〕} P. 3134）秋天，风疏桐叶之声庶几近乎庄子所云的“天籁”，如陈师道《和黄预感秋》：“林梧自黄陨，风过成夜语。”^{〔2〕} P. 12685）、《群芳谱》卷七十三引郑允端《梧桐》：“梧桐叶上秋先到，索索萧萧向树鸣。为报西风莫吹却，夜深留取听秋声。”

雨声、风声、落地声是细分之下的三种秋声类型，出于“精密论述”之必要；而事实上，三者往往是组合造景的，如张耒《杂题二首》：“寒雨萧萧桐叶惊，浪浪还作夜阶声。西风忽起幽人觉，枕簟凉时向五更。”^{〔2〕} P. 13249）、陆游《秋夜风雨暴至》：“风声掠野来，湏洞如翻涛。雨声集庭木，桐叶声最豪。”^{〔2〕} P. 24730）

2. 桐叶悲秋之否定与超越：意志理性与民本情怀的双管齐下。

中唐时期，“梧桐夜雨”等系列秋声意象出现并被沿袭，这是梧桐悲秋功能之强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大传统”，但中唐以降，消解、抗衡也与之俱存，桐叶悲秋的心理结构开始受到挑战。宋朝之后，桐叶悲秋之否定与超越也成为一个小传统；“小传统”是文人意志理性与仁者情怀的“合力”作用。“大传统”体现了文学的延续性；“小传统”则体现了文学的弹性与活力，两者相辅相成。

程杰先生在《宋诗学导论》中的一段话颇有助于本节的论述：“在传统的诗歌理论中，‘诗缘情’、‘诗可以怨’，‘诗是‘不平之鸣’等说法是最基本的信念，借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诗被看作是‘爱欲’的表现。而在宋代文化中，在日趋深入的道德性命之学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对人的实践‘意志’的肯定。……如‘悲秋’，自宋玉以来，在一代一代的难以计数的袭用中内涵不断积淀，意象逐步完善，成了文人抒发种种‘不遇’之感的有效模式，但这一模式从中唐时候开始受到挑战。……如杜牧《齐安郡中偶题》所言：‘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已是对‘悲落叶于劲秋’这一‘情以境迁’的传统心态正面提出质疑。……物色摇情不是一种必然存在，对于忘怀得失者来说，物色便无从施展其威力，关键在于主体自身达到的态度和立场。显然，这一关于情感之虚妄性的认识有了释道二教心性之学影响下的思想深度，体现了意志和理性的力量。”^{〔11〕} P. 141）宋代，随着主体意识的张扬，经过唐人所强化的“桐叶悲秋”的心物关系失去了效力。

中唐之后，儒学复兴，士大夫以经世致用为己任，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宋代文人从观念层面到实践层面普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民本情怀几乎成了宋代文学创作的“主旋律”。秋天虽然是桐叶凋落、秋气肃杀，但却又是农作物、果树、桑麻成熟之季，传统的悲秋情绪被民胞物与的民本情怀所替代，忧天下之所忧，乐天下之所乐。民本情怀也使得宋代文人“定向”发掘“秋美”，并对传统悲秋意象翻新、改造。

南宋时期，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南移，诗歌中的物象也具有南方特色、风情。南方是中国稻米的重要产区，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考证，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就已种植水稻。桐叶飘落之时也正是稻花飘香之时，岁稔的欣悦取代了悲秋的情绪。“梧桐夜雨”是文人抒发悲秋的常用意象；但是，对于久旱望雨的农夫而言，沛然而至的“梧桐夜雨”却无疑是最美的音乐。宋代文人对这一传统意象进行“翻案”，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2〕} P. 18550）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南宋以后，桐叶与稻子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意象在诗歌当中往往是联

袂出现。这是文化心理与地域文化的协同作用,如:

黎道华《疏山》:“蝉噪荒林桐叶老,风回半野稻花香。”[2 I P. 19214]

释师范《偈颂七十六首》其二六:“时节不相饶,俄当七月朝。未闻桐叶落,已觉稻香飘。”[2 I P. 34779]

汪昭《秋夕遣兴》:“鹊惊梧叶坠,露压稻花香。”[2 I P. 32896]

方一夔《杂兴三首》:“珠玑推上稻花水,金铁敲残梧叶风。”[2 I P. 42280]

何中《山中乐效欧阳公四首》则是全方位的展示了秋天的丰收、老成之美,除了青林红树外,还有芦蕨、稻米、橙子等:“……扇团自守不依人,桐叶知几寻脱路。……旋庖芦蕨美胜酥,精浙新秈香满户。山中之乐谁得知?我独知之来何为!青林红树人烟湿,护得金橙密处垂。”[12]

我们还可以用荷叶来为参证,枯荷同样是传统悲秋意象,然而在“最是橙黄橘绿时”的岁成之心观照下;“荷尽已无擎雨盖”的老成之美被发现。叶梦得《鹧鸪天》小序云:“梁范坚常谓:欣成惜败者,物之情。秋为万物成功之时,宋玉作悲秋,非是,乃作《美秋赋》云。东坡尝有诗曰:‘荷尽已无擎雨盖。……’此非吴人无知其为佳也。予居有小池种荷,移菊十本于池侧。每秋晚,常喜诵此句,因少增损,以为《鹧鸪天》”,词云:“一曲青山映小池,绿荷阴尽雨离披。何人解识秋堪美,莫为悲秋浪赋诗。携浊酒,绕东篱,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10 I P. 365]正是缘于民本情怀,苏轼的作品得到了普遍共鸣,枯荷也一反“常调”,再如:

苏轼《浣溪沙·咏橘》:“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10 I P. 1008]

杨无咎《渔家傲·十月二日老妻生辰》:“菊暗荷枯秋已满,柰黄橘绿冬初暖。”[10 I P. 406]

李纲《望江南》:“新雨足,一夜满池塘。粳稻向成初吐秀,菱荷虽败尚余香。爽气入轩窗。”[10 I P. 1547]

朱熹《次吕季克东堂九咏·橘堤》:“君家池上几时栽,千树玲珑亦富哉。荷尽菊残秋欲老,一年佳处眼中来。”[2 I P. 27622]

三、桐叶题诗:文人雅趣、爱情心声

在纸张发明之前,原始形状为薄片的天然材料

如树叶及纸草(Cyperus papyrus 或称莎草),这类物质都曾被人类用于书写,但在中国却从未见采用[13 I P. 37]。换言之,从实用功能而言,树叶从来就没有正式成为纸的替代品;中国文化中的“桐叶题诗”是一种诗意的书写方式,是文人雅趣、爱情心声。“题叶”爱情故事在唐代以多种渠道、多个版本流传,此处的“叶”多指桐叶,宋代之后,“桐叶题诗”让位于“红叶题诗”。①

1. “桐叶题诗”与文人雅趣。

题叶是一种富有雅趣的题诗方式,由来已久,举凡叶形阔大者,无不成为信手拈来的题诗工具,如芭蕉叶、菖蒲叶、荷叶、柿叶等。梧桐是中国文化中的嘉木、柔木,桐阴之下是文人日常休憩、诗意栖居之所在,桐叶则更是文人题叶之首选。桐叶题诗是屈原以来文人“善鸟香花,以比忠贞”的比兴传统的延续,寄寓着芬芳品格,如孟郊《赠转运陆中丞》:“衣花野茵茜,书叶山梧桐。”[3 I P. 4236]“茵茜”即荷花、芙蓉,是《楚辞》中常见的香花。再如:

杜甫《重过何氏五首》:“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3 I P. 2403]

杜牧《题桐叶》:“去年桐落故溪上,把笔偶题归燕诗。江楼今日送归燕,正是去年题叶时。”[3 I P. 6002]

赵汝回《春山堂》:“抱病独不饮,爱闲君所知。阶前碧梧叶,片片可题诗。”[2 I P. 35877]

韦应物《题桐叶》:“参差剪绿绮,潇洒覆琼柯。忆在沔东寺,偏书此叶多。”[3 I P. 1998]

韦应物的“偏书此叶多”,可以更为补述,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怀疑,韦应物在寺庙中书写的是佛经,而非诗篇。在古印度,佛经是写在多罗树、即贝树的树叶之上的,故称“贝经”。佛教传入中国时,造纸术早已发明,树叶写经并不是因为纸张的匮乏,而是一种“报本反始,不忘其初”的宗教虔诚与力行苦修。寺庙中多有树叶储存,如《尚书故实》:“(郑虔)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存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桐叶既然可以题诗,当然也就可以替代贝叶写经。而且,梧桐树本身也具有佛教意蕴,寺庙中普遍栽植;对此,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

桐叶是文人之间问遗、邀约、聚会的题诗之具,

① 详参笔者《红叶辨》《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

如同信笺与纽带,寄托了清兴、逸兴、豪兴,如:

郭奎《答人见寄》:“想到清秋无限兴,坐题桐叶寄殷勤。”^[14]

宋禧《题高氏万绿堂》:“梧桐叶上题佳句,乘兴重来不待招。”^[15]

戴复古《渝江绿阴亭九日燕集》:“寄兴题桐叶,长歌醉菊花。”^[2 I P. 33520]

戴复古“九日宴集”也可以更为补述。《魏书·彭城王勰传》:“高祖尝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觞情始畅,而流景将颓,竟不尽适,恋恋余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悵悵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题叶”与“流觞”同为文人雅集之雅事。

2.“桐叶题诗”与爱情心声。

树叶随风飘荡、任水漂流,于是古人遂在树叶的传播功能上大做文章,以题叶作为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爱情的红丝绳。《本事诗》云:“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翌日亦题叶放于上流,诗云:‘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十余日,客来苑中,又于水上得叶诗以示况,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题叶”类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曾数见,如范摅《云溪友议》、孙光宪《北梦琐言》、刘斧《青琐高议》、王铎《补侍儿小名录》;虽然故事框架与结构大致相同,但是人物、地点均不同。这其实体现了民间文学的某些的特质,如口传性、变异性;青年女子渴望冲破桎梏寻求“有缘人”是这类作品共同的主题。

我们再看《本事诗》中的一例:蜀侯继图倚大慈寺楼,偶飘一大桐叶,上有诗云:“拭翠敛蛾眉,郁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作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后数年,继图卜任氏为婚,始知字出任氏。“桐叶胜于石、纸之处就是在于其流动性。

后代文学中,“桐叶题诗”遂成为重要的典故、意象,如蔡桷《鹧鸪天》:“惊瘦尽,怨归迟。休将桐叶更题诗。不知桥下无情水,流到天涯是几时。”^[10 I P. 1173]、谢应芳《朱答李取男帖赘姻札子》“题书桐叶,足知流

水之多情,寄语桃花,将续仙源之盛事。”^[16]

3. 从“桐叶题诗”到“红叶题诗”。

入秋尤其是霜降之后,桐叶颜色转深,如孟郊《秋怀》:“棘枝风哭酸,桐叶霜颜高。”^[3 I P. 4220]秋天的桐叶,我们一般称之为“黄叶”;而在唐宋文学作品中,也被称之为“红叶”,红、黄两色本就相近,我们看诗例:祖可《小重山》:“西风簌簌低红叶,梧桐影里银河匝。”^[10 I P. 1284]、《全芳备祖》引顾吴峤诗句:“井梧惊秋风,叶叶雕萎红。”

如前所述,在唐代,“题叶”爱情故事在唐代曾数次出现,《青琐高议》所收张实的传奇作品《流红记》是其中最为详尽的一个版本:“唐僖宗时,有儒士于佑晚步于禁衢间。于时万物摇落,悲风素秋,颓阳西倾,羸怀增感。视御沟浮叶,续续而下。佑临流洗手,久之,有一脱叶差大于他叶,远视之若有墨迹载于其上,浮红泛泛,远意绵绵。佑取而视之,其上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最终,红叶为媒,成就了于佑与韩氏之间的姻缘。《流红记》传播最广,元人白朴、李文蔚分别改编成杂剧《韩翠苹御水流红叶》和《金水题红怨》。

《流红记》中,“桐叶题诗”让位于“红叶题诗”;仅是一字之别,由特指而变为泛化。“红”是一种热烈的颜色,是爱情故事中最常见的色调;而且中国古代情人之间用的信笺也往往是红色的,如“薛涛笺”为粉红色,晏殊《清平乐》:“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10 I P. 854]“红叶与红笺有着相同的功能,又别具浪漫气息。

“红叶题诗”中的“红叶”无需确指,但桐叶无疑是“红叶”族类中重要的一员,晏几道《诉衷情》就将桐叶与“流红”、“题红”综合在一起:“凭觞静忆去年秋,桐落故溪头。诗成自写红叶,和泪寄东流。”^[10 I P. 117]在后代,枫叶在“红叶”族类中的地位跃升,于是“红叶题诗”中的“红叶”在确指时往往是指枫叶,枫叶“一叶独尊”,而桐叶在“红叶”族类中的“元老”身份已渐渐不为人知。

四、桐叶封弟·分桐·判桐·破桐

桐叶又作为历史典故与义理比喻,这也是因为梧桐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正如钱钟书《管锥编》“周礼正义二七则”之“二”云:“理贖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释氏所谓权宜方便也。古今说理,比比皆然。甚或张皇

幽渺,云义理之博大创辟者每生于新喻妙譬,至以譬喻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其喧宾夺主耶?抑移的就矢也!〔17〕P.11-12〕“剪桐”或曰“桐叶封弟”是关于分封、兄弟之义;“分桐”则具有“比喻之两柄”〔17〕P.37〕,桐叶既分之后,可以“合”,也不可以“不合”。

1. “桐叶封弟”的典故出处。

“桐叶封弟”是一个著名的典故《吕氏春秋·重言》有记载: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史记》中的两处记载则稍异于《吕氏春秋》,而且这两处记载本身在细节上亦有出入。《史记》卷三九: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史记》卷五八: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前者,向周成王的进谏的大臣由周公变成了史佚;后者,叔虞的分封地由晋变成了应县。不过,这些都无损于故事本身的大旨。

2. “桐叶封弟”的典故含义。

“圭”,又作“珪”,是古代用作凭信的玉,上圆(或尖头形)下方,帝王、诸侯在举行朝会、祭祀的典礼时所用。梧桐叶形阔大,可以剪裁为“圭”的形状;这是“剪桐”典故产生的物理基础。甚至,相传民族艺术剪纸的渊源即可追溯到周成王的“剪桐”;此外,西北地区有句民谣:“汉妃抱娃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这里的剪花材料亦为桐叶。

唐叔虞为周成王的弟弟,周公旦则是当时的摄政大臣。“桐叶封弟”其实有“正”“副”两个主题。正主题所宣扬的是周成王过而能改、“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天子威仪及兄弟之义;副主题所宣扬的是周公旦的辅政、辅仁之德。“剪桐”后来成为分封的典实,如王勃《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剪桐疏爵,分茅建社。”〔18〕P.831〕高适《信安王

幕府》诗:“剪桐光宠锡,题剑美贞坚。”〔3〕P.2234〕“桐叶封弟”则与“棠棣之花”一样,是宣扬兄弟之义的常典,如:

曾肇《除皇弟似守太保依前开府仪同三司蔡王充保平镇安等军节度使制》:“忠孝之诚,桐叶疏封已侈;盘维之寄,棣华致好每敦。”〔19〕

苏轼《赐皇弟武成军节度使祁国公偕生日礼物口宣》:“棣华袭庆,桐叶分封。”〔19〕

张说《奉和暇日游兴庆宫作应制》:“棣华歌尚在,桐叶戏仍传。……圣慈良有裕,王道固无偏。”〔3〕P.961〕

棠棣又称郁李或者六月樱,开白色或粉红色花,蔷薇科李属。《小雅·棠棣》云:“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旧说以为周公所作《毛序》谓:“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也”。管、蔡是指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弟弟;周成王时,管叔、蔡叔和霍叔勾结武庚及东方夷族叛周,周公奉命东征。

值得注意的是:“桐叶封弟”的可信性、合理性均是建立在“对‘封建制’肯定的基础之上”;当“封建制”本身受到质疑、否定的时候,“桐叶封弟”也就成为悬案虚谈。我们虽不能断定柳宗元就是质疑“封建制”、“桐叶封弟”的第一人,但他确实是声名最著者。《封建论》云:“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桐叶封弟辨》则断言“故不可信。”

3. 分桐·判桐·破桐。

桐叶叶形阔大,可以剪裁,也可以判分、破分。“分桐”有“桐叶封弟”之义,如吴国伦《送姜太史节之使楚王》:“天子分桐叶,词臣下柏梁。”〔21〕明代实行藩镇制度,类似于“封建制”,此处的“分桐叶”则指楚王,而“词臣”则指姜太史。

此外,分桐具有“比喻之两柄”,即“同此事物,援为比喻……词气迥异。”〔17〕P.37〕“分桐”一则取其可以续合,如同铜虎符、竹使符,如冯琦《奉使宛洛初出都门》:“奉使分桐叶,承颜御木兰。”〔22〕“分桐叶”即为“分符”,是使节的凭证、信物。“分桐”二则取其不复续合,如张栻《名轩室记》:“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则明日兹念重生矣,积而熟时习之功销矣,不两立也,是以君子惧焉。萌于中必觉,觉则痛惩而绝之,如分桐叶然,不可复续。”〔23〕

“判桐”与“破桐”承接“不复续合”之“柄”。陈

淳《隆兴书堂自警三十五首》：“颜子不贰境，如判桐叶然。一绝不复续，何尝有遗根”^[24]，其理学色彩、取喻方式与《名轩室记》一脉相承。

《新唐书·李泌传》：“时李怀光叛，岁又蝗旱，议者欲赦怀光。帝博问群臣，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破桐”比喻君臣之分断绝，再如《金史·完颜纲传》：“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

梧桐在树木中本就因树身高大而卓尔不群，桐叶更因其叶形阔大而与众不同。“一叶一菩提”，中国文化中的桐叶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比喻意义。“桐叶秋声”是悲秋的重要意象；“桐叶题诗”既是文人雅趣，也是爱情心声；“桐叶封弟”则宣扬了兄弟之义。

[参 考 文 献]

- [1]汪琬. 尧峰文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十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4]严可均. 全宋文(卷十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5]顾瑛. 玉山璞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7]严可均. 全晋文(卷六十八)[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8]丹纳. 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9]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0]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程杰. 宋诗学导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12]何中. 知非堂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钱存训. 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4]郭奎. 望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5]宋禧. 庸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谢应芳. 龟巢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7]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8]董诰. 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9]曾肇. 曲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0]苏轼. 东坡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一十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1]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十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2]冯琦. 宗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3]张栻. 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4]陈淳. 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南山)

美文、小品文与随笔*

——从文体命名看周作人的文体选择

汪成法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作家,也是新文学重要作家中少有的以散文为其最主要的创作文体者,他在散文理论方面也发表了很多颇有影响的意见。他在不同时期所提倡的“美文”“小品文”和“随笔”,所指其实是同一种类型的散文,即占据了其创作大部的以议论为主的散文,这3种名称所对应的其实都是相当于 essay 所指的那种散文。而周作人个人的创作正是其散文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都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文体选择。

[关键词] 周作人; 随笔; 文体选择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098-06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首先主要是以理论批评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创作则主要是实践了他个人在文学上的主张:先是有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而后才有《谈虎集》中的创作,先是有了《美文》《自己的园地》,而后才有了《雨天的书》《泽泻集》等集中的创作。

这种先理论而后实践的现象也正是当时整个新文学界的普遍状况。《青年杂志》/《新青年》1915年创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7年2月,但直到1918年1月,《新青年》才第一次发表以胡适的《鸽子》及沈尹默的《月夜》等为代表的新诗,再到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新文学这才算是真正有了迥异于旧文学的作品。可以说,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虽有出于时势不得不然的成分,但具体的创作都是出于其参与者的理性的自觉的选择。

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理论主导下的创作当然也是出于其理性的自觉的选择。这尤其在他的文体选择方面,即选择了散文这种文体,并且以随笔为主这一

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周作人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且不论早期的翻译工作,就是他在当时的创作,文类也很庞杂:除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而练习写作的制艺文之外,既有传统的诗文,也有受西方文学影响而写的小说一类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学的起步阶段,周作人更是以一个新诗人的形象出现于文坛,1919年2月发表的《小河》一诗当时就曾被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1] (P.134)},废名因此说周作人“有一个‘奠定诗坛’的功劳”^{[2] (P.71)};较为早些日子做新诗的人如果不是受了《尝试集》的影响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发^{[3] (P.211)}。但是,周作人后来放弃了这种文体,把个人的主要精力投入了散文写作之中,以至于成了“小品散文的专家”^{[3] (P.211)}。

散文是周作人毕生创作的最主要的文体,他也是新文学重要作家中少有的以散文为其最主要的创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项目编号:10YJA751073)。

[收稿日期] 2011-03-25

[作者简介] 汪成法(1972-),男,河南泌阳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作文体者。但就是在散文这种文体中,周作人做出了自己的偏向显明的选择。大致说来,散文常用的表达方式有描写(人、物、景)、叙事、抒情、议论(说理)几种,虽然一般都是几种表达方式混合使用,但也毕竟是要以某种方式为主的。考察周作人的创作历程就可以发现,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占据了其作品中的最大比例,而以描写、叙事或抒情为主的作品比例很小。尤其是在他创作的盛年时期,即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更是以议论性文章为其创作的主体。

在开始新文学创作之后,周作人几乎是从来没有写过专力描绘风景的文章,以至于早在一九四〇年代,黄裳对其就有着这样的印象:“知堂平常很少作流连光景之词。”^{[4] P.178}周作人自己也在《中秋的月亮》一文这样说过:“总之我于赏月无甚趣味,赏雪赏雨也是一样,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与我缺少缘分的。”在周作人的作品中,《雨天的书》从书名看似乎是要写风景的了,但集中的文章,即使更加像是写景记游之作的《山中杂信》与《济南道中》两组书信体散文,也都缺少认真的刻画风景的篇章。周作人另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苦雨》《喝茶》《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篷船》之类,所写大多仅是风物,用钱锺书评《诗经》的话说就是“有‘物色’而无景色”。^{[5] P.613}至于其后的“草木虫鱼系列”,虽然谈的是金鱼、蝙蝠、白杨、乌桕,但也就如他1945年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所说:“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实在缺少对所谈事物的认真的描写。

鲁迅曾经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题作《准风月谈》,因为他是在借谈论“风(花雪)月”来评说“(世事)风云”,^{[6] P.189}和自然界的“风月”或“风云”都没有什么关系。周作人的文章也是如此。《雨天的书》之外,他在三十年代又曾经用《看云集》《风雨谈》命名自己的散文集,但事实上集中的文章和自然界的“云”或“风雨”都没有太多的关系。周作人本拟收入“风雨后谈”的文章后来编为《瓜豆集》出版,在1936年11月1日所写的“题记”中他也谈到了“风月”: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1944年,谈及自己的旧体诗,周作人再次说到“风月”:
“我所写的东西,无论怎么努力想专谈或多

谈风月,可是结果是大部分还都有道德的意义。”(《苦茶庵打油诗·前记》)

“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大部分还都有道德的意义”,这正是周作人散文的一大特色。恰如周作人在《瓜豆集·题记》中所说,他的这些文章大多是属于那种具有“师爷笔法绅士态度”的文章,无论所谈的是“风月”还是“风雨”以至“风云”。或者,用他在《风雨谈·小引》中的话来说,就是:“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的原因也就在于这些都是“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的批评文章,而正是这一类的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主体部分。

二

周作人在1940年2月26日所写的《书房一角·原序》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曾经说过:“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其实无论“批评文章”还是“随笔”,都是以议论为主的。可见周作人对自己文章以议论为主的特色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而这种特色的形成当然也是出于周作人自己的理性的自觉的选择。

这可以首先从他“美文”的提倡说起。

“美文”这个词语自然不是周作人创造的,但最早将“美文”作为一种文体引入中国文学之中的是周作人。这就是他1921年6月8日发表于《晨报》上的《美文》。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周作人明确提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自然不是对“美文”的定义,而是一种归类,即美文是“艺术性”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美文”归入“论文”之列,虽然是属于具有“叙事”性或者“抒情”性之“记述”性的论文,依此与纯“学术性”的专业论文区别开来。他在文中举出一些英语文学中的美文作家,如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等,然后说道:“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古文中的“序”,主要是指评介作品内容的文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序言”如《诗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等，后来也有称送别赠言之文为序的，如韩愈《送孟东野序》；“记”则是一种记事文体，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但“记”的另一含义是指解释经传的文字，如《礼记》；“说”则是一种典型的议论文体，如韩愈的《师说》《杂说》之类。这3种文体中，似乎“论文”所占的比重是要超过单纯的“叙事与抒情”之文的。所以，对周作人《美文》中所说的“叙事与抒情”要加以特别的理解，因为这是在“论文”中的“叙事与抒情”，不能和通常意义上的“叙事文”或“抒情文”相提并论。

范培松在《中国散文批评史》中论及《美文》时说，周作人对“美文”的界定是“把散文放进了纯文学作品样式内，从而与非文学明确地划清了界限”^{[7] P.34-35}；读者接受了这一定义；“美文”已成为现代散文的另一名号”。^{[7] P.34-35}欧明俊在其《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中也这样认为：“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实质上指的是新文学白话散文、纯文学散文，即20年代通行的小品或小品散文、散文小品概念。从此，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划清了界限。”^{[8] P.55}这和范培松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周作人已经说美文“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则其含义不等于散文即“新文学白话散文”，不是“现代散文的另一名号”，就是非常明确的了。欧明俊在书中又对“美文”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周作人所说的“论文”实指 Essay；“美文”实指 Familiar Essay。这从1928年写的《燕知草跋》中可以证明，他说：“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文中所说的“絮语”散文正是1926年胡梦华《絮语散文》中将 Familiar Essay 译作的“絮语散文”。……周作人的观点有自相矛盾处，他既把“美文”限制在散文中的叙事与抒情，或两者夹杂的，但他又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说等也是“美文”的一类。中国古文里的序、记、说既有叙事、抒情的，也有不少是议论批评的，或是三者夹杂的，即使是他所举的英美 Essay 代表作家，情况也不例外。^{[8] P.54}

“周作人的观点有自相矛盾处”实在是很正常的

事情，因为他从未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作过什么准确具体的严格定义。对“美文”这个概念，周作人也一如既往地未加定义，只不过从某一方面对其有所界说而已。不过，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所论的是俞平伯的“有涩味与简单味”的散文，将其与“小品文”、“絮语散文”亦即 Familiar Essay 联系在一起，却不用“美文”来称呼，这或者也是因为在周作人看来，“小品文”、“絮语散文”、Familiar Essay 几个概念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和“美文”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也就是在《燕知草跋》中，周作人还是明确把“小品文”归入“论文”之列的，只不过强调这是“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论文而已，这和在《美文》中把“美文”归入“论文”是一样的立场。

因此，显然是欧明俊在这里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周作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自相矛盾”，他不是“把‘美文’限制在散文中的叙事与抒情”，而是把“美文”限制在论文中的“叙事与抒情”，周作人把“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归入“美文”，所指的是那些议论批评的一类，他所举的英美代表作家，虽然不曾举出具体作品，其实也正是指向他们的论文的。周作人在《美文》中说得非常明白，他开头即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论文”，然后又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其后，他在1923年2月作的《文艺批评杂话》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文艺批评文章当然是议论性的，却“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美文”之为议论性的特质由此可见。事实上，周作人自己的文艺批评文章，像收入《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中的那些，确实可以归为他所说的“美文”之列。

所以，如果要和英文中的术语对应，与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对应的应该还是 Essay，但这是在这个词的狭义的意义使用的，不包括其中的“批评的”、“学术性的”那一类，也就是属于 paper 或者 treatise 的那一部分。^① 这也就是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的“自序一”中所说的“论文”与“随笔”的区别：收入

^① 英语中 paper, treatise, essay, prose 诸词语的准确含义以及彼此之间的界限，还有现代文学史上将美文、小品文、散文等概念与英语中的词语互相对应的具体情况，此处不作讨论。

《艺术与生活》中的《人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诸文是论文,而同是谈论文学的收入《自己的园地》中的《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诸文则是随笔。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也曾经说过:“议论文照例不选,所以有些人如蔡子民、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李守常、陶孟和等的文章都未曾编入。”但他所编入的文章,如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以及梁遇春的《人死观》《谈“流浪汉”》等,也是议论性的文章,其实就属于随笔/美文之列。至于其间的区别,主要的就是周作人后来在《燕知草跋》中所说的美文是“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论文而已,也就是其中是否更多地融入了作者“个人的情思”。周作人1922年1月在《文艺的讨论》中曾经说过:“我以为文艺是以表现个人的情思为主。”所以,表现了“个人的情思”的“论文”就属于“文艺”范畴的文学散文“美文”,否则就不是文学散文,只是一般的“论文”而已。

三

明确了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属于“论文”中的一类,另外值得注意的,其实倒是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是用“小品文”来指称他所说的“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论文”的,而没有再使用他先前所提倡过的“美文”。周作人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然后他引述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那段话:“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胡适在此处首先将“小品散文”与“长篇议论文”对举,显然就是把“小品散文”和“短篇”议论文联系在一起了,然后他又说“小品”散文的成功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也就是把“小品散文”和“美文”看成了同一的概念。因此,胡适显然也是将“美文”看作“(短篇)议论文”的。而胡适在这里所说的“小品”的审美特色,也确实就是属于美文/论文的。由此可见,“小品散文”这一概念,在当时的使用中和“美文”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苏雪林说周作人是“小品散文的专家”,^{[3] P. 211}应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命名的。

在周作人后来的文章中,确实也很少再使用“美文”这个概念,他使用得更多的也就是“小品文”或者“随笔”这样的词语,所指也大多都是这种“艺术性”的“论文”。

在1930年9月所写的《冰雪小品选序》中,周作人曾经这样宣布:“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周作人既然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将“个人主义的文艺”、“个人的文艺”看作是“文艺的本质”(《文艺的讨论》),现在又说小品文是“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其对小品文地位的推重可谓已至其极。也许就是出于这种认识,周作人才会选择了“小品文”/“美文”这种文体作为自己最为主要的创作体式。

但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编选感想》中,周作人却又说过这样的话:“我并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至于不喜欢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不愿以“小”视之,但另一方面也许和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的使用过于宽泛有关。朱光潜当年曾经这样谈及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

中文的“小品文”似乎义涵较广。凡是篇幅较短,性质不甚严重,起于一时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所以书信游记书序语录以至于杂感都包含在内。如果照这样看,中国书属于“集”部的散文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小品文。^{[9] P. 428}

“小品文”的意义既这样复杂含混,使用这个名称自然就无以把周作人的文体意识明确表达出来,所以他才会说出“不赞成”小品文这个名字的话来。

在1945年11月所写之《两个鬼的文章》中,周作人先是也曾经说到自己“有时想写点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但最后还是宣布自己实在写不出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这里的“闲适”与“平淡而有情味”似乎可以看作周作人对小品文审美特质的界定,而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不能用这种标准来评价的。所以,他很少说自己的散文属于“小品文”,只是在谈论别人的文章时才说是“小品文”。

《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一书论及周作人后来放弃了“美文”这一概念而“明显倾向于用‘小品’或‘小品文’概念”时,先是引述了周作人1937年4月所作《谈俳文》中的话:“现今日本的随笔(即中国所谓小

品文)实在大半都是俳文一类。”接着引述周作人1937年5月所作《再谈俳文》中的话：“日本的松尾芭蕉横井也好,法国的蒙田,英国的阑姆与亨德,密伦与林忒等,所作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假如这是同的,那么自然就是一类,名称不成问题,英法曰 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然后论道：“中国传统的随笔(笔记)包罗万象,根本不是文学范畴的概念,而‘小品’是中国的‘特产’,有汉语的民族特色,有传统文化的韵味,有特定的内涵。”因此,周作人主张用‘小品’或‘小品文’对应英法的 Essay 和日本的随笔,是较有见地的。^[8 I P.15]

这实在是对周作人的一种误解。

周作人在《谈俳文》《再谈俳文》中强调的是那些文章都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因此才说它们“自然就是一类,名称不成问题”。至于他个人是否就因为“中国曰小品文”而自己也称自己的文章为小品文,则还是一个尚需辨析的问题。

在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编选感想》中,周作人既已说过“我并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其后,他又一再表达过这样的意思:1937年3月在《谈笔记》中说:“我这里所要的不是故事,只是散文小篇,是的,或者就无妨称为小品文,假如这样可以辨别得清楚,虽然我原是不赞同这名称的。”直到1945年1月作《国语文的三类》,周作人还是这样表示:“小品的名称实在很不妥当,以小品骂人者固非,以小品自称者也是不对,这里我不能不怪林语堂君在上海办半月刊时标榜小品文之稍欠斟酌也。”

事实上,在周作人个人,也许还是更愿意用“随笔”这个名称来指称自己的作品。早在1923年11月所作《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周作人就将自己要写的文章称为“雨天的随笔”了;1925年11月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他又说集中的文章“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1926年8月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一》中,说到自己以后不想再写“长篇的论文”时,周作人又说是“以后想只作随笔了”;1940年2月在《书房一角·原序》中,他也是用“随笔”来指称自己“民国廿一年以后”的散文作品的;1965年4月21日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又把他自己的散文和“英法两国似的随笔”联系在一起。周作人有一部散文集名为《苦茶随笔》,1935年10月由上

海北新书局出版,但在此之前,他已经从1932年1月起,在《东方杂志》上开设了《苦茶随笔》专栏,只是仅仅发表了《黄蔷薇》和《远野物语》两篇文章,就因“一·二八”战事而止,余稿毁于上海战火,这两篇文章后来也未收入《苦茶随笔》,那篇写于1931年11月的《苦茶随笔·小引》,也未收入《苦茶随笔》(此书出版时的“小引”是1935年8月新写的),而是收入此前于1934年3月出版的《苦雨斋序跋文》,在这篇“小引”中,周作人先是抄录了他1928年1月所写的《夜读抄·小引》,并说明“苦茶随笔”系列就是要继续写作“夜读抄”一类的文章;1934年9月,周作人将其写于1932年至1934年的一组文章合集为《夜读抄》,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中就包括了原以“苦茶随笔”系列发表的《黄蔷薇》和《远野物语》。因此也可以说周作人是把他这一时期所写的散文都是称作“随笔”的。

四

自然,“随笔”也是中国传统散文中的常用概念,作为一种文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一大类型。周作人将自己的那些散文称为“随笔”,起码从名称上是承认了自己对这种文体的继承。而周作人之所以要选择“随笔”这一概念来命名自己的散文,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自己的文章与当时极为风行的比较接近的文体“杂文”和“小品文”区别开来。因为,“杂文”、“小品文”以及“随笔”,其实都可以说是与英语中的 Essay 对应的文体,他们之间在具体含义上的所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当时偏重文学社会功用的人说自己的作品是“杂文”,疏离文学社会功用的一派说自己所写是“小品文”,他们笔下的散文也确实因此在审美风格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周作人是一个他所一再宣扬的那种“中庸主义”者,自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章和“杂文”或“小品文”这两种倾向混为一体,所以,他才更愿意用较为中性的“随笔”甚至“笔记”来称呼自己的文章。到了四十年代,当周作人开始有意识突出自己的文章的社会功用时,就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药堂杂文》。止庵在为《药堂杂文》所写的校订说明中说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文章“不妨叫作理性随笔,不同于《夜读抄》那类知性随笔和《雨天的书》那类感性随笔”,^[10 I P.2]这所谓“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分类,其实倒正好可以与周作人所用的小品文、美文/随笔、杂文一组名称一一对应,各自突显了周作人某一个时期的散文在某一个方面的特征。朱自清在论

及鲁迅的杂文时曾经这样说过：“鲁迅先生的《随感录》，先是出现在《新青年》上后来收在《热风》里的，还有一些‘杂感’，在笔者也是‘百读不厌’的。这里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还有别的，就是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而这也就是诗。”^{[11] (P.411)}所强调的也正是杂感/杂文的“理性”特征。而在1945年1月所作《文学史的教训》中，周作人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所喜爱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腊文写作的叙利亚人路吉亚诺斯，便是这种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当作这派的代表作，虽然已是二千年前的东西，却还是像新印出来的，简直是现代通行的随笔，或是称他为杂文也好，因为文章不很简短，所以不大好谥之曰小品。”路吉亚诺斯是周作人终生推崇的作家，周作人愿意将其作品视为“随笔”甚至“杂文”而不愿以“小品”相称，当然更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小品文”了。

从“美文”、“小品文”到“随笔”，周作人终于为自己所选择的文体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名称，在这一选择探寻的过程中，他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为适合他的自我表达的文体，从而成就了他在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 考 文 献]

- [1] 胡适.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A]. 胡适文集(第二卷)[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 废名. 《小河》及其他[A]. 论新诗及其他[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3] 苏雪林. 周作人先生研究[A]. 周作人论[C]. 上海: 北新书局, 1934.
- [4] 黄裳. 读《药堂语录》[A]. 来燕榭集外文钞[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 [5] 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鲁迅. 准风月谈·前记[A]. 鲁迅全集(第五卷)[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范培松. 中国散文批评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 [8] 欧明俊. 现代小品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 [9] 朱光潜. 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A]. 朱光潜全集(第三卷)[C].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 [10] 止庵. 关于《药堂杂文》[A]. 药堂杂文[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1] 朱自清. 鲁迅先生的杂感[A]. 朱自清散文(中)[C].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上接第 54 页)

- [6] Bandura, A. . Cultivate self-efficacy fo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E. A. Locke(Ed.), Handbook of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 behavior[M]. Oxford, UK : Blackwell, 2000.
- [7] DH Schunk . Self-efficacy perspective on achievement behavior[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84(1).
- [8] DH Schunk , & TP Gunn. Self-efficacy and skill development : Influence of task strategies and attribution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1986(4).
- [9] 黎兵 杨嘉乐. 初中生时间管理倾向, 自我效能感, 学习归因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004(4).
- [10] 胡桂英, 许百华. 初中生学习归因, 学习自我效能感, 学习策略和学业成就关系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02(6).

- [11] 王婷婷. 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的动机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
- [12] 梁宇颂, 周宗奎. 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归因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0.
- [13] 胡俏, 戴春林. 初中生学习倦怠问卷的初步编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2).
- [14] A Villa , & E Calvete .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 Self-Concept Evaluation Scale and Its Relation to Burn-out[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 2001(3).
- [15] SM Jex , & PD Bliese . Efficacy beliefs as a moderator of the impact of work - related stressors : A multilevel stud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1999(3).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女性的洞察者*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萧红研究

陈晓娴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 广东广州 511450)

[摘要] 萧红小说自问世以来,经历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多重解读。本文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以萧红的小
说研究为主,探讨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萧红研究。

[关键词] 萧红; 女性主义; 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04-04

萧红的小说自问世以来,经历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多重解读,从20世纪30年代萧红初登文坛被命名为“抗日作家”开始,到50至70年代因历史境遇的变迁而遭受冷遇,继而在新时期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引发研究热潮。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不仅进一步延伸了80年代开始的启蒙视角,而且尝试从女性文学、比较文学、叙事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等角度来全面审视萧红的创作。本文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以萧红的小说研究为主,探讨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萧红研究。

一、女性主义视角下萧红研究的背景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1] (P.112)}这段剖白承载了萧红作为女性对千百年来中国女性作为男权话语附庸的真切体悟和深刻认识。尽管鲁迅、胡风、茅盾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注意到萧红小说创作的女性韵味,特别是鲁迅那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更是成为70多年来萧红评价无法绕开的一笔,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评价在当时并没有成为萧红评价的决定性

要素。很显然,在当时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批评家关于萧红作品抗战内容之外的解读,更何况他们的评价也仅针对其小说的创作风格和语言特色而言。很长一段时间,萧红小说蕴含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主题是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的。这种淡化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评论,是有它的历史语境的。

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时代的到来,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也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探寻女性命运的主题时一开始就与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等时代命题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这种在“五四”运动时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便迅速地让位于“救亡”和“革命”的号角,一些女作家开始走上一条把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的道路,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与男性文学趋同的特征,妇女解放被纳入社会革命之中,女性文学自然也被纳入整个民族革命的文学体系中去观照。50到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则更加无视女性话语的存在,女性的声音淹没在以男权和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话语

*[收稿日期] 2011-03-07

[作者简介] 陈晓娴(1980-),女,广东海丰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中,女性文学批评更没有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在这种语境下,几部文学史除了将《生死场》作为萧红的代表作略加论述外,萧红其他的作品大多得不到重视,更别谈女性意识的挖掘了。“文革”过后,文学批评出现了新的转机,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在经历了“译介引进”阶段后,于90年代进入了“女性批评实践勃兴”的阶段,此时,萧红创作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色才得到了研究者的发掘,也成为了90年代以后萧红研究的最主要视角。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化更新的,这种变化也引起人们审美需求的转移以及文学批评原则和标准的嬗变。

二、“女性”与“民族”的大智勇者

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出版在女性批评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著者将萧红纳入整个女性文学批评的框架中进行专章研究,从而开启了萧红研究史上的另一个新时代。

著者从“女性的抉择”“女性的历史洞察力”“彻悟与悲悯”几方面,将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相结合,对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作了细致的解读。著者认为《生死场》延续了鲁迅对国民心态的开掘:“《生死场》揭示的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利益集团——乡土大众的群体心态弱点”(2 I P.183)。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著者用鲜明的性别角度与民族批评话语进行交锋,她所做的只是在寻找和确立中国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在妇女与民族的关系上,著者强调的是“共谋”关系。这无疑是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但书里所涉及的“回归女性自身”“寻回女性气质”等观念在当下仍有启发意义。著者注意到萧红对历史和乡土生活的洞察,是通过一双“女性的眼睛”观察到的,对萧红小说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大加赞赏,并以此批评一直为我们所认同的主导意识。“正是这种象喻意义上的、或许与作者女性经验有关的妊娠和生育成了作者透视整个乡土生命本质的起点,成了‘生’与‘死’一系列象喻网络中最基本的象喻,也成为萧红那已然掩盖起来的女性通往这一中性社会的一条信息通道。”(2 I PP.185-186)著者强调了文本中女性生育行为的象喻意义,提醒读者将眼光投注到文本中描写女性生活的内容,并开始思考小说中传达出来的女性群体经验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从而突出了女性主

义的批评视角。

乔以钢也将“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相结合来阐释萧红的女性意识,他更多结合了启蒙主义的视角,对萧红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封建男权意识的批判”“对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剖析”“对愚昧、野蛮的民间陋习的挖掘”和“病态的民族弱点的剖露”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在特定的时代,萧红的创作呈现出“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两种倾向并存的状况,但性别批判、人性剖析和生命探索是萧红创作的主要精神内涵。“《呼兰河传》一方面站在女性本位立场上对男权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它又超越性别意识,对国民性的负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种‘双声话语’的出现,是女性文学在发展中不断成长的标志。”(3 I PP.93-94)林幸谦也认为萧红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一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4)作者从萧红文本的女体/乡土叙述出发,认为萧红以女性的视角为立足点,去观察民族兴亡、乡土文化和性别政治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

以上论者站在经典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来重读萧红的作品,在强调女性与民族“共谋”关系的基础上,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文本,从而让女性主体“浮出历史地表”。在这里,“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无荒诞”(5),但必须承认:“正由于民族国家的话语,才打开了女性主义的叙述空间”(5),而萧红也正由于在特定年代对民族话语的涉及,才得以在作品中发出女性的声音并为社会所接受。这也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现代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即自觉地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并借助社会启蒙的力量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只有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才能为两性平等、妇女解放等争取话语权;另一方面,这种启蒙的思想目标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女性问题提出的方式及其内涵,从而使女性解放问题转化为女性与“民族”“国家”、与“人”的启蒙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民族/启蒙主义”的话语权力对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深刻塑控;一种理论话语的树立过程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不断重返与重新叙述、编码的过程”(6 I P.10),对萧红

的女性主义批评自然也包含着对过去“民族/启蒙”传统的重新叙述、阐释与反省。

三、女性身体经验的体验者

与以上论者强调女性与民族“共谋”关系不同的是,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则完全颠覆了以往在历史、国家、民族框架下对萧红小说的理解,由此展开了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进行批判的解读。

刘禾认为鲁迅、胡风、茅盾等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操持民族兴亡的批评话语造成了对萧红小说的“阅读盲点”。“鲁迅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7 I P.474)。刘禾对《生死场》的分析集中在女性的身体经验上,她详细分析了小说中所出现的每个农村妇女对生育、疾病、性、衰老与死亡的体验,将女性的身体经验分析与萧红在作品中对生与死意义的表达联系起来,指出萧红小说鲜明的“性别立场”对民族主义话语的解构和颠覆。刘禾的阐释带有极其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她对《生死场》长期以来被“庸俗社会学”所遮蔽的女性身体经验的批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反拨,将小说从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中解救出来,发挥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

同时,围绕萧红自绘的《生死场》封面的争论,刘禾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阐释:“若是封面的深红色血块可以联想为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的血”(7 I P.477),刘禾认为,这一从性别角度解释萧红封面创作的可能性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遏制而未能展开。三四十年代读者从抗日救亡的时代特征出发,认为小说的封面隐含了抗日救亡的呼号,杨义从启蒙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小说的封面不仅暗含了“抗日”的意义,也蒸腾着属于民族的魂魄,而刘禾则从鲜明的性别视角出发来解释封面的含义,尽管萧军后来已道出萧红当时自绘封面时的真实情形(由于种种偶合的原因才涂成目前的样子),但都无碍于研究者从各自的审美“期待视野”出发来对小说进行不同的阐释。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一直是权力诉诸文学的方式之一,这些论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作为一种“知识”或“真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读者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判断,将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给读者。

刘禾的论述显然为萧红的女性主义批评带来了新的冲击,但用这一理论刻意压制小说民族主义内涵的阐释也引来很多论者的质疑:“写女性身体体验并不是萧红的终极目的,小说的前九章是写人的生和死,后六章是写民族的生和死,这是作者一种有意识的布局。文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刘禾有意地压制了文本的后半部分,目的是要服务于其鲜艳的立论。”(8 I P.562)事实上,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不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其截然分开。“如果说,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眼睛的话,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5)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完全离开一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去观照它在当时产生的特定意义也是不够客观的。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一部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读者从中接受什么,与社会的情势、读者的心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9)。《生死场》出版之际,正是全民族抗战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无疑会得到强化,时过境迁,当新的文化语境出现时,人们以新的视角去观照它,审视它,自然又会得出新的认识,而文学经典的价值也正在于其文本意义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给予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提供从不同角度去阐释它的可能性。

四、女性“身份”的体认者与女性意识的自审者

新时期以来,对萧红小说的研究仍是集中在《生死场》或《呼兰河传》,艾晓明则用女性主义的视角阐释了萧红另一部被人忽视的作品《马伯乐》。在《女性的洞察》一文里,作者舍弃常用的主题解读和战时人物形象分析等方法,从女性视角对萧红在创作时对自身写作身份的肯定进行论述。作者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女性洞察力的又一独特例证,萧红的特殊之处在于选择了一个男性人物代表,用一种“絮絮如说家常”的方式来反映战时民众的真相,小说对马伯乐这一自私自利、自伤自怜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是萧红解构男性形象,并向主流文学叙事中一味高扬的民族士气提出质疑的有力依据:“萧红恰恰是在这些地方,在大话和小事的冲突中,在虚张声势、大言不惭的行为和窝囊对付的生活态度造成的喜剧中推翻了男性中心的社会给予男性特质的一般概括。”(10 I P.18)作者认为萧红选择的是一条“写作——

个人的写作——作为女性的个人写作”的道路。

关于萧红对“身份”的体认,陈洁仪则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萧红的4部作品,探讨萧红从追寻“自我”到“女性”到“作家”这一身份的意义。作者认为,就萧红追寻“女性”身份的角度来说,她笔下的“女性命运”多以悲剧告终,很少女性在苦难里仍可反抗到底、得到醒觉,惟有于青岛时期写下的《生死场》,才是她对于“女性”处境一次较为积极的回应^{[11] P.55}。到她的人生几经困顿后,萧红对“女性命运”的看法又由反抗回到绝望。作者认为,在“自我”和“女性”的身份上,萧红均由最初肯定的坚持,到最后变成彻底的幻灭,至于“作家”的道路,则在自觉意识加强下成为萧红最后比较明确的身份。从“身份”探寻的角度来看待萧红在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对“自我”、“女性”和“作家”等身份的体认和追求,无疑是萧红研究中一个新的亮点,但论者的有些观点仍有待商榷。如萧红对“女性身份”的否认和彻底绝望这一看法,应该说,萧红对女性的悲剧有着深刻的体会,但由始至终,她没有放弃对女性如何寻求个人解放和实现自我价值这一艰辛历程的探索和实践,而作为“作家”的萧红,她写作的初衷和宗旨也是一直“对着人类的愚昧”的。

黄晓娟对萧红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深层探究,并不停留于从萧红对传统男权中心的道德观念进行批判的角度进行观照,作者认为,萧红的作品还体现了“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在萧红眼里,女性最大的悲哀不是因为她们经历坎坷,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看到了妇女的命运是在被虐与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1] P.143}这才是女性命运长期被奴役的根源,惟有解放自身,并对这种长期“屈从”的自身性格进行反思,寻求作为“人”的独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为妇女的真正解放画上句号。黄晓娟不仅仅将眼光投射在萧红小说女性主题对在父系文化圈中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抑的宣泄和批判部分,而且注意到了萧红小说在展现女性生存本相、认识女性自我、理解社会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含的女性自审意识尤具现代意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研究者对萧红的阐释有了女性批评这一新的视角,但始终难以跳出“民族/启蒙主义”的语境去谈论萧红。由于国内的女性文学批评很大程度得益于西方女性理论的催生,又

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思潮,因此,不管是女性文学创作还是女性文学批评都很自然地与“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相勾连在一起。事实上,在中国,女性的解放始终存在于民族和国家的主流语境之内,不管提出怎样的思想命题,“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12]这种文化传统和话语权力的深刻塑造使研究者在寻找“女性文学”的历史支撑时,不约而同地将“启蒙主义”及其对“现代性”的追求指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也造成了女作家和批评家对女性文学价值上的犹豫与困惑。“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6] P.9}我们期待着文学批评家们以新的视角,用更客观、更开放的态势去接近萧红。

[参考文献]

- [1] 黄晓娟. 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2]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 乔以钢.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4] 林幸谦. 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 [5] 吴晓佳. 萧红:民族与女性间的大智勇者?[J].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增刊(2).
- [6] 乔以钢.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7] 刘禾.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A]. 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C].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3.
- [8] 王寰鹏. 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M]. 济南:齐鲁书社, 2005.
- [9] 邹午蓉. 新时期萧红研究述评[J]. 文学评论, 1988(4).
- [10] 艾晓明. 女性的洞察——萧红最后一部小说《马伯乐》[A]. 艾晓明. 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11] 陈洁仪. 现实与象征:萧红“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寻[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5.
- [12] 汪晖. 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下)[J]. 文学评论, 1989(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论福克纳《八月之光》的对照型结构*

张 曦

(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 《八月之光》中的对照结构是一种诗化而抒情的结构形式,其源头直追福克纳早期作为诗人和画家的艺术实践。在琳娜与克里斯默斯板块的对照中,作者否定了清教伦理和种族主义的偏执,肯定了温和而顺应自然的世界观。

[关键词] 福克纳; 八月之光; 结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08-03

对照是福克纳大多数小说中常用的结构形式。其成熟时期的作品,常将两组结构模块并置在一起直接构建文本而摆脱情节的关照。《八月之光》是此类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作品。

一

琳娜·格罗夫刚刚到达杰弗生镇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滚滚浓烟从乔安娜·伯顿着火的房子里冒出。琳娜看见了乔·克里斯默斯杀死情人乔安娜·伯顿后放的火,这是两位主角在小说中唯一的联系。琳娜对事故的不闻不问态度说明这联系仅仅停留在符号意义上而已。两位主角各自拥有独立的人生。

小说的前几页以舒缓的笔调讲述琳娜不甚美满的童年、成长、未婚先孕和离家出走,其间既没有主人公的自我分裂的心理独白也没有紧张的人物对话。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描述下,久远成了这段抒情诗的主题。琳娜·格罗夫身上那自然温和的宁静散发着显而易见的异教性质,如古希腊雕塑般的静穆使得琳娜即使在胎儿骚动的时刻也不见任何慌张,在超越了时光流逝的广袤中获得富于生命力的永恒安详。这异教的安详来自史文朋:

我唱着,从春初到春末,到春光消亡,披着
露珠上反射的莹莹月色,

我唱着,有时光相伴,野鸟相偕,我飞着,一

心寻找和追随太阳。^{[1] P.209}

布鲁克斯认为史文朋对福克纳影响最大者为一首名为《狂乱者》(“A Nympholept”)的长诗,这是福克纳早期散文、诗歌的主要源泉。史文朋以反清教的姿态借感官化的自然笔调着色出情欲主义的质感,并以古希腊的异教神话世界渲染这种质感的古老与超然,这对福克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文朋使福克纳逐步认知到古代艺术在“寂静的、完美处子”般平静之下的自在力量,从史文朋及其背后传统“一潭静水”的风格中,他看出了超出某个诗人局限的基于坚忍不拔、从容不迫的坚强活力。一种阳刚之气从看似病弱哀愁的美中被领悟出来,琳娜身上的随遇而安和肉体性正是被这样一种理解转换成了某种永恒的完满自为的力量。

与琳娜部分对立的是乔·克里斯默斯板块。乔是命运的影子,一个始终不肯与命运和解的俄狄浦斯。在自己狂暴的一生里他始终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符号,他那狂暴、破碎、自我封闭的斗争最终以无助的死亡告终。

他的人生记忆只能追溯到孤儿院,只是在临死前才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死于非命,肇事者是自己的外公。在黑屋子般的孤儿院他莫名其妙地被伙伴们喊作黑鬼,从此堕入比黑鬼还糟糕的境地,“因为你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威廉·福克纳的叙事艺术”(项目编号 D9SJD750027)。

[收稿日期] 2011-03-11

[作者简介] 张曦(1978-),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讲师。

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五岁时他撞破营养师的偷情场面,却换来贿赂的银元,这将《荒原》中揭橥的贫瘠而基于肉欲的性爱观灌输到他幼小的头脑。与琳娜自然丰产的性爱所带来的新生不同,这性爱观日后将他带入与乔安娜·伯顿疯狂的关系。他曾经是一个努力长大独立的男孩,但清教伦理的严酷摧毁了他的自然人性。养父对工作和敬畏上帝的偏执摧毁了他一切作为人的乐趣和丰富性。离家出走后他走南闯北,走过比琳娜远得多的路程,但却找不到自我,无法逃出种族主义的诅咒和清教伦理的枷锁。与琳娜没有结尾而充满期待的旅程不同,曾见于古希腊悲剧的可怕宿命在十五年的漂泊之后驱使着乔最终回到密西西比——他自己不曾知晓的出生地去接受死亡。乔杀死伯顿后被私刑处死。在最后时刻他却显出某种宗教意味的平静,以“安静”“深不可测”“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看着施暴者,而这情景深植入人们的记忆变得“自成一体,安详静谧,得意扬扬”。论者常常强调乔没有身份的现代人气质,以及种族主义、清教伦理对他的戕害。不过放在小说结构的层面上讲,乔更接近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乔的死亡带给读者的不仅有怜悯还有恐怖,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一个受害者和恶棍,还是一个自我分裂的悲剧英雄。”^{[2] P.91)}

乔虽然负载着很多南方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但就更核心的性质而言他与琳娜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角色。琳娜温和自然的恒久属性接近文艺复兴时期对异教世界的欢乐理解;乔被宿命诅咒的暴烈人生和令人惊惧的毁灭则达到了古希腊悲剧的高度。两个人分别代表着古典文化艺术的不同方面,并且撑起了小说的宏观结构。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琳娜的故事几乎完全独立于克里斯默斯的故事之外这样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读者们抱怨为小说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二

琳娜与乔的故事互为对照,这是福克纳所有小说中最基本的结构手段。这种结构倾向在福克纳的学徒阶段便已定型,直追他最早期的艺术创作。

伊厄斯·林德指出,福克纳天性中便具有从事视觉艺术的主动性,这实际是一种多元创造力的表现。几乎和福克纳能够写作诗歌和故事一样早,他开始绘画和素描,在1914到1922年期间,他曾花费大量精力在那些富含个性和精巧风格的卡通和插图上。这些绘画与日后的文学作品在风格上紧密地联

系并且对后者存有深刻影响。^{[3] P.127)}



图1



图2

图1为福克纳1916至1917年间绘制但没有发表的墨水画。对称与平衡的和谐构图是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人物动作一致,身形在黑白色彩的高度对比中将肢体延伸到画面的边沿,支起整幅图画的架构。视觉化的动作瞬间由部分重合而又高度对称、融为整体的造型表达出来。图2为福克纳1918年绘制的钢笔画,操长笛的坐态牧神与其旁边裸体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福克纳在这一时期以线条和形状探索更为抒情风格的努力^{[4] P.43)}。这抒情风格的获得,来源于线条简明的人物形象在相互对照的构图中令读者所产生的遐想。图画背景的明暗对比非常鲜明,令人想起《八月之光》中琳娜部分的明朗基调与克里斯默斯部分阴暗底色的对照。相比图1,在第二幅图画中福克纳明显更加写意。不再重视线条细节的写实作用,而以非常圆润的弧形曲线勾勒出人物造型的整体感觉。图1中有些依赖技巧而略显生硬的对称感在图2中已经被更加基于画面整体性的对照所替代。比尔兹利(Beardsley)为《莎乐美》所作的插图,显然以其对于蜿蜒曲折线条的偏好影响了福克纳在这幅画中的审美情趣。拥有比尔兹利插图版《莎乐美》的福克纳除了对王尔德神秘而炫丽的诗意表达表示赞赏外,对于比尔兹利插图中体现的取消三维透视的景深、将绘画回复到二维平面纹理的倾向也颇为认同。事实上这倾向表达了贯穿于从世纪末风格(fin de siècle)到现代主义绘画的解构传统的大趋势,与现代主义小说放弃情节这一深度模式的变革属于同一思潮。

优秀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形式之前都会有一个漫长的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对于现存创作模式的研究和体会会将这些风格模式过滤为微小的形式模块并逐渐积累为除了现实素材之外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材料,或者说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形式因”的具备过程。遇有适当机缘,个人化的写作形式和风格便从这积累中涅槃而来。因而在一

定意义上,早期创作也更容易见出作家对时代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学习之处,其清晰的渊源脉络往往随着作家艺术表达臻于精纯而逐渐潜没,再难寻就。对福克纳而言这个风格的积累期是1921年以前,特别是从1915年到1921年这个阶段,作为学徒的福克纳在绘画、诗歌、散文等多个方向上进行了杂乱但不乏创见的模仿、改写甚至剽窃活动。其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泛,在诗歌方面涉及T·S·艾略特、戈蒂耶、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魏尔伦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等人,溯源这一系的艺术流脉,经由史文朋可以直追济慈。绘画上福克纳从世纪末风格、新艺术主义、工艺美术运动中汲取营养。特别是比尔兹利以繁复且精美绝伦的曲线配以高对比度的简单黑白构图表达带有罪恶感的浪漫幻想。从艺术源头上看,福克纳接近罗塞蒂、威廉·莫里斯、戈蒂耶这类诗画兼工、互为表里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倡导的“总体艺术品”风格是这派传统的滥觞。诗、插图、装帧融为一体以形成整体的艺术效果是这些艺术家的基本追求:即使是最简单的诗行也可以藉由蜿蜒优美的螺旋及花形曲线而光彩丰溢。^{[5] P.32}整体性、对称/对照性、压缩文本——反衬文本之外的想象空间,是福克纳从他们那里学到的艺术理念,日后这些理念成为包括《八月之光》在内小说创作的核心构思。

三

福克纳早期诗、画活动的主要艺术收获,霍恩豪森认为是获得了高度风格化的表达形式,这些形式日后作为原型成为了他小说创作中的基本形式模块。不过我们认为,福克纳的收获不仅仅是习得了这些高度精炼和偏向抒情的、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传统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写作范式,更重要的是这些艺术活动确定了福克纳对作品构思的基本模式:结构上注重作品的整体性而不在乎细节真实,以重复和对照为基本构建手段;风格上偏向抒情,喜欢以诗歌式的语言和形象化的方式精细地描绘静态瞬间的平面美——这些是这位文学大师辉煌创作生涯的起点并决定了他多数作品的叙述形式。

多年后,当福克纳被问到《八月之光》的创作过程时,他曾回忆说:“当时除了一个年轻女子、怀孕、独自走在异乡的道路上,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6] P.139}也就是说,除了琳娜·格罗夫的一幅静态画面,福克纳在开始写作小说时根本没有对小说

作整体构思,乔的故事,相关其他人等的故事都是后来一边写一边加上去的。但最后,这部小说的各个部分却围绕着共同的主题,凭借意向性的关联实现了作品独特的整体性。福克纳乃是以诗人和插图家制作“整体艺术品”的思路去写就他的大部分优秀小说的,不论《喧哗与骚动》还是《八月之光》,最初的写作架构都只是一幅画面。在写作过程中福克纳借助来自诗歌和绘画的重复、对照的手法不断垒加材料,将各大板块加以并置,最终营造出看似松散却包含内在紧张关系和想象空间的有机整体,这特殊的创作思路是理解其作品离奇结构的关键。

在小说的最后,福克纳为琳娜安排了丈夫,让孩子有了父亲,有了身份,避免了克里斯默斯式的悲剧重演。正是在两人的对照中,一种富于生产性的力量在更古老的原始意义上恢复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并形成真正的喜剧结局,虽然这结局不能消散整个作品的阴郁。小说的对照结构比照出迫害克里斯默斯的种族主义和清教理论的狭隘与偏执,并且将一种更为宽广和温和的喜悦带给读者。它使小说的意义甚至跃出了作家本人的理解范围,获得了文本之外的隽永意味。

[参考文献]

- [1] 史文朋. 伊梯洛斯[A]. 英国历代诗歌选[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2] David Minter. Faulkner's Questioning Narrative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 [3] Ilse Duso Lind. The Effect of Painting on Faulkner's Poetic Form[A]. Ann J. Abadie, ed. Faulkner, Modernism, and Film: 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79.
- [4] Randall Shawn Wilhelm. William Faulkner's Visual Art: Word and Image in the early Graphic Work and the Major Fictions[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2002
- [5] Lothar Hönnighausen. William Faulkner: the Art of Stylization in his early Graphic and literary work[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John Pilkington. The Heart of Yoknapatawpha[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1.

(责任编辑 南山)

女性主义视域中的福克纳短篇小说*

薛 瑞 东

(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福克纳短篇小说精彩纷呈。文章在女性主义视域下论述福克纳的系列小说,论证文本中女人的身体与欲望、观念的复杂关系,论证女性的男性化特征,借以进一步提升福克纳小说研究的高度。

[关键词] 女性主义视域; 福克纳; 短篇小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11-04

在福克纳抱怨耗费了他创作长篇小说的部分时间与精力的短篇小说中,^{[1] P.394}活跃着一批南方的女精灵,她们与作者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独立存在。这些女人面目不一,或是妖女/引诱者、淑女/公主、坚韧有力的母亲(祖母),又或是新女性。但不论这些女性以什么面目出现,她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界定的事物,包括认同的价值体系,还是具有鲜明的男性化特征。如今,这些女性形象虽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把福克纳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文本系统加以研究的文章还非常少。笔者力求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着重探析其短篇小说的身体话语,进一步揭示美国南方社会中女人在现实与想象、维护与颠覆、正常与变异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把美国南方的地域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现实与想象

在西方传统认识中,身体是可见的、短暂的存在,它充满无限的欲望,容易导致错误与恶。柏拉图就认为身体是任性的,可能导致疯狂的残杀。在他那里,身体是崇高、永恒、真理、道德的反面。^{[2] P.186}不过,尽管身体背负了骂名,可是“卑贱的”身体也是各种美好事物的载体,离开了身体,任何美好的未来、美丽的想象,包括欲望、时空,便失去了意义。欲望是一个从无到有,无限增衍的过程,不论身份、地位、阶级、种族、社会属性怎么不同,欲望总会凭附在

身体中。随着身体的变化,各种欲求也随之变化。于是,有限的身体与无限的欲望,自然就构成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体。为了寻求解决之道,千百年来,人类不断探索超越时间、身体的办法。哲学和文学的国度中想象出的永生的天国、幸福的桃花源与乌托邦,就是身体诉求的一种折射。毕竟惟有身体延缓衰老,才可能与政治、社会、时间角斗,才可能满足更多的欲求。但身体有着不同的属性,那些属性本身就对身体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压制和变相的遗忘,执掌监督、审查职能的各种社会成规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新一代身体,因此身体虽存在,可也不能为所欲为。也就是说,拥有身体,并不代表可以自由支配身体,随意满足欲望。更何况欲望往往具有自相矛盾的、变异的、不稳定的、古怪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特点。

女人,在古代社会被视为交换的象征,有时甚至直接被简化为交换所需的物品。因此,令人不断滋生欲望的女人更被看作红颜祸水。在某种程度上,父权制社会常常把女性从欲望关系中排除出去,以达到净化家庭、家族与社会的目的。19世纪美国南方,就对女性身体进行了“合法”加工,创造出淑女神话。淑女神话最终成为全社会欢迎的欲望表征,也是社会各种力量控制的欲望表征。总之,男性社会忽略、压抑女性身体的内在欲望。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薛瑞东(1971-),男,江苏江都人,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而且,传统的美国社会,作为欧洲文明在新大陆的延伸,思维模式上也采用二元对立的思考方法,对与错、善与恶、男与女、灵与肉、精神与身体、异性恋与同性恋两两对立,并被人割裂开来,前者被视为高贵的、主动的,后者则被视为低俗的、被动的。身体与欲望在这种思维模式中就成了低俗的。

一旦南方种植园经济制度解体,曾经引以为傲的南方淑女神话就直接面临身体与欲望的严峻挑战,于是身体和欲望的对立统一关系就突显出来,成为一对社会没法从容解决的矛盾。身体和欲望的对立,作为南方种植园神话崩溃下的衍生物,不断冲击传统价值观。解决身体和欲望的矛盾,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解决南方与北方的矛盾,解决被淑女神话束缚了的女性身体与不断发现、膨胀的欲望之间的矛盾,解决现实中的南方与想象中的南方的矛盾。

《干旱的九月》中的那个年近40、年老色衰、无人追求,常常借酒浇愁的女人米妮·库珀,就用身体同南方社会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年轻时,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好动情感、没有门第等级观念但相貌平平的她,曾一度雄踞社交界的王座。但世风日下,男人开始变得势利自负、目空一切;女人也学会了打击报复,而且乐此不疲。拒不承认现实而又无人问津的米妮从此变得茫然失措、憔悴失意。这期间,她也曾与一位40来岁的鳏夫——银行出纳员相处过,后来那人调到孟菲斯银行工作。人去楼空,她又成了一个怨女。独自出行的她已引不起男人的兴趣。她不堪忍受孤独,听任身体憔悴下去,为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她含混其词地表示黑人威尔·梅耶斯欺负了她。在威尔遭受非人待遇的那天晚上,她浑身烧得烫手,先是浑身哆嗦,后来控制住了哆嗦。那些曾经一同玩乐的朋友们聚拢过来,目光灼灼,诡秘地盯着米妮,希望她能说出事的经过陈述一遍。在电影院里,她嘴唇抽搐,本以为可以控制身体,但现实世界中进入影院的成双捉对的男女,与银幕的想象世界中享受美好而热情生活的男女刺激了她,12年来几近麻木的身体被欲望鞭笞醒了,她终于失声大笑,尖声狂笑。朋友们护送她回家,哄她上床,为她冰镇发烫的脑门,帮她寻找岁月打上的印记——白头发,相互诡秘而兴奋地询问威尔和米妮是不是果真有什么骇人听闻的身体新闻。

女性挣脱束缚、满足欲望的原动力往往来自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成为现实与想象两股力量对抗的场所,身体与欲望在交锋中也相互排斥、吸引。

米妮就这样让身体服务欲望,听任欲望自由表达。现实世界不允许她自由表达身体以及个体欲望,她就用近乎病态的想象表现出来:她用身体伸张、标榜了屡遭压抑的欲望,以假想身体受辱的极端方式宣泄了对社会的怨恨之情。世人口中的“可怜的人儿”,淑女米妮自造言论,自愿将身体抛给想象,也给世人提供想象的原材料,供世人施行暴行。通过这种扭曲变态的方式,她的身体与社会注意的欲望得到了暂时性满足。

以麦克莱顿为首的所谓社会精英,既是白人女性身体的忠实捍卫者,也是黑人身体的坚决清除者。他们在传言中满足了对淑女的想象性欲望,于是迅速集结一批暴徒对威尔痛下杀手,致其丧命。至于私刑执行者麦克莱顿的妻子,像只笼中鸟,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被麦克莱顿瞪得垂下眼睛,在丈夫的训斥下呆呆地站着;丈夫还不解气,抓她肩膀,推推搡搡,把她摔进椅子。这位妻子被捶打得没有多少生气,在麦克莱顿眼里更像个物件被随意摆弄。同米妮相比,这个女人在丈夫狂野的暴力和强大的威权下竟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法掌控,更没有可能实现个体的欲望了。在这个家庭,我们看到女性的身体被男性话语所禁锢,而且在“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31 P.195)。

《干旱的九月》多方面呈现了主人公米妮特定时空、具体而独特的女性存在形态:被锁闭的身体、被围困的身体、被监管的身体、成熟而衰颓的身体、被爱欲控制的身体,小说同时也客观呈现了南方男人无法控制的狂怒的身体。小说中,身体的存在方式,正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命流动的形态。同时,在更深的意义上,米妮是身体和欲望共谋的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她的存在限于淑女标本、生理身体的存在,她的身体和命运被掌控在传统社会各种力量手中,这正是她的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

阿姆斯特夫人(《花斑马》)也是位身不由己的女人。她极力劝阻疯狗般的丈夫亨利·阿姆斯特不要花上五块钱买匹野性难驯的野马,可他唯恐吃亏,还是买了一匹。当然受伤害的还是他们自己,野马跑了,亨利也在追马途中受了重伤,收拾残局的则是那位坚持己见可无法掌舵的女人。男人随心所欲,身体与欲望一致;女人微薄的欲望就是养家糊口,可身体不属于自己的。这是这类穷人家的窘境。

可以这么说,在福克纳的许多短篇小说中,上流社会白种女人身体与欲望的冲突是肉欲横流的现实

与传统淑女想象的矛盾,穷白种女人身体与欲望的冲突主要是难以延续身体存在的严峻现实与满足更大欲望的想象之间的矛盾。

二、维护与颠覆

纯粹的南方人欢呼血统绝对纯净的种族,惧怕种族混杂。为了保护自己,南方社会对不同的种属进行了归类,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级划分等方面强化白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在个人的文化教育方面规范白人的行为举止。淑女与绅士、黑鬼与贱种成为不同阶层的称谓。在这样的教化下,白人便向内转,化动为静,自我陶醉,女人也成为静止的角色。女人的身体也必然划归观念统治。但无情的战争损毁了传统大厦,女人的身体重新面对鲜活的现实世界:是继续维护传统,用一成不变的旧观念包裹着热情似火、待机而动的身体,还是顺应社会变化,使身体挣脱观念的束缚,用身体思考,直接和社会对话?这个问题摆到了内战后年轻一代的面前。更为刚劲有力的北方经济模式摧毁了僵化的南方种植园经济模式,吹皱了南方人的心湖,南方的年轻一代为个人的发展也在谋求出路。北方人员、物质、文化的入侵,使南方新生代满怀狐疑,躁动不安,他们不再甘心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这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人顺应了时代潮流,全盘接受了北方的价值观;一部分人首鼠两端,态度暧昧;一部分人被保守人士贴上守护神的标签,在维护与颠覆的两难行动中作了传统的殉葬品;一部分根深蒂固的传统人士则继续做着延续传统神话的美梦,自我陶醉。说到底,这是传统与现代之争,具体显现为维护淑女身体还是颠覆淑女身体的斗争。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就是用晦明不定的笔触写出了南方大家庭中一个女子身体与观念的矛盾存在。在南方人眼里,艾米丽·格里尔生的父亲捍卫传统,赶跑了追逐她的青年,阻断了女儿身体与尘世中男性身体的联系,艾米丽成了不是凡尘中的“身段苗条、身着白衣”的画中人物。父亲死后,艾米丽病了好长时间,看上去像姑娘,和教堂里带有几分悲怆肃穆的天使相似。传统社会价值观占据了上风,身体暂时沉睡。北方建筑公司工头荷默·伯隆出现,唤醒了身体沉睡的艾米丽,导致她改写了自己的身体意识。不过荷默仅仅是个过客,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摔在一个仍长睡不醒的南方。而30岁出头的艾米丽也绝对不容许他人像死去的父亲那样再漠视她的身体,这个比往常更清瘦的“削肩细腰”,带

着灯塔守望者的神情的女人去买了灭鼠药,封存了荷默的身体,此后一劳永逸地躺在荷默身边。她就这样牢牢地控制住情人的肉身。抗税时,大家又见到了这位久违的女人,她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穿一身黑衣,形似一具长久泡在水中、肿胀发白的死尸,她三言两语就干净利落地打败了一队前来催税的人马。终于,比爱情更持久的永恒的长眠驯服了艾米丽的观念与身体,鲜花覆盖住她。她用传统的观念维护着南方女人的贞洁神话,她又用隐秘的身体颠覆了淑女神话。她就是那个社会的方尖碑,她又自己放倒了自己。

南希(《夕阳》)则是一位在观念与身体之间摇摆的黑种女人。作为康普生家的仆人,南北战争对她个人的意义,主要是形式上的;在她心目中,她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可以任由主人和白种人支配,她永远不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对南希而言,内战的结果,只是时间的更迭,于她一切如故。观念的衍变,自由的身体,对南希也毫无实际益处。传统观念的巨轮继续碾压着南希们的身体。况且,观念的更新,难以一蹴而就,往往需要长时间辛劳的耕耘,最终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南希身体在这缓冲期的命运是继续遭遇白种人不公正的对待,并且怀有身孕。南希的身体在家也不能听由自己做主,她的男人耶苏威胁到她的安全,并且搅得康普生一家不得安宁。她不敢走夜路,康普生和3个孩子送她回家,留下絮絮叨叨的夫人在家。文中南希神神叨叨,言语不少,可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仅在一个白人家庭中就渐趋平静了。南希身体与观念的冲突主要是可以自由的身体与无力挣脱的观念之间的矛盾。

《曾有过这样一位女王》中的弗吉尼亚,直到90岁高龄,都一直在维护南方传统,可她的一切努力都和她的身体以及承载她身体的轮椅一样,处于半沉睡状态。忠心耿耿的女仆埃尔诺拉是弗吉尼亚命令的执行者,她一直密切注视着弗吉尼亚的孙侄媳妇娜西萨的一举一动。不幸的娜西萨,身怀六甲时丈夫就身亡。她在与丈夫度蜜月期间,曾收到若干封匿名求爱信,后来家中遭窃,信也失窃,并辗转到了一名联邦特工手中。特工以此要挟她,娜西萨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委身于他。在沙多里斯家族眼中,淑女观念永远高于身体;身体可以受辱,神话不可打破。娜西萨最后一次独自离家,两夜未归,终于取回了信件,并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向弗吉尼亚作了详尽的叙述。弗吉尼亚听完已了无牵挂,便命

侄重孙取来一顶小巧的黑色老式女帽,庄重地戴上,离世。事实上,两代人都努力坚守阵地,但都失败了。弗吉尼亚一辈子守护着哥哥沙多里斯的家,但有心无力,娜西萨为了维护名誉,却牺牲了身体颠覆了淑女神话。

《莱巴嫩的玫瑰花》中的露易丝·兰道夫,一位曾轰动南北战争时期的女人,只在故事后半段才出场,她在男人的世界中没有话语权,她的故事也由他人转述。文本中,她已经永远定格在战争中,留在那段记忆中。

这些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在福克纳小说中那么浪漫、魔幻而又真实,她们以自己的行动维护或颠覆传统观念,作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三、正常与变异

女性主义者注意到,温驯与顺从的女性是男性作家肯定、赞赏的,而作风硬朗、行事强悍的女性则成了“阁楼上的疯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威胁性力量。女人被赋予坚韧、怜悯、同情、宽容等美德,这迫使她们只能以家庭为中心,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支柱。然而,福克纳并没有简单地把笔下的女性打造为坚韧型人物,他塑造了更为矛盾复杂的女性形象。

《山上的胜利》中那个大概20岁的女孩同家人守着一块鲜有人迹的地方,这是个穷白人家庭,全家人都光着脚,厨房就是用一块木板搭在一面墙上。家中的老妇人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但没有丝毫表情,脸就像一个用旧的面具。她对于能不能接受陌生人住宿没有决定权,还得询问男主人。这个女人同《干旱的九月》里麦克莱顿的妻子一样,属于温顺型的家庭主妇。但是已经成熟的女儿不经意间成了全家的不稳定因素。青春萌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近与世隔绝的她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了。当一位南方的败军少校索瑟·韦德尔出现时,最终激活了她作为人与女人的基本需求。这个具有法国人与蒙古人血统的混血儿,多看了她两眼,她就死活要随他而去,甚至怂恿少不经事的弟弟也与她一块出走,她的这一举动无疑加速了韦德尔主仆与弟弟的死亡。作为成熟的女孩,她要求离开贫穷的家过上正常的生活,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本属正常,但是用传统眼光来看却是一种变异,因为偏离了传统社会轨道。

其实《干旱的九月》中的米妮又何尝不是对传统的反动,是一种变异行为呢?作为高雅文化的南方代表,高贵、恬静、优雅才是她应有的举止,可是她一

反常态,放声大笑,造谣生事,根本不是南方社会认同或可仿效的楷模。她的反常行为正是作者内心矛盾的结果。

而《花斑马》中的阿姆斯特夫人也一度变异为一个超自然的生命体,她一直坐在停靠在马路中央的大车上,奔突的野马也没有能伤她分毫。

当然《莱巴嫩的玫瑰花》中的露易丝·兰道夫65年来一直生活在南北内战的回忆中,她因为战争从此变异为一个“男人”,一个战士。在一次聚会中,她幻觉般重演了一次当年5个北方士兵闯入她家的情形:她手握一把水果刀,将大部分握在了伸出去的拳头中,平稳地伸出亮闪闪的小刀片,像手握一柄手枪,并对对面的男士说出了时隔65年对北方佬说过的话:“用的是同样的言语,那种船员才讲的辛辣、伶俐而又粗野的污言秽语”。弗吉尼亚(《曾有过这样一位女王》)也因为战争而变异,战争摧毁了她的家园,杀害了她的父亲与丈夫。她孤身一人行走2000英里投奔亲人。这些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战争颠倒了她们的性别和基本行为。娜西萨的行为也很有趣,她为了得到小贝亚德,花了5年时间,这也可算是对传统女性身份的变形。

总之,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发出了有别于南方其他作家的有力的、响亮的又与众不同的声音。通过对文本中女性身体与欲望、与观念,包括身份变异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福克纳有关种族标志、社会身份、社会性别错综复杂的文本中,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方法观照他的短篇小说,不仅能够拓展短篇小说的研究疆域,更可以推演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何况在新身体学崛起的预言早已成现实的今天,^{[4] (P.22)}福克纳精心描写的身体在历史中的尴尬这一类的短篇小说,也是值得好好参研的。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C. Moreland. A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 [C].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 [2] 希·柏拉图. 理想国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 法·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 [A].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4] 英·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想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责任编辑 南山)

是谁将你困在了床上*

——论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周思源

(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 八幕剧《床上的爱丽斯》被视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女士毕生的精神积累。本文发掘剧本创作之原型——詹姆斯家族的史实背景,以身份认同视阈探究主流社会、父亲、兄长所构建的个体认同法则对爱丽斯的麻痹与压制,击垮了她在建构自我身份认同上的意志。

[关键词]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身份认同;反抗意识;自我压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15-03

一、引言

八幕剧《床上的爱丽斯》是苏珊·桑塔格一生惟一部剧作,在为德译本所做的题注中,桑塔格自述道:“我感觉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1] (P.5)}可以说,这部剧作是桑塔格对戏剧献上的忠诚与敬意,动用了她毕生的精神积累。而此剧的创作也体现出了桑塔格历史题材的转向,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降,西方文艺理论由文本化的形式主义研究向文学、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转向。

桑塔格在这部剧作中要描绘的是一个女性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天才、巨大的独创性和进取心,最后成为一个废人的事实。这个命题并非自她而始,伍尔夫早就问过——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妹妹,那将会怎样?而桑塔格的主人公爱丽斯则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爱丽斯·詹姆斯,一个美国杰出家庭中才华横溢的女儿,备受才华的炙烤,生活在她两个出类拔萃的哥哥的压抑之下——大哥威廉·詹姆斯是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二哥亨利·詹姆斯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爱丽斯自19岁起就为抑郁所困,惧怕在现实中成长,她把自己囚禁在病床上,沉浸在与现

实相对的梦境中,最终缠绵病榻多年而终。关于女人必须隐匿自我的才华,桑塔格这样解释:“并非只缘于缺少鼓励而湮没不闻,而是因为女人被社会派定的角色不容她们彰显自我,而且由此导致她们大多也自我认同了这种角色。”^{[1] (PP.1-2)}。

爱丽斯的才华被湮没以及终生所受的抑郁之苦是由她在身份认同上产生的挣扎与彷徨造成的。“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身份选择。在个体与特定文化实现认同的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个体身份认同;而孤立的主流话语权边缘的自我身份认同则强调心理和身体体验,其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欢欣并存的主体体验。“床上的爱丽斯”这个意向本身就“象征着不为男权社会所容纳的、处于边缘化的危险存在。”^{[2] (P.278)}恐怕这正是桑塔格渴望在女性自我认同中实现的反戈一击。

二、“让我睡吧”

1890年的伦敦,爱丽斯卧病在床,她与护士之间

*[收稿日期] 2010-12-20

[作者简介] 周思源(1987-),女,江苏泗洪人,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一次关于起床不起床的争执看似无意义却是贯穿全剧的核心。简短而虚无的对话将爱丽斯羸弱的身体与对现实失去兴趣和希冀的状态清晰地呈现出来。是谁让爱丽斯认定自己没有能力从床上下来？爱丽斯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维多利亚式的陈设暗示着爱丽斯的生活为传统法则所囿——人们公认的女性美德标准是谦卑、自我克制，未出嫁的女子须听从父亲、兄长的意志。“我觉得他喜欢看我躺在床上。”他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在我该在的地方。^[1 I P.4]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这自上而下的监视，其实就是由自己实施的。^[3 I P.191]爱丽斯生活在自我管制的社会压力之下，遵从规范，驯服自己的身体，呆在她该呆的地方。

哈里（即二哥亨利·詹姆斯）前来探访，他对妹妹的无限爱怜之情令人动容，父亲般呵护着她，对话中随处可见“我可怜的小鸭子”、“我亲爱的小兔子”等亲切的昵称。对女性柔弱的称呼实质上是性别权力的一种体现，是一种文化霸权。爱丽斯在这样的霸权运作中实现的身份认同是自我禁锢的。她戴上钩针编织的红色睡帽取悦兄长，在他情绪低落时安慰他：“别忘了我是个女人，安慰男人让他们放心是女人的天职。”^[1 I P.44]这是爱丽斯对兄长的劝慰，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叮咛，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方式，爱丽斯作为协同者建构了自身毁灭性的自我认同。其实她对这样的生存状态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过去的一年间（亨利）出版了《悲剧缪斯》《美国人》^①并写就了一部名为《韦伯特夫人》^②的剧本（哈里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喜剧），这个剧本结合了威廉的《心理学》^③，的确是不错的家庭秀——尤其是如果此时我可以一死了之，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个家庭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了。”^[4 I P.40]在第四幕中，桑塔格安排了一个独特的情节，让哈里把一段爱丽斯去世两年

后自己说过的话在此当面告诉了她：“在某种意义上她悲剧性的健康对于她的人生问题而言恰是惟一的解决途径——因为它正好抑制了对于平等、相互依存云云所感到的哀痛。”^[4 I P.31]这是了解她的兄长对她的一生做出的总结，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兄长的自私。爱丽斯悲剧性的健康不仅解决了她自己的人生问题，更满足了男权话语对女性的限制要求。

三、“让我醒来”

爱丽斯在追寻自我身份认同时经受的精神磨难源于她的才思禀赋，病榻上的她也曾不断反抗着。当护士劝诫爱丽斯不要对抗命运时，爱丽斯挑战之矛随即拔出：“我就想这么干。蔑视命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命运就这么冒犯不得吗？”^[1 I P.6]爱丽斯有一面古董镜，它曾是法国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的化妆镜，因而被赋予更多的“女性气质”，但显然爱丽斯对此一直很抵触，甚至在小偷造访时还不断提醒他把镜子带上。

困于病榻的爱丽斯曾出现过强烈的幻觉：“我看见自己手持匕首——不，是砖头。我看见他的脑浆从脑袋里翻涌而出。他黑色的爱尔兰人的脑浆。”^[1 I P.19]通过层层暗示以及爱丽斯与父亲在书房的对话，读者会发现砖头并不是砖头，而是父亲书架上陈列的“砖头样的厚书”。爱丽斯在意识中杀死的正是自己的父亲，那个对她一视同仁允许她像几个哥哥那样自由使用书房，扮演着重要教育者角色的父亲。既然如此，爱丽斯对他的仇恨又源于何因呢？

在契诃夫的四幕剧《三姊妹》中有这样一次对话：

安德烈：多亏父亲督促，我和姐妹们才学会法文、德文、英文。

玛霞：在这个城里学会3种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甚至还不能算是奢侈，而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好比第6个手指头一样。我们

①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美国人》于1876-1877年连载于《大西洋月刊》，并于1877年首次成书出版，再版时间为1907年，而《悲剧缪斯》于1889-1890年连载于《大西洋月刊》后于1890年首次全书出版。爱丽斯在日记中提到这两本小说于1890年同时出版实为谬误。另，文中多次引自弗里曼所著《亨利·詹姆斯》一书的文字均由笔者自译。

② 据爱丽斯日记记载，该剧为“Madame Webest”，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1890年前后并未有亨利·詹姆斯的相似作品记录，许是该作后来没有出版。

③ 爱丽斯日记中提及的《心理学》都应为《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s, 1890），该书出版两年之后，即1982年，威廉·詹姆斯又出版了《心理学》简易版（Psychology, Briefer Course, 1892）。

学会许多多余的东西。^①

兄妹二人对学会了3种语言的态度截然相反,兄长感谢父亲,因为教育让他受益匪浅;而妹妹却没有同等机会彰显才华,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爱丽斯拥有的才思禀赋也是这样的“六指”,在男权社会,聪颖的本性使她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爱丽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比兄长们更为卓越机敏的思维。两位兄长在主观与客观方面都具备写作的条件。“无法写作会让人衰退凋零,威廉就是以一种久旱逢甘露的状态撰写着自己的《心理学》;而同时,亨利从事写作的欲望也正是源于‘释放自我’的目的”(4 I P.54)。但是爱丽斯远没有那么幸运,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苏珊·格巴的观点:在19世纪,妇女作家们对自己那种操纵笔的欲望感到一种僭越的恐惧,她们试图用种种写作策略来缓解这种欲望。^[5 I P.165]爱丽斯同样渴望写作,同时又对这一欲望倍感恐慌,于是创造出的一套缓解欲望的写作策略:“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十年卧床不起,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间悄悄地记起了日记,她用戏谑的文笔记录着自己得以延续的生命和自己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关于爱尔兰的观点,以及自己在亨利涉足戏剧界的写作之路中所起到的替代作用。”(4 I P.46)日记暂时缓解了她内心的冲击,然而写作过程同样也是探寻隐匿在身体里真实自我的过程,这又加剧了爱丽斯的痛苦,她一方面在通过不为人知的写作释放自己,一方面又在极力地控制已经释放或即将迸发的自由,这是一场与自我对决的最残酷的博弈。爱丽斯的密友凯瑟琳·劳里在她死后追忆道:“三月四日,写作的念头在她的思想里萦绕了一整天,尽管她已经非常虚弱,而写作又需要穷尽她的气力,她仍然无法让思绪平静,直到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4 I P.56)然而,爱丽斯的写作是消极的,思想被记录却没有得到认可和传承,更没有在社会舞台上产生丝毫的效应。爱丽斯去世后,凯瑟琳按照爱丽斯的愿望将她的日记给威廉和亨利兄弟各送去一份,但他们都拒绝阅读。凯瑟琳回忆说:“他(威廉)并不感谢我给他送去日记,仅仅回复说收到了,当然也没有给出任何

评价,甚至没有提及他是否已经读过;而亨利甚至直接销毁了日记,他认为此举太过轻率。”(4 I P.58)

爱丽斯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悄悄写作,以此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然而这样的勇气仅仅存在于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回到现实,面对兄长、父亲,她仍旧只能怯懦地偎在一大堆被褥底下,用病痛麻痹自己,封闭走下床的意念。

四、结语

“让我睡吧。让我醒来。让我睡吧。”(1 I P.132)这样的结局令人压抑,爱丽斯终归还是做回了床上的爱丽斯,直到生命终结。全剧自床上始,以床上终,这不是爱丽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西方妇女社会地位与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桑塔格是一名解放者,同时也是一名监护者,她却始终无法为爱丽斯找到出路,只得心痛地为剧本画上句号。妇女距离真正的平等和解放确实很近了吗?写于20世纪末的《床上的爱丽斯》似乎正是要对此做一个脚注。伍尔夫坚持争取的那个房间,跨越了七十几年,却变成了爱丽斯自困其中的一张床,无法实现女性自我认同的绝望感充斥着整部剧作,现实在爱丽斯的心里结成了枷锁,是谁将她困在了床上?是社会、父兄和她自己!

[参考文献]

- [1] [美]桑塔格·苏珊. 床上的爱丽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2] 王予霞. 苏珊·桑塔格纵论[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3] Ramazanoglu, C. Up against Foucault[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4] [美]弗里曼·亨利·詹姆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5]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南山)

^① 安德烈(Andrey)为普罗罗罗夫一家三姊妹的兄长,玛霞(Masha)为三姊妹中的二姐。该引文引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18443/>。

背叛下的创伤情结*

——品特《归家》分析

肖 婷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教院, 江苏南京 211168)

[摘要] 品特的许多作品都隐含了他对创伤精神内涵的思考。品特戏剧人物的创伤记忆来自二战这段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历史。品特从当今所有暴行中都看到了它的影子。战争创伤对品特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和人类关系内在性的感悟,是对各种恐惧和威胁的体会和感觉,它使得品特迷恋于背叛、折磨、权利争斗等心理现象。

[关键词] 品特;《归家》;创伤文学;创伤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18-03

哈罗德·品特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他所形成的“品特式的风格”(Pinteresque)、“威胁喜剧”(Comedy of Menace)和“记忆戏剧”(Memory Play)已成为戏剧词典的重要术语。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威胁喜剧”到70年代的“记忆戏剧”和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剧”,品特风格一直是在不停演绎变化。品特戏剧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威胁、暴力和迫害,这在他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品特创作的一些作品,如《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7)、《升降机》(The Dumb Waiter 1957)、《情人》(The Lover 1963)、《归家》(The Homecoming 1965)、《尘归尘》(Ashes to Ashes 1996)等都隐喻了不同程度上的创伤。创伤确实是品特戏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主题。品特戏剧中创伤经历所带来的无名威胁的忧虑和恐惧感是无所不在的。创伤最初是源于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随着对创伤理论认识的深入,创伤文学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起来。对于品特戏剧中创伤这一主题的研究,尽管没有专门的论著,可是创伤主题却分散并隐喻在其他个别的研究中。比林顿《哈罗德·品特的一生与作

品》(The Life and Work of Harold Pinter 1997)、艾斯林《哈罗德·品特的残酷戏剧》(Harold Pinter's Theatre of Cruelty 1991)、拉莱特《哈罗德·品特的温室:一个大屠杀的寓言》(Harold Pinter's The Hothouse: A Parable of the Holocaust 1993)和格莱姆斯《哈罗德·品特的政治:回音背后的沉默》(Harold Pinter's Politics: A Silence Beyond Echo 2005)等论者皆从品特生平及政治经历等角度解读品特戏剧,指出品特许多作品的灵感源自某个具体事件或某种记忆之启迪,身为犹太人的个人经历和对战争的反感都得以阐释他戏剧人物遭受的历史创伤,特别是二战中纳粹迫害带来的心灵伤痛。一些学者也分别从女性主义研究、后现代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角度解读了品特作品中的创伤情结。因此,分析品特戏剧中的创伤主题,不仅可以发掘战后戏剧不同以往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再次认识品特戏剧的独特的艺术和思想特征。本文对于品特戏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这一主题方面。品特对戏剧的理解有别于当代大多数英国剧作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旨在从作家与文本关系的角度为切入

*[收稿日期] 2010-12-30

[作者简介] 肖婷(1983-),女,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教院助教。

点,以《归家》剧本为例,对品特中期作品中所隐喻的个人创伤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品特戏剧人物独特的“创伤”的精神内涵。

一、品特作品中的创伤情结

品特出生在英国伦敦东区,是一位犹太裔裁缝的独生子,祖辈是来自葡萄牙的犹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品特深受反犹太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所生活的东区街道是各地流亡犹太难民的聚居地。新旧难民之间,犹太人与其他种族穷人之间的激烈争斗,使得该地区成为“一种充满血腥气的政治战场”。毫无疑问这对品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里隐约批判了反犹太人思潮。此外二战期间,品特曾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投下的炸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恐怖情景,这在他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战争精神创伤。战争创伤对品特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和人类关系内在性的感悟,是对各种恐惧和威胁的体会和感觉。因此品特作品中最重要一个主题就是威胁、暴力、迫害和背叛,这在他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品特创作的一些作品,如《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7)、《升降机》(The Dumb Waiter 1957)、《情人》(The Lover 1963)、《归家》(The Homecoming 1965)、《尘归尘》(Ashes to Ashes 1996)等都隐喻了不同程度上的创伤。作品往往表现出来的是现代人的无助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孤独和隔膜。“房间”作为品特戏剧的一个重要意象,标志着一个安全、可以认知的世界,而“房间”以外却是一个不可知,充满恐怖和威胁的世界,因此构成了对“房间”以内的人的威胁。虽然品特的作品中没有对战争很直白的描述,但其实他骨子里的政治倾向和态度是非常明显、强烈的。在他极具个人色彩的戏剧世界背后,毕竟还是隐藏了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比如,权力的争夺、生存空间的争夺、人类的残酷和恐怖等。尤其重要的是,每当品特提起这些话题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在二战和法西斯时期的某些事件和瞬间。可以说,正是他个人的创伤经历以及战后整个政治形势使品特形成了对一切人类关系中强与弱不公平关系的愤怒情绪。就二战前后这段经历对品特的影响而言,它使品特迷恋于背叛、权力和折磨等心理现象。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大屠杀现象探索的兴趣上。无论是早期的“威胁喜剧”还是后来的“政治剧”,它们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要弄清各种纳粹式刽子手们和虐待狂在实施迫害时的心态。这些

威胁和迫害的主题不仅将品特对纳粹年代的恐怖记忆与现代政治形式联系起来,而且,也将他早期的威胁喜剧和后期的政治剧连在了一起。

品特在表现其戏剧人物“创伤”的精神内涵时,总将他们外化为暴力、两性问题等画面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品特创作中期,其作品中彰显出的创伤意识更上升到了一个现实的层面。品特早期创作中晦涩难懂的部分也越来越清晰鲜活起来。家,在品特中期创作中是一个时常出现的主题,家永远是一片经历了创伤洗礼后的荒原。品特对于家庭关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亲情和婚姻。品特笔下的家庭关系集中体现在两性关系和亲情关系上,而品特对这种纽带关系表现出的则是悲观的情绪。品特的笔下没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大多数的家庭是瓦解的、扭曲的、混乱的。品特的中期作品比如《归家》就赤裸裸地向观众展现了家庭生活扭曲的一面。

二、《归家》——一片创伤的荒原

《归家》展现了这样一种家庭关系:母亲杰西去世后,父亲马克斯和他的3个儿子泰迪、兰尼、乔伊以及马克斯的胞弟山姆组成了一个男人的家庭。大儿子泰迪离开家很多年后,某天带着他的妻子露丝回到了家中。露丝的到来把原本这个已经扭曲的家庭关系又扩大化了。婚姻的背叛和亲情的丧失赤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戏剧的高潮也就是戏剧的结尾以露丝抛弃丈夫泰迪,同意留在家里做马克斯他们的情妇收尾。休伊斯对这样的家庭关系评论说:“毫无疑问《归家》里家庭成员之间表现出了极端的斤斤计较和残酷。但这种残酷本质并不是邪恶引起的,而是一种绝望。”^[1]因此人物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战后瓦解的家庭带来的创伤。

《归家》中的创伤主要体现在3种人物关系中: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战争打破了正常家庭的格局,创伤遍地,道德沦丧,背叛弥漫。首先,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就让人窒息。在《归家》中,父亲马克斯和他的儿子关系并不和睦,甚至到了彼此敌视的地步。妻子杰西虽然去世,但杰西生前对婚姻的背叛动摇了马克斯在家庭中的男性权威,所以他始终依靠着他的拐杖作为维护其男性权威的武器,以便掩盖他的个人创伤。马克斯的这种创伤反过来也导致了他对儿子言语的暴力:“去找你妈去”^[2 I P. 16]“别喊我爸”^[2 I P. 17]。这种扭曲的父子亲情随着离家6年的大儿子泰迪偕同妻

子露丝的到来而变得激烈起来。马克斯见到儿子和儿媳的第一面就吼道：“这混蛋我6年没见了，一声招呼没打他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马路上肮脏的东西，还居然在我屋子里同居了！”^{[2] P.42}马克斯对露丝奇怪的态度也不难理解。妻子生前的背叛，使得他现在看所有的女人都像看杰西一样。马克斯甚至毫不顾忌儿子的感受，喊露丝是妓女。马克斯和泰迪之间的关系表明传统的血缘亲情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家的概念沦为“居住的场所，并非血缘的维系”^{[3] P.146}。创伤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个家里，就像杰西的鬼魂一样挥之不去。房间，作为品特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意象，现在成为了马克斯一家逃避创伤的生存空间。每个人的内心其实渴望爱，但都选择了逃避爱。泰迪选择了逃往美国6年6年后回来想寻回失落的爱时却发现家庭成员已经把他视作外来者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一样糟糕。马克斯和弟弟山姆的关系，泰迪、兰尼和乔伊三兄弟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和谐的关系。上一辈的创伤遗留到了这辈，正如贝格立所说：“这部剧展现了创伤对男性后代之间本应有的兄弟友爱的影响。乔伊感情上发育不良并且自恋，泰迪无用并且被剥夺了一切，兰尼有严重的精神性欲紊乱。父亲则成为这一系列错乱的根源。”^{[4] P.74}第3种破裂的家庭关系是夫妻关系。笼罩在创伤下的战后家庭同时也弥漫着背叛、折磨、权利争夺等品特感兴趣的话题，这种背景下两性道德意识的沦丧注定了婚姻关系的肢解。杰西的出轨注定了马克斯婚姻的失败，马克斯也因为杰西的背叛而常年遭受着精神创伤的折磨，对于他而言，生活仅仅是“一个残缺的家庭，3个杂种儿子，一个荡妇般的妻子”^{[2] P.47}。夫妻间这种沟通的缺失也同样在泰迪和露丝婚姻中重演。通过夫妻间的对话，观众不难发现两人的思想和感受已相差甚远。泰迪和露丝刚进家门那会儿，露丝两次说她疲惫，泰迪似乎完全没理会露丝的感受，隔了一会儿才突然

问“你累了吗”^{[2] P.21}，露丝这时回答说“我不累”，泰迪却说“去睡觉，我告诉你哪个房间”^{[2] P.22}。此类夫妻的对白在《归家》中还有很多处，夫妻间这种冷漠和游离的对话充分表明了婚姻关系中沟通的缺失。难怪在被问及他们美国生活的时候，泰迪和露丝的态度截然不同，泰迪口中的理想生活在露丝的嘴里确是“沙子”“害虫”，全然一片艾略特式的荒原。战争带来的不仅是传统家庭的颠覆，更给人类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痕，缔造了战后家庭式的荒原。

三、结语

《归家》以及品特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品特的创伤情结。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噩梦，残暴无情，品特所有作品的时间都是“现在”，这正是品特的感悟，因为他从当今社会一切的暴行中看到了历史的影子。不管是二战还是当今的一切暴行，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战争创伤对品特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对社会和人类关系内在性的感悟，是对所有恐惧和威胁的体会和感觉。品特以他独具魅力的戏剧形式向观众讲述了这样一种情结，他的戏剧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Hewes ,Henry. Probing Pinter's Play[J]. Sunder Review ,1967(8).
- [2]Pinter ,Harold. The Homecoming[M]. London :Eyre Methuen Ltd. ,1965.
- [3]Gale ,Steven H. ,comp. Critical Essays on Harold Pinter[M]. Boston :G. K. Hall ,1990.
- [4]Begley ,Varun. Harold Pinter and the Twilight of Modernism[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责任编辑 南山)

元语用意识下英汉话语标记语对比*

——一项基于有声思维法的个案研究

罗桂秀 郭纯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摘要] 话语标记语在话语生成和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有声思维方法采集了中英两位大学生在完成看图说话并写作这一多项任务时的口语材料,从元语用意识角度对比分析了英汉话语标记语在看图说话中的使用频率和种类,并指出产生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

[关键词] 元语用意识; 话语标记语; 看图说话; 有声思维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21-04

一、引言

Schiffrin认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 缩写DM)是“依存于前言后语,划分说话单位的界标”^[1](P.31)]它们往往出现在句首,或两个句子中间,或用作插入语。话语标记语是对前面话语的一种回应或延续^[2](PP.87-88)]如英语中的“well”和汉语中的“嗯”等都属于话语标记语。

Verschuere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受交际目的支配,人们有意识、有意义地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的意识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这种有关语言使用的反射意识,称为“元语用意识”^[3](PP.187-189)]。话语标记是标示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的一种语言手段。周彪,朱海玉分析了话语标记语的使用动因和元语用功能,并指出元语用意识本质上是种心智意识,话语标记是元语用意识语境顺应的结果。^[4]本文试图采用有声思维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并从元语用意识的角度对比分析英汉话语标记语在看图说话任务中的使用情况。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比两位中英大学生的看图说话语篇中的话语标记语,旨在回答下面3个问题:

其一,中英两位大学生在看图说话任务中使用话语标记语的频率是否有显著差异;

其二,中英两位大学生在看图说话任务中使用话语标记语的种类是否有显著差异;

其三,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2. 研究步骤。

(1)话语标记的分类。

美国学者Fraser将话语标记语分为对比性标记语、阐发性标记语、推导性标记语和主题变化标记语。^[5](PP.167-190)]王立非、祝卫华将话语标记语划分为两大类:一是逻辑连接标记语,二是填充标记语。其中又细分为15小类。^[6]笔者综合参考了Fraser、王立非和祝卫华的分类,把本研究中的话语标记语分为语流性、阐述性、推论性和时间性四类话语标记语。

(2)数据收集。

本项个案研究过程中,笔者采用有声思维方法采集语料数据。所谓有声思维,就是受试者在完成某项任务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大声讲出头脑里的各种信息。理想的有声思维,是受试者一刻不停地说出自己在完成特定任务时进出大脑的任何信息。^[7](P.1)]笔者首先确定了测试材料,一个由8幅小图组成的图画故事。两位被试分别是以汉语为母语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汉英句法与语义界面的认知对比研究”(项目编号:10YYB010)。

[收稿日期]2011-03-20

[作者简介]罗桂秀(1980-),女,广西来宾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郭纯洁(1965-),男,安徽临泉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的中国男性大二学生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男性大三留学生。研究要求被试在完成看图写作的同时,大声说出头脑出现的任何想法和信息,尽量做到少停顿,不沉默。笔者对这一过程进行观察并录音,最后将两位被试的录音转述成文本材料,并对此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两位被试录音时间总长分别为:英语(8'11")其中停顿时间为(8"),占 totalTime 1.63%。汉语(16'19"),其中停顿时间为(12"),占 totalTime 1.23%。两组数据符合有声思维法的要求,即沉默或停顿时间不能超过总时间的10%,所以两组数据是有效的。

笔者把录音转述材料中出现的话语标记语分为语流性、阐述性、推论性和时间性四类,然后采用 Word 替换功能,分别提取和统计了录音转述材料中英汉语话语标记语。从表1中可以得知,英汉语话语标记语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汉语话语标记语的形式比较多样,特别是推论性。

表1 本研究中出现的英汉语话语标记语

DM 类别	英语话语标记语	汉语话语标记语
语流性	En, ah, oh, ok	恩,啊
阐述性	and, but, you know, you look	想起,我想说的是
推论性	what, so,	噢,不知,我看,对,应该,感觉,好像
时间性	Now, the next, second, soon	先,紧接,最后,然后,还有,突然

表2是本研究中英汉各类话语标记语出现频率及所占比重。经对比,不难发现,英汉语流性、推论性话语比重相当,但是在阐述性、时间性上差异较大。

表2 本研究中英汉各类话语标记语出现频率及比重

DM 类别	英语频率及比重	汉语频率及比重
语流性	32(36.78%)	88(39.64%)
阐述性	30(34.48%)	4(1.8%)
推论性	17(19.54%)	46(20.72%)
时间性	8(9.2%)	84(37.84%)
合计	87次(100%)	222次(100%)

笔者通过 Excel 将原始具体数据转化成柱状图,可以清晰看见英汉各类话语标记语的出现频率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在此项看图说话任务中,我们可以从图1看出:第一,英汉语流性话语标记语使用频率较高,且相差不大;第二,英汉推论性话语标记语使用频率基本一致;第三,汉语时间性标记语使用频率很高,而较少使用阐述性话语标记语,而英语阐述性

话语标记语使用频率高,而时间性话语标记语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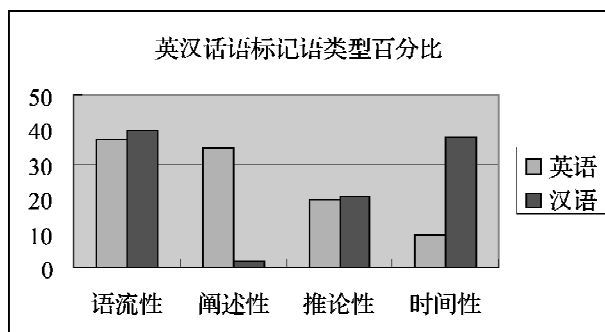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中英汉语话语标记语类型百分比

英语语流性、阐述性、推论性和时间性4种话语标记语使用频率各不相同。其中,各个标记语的使用频率也有不同。图2是英语话语标记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数值表示该话语标记语出现的次数。其中,阐述性标记语“and”使用频率最高,出现了23次。推论性标记语“so”和语流性标记语“ah”出现次数也很多。时间性标记语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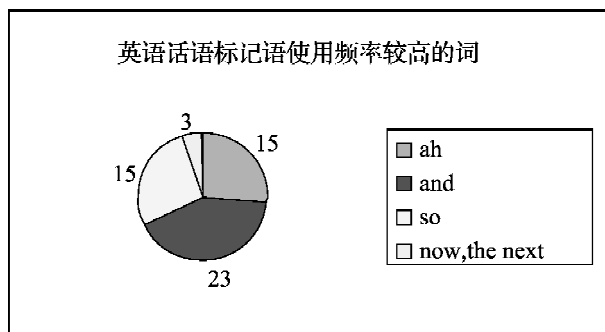


图2 本研究中英语话语标记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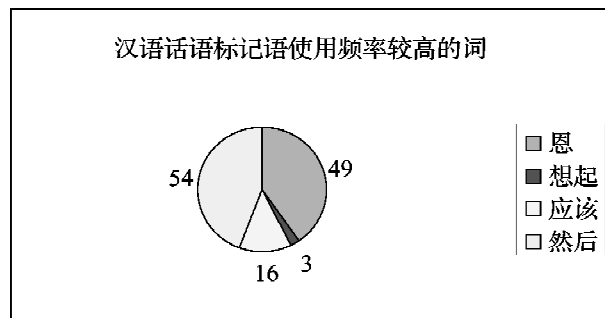


图3 汉语标记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

图3是汉语标记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其中,时间性标记语“然后”的使用频率最高,而阐述性标记语“想起”使用最少,仅有3次。语流性话语标记语“恩”出现次数也很多。推论性话语标记语“应该”出现了16次。

四、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意识功能分析

1. 语流性话语标记语。

语流性标记语主要出现在句子开头或中间。在说话过程中,为了避免过长时间的停顿,人们有意识地使用一些没有任何概念意义的词语来控制语速或填充语流空白,表明或暗示自己想说的东西还没想好。

(1) 'En, after he finished it, after he finished it, he decides to have a little lunch and he's eating the fish bones. En, the next picture, ah, in the next picture they all decide to go somewhere ..."

例(1)中“en, ah”出现在句首,而且句中有重复语句“after he finished it”和“the next picture”,表明被试此刻正在使用话语标记语来延缓时间,积极调整思维方式,尝试解读图画内容,同时句中的重复也表明了被试对图画内容的不确定性。

(2) '恩,恩,晴天,不知道是不是晴的。反正就是,恩,一个池塘,恩,一个池塘里面有三只(写字沙沙声)一个池塘,三只鹅,暂且称它为鹅吧,实在也搞不清楚,然后他们在,他们在捕鱼。恩,这个鱼,青草鲢鳙,淡水四大家反正也没啥关系,它们在捕鱼。”

例(2)中“恩”就出现了5次,表明被试正在尝试将图画内容与自身原有知识相联系,解读图画信息,使用话语标记语“恩”增加了被试思考的时间,更好地组织话语内容。

2. 阐述性话语标记语。

这类标记语主要是用来标示说话态度或认知状态的元语用意识。也就是说,把存在于说话人意识中的对命题内容的情感、思想、态度或认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引起说话人注意,提醒对方或强调自己的观点。

(3) 'you look, I'm talking about but I can't write at the same time. I really can not. oh, second picture is some a dog has been chasing a cat, a bird above the tree...but I can't do the two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You understand? I can not. (a phone ringing) ah. What I can do is I can read when I write, but I can't do two different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

被试用“you look”和“you understand?”提醒或暗示笔者,表明这个有声思维任务难度很大,边看边说边写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后还用了“but”和“really”来

加强这种语气和态度。

(4) '啊!我想说的是,我在写的时候一般不会想别的,只想着这句话,想把它快点写完,所以脑子没什么想法就暂且不说了。”

例(4)中“我想说的是”表明被试此刻觉得边说边写很难,所以不自觉地忘记了说,但是他又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说,向笔者解释的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这个任务难度的判断。

3. 推论性话语标记语。

这类话语标记语的功能是表明说话人对事情的判断或评价,体现说话人对前面话语内容的理解或确认的元语用意识,从而为后面话语内容提供一定的理据性。

(5) 'When they finish eating, and the fox entertain them with a few tricks that he learned from the bird because he was working in the circus so (smile) he can do some little tricks.

被试一开始就认为是小动物在聚会,整个故事只能继续围绕聚会展开,所以用“so”肯定自己的推断,他认为狐狸会表演杂技是因为他曾经在杂技团学过,从而为下文故事情节开展提供根据。

(6) '这个时候呢,树上有一只猫,然后,它嘴里叼着个骨头,对,先写下来,恩,狼叼着鱼,恩(语气兴奋)不对,应该是狗,对,应该是狗!狗发现,然后狗向前小跑了几步,发现树上有只猫,它嘴里叼着根骨头,啊,对,后面应该是他们交换骨头的过程,然后中、其中还出来了个中介。”

被试用了3个“应该”来推测自己对图画的解读是否正确,一开始他认为是狼叼着鱼,后来发现是狗,用“对”或“不对”来帮助自己理解图画内容,充分体现了被试的元语用意识的参与和调控作用。

4. 时间性话语标记语。

主要是用来表示时间或事件发生次序的。表明说话人对整个事件本身的时间逻辑顺序的认可,标示了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系,反映了说话人在建构前后话语时的元语用意识。

(7) 'Now we have other animals. all sharing food, all sharing food, having a good time and talking about the vocation plans. "

被试以为小鸟送鱼给小狗,然后小狗去找朋友小猫一起分享鱼,小猫很感激,从树上下来了,但是下幅图画里又出现了狐狸和小鸟,为了使故事情合理,被试使用“now”连接来肯定自己前面对图画的

描述,同时引出后文。

(8) 恩,共八幅。池塘和狼。然后第二幅还有猫,然后狗、狗猫狼。不知道。然后,猫把什么东西丢下来,狼想着。恩,然后,还有,然后猫又拿骨头去换鱼。恩,后面又出来个狐狸什么东西,然后想个天平。恩,还有小鸟,我看,狗、猫去吃鱼,狗去吃骨头。然后,最后,噢,这个什么意思?第七幅图有点不懂,然后又返回第八幅,再返回刚才那个池塘,什么东西逃走了只露尻尾。对。然后开始写吧。”

被试一拿到图画,就连续使用多个“然后”来描述自己对整个图画故事梗概的初步印象,帮助他对整个事件进行有序梳理,加深对图画内容的理解。

5. 造成差异的原因。

通过以上4种不同英汉话语标记语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英汉话语标记语的功能差别不大,只是英语话语标记语中阐述性标记语使用较多,但时间性标记语使用很少。而汉语标记语中则不同,出现了大量时间性话语标记,而阐发性标记语很少。究其原因,可能跟英汉社会文化和语言思维模式有关系。

(9) When they finish eating, and the fox entertain them with a few tricks that he learned from the bird because he was working in the circus so (smile) he can do some little tricks. The other animals are watching his show and when the show is finished they applaud the fox for the nice show. And after the nice show was over, they all decide to go somewhere for desert, ah, ah because the fish did not really make them fed up. They still want some ice-cream. Ah, so they all leave for the desert.”

母语为英语的被试一开始就把图画看成是动物们在开一个聚会,以为小狗打算邀请小猫下树来分享食物,这跟国外经常开聚会的社交习俗相关。他用了“he”指代小狗;“she”指代小猫。他认为狐狸出现是给小狗和小猫做了个幻灯表演,然后其他人加入进来,最后小鸟飞回池塘继续工作,而其他动物则是因为吃不饱而继续找点心吃。这个故事被解读得合乎英美国家的人们生活习惯和逻辑,而且他认为狐狸给大家表演杂技节目,是因为狐狸曾经在杂技团学过。

母语为汉语的被试在口语表达中凸显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出现了南京方言口音3次;“小鸟”“打酱油”“傻妞”;出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词汇“只露尻尾”“青草鲢鳙”“淡水四大家”和古诗“鹅”。被试通过话语标记语,体现了自己的元语用意识,而这些意识又跟中国文化背景有很大关联。最突出的地方如

例10:

(10) 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讲故事,一个笨媳妇在那做面,先是把面和稀了再加面粉,面粉然后又太硬了之后又加水,结果,弄弄弄,整了一大团,啊,估计这个,狐狸,跟[狐狸的想法]有点像,啃啃鱼再啃啃骨头,啃骨头,每次都一样,然后就持续地啃,直到把两边都啃完,太聪明了。”

这段话由“啊”引出,表明被试将自己的背景知识和图画信息联系起来,终于了解图画要表达的意思,读懂了图画蕴含的意义。在故事结尾,被试还做了个小结:“一般这种故事不是都应该有什么意义?恩,想一下啊,不要轻信中间商。然后,恩……三只鹅?对三只鹅有什么教育意义,好像也没啥啊。狐狸太聪明又不是它的错”。被试认为只要是寓言都会有寓意,与被试在学校的写作要求和经验有很大关系。

五、结论

本个案研究发现,在此项看图说话任务的个案研究中,英汉话语标记语在语流性和推论性使用中差别较大,而在时间性和阐述性两类的使用中有较大差异。其中,英语“and”是高频词,而汉语“然后”出现次数最多。英汉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不是一一对应的。但是英汉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功能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而这种元语用意识又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可以扩大到更大样本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进一步研究英汉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

[参考文献]

- [1] Schiffrin, D. Discourse Mark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4] 周彪, 朱海玉. 元语用意识下的话语标记语分析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 [5] Fraser, B. Pragmatic markers [J]. Pragmatics, 1996(6).
- [6] 王立非, 祝卫华.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研究 [J]. 外语研究, 2005(3).
- [7] 郭纯洁. 有声思维法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南山)

英语广播新闻话语中的末尾加重句式初探*

洪晓丽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新闻话语是英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变体。众多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作过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末尾加重这一句法结构入手,通过真实语料分析新闻话语中这种结构是如何为简短精练的内容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的。由此引导学生重视英语广播中的句式特点,训练他们收听英语广播新闻节目的技巧,达到加强听力理解的能力。因此,研究这一特殊语法现象不仅有助于揭示英语广播新闻的语言特征,并能为英语教与学提供有效线索。

[关键词] 英语新闻广播; 末尾加重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25-03

新闻话语是英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变体。对新闻广播话语的分析一直都是众多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等都会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其在不同领域的作用。目前国内众多学者分别从新闻话语的词汇、句法、修辞、语义、语用、语篇的宏观、微观结构以及题材、写作手法、导语、标题等不同方面将广播新闻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文从末尾加重这一语法特点的角度描述、分析英语广播新闻话语。如果能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重视英语广播中的句式特点,将有利于培养他们听英语新闻节目的技巧,加强听力理解的能力。因此,研究这一特殊语法现象不仅有助于揭示英语广播新闻的语言特征,也能为英语教与学提供有效线索。

一、广播新闻话语

新闻报道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众学者对于新闻的理解较为一致。其中王佐良等认为“新闻报道文体指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工具在信息报道中使用的文体”^{[1] P. 244},那么其中报道的内容就是新闻话语了。《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新闻定义为“新的或新鲜的信息;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报道”^{[2] P. 758}。李悦娥等将话语定义为“话语是语义和语用上连贯的,用来实现一定的

交际目的的一种交际行为的体现,它既可以是书面体也可以是口语体。^{[3] P. 163}新闻话语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包含了话语应有的特征:新闻话语在语义和语用上都是非常连贯的,该话语是一种交际形式,而且这种交际是发生在广播电台和听众之间的一种动态的过程,该话语同时具有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的特点,这也正是广播新闻话语的独特之处。^{[3] P. 164}

二、末尾焦点和末尾加重

在新闻话语的多个特点之中,句式特点也属其一。伦道夫·夸克认为有两个因素对决定英语的句子用某一特定的词序而不用另一种词序来表达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种是倾向把新信息置于句子的末尾——末尾焦点的原则;另一种是倾向把比较复杂的部分置于句子的末尾——末尾加重的原则,通常这两条原则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虽然国内学者对于这两条原则的译法不尽相同,但所指内容大体一致。^{[4] P. 411}黄国文认为语言的线性表现这一特点决定了发话者在传递信息时必须考虑语言结构的排列。^{[5] PP. 64-70}句内成分的排列受一定规则的制约,其中就要考虑句末中心和句末重心。句末重心指的是在排列句子成分时,把重的成分置于接近句末的地方。利奇和斯瓦特维克把他解释为:“一个成分的轻重即该成分的长度(所含音节的多少)或其语法复杂

*[收稿日期] 2011-02-13

[作者简介] 洪晓丽(1976-),女,江苏淮安人,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

性(修饰语多少)。句中较重的部分应置于接近句末的地方,否则句子听上去不自然、不平衡。章振邦也指出英语中使用后置这一语法手段时,支配英语次序有两条重要原则(1)句尾焦点,即句子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单位,通常是由“旧信息或已知信息+新信息”构成。新信息是信息传递的重点,在句中通常由谓语表示,而新信息的最关键部分由通常出现在句尾,这就是信息焦点又叫句尾焦点(2)句尾中心——从句子结构看,主语作为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在结构上通常较短、较简单。而谓语,作为信息传递的着重点,则通常较长、较复杂,这种句构特征叫“句尾中心”。根据句尾中心这一原则,我们在造句时要注意句子结构匀称,避免头重脚轻的现象,比如一个句子通常不以单一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如:He smokes cigarettes. 要比 He smokes. 更自然、匀称。[6 I PP. 698-699]

三、末尾加重原则在英语新闻广播话语中的具体体现

黄国文认为:末尾加重原则所谓“重”的成分,在不同场合体现为不同的内容。[5 I PP. 69-70]例如:副词比名词“重”,短语比单词“重”,介词短语比名词短语“重”,音节较多的也“重”于音节较少的,单词数较多的“重”于单词数较少的成分,结构复杂的也通常较结构简单的成分“重”。我们可以此规则来安排句子结构、排列句子成分,避免句子成分排列不当造成的不平衡。李悦娥等对广播新闻话语的句法特点作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每个新闻话语平均使用7.3个句子;简单句略少于复杂句;陈述句占绝对优势。[3 I PP. 173-175]英语新闻报道的句子种类大体上是陈述句,偶尔会用问句、祈使句、感叹句。语句中的成分基本按照主语—谓语—补足语的顺序排列。在这些成分中状语的位置多数在句末,除了要突出某个信息时会将其置于句首。[7 I PP. 275-276]一般来说,英语单句的焦点在句子的尾部,而且通常末尾焦点和末尾加重原则在句尾同时体现。但是由于语体的需要或语句内各部分内容安排的需要,在一些情况下会着重强调末尾加重原则。例如在复合句中,由于主从句在句法功能上的不等和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从句要为主句提供背景信息,是主句信息的陪衬。分句的从属地位往往使它在句子信息地位居于次要。所以复合句的信息中心在主句。[8]

在新闻广播话语中有很多应用末尾加重原则的例子,这一原则在新闻英语中应用较多的有以下几种^[9 I 10]:

1. 用“it”作先行词,将较长的分句、不定式、动名词等后移。

It's reported that he had won executive clemency and would soon be set free.

The economists say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relationship, good or bad, between aid and economic growth.

2. 名词词组后置修饰语实现末尾加重。

The Japanese has promised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a special loan of almost a quarter-of-a-billion American dollars along with a commodity loan worth about 200 million.

A party of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officials left Tokyo today to resume talks in Beijing on concluding a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with China.

3. 将复杂的说明、补充等作为同位语置于句末。

Scientists wondered if feedback could be used for a more serious purpose: to control body activities to improve health.

The one person or persons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seriously wounding a woman in the city of Fredericksburg, Virginia, about 80 kilometers from Washington.

4. 用分词独立结构将信息重心后移。

Taiwan expressed regret over the communiqué saying it does not recognize such an accord that involves its interests.

A dozen children, some in native costume, from Asia, Europe,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brought flowers up toward the central altar, placing them near a statue, depicting baby Jesus as a choir of adults and youths sang hymns.

四、尾重句式在听力教学中的作用

VOA和BBC新闻节目是英语专业学生练习听力的重要资料来源。其中常速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可能用到的词汇量约为90,000个,每分钟播讲的单词有135个之多;不但出现连读,而且出现同化、省略等特殊语音现象;不少节目由多人播出,并穿插一些来自现场的录音报道,有时南腔北调语音较多,所以对于母语为非英语的人来说听起来难度较大。刘润清曾指出:听力理解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听者要充分利用所有掌握的语言和非语言知识,包括各种背景知识,对外界输入的语音材料进行加工、处理、达到理解说话者的意图。[11 I P. 137]在听英语广播新闻时要利用的知识更是多不胜数。从上文对末尾加重句式(下转第136页)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与原则*

陈晓姿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在新课程改革实施10年多的时间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作为新课标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已经对语文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开发利用课堂教学资源更好地推进语文教学的效果却不太尽如人意。语文教师对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深刻、开发利用原则把握不清是其重要的原因。通过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4条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实施的基本理念为基础,充分论述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一般性原则,以期对广大语文教师更好地进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所裨益。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 基本理念; 意义; 原则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27-07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是指能够进入语文课堂,针对学生进行语文学科课堂学习心理特点,围绕语文教学整体目标和课堂教学目标、为语文课堂教学的开展提供各种支持的因素来源。丰富多样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是语文课堂教学实施的条件,也是达成语文课堂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在新课程改革实施10年多的时间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作为新课标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已经对语文课堂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开发利用课堂教学资源更好地推进语文教学的效果却不太尽如人意。在很大程度上,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还只是教师的偶发行为,还只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补充形式出现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并没有将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贯穿于语文课堂教学的始终,没有使之融合为语文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文教师对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深刻、开发利用原则把握不清是其重要的原因。本文旨在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提出的4条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实施的基本

理念为基础,充分论述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以期对广大语文教师更好地进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所裨益。

一、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

《标准》是语文课程实施的准则,它提出的4条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实施的基本理念,既体现了社会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出发点。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既是语文新课程改革基本要求的要求,同时也为语文新课程基本理念的贯彻执行创造了条件。

1. 为落实双“全”培养目标提供资源支持。

《标准》开篇便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1]第一次明确提出“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目标理念,并把它置于4条基本理念之首。要完成

*[基金项目] 2009年度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课程背景下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价值探究”(项目编号 09SJD880021)。

[收稿日期] 2011-01-17

[作者简介] 陈晓姿(1981-)女,江苏海门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教育学硕士。

面对“全体学生”“全面提高语文素养”的双“全”培养目标需要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加以支持和支撑。

(1)有利于语文教师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使语文教学“面向全体学生”。

“课堂教学”在我国大百科全书和英国大百科全书中与“班级教学”“班级授课制”是同一概念,它与“个别教学”相对,是指把年龄和知识程度相同或相近的学生,编成固定人数的班级集体,按各门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组织教材,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并根据固定的时间表向全体学生进行授课的教学组织形式。^{[2] (P.17)}这种方式在教学时间的经济性和管理的规范性上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极大地扩大了教学对象范围,加快了教学进度,提高了教学效率。然而,正像一切事物都存在两重性一样,班级课堂教学优点的背后也隐藏着不足:同一年级的学生,作为一个年纪相近的群体,在智力、心理等方面有其发展的共性,但“世界上不存在两片一样的叶子”更何况是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而班级课堂教学最大的缺陷在于过分的机械划一,不利于因材施教,不能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顾及不到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如果不强调差异性,漠视甚至扼杀个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就难以实现,语文教学就难以做到真正“面向全体学生”。在语文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中,我们不能以单一、僵化的标准看待所有的学生,某一方面的差生或许就是另一方面的优秀生,我们不能用单一、固态的教学资源面对所有的教学对象,某些学生需要文本,某些学生需要活动。所有理想的语文课堂教学都是要让所有进入课堂学习语文的学生在课堂上得到自信与尊严,要让每个学生与生俱来的个性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恰当地开发利用语文课堂资源进行课堂教学成为了语文教师必然的选择。

开发利用语文课堂资源进行课堂教学,要求语文教师充分认识课堂教学资源概念和范围的广阔性、充分的包容性,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包含了所有有助于语文课堂教学、能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适合学生心理发展、围绕课堂教学目标的一切资源。根据《标准》的要求,语文教师作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为学生学习语文服务。语文教师应积极开发利用课堂教学资源创设有利的课堂教学条件,引导并促进每个学生语文学习的发展。开发利用语文

课堂资源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是所有语文教师正确看待课堂中学习的每个学生的过程。语文教师在面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方面应具有无比的宽容心,开发利用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资源为学生打造更为广阔的课堂学习空间,使学生的天赋个性在语文教师的引导、关怀、激励中得到发展,在宽松、和谐、自主的语文教学情境中得到发展。

开发利用语文课堂资源进行课堂教学,要求语文教师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公平的学习语文知识的机会。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和内在感受,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的学生在学习同一内容时,实际具备的认知基础和情感准备以及学习能力倾向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学生对同样的内容和任务的学习速度、掌握其所需要的时间及所需要的帮助都各不相同。语文教师应在充分考虑到学生性别、气质、天资、体质、兴趣爱好、情感态度、知识能力、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等方面特殊性的基础上,在学习材料、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方面的选择和提供上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使所有的学生都享有接受优质语文教育的权利,努力求得每一个学生心智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2)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基础,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相对于“语文能力”而言,“语文素养”的提出,应该说其立论更高,视野更为开阔。《标准》提出,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1]这一段话实际上就是《标准》关于“语文素养”这个概念的具体解释。可见语文知识和能力仅仅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积累、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以及思维能力、人文素养等等也是语文素养的应有内容。韩雪屏老师曾针对“语文素养”提出了“冰山模型”,如图1所示。

分析这一“语文素养模型”不难发现,无论是基础层面的言语主体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审美情趣、文化品味、言语积累、智力发展、个性人格,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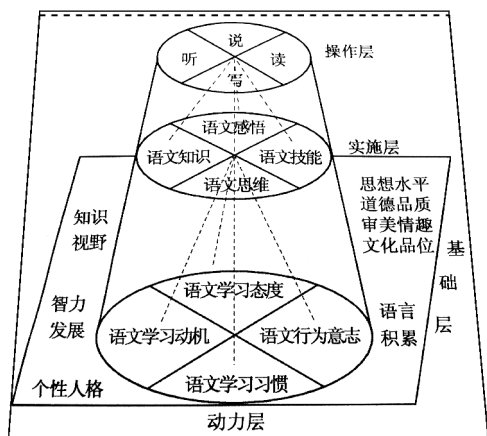


图1 语文素养“冰山模型”^{〔3〕}(P.18)

动力层面的语文学学习态度、语文学学习动机、语文行为意志、语文学学习习惯,无论是实施层面的语文感悟、语文思维、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还是显露于外的操作层面的听、说、读、写,各个要素的形成和发展都以学生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认识为前提。因此,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了语文课堂教学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标准》中对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内容也做了阐述,不仅包括一直以来深受语文教师重视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还包括各种其他图文资源、媒体资源、活动形式资源、场馆资源、街道资源。“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1〕}也可以进入语文课堂为语文教学服务。这些资源的内容类型多样,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能力培养,使学生始终置身于一个语文的综合学习过程中,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而且这些资源涵盖了学生能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源,其中很多教学资源都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便于学生理解,易于学生掌握。因此,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不仅成为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学生全面语文素养的一个重要前提,而且为形成和发展学生全面语文素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 为体现语文工具与人文相结合的性质提供保证。

《标准》这样界定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这段阐述明确告诉我们,语文课程的性质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建立在语文的交际功能与文化功能的相互作用之上。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这一界定,打破了长期以来囿于语文教育工具性的

狭窄视野来定位语文课程性质的陈旧框架,第一次确认并合理定位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使有关语言课程性质的争论走出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怪圈。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应成为体现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体现语文工具的实践性、发挥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过程。

语文是工具,而掌握任何工具的基本途径是实践。吕叔湘先生曾说过:“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复杂罢了。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4〕}《标准》有这样的叙述:“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1〕}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扩大了语文教师的视野,许多原来被语文教师忽视掉的资源得以纳入语文课堂教学的范围,给予语文教师更多的教学选择空间。语文教师不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在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过程中成为语文课堂的开发者、建设者。教师的阅历、学生的体验、课内外的各种常识、知识、自然资源、社区资源、校园文化都可以走进语文课堂中,原本死板的阅读课可以上得绘声绘色,原本枯燥的说明文可以上得生动有趣,议论文的教学可以成为语文教师引导学生借助网络、电视、广播让学生自己搜集信息、发表自己看法的平台,作文教学可以更深入地走进学生的生活,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想说的话。在学生的眼中,语文课堂不再仅仅是语文教师的“独角戏”,不再仅仅是一本课本加几本练习册,语文的课堂教学在短短的45分钟可以凝聚更多的内容、链接更宽广的世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可以真正成为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进行语文实践并逐步掌握语文工具的过程。

语文教学负载着传承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任务,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语文的人文性要在语文的工具价值实现过程之中得到体现。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本身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以往单一狭隘的“唯教

材论”禁锢了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使语文课堂教学陷入了单纯进行知识传授的误区,原本文质兼美的文章被人为肢解得七零八散,抒发学生情怀的作文训练成了学生头疼的“紧箍咒”,语文的人文性被淹没在一片“语文题海”之中。为此《标准》要求,在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文化品味、审美情趣。语文教学人文性的体现不仅表现在感受教学材料所反应的思想感情上,还应该引导学生体味语文蕴涵的人文价值,尊重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在以往的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教师归纳的“文章中心思想”取代了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一言堂”“公共话语套子”随即形成。学生成了被动接受的个体,不仅被动接受知识,还要被动接受情感。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努力去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5]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过程,扩大了语文教师选择教学材料、教学方式的范围,教学资源在课堂教学的应用也大大扩大了学生学习语文的范围,并将学生置于了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而且尊重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经验背景、情感认识所形成的独特体验成为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价值指标。语文教师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将语文还原到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学生作为一个真实的语文实践者在这些教学情境中参与语文活动,亲历语文活动过程。学生在由课堂教学资源构建起的语文情境中体验到的不仅仅是作品,还包括作品所涉及的生活,具体地说,体验者所体验到的是作品与生活的关系。因此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课堂教学,沟通了教材内外,沟通了课堂内外,沟通了教师、学生和作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语文学科熏陶感染的作用。

3. 为学生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是对传统语文教学重接受轻探究、重认识轻体验、重结果轻过程的被动、封闭、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的否定和扬弃。^[6]这一理念强调了语文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使学生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真正的确认和尊重。这一理念强调了学生学习方式

的变化,同时也促使语文教师的角色功能发生了转变。“自主、合作、探究”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学习方式,对语文教师而言,则是一种教学策略,作为语文教师,要真正让学生掌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必须努力转变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教学的创造性。丰富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为语文教师向这种教学策略发生转变创造了条件。语文教师要积极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语文学习材料,挖掘与学生自身生活更为密切的语文学习资源,开拓更为多样的语文学习渠道,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不同但透彻的服务。语文教师不再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侃侃而谈,充当主角,而是在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走向知识,使学生通过自身的探索与研究,不仅找到答案,更重要的是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合作,学会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认识。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掌握语文工具,感受用语文知识获得成功的愉悦,从而实现语文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发展。

学生的“自主学习”,以建构主义心理学为依据,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利用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对新知识起固定作用的旧知识对新的知识信息进行加工、理解,由此建构起新知识的过程,同时又是原有的知识经验因为新知识经验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的过程。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将“学生”本身作为重要的课堂教学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将学生不仅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更将学生纳入到开发利用课堂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学生不仅作为教学资源参与语文课堂教学,更应该和语文教师一同成为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者、利用者,成为语文课堂教学过程的建构者。

学生的“合作学习”建立在学生不同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之上。按照建构主义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去构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不同的人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学生的认知和情感的差异性是他们原有知识积累、生活经验、性格特征差异的外在体现。在语文教学中,同一篇课文、同一个人物形象,学生的理解往往各式各样。这种差异性本身就可以作为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加以利用。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从合作者的身上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体会到了更多的情感,教学资源在合作中变得丰厚,合作学习既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学生在语文教师的指导下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一种方式。

学生的“探究学习”是为了使学生在更高的层面

上进行语文学习的一种方式。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探究学习应该是在语文教师的指导和引导下学生自主进行发现的过程。学生探究学习尤其需要课堂教学资源的支持,教学资源为学生的探究准备了丰富的材料,多样的选择。可以说语文教师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也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探究性学习的过程。

“自主、合作、探究”不是3种独立的学习方式,而是相互联系、三位一体的语文学习方式。语文教师要充分重视“学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独立性,在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为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创造条件。

4. 为构建开放有活力的语文课堂提供保障。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类型十分多样,内容十分丰富,来源十分广泛,它与生动而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开放与活力是教学资源的应有属性。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过程成为为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做准备的过程。

(1)语文课堂要向其他学科开放,获取最先进的信息。

过去的语文课堂教学过于强调以学科为中心,独自为战,为语文而语文,与其他学科相隔离,忽视了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当前的课程改革,提倡跨领域学习,《标准》也明确要求:“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1]可见语文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同时语文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在内容上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多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了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不仅实现了省时、减负、优质、高效的语文教学,而且增强了语文学科的活力,可以使学生在优美的旋律中体会文章的意境,在绚丽的画面中感受语言文字所渲染的图形色彩,在轻松、活泼的健身表演中愉悦身心,在网络的海洋中收集语文信息,不仅使语文教学获取各学科发展的前沿信息,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大大开拓学生的视野,更好地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

(2)语文课堂要向社会生活开放,引生活的活水

入语文课堂。

社会是一个大课堂,《标准》中列举的“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告”^[1]等语文教学资源都来自社会生活。而且“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1]也可以成为教学资源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这样的教学资源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新鲜的,不仅是学生深有感触的而且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这些资源不再局限于一本教科书,而是成为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资源体系。课堂教学资源以课程目标和语文教材为生长基点,不断引入社会生活的“活水”加以补充,允许语文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重组,留给语文教师更多个性开发和选择加工的空间,为学生主体留下更多自主取舍和拓展的空间,语文课堂教学因此增强了弹性和发展的动力。开发利用蕴涵于社会生活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出发点与落脚点虽然是在语文课堂,但是,开发和利用的过程却可以走出课堂,走向更为宽广的天地。语文教师要勇于打破校园的围墙,走出教室的禁锢,突破课堂时空的局限,向社会生活领域和自然环境延伸,利用散落在其间的教学资源,将语文课堂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语文教师要鼓励学生把语文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把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语文问题带到语文课堂上一起讨论,引入生活的活水,在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过程中为构建开放的、动态的、课堂内外相互结合的语文课堂做好准备。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为落实双“全”培养目标提供了资源支持,加强了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为学生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为构建开放有活力的语文课堂提供了保障。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是践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基本理念的过程,只有认清这两个过程的统一,语文教师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意义,才能更好地达到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教学要求。

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概念的界定我们知道,虽然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范围比较宽广,开发利用的意义十分重要,但是并非所有的资源都能进入到语文课堂,为课堂教学所用。在资源未进入到语

文课堂的时候,资源只能作为一个有待加工和处理的材料,只有进入到课堂这个特定的时空,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某个环节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一般而言,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需遵循以下4个基本原则。

1. 语文性原则。

语文性原则的提出是为了区别课程论层面上提出的“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语文性原则就是要求语文教师在开发利用课堂教学资源进行语文教学的时候要时刻注意把握语文的学科特点,体现语文学科的特色,挖掘语文学科自身的魅力,充分利用语文学科自身的内容和特征来选择课堂教学资源。不能因为多样的教学资源走进课堂冲淡了“语文”自身的味道。坚持“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语文性”十分必要,理应置于4个原则的首位。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语文公开课上看到这样的场景:讲抒情散文,就是大段大段的听音乐、看图片;讲小说,就是看电影、看电视;讲戏剧,就是让学生分成小组排练、表演;讲科技说明文,干脆请进物理老师、化学老师、生物老师。在这样的语文课堂中,语文教师成了音乐、图片的播放者,成了学生表演的看客,甚至成了其他学科教师的配角。在这样的课堂上,看似充分开发利用了教学资源,却使得语文课成为了音乐课、美术课、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的附属,而失去语文课的本色。因此,坚持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语文性”原则对坚守语文教学阵地、彰显语文学科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2. 针对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有两个指向:第一,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要针对不同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对于教师是教学资源,对于学生便将转化为语文课堂学习资源。这些资源要符合学生身心特点,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适应学生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只有这样开发利用出来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才能为学生乐于接受,更好地帮助他们智力和情感的发展。第二,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要针对每堂语文课的教学目标,要与每堂语文课的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是为了促进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最终目标是为语文课堂教学服务。资源本身具有多质性的特点,同一资源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教学目标。所以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在明确课堂教学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分析,与课堂教学目标相关的各类资源,认识并掌握不同资源各自的特点和性

质,有针对性地选择,才能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在针对教学目标的同时,语文课堂教学资源还要与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讲,由于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原有的教学内容得到极大地丰富,一方面学生的学习空间获得了扩展,但是,这种丰富和扩展都要以语文教学内容为依托,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3. 开放性原则。

课程资源概念突破了单一教材资源的束缚,突破了课堂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因此开放性应该是开发利用课堂教学资源的应有之意。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就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所有有益于语文教学活动的一切可能的课堂教学资源。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容是开放的,可以容纳多学科的知识为语文教学服务;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类型是开放的,无论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资源只要有利于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都可以成为开发利用的对象;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是开放的,不论是课堂内的还是课堂外的,不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不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可以加以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是开放的,教师开发,学生开发,家长参与开发,学校指导开发,社会配合开发,多种途径和方式可以协调配合使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开放性原则,保证了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进行,为语文课堂教学的开展铺就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4. 经济性原则。

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财力、物力、人力等的投入和支持,开发利用不同的语文课堂教学资源需要不同大小的投入,也会收获不同的教学效果,如何在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中实现投入最小化和产出最大化的最佳效果,是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尽可能用最少的开支和精力达到最理想的课堂教学效果。在没有能力进行条件性资源开发利用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开发素材性资源进行资源上的弥补,多开发利用那些最节省经费开支或者那些不需要过多经费投入的课堂教学资源,而不应借口开发利用教学资源大兴土木、购买教学装置,要努力做到投入的经济性;我们强调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应该成为语文教师准备课堂教学的重要过

程,但是在选择课堂教学资源的时候,在教学效果不产生明显差别的前提下,要选择那些不占用语文教师过多时间,或者不需要语文教师投入过多精力就能完成开发利用任务的课堂教学资源,做到时间的经济性。《标准》中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1]因此,语文教师在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要尽可能利用本地资源,就地取材,不舍近求远,也不好高骛远。这些资源是学生所熟悉的,是与他们平时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可以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做到空间的经济性。投入、时间、空间三者相结合的经济性不仅为语文教师筛选课堂教学资源提供了开发利用的原则,也为最佳语文课堂教学效果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以上4个原则的提出是对以往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经验的借鉴,也是对遵循学生发展和语文课堂教学的客观规律的总结。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是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是语文教学不断摸索、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有着百年的语文教学渊源,又符合语文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同时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的探索道路是无止境的,就像语文课堂教学的探索没有终点一样。因此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是一个值得每位语

文教师和语文教学研究者不断探索、不断改进的过程。只有在科学的语文教学理论指导下,只有在语文教学经验的积累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所在,才能在开发利用语文课堂教学资源原则的指引下,不断摸索,为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服务。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 袁金华. 课堂教学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 [3] 倪文锦. 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4] 吕叔湘. 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J]. 文字改革, 1963(4).
- [5] [苏] 苏霍姆林斯基. 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问题[A].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一卷)[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6] 潘庆玉. 语文教学焕发生命活力与创新精神[J]. 山东教育科研, 2002(2).

(责任编辑 刘守旗)

我院喜获 5 项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管向群书记出席颁奖大会并接受省委罗志军书记颁奖

4月12日,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在南京隆重召开,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省政协主任张连珍等省领导出席颁奖大会。我院管向群书记作为获奖代表接受省委罗志军书记颁奖。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目前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共评出一等奖30项,二等奖120项,三等奖312项。我院魏所康的《国民教育论——和谐社会建设与公共教育政策》荣获二等奖;管向群的《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形成与发展》、冯保善的《凌濛初研究》、陈韶峰的《中小学教师任用及其纠纷的处理》和宋旭峰的《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轨迹》等4项成果荣获三等奖。

新课程理念下高中历史教学目标的设定*

吴苏晨^{1 2}

(1.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2. 苏州第十中学, 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 历史教师准确地把握教学目标,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前提和关键。但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有些历史课教学却出现了教学目标虚化的现象。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分析课程标准、分析学情、借助行为目标理论进行科学表述的方法进行纠正、解决。

[关键词] 历史教学; 教学目标; 学情分析; 科学表述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34-03

教学目标是教师教学活动的灵魂,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关键。“不具备这个条件,课程目标到教学目标的效益——教学质量,就会更大程度地依赖于教师个人的专业水平。”^[1]因此,对于中学历史教师特别对于年轻教师而言,只有先制定准确、具体、完整的教学目标,才有可能确保教学的有效性。课程标准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而课程目标承载的新的理念、学习方式等要真真切切的进入课堂,实现历史课程的有效教学教师必须思考3个问题(1)你把学生带到哪里?(教学目标)(2)你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教学过程和方法)?(3)如何确信你已经把学生带到那里(学习结果评估)。而明确把握教学目标,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前提和关键。目前,课改在沿着新课程方向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教学目标虚化,有效性受到挑战。例如在讲授人教版必修一第三单元第7课《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时,课标要求“通过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过程,使学生认识并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调整的过程,从而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这些目标的行为主体都是教师,而学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而“教师通过……培养学生……”也是不可测的,并没有体现新课标“以学生为主”理念。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教师科学地制定适

应新课程理念的教学目标。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探讨如何不断更新教学目标,以制定出更有效的教学目标的方法。

一、分析课程标准——教学目标科学化的纲领

确定教学目标是推进标准、教学、评价一致性的关键。严格的教学目标,应包括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表现程度四项要素。^[2]而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是制定教学目标的纲领,确定教学目标的第一步应该是对课标进行详细的分解。如: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含义”(人教版必修一第一单元第2课《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经过分解,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把握这一课标。第一,从学科内涵上来说,中央集权制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色,我们需要了解这一制度的缘起、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影响;第二,从知识分类来说,这个课标包含概念性知识和事实性知识;第三,从认知水平上来说,了解行为动词包括说出、背诵、描述、辨认列举、复述等。

在分解课标时应以人教版教材为主,参考其他各种版本的教材。人教版教材对课标调整不是很大,对课标前半句解释相对充分,对后半句却阐释过于简单,如: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人教版必修一第一单

*[收稿日期] 2011-02-17

[作者简介] 吴苏晨(1980-),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教育硕士,苏州第十中学历史教师,中教一级。

元第三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一课),对“史实”描述比较完整,对“特点”则没有表述;又如,“了解希腊自然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人教版必修一第二单元第五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教材中只是叙述了希腊城邦的形成与内容,没有对相关规律性内容的解释。因此,要根据其他版本的教材补充相关知识,以求全面、准确理解课标内容。

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是成功教学的基础和关键,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是教师探求教学目标的源头。所以教师必须研读课程标准,明确课程性质、理解课程理念、体会课程设计思路、明晰课程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内容标准去构建每一课教学内容的具体目标(即“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且目标应尽量清晰、可测量、可操作、有递升。可以使用“了解”、“理解”、“运用”等词汇,区分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目标要求。因为教学目标表述的越是简洁、明确,教师和学生对它的把握才会越准确,并且对目标达成的有效性也越便于检测。

二、针对差异,具体分析学情——教学目标合理化的基础

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目标”是为学生而设计的,它的表述行为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是我们确定教学目标的基础。因此,当学生不能达到课标上的要求时,教师就要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及时纠正,合理的制定教学目标,不能依葫芦画瓢,千篇一律。

如执教《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人教版必修二第八单元第23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一课时,课标要求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例,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建议组织学生讨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原因与影响,展望中国在区域集团化中的作为。有教师这样进行学情分析:学生在经过近一年的新课改背景下的高中历史学习后,搜集、整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已大大增强,逐渐适应了生生合作、师生互动的课堂探究模式,因此预设目标是学生能做到100%参与——或阐述观点、或提出问题、或提供材料、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但事实证明,由于这种分析比较抽象、概括,没有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没有把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没有具体分析学生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具体缺少什么知识、能力、方法、态度、价值观,没有从全面、变化发展、联系的角度对

学生进行分析等,导致有些认知水平较差的学生无法参与到小组讨论中来。

余文森教授认为:“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的,面向全体不是让每个学生都获得一样的发展,而是让每个学生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发展。不要简单地把学生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教学的问题,而是要把学生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教学的资源,教学中要充分合理地艺术地利用这一资源,使学生之间发生实质性的互动,这是实现教学增值,也是教学面向全体学生的重要保证。”^[3]

在具体、全面的分析了学情后,该教师重新设计了教案。针对基础相对较差的学生这样设计问题:“欧洲共同体是由哪些机构合并成立的?”“欧洲共同体成立的目标是什么?”“欧盟成立的标志、北美自由贸易区由哪些国家组成、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背景?”对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这样设计问题:“欧洲共同体成立的影响是什么?”“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盟相比有哪些不同点?”“你认为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有何积极意义?”“经济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会带来怎样有益和不利的影响?”

在进行分组讨论问题“你认为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有何积极意义?”“欧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你认为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时,教师有意识地把不同层次的学生组合在一起,以便生生之间的互相帮助与学习。对每位学生的发言,教师都进行了点评,充分肯定其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肯定其思维的创造性。对于不科学、不合理的部分采用适当的方式予以指出,绝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教师尽己所能地为学生营造一个发展良好个性的空间,使学生在标准中有变化、规范中有自由、一致中有特色、统一中含个性,充分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敢于发言,且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均有所获、均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这也正是我们历史课堂教学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最本质的体现。

三、以行为目标为基底——教学目标规范化的保证

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以学生为主体,并使用科学的表述,可借用行为目标学科中的相关理念。行为目标是对学习者通过学习后将能做什么的一种明确的、具体的表述。一个优良的行为目标的表述,一般包含4个要素:对象(audience),写明教学对象,以此导教;行为(behavior),通过学习后,学习者应能做什么,既导学又导教;条件(condition),即上述行为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以此导教;程度(degree),规定上述

行为是否合格的标准和程度,以此导测量。

如何运用行为目标的理论精华来设计一个优良的教学目标呢?

首先是对象的表述。

对象解决“由谁来完成行为”的问题,可以采用以下3种表述方式:一是程度副词+主语,如程度较好的学生、程度稍弱的学生等;二是百分比+主语,如85%的学生、60%的学生等;三是表示范围的副词+主语,如全体学生、多数学生等。

其次是行为的表述。

行为解决“做什么”的问题,是说明学习者在教学结束后,应该获得怎样的能力,可以使用“能够说出”、“能够描述”、“能够列举”等行为动词。如果需要,还可加上表示程度的状语,如“基本掌握”等。

再者是条件的表述。

条件是完成行为的前提,它表示学习者完成规定行为时所处的情境,即评价学习者学习结果时,应在哪种情况下评价。条件通常用一个介宾结构表示,如“在……情况下”;“根据……”;“经过……”等。

最后是标准的表述。

标准要解决“做得怎么样”的问题,是行为完成质量的可接受的最低衡量依据,它通常附在行为表述之后,从行为的准确性和质量两方面来确定,进一

步说明行为要达到的水平和程度,如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含义在科学分解的基础上,我们重构清晰合理的教学目标,以学生为行为主体,运用可观察、可测量的具体行为为动词,指出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达到目标的具体表现:说出中央集权制的概念,描述这一制度的特征,辨认、列举不同时期的制度,如汉代中央“中朝”的形成、唐朝三省六部制、元代中书省制设置等史实。

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已经发生了变化;“满堂讲”、“满堂问”的授课方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要做到“有目标,有任务,有规则”,其中制定科学、合理、规范的教学目标就是实现有效教学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赵亚夫. 历史教学目标刍议三:怎样确定课堂教学目标[J]. 历史教学(中学版), 2007(7).
- [2] 唐江澎, 佟柠, 贾军, 石燕. 教学目标叙写要目中有人[N]. 中国教育报, 2009-03-13(7).
- [3] 余文森. 关于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对话[EB/OL]. http://www.teacher.com.cn/nationaltrain/course/ktjx/tzyd/101_1.htm.

(责任编辑 晨晓)

(上接第126页)的分析和相应的语料中可以发现,新闻广播话语紧凑精炼,不像书面语那样复杂并可以让读者有时间揣摩、回味,但是也遵从了英语语句的末尾加重原则。在这样的句式中,语句末尾部分为句首成分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或补充信息。如果听者能熟悉并掌握新闻广播中的尾重句法结构,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取大量有效的信息,做到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 [1] 王佐良, 丁往道. 英语文体学引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 [2] 张芳杰.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S].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3] 李悦娥, 范宏雅. 话语分析[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4] Quirk, R & S. Greenbaum, et al. A University Grammar of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4.

- [5]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6]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 [7] 胡曙中. 现代英语修辞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8] 何瑞清. 翻译的重要视角: 信息结构与信息焦点[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2).
- [9] 沈伟栋. 如何获得末尾中(重)心[J]. 科技英语学习, 1996(21).
- [10] 应肩中. 英语讲究尾重句[J]. 科技英语学习, 2002(2).
- [11] 刘润清, 韩宝成. 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修订版)[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南山)

高三英语试卷讲评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王 荃

(南京市第四中学, 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 本文针对当前一些高三教师在试卷讲评课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用一些具体实例浅析上好高三英语试卷讲评课的基本原则,以期通过试卷讲评课帮助学生查漏补缺,提高高三学生英语思维能力和解题能力。

[关键词] 高三英语; 试卷讲评; 教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3-0137-03

一份试卷既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又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水准。学生可以通过试卷及时了解自己现在的水平,对自己目前存在的知识点的遗漏做到心中有数,而教师则可以通过测试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对试卷中存在的共性的问题进行教学反思,以使自己的教学更加有的放矢。测试结束后科学的试卷讲评则是教师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归纳复习、培养答题技巧和提高学生运用能力的重要环节。

一、存在问题

笔者在平时的听课观摩以及观察中发现,有些高三教师推托教学时间紧、课时不够,对检测后的试卷讲评准备不充分或重视不够,失去了整合知识和训练解题技巧、培养能力的大好机会。具体表现为:

1. 重视常态复习课而忽视试卷讲评。

有些教师把备课的重心放在正常教学进度中的新授课或者按系统的高考复习中。遇到备课量大、任务紧的情况,只是对照答案草草做一遍学生测试试卷,对试卷没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分析试卷,研究试卷的出题角度及考题趋势了。在这种情况下试卷讲评一定是仓促低效的。学生辛辛苦苦、殚精竭虑,教师占用了宝贵课时的测试,没有针对性的试卷分析,那么测试的目的意义何在?

2. 匆忙核对答案。

有的教师将讲评视为核对答案,习惯于蜻蜓点

水地核对一下答案,甚至将答案输入电脑打在投影上或张贴在墙上,指望学生自己核对。核对完毕后仅对学生错误率高的题目一带而过,认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深究对错。

3. “一网打尽式”的满堂灌。

也有的教师生怕有哪个考点疏漏,于是把试题从头至尾讲一遍,“满堂灌”式进行机械重复答题过程,不分轻重主次,缺乏讲解分析及提供解题策略,学生容易分神甚至产生厌倦心态。

4. 专注于词汇、语法的讲解。

有些教师只专注于知识点的讲解,他们似乎擅长单项选择的讲解。比如对于一些动词的搭配,教师惯于详细罗列,学生被动接受,缺乏思维过程,忽视了解题能力的培养。死记硬背的词语搭配在缺乏语境的情况下很容易遗忘。这种评讲只注重词汇、语法的讲解,忽视阅读理解、书面表达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5. 试卷评析缺乏情感交流。

有些教师只专注于分析试卷上的失误原因,忽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殊不知进入高三,课堂容量增大,学生学习的密度加大,随之而来的压力有时难免让他们不堪重负。此时,积极的情感交流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不小的促进作用。

*[收稿日期] 2010-11-20

[作者简介] 王 荃(1972-),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市第四中学中教一级教师。

二、对策思考

上述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地影响了试卷讲评乃至学生高考总复习的效果。那么,如何上好试卷讲评课呢?笔者认为,要想上一堂有效的试卷讲评课,教师必须至少做到以下6点。

1. 及时阅卷,认真备课。

笔者认为,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评讲试卷的重要性,在考前必须对测试试卷精挑细选:可以是现成的适合自己学生认知水平的质量上乘的试卷;也可以是自己在备课过程中进行精心剪贴后编制的试卷。如果教师在测试之前自己对试卷没有总体的把握和了解,那么这将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教学行为。平时每进行一次测试,教师最好在一两天内挤出时间,读完试卷,尽可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得失,同时也让学生及时知道自己的测试情况,以便在讲评前留有充分的时间探究,修正自己的问题。同时,若不及时把信息反馈给学生,不仅容易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会使学生的错误与偏差因得不到及时纠正而形成错误的思维定式。就算几天之后教师评讲了试卷,由于学生对当时的思考过程记忆模糊,导致纠错效果大打折扣。备课的主要内容有:备试题(分析试题内容,揣摩命题思路);备学生(考前预测学生答题难点,考后分析学生共性问题);备方法(认真思考评讲方法)。

2. 讲评要具有针对性。

高三的课时十分紧张,如果教师在讲评试卷时面面俱到,逐题讲评,这样既造成时间上的浪费,又会使课堂平淡乏味。因此,教师要在课前认真分析试卷,在此基础上,对学生的普遍性、典型性错误及原因做到心中有数,选取有代表性、普遍性的问题进行重点备课和讲评,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举一反三,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进行合理发散,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错误率较低的题则只需蜻蜓点水或课后个别指导,这样讲评的时间得到了保证,效果也更明显。以2009年江苏高考卷的完形填空讲评为例。39(选 during) a service experience, students must keep a journal(日志) and then write a 40 abou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第40空的选项是4个单词,乍看有学生以为是词汇的辨析,很多学生轻易地选择了A. diary。这恰好符合中国人的用词习惯——写日记。可是,上文中说:在服务过程中,学生必须要写日志,之后写一个关于所

学到的东西的____40____。四个选项是 A. diary B. report C. note D. notice,全文第二句话讲到学生没有完成6小时的 service learning 就无法毕业拿到学位,且本句话有个 must 强调是学生的责任,这两点都意味着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应该作出一个 report(注:report 表示比较正式的报告)提交给学校。提醒学生理解了上下文的意思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再次提醒学生从搭配上来看,英文中与 diary 搭配的词一般是 keep,而我们的学生习惯上用 write,这个考点在其他省的高考题中也有涉及,足见培养用英语思维尽量弱化汉语负迁移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同时,学生背诵词汇时不能浮光掠影,仅仅背诵浅层含义及常用法,在高考复习阶段更要注意理解词汇的深层含义与熟词僻义。同时注意记忆单词与阅读理解结合,在阅读中不断巩固单词的深层含义,体会单词意义与语境的契合。

3. 讲评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讲评过程中,必须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解题指导,促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和技巧,并尽可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重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发展思维能力。如2009年江苏高考卷第29题。

——Bill, can I get you anything to drink?

——_____.

A. You are welcome. B. No problem.
C. I wouldn't mind a coffee. D. Doesn't matter.

很多学生根据中文理解选择B。其实这时老外喜欢用一个否定形式再加一个负向的词表达一种肯定的概念,即双重否定表示肯定。如这里的 wouldn't mind a coffee 是表示你可以给我来一杯咖啡。

是不是讲解完了就可以进行下一题了?要想生生活在非英语国家文化下的学生能正确选择交际用语,一个例子是远远不能让学生体会深刻的。这时笔者再给出两个例子,让学生举一反三:

——Do you mind if I record your letter?

——_____. Go ahead. (2008 江苏)

A. Never mind. B. No way.
C. Not at all. D. No, you'd better not.

此句 Never mind. 意为不介意,与下面一句肯定的 Go ahead. 联合在一起表示可以抽烟。

——How about putting some pictures into the report?

_____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2005 江苏)

- A. No way. B. Why not?
C. All right. D. No matter.

答案 Why not 原本是很多学生不会选择的,但是知道了老外有时喜欢用否定来表达肯定的意义,做这种题目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判断正确了。

4. 试卷讲评要体现学生主体性。

讲评试卷并不是教师一味地讲,学生被动地听。能让学生讲的,教师不讲,体现自主性;能让学生议的,教师引领,体现探究性;能让学生悟的,教师等待,体现包容性。在讲解之前,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尽量先使学生自己归纳,这样做不仅能加深学生的印象,而且更加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样一道题目,有的学生做对了,有的学生做错了,教师可以引导这些同学发言,分别阐释自己的观点。做错的学生在讨论中自觉修正自己原本错误的理解,做对的学生得到一次自我表现的机会,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这难道不比一言堂更具有教学的有效性吗?

5. 讲评要重视阅读中思维的训练。

对于阅读理解中需要推理判断的题干,要教会学生在原文中寻找蛛丝马迹以支撑自己对4个选项的正确选择。这种难度较高的题型,选项的设置干扰性极强,备选答案中可以立刻排除的比较少,大多数选项貌似正确切题,更有些选项之间具有相似性,增加了学生选择的难度。那么在遇到试卷中典型性错误的时候,教师一定不能心急为了赶时间匆匆带过,反而应该特别照顾,仔细剖析。如2008年北京高考题阅读理解A篇,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对最后一题“*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tory?*”有不同见解。对于(A) *Giving is always a pleasure.* 和选项(C) *An act of kindness can bring people great joy.* 有争论。从表面看两个答案确实有些接近,很难区分。评讲中笔者让选择不同答案的学生分别说出自己的依据,学生都认为最后的自然段是整个故事的概括与升华。最后一段是这样的:*Almost without thinking, I bent and gave her a hug. She held onto me tightly. Our hug ended with her remark, “you gave an old woman a little moment of joy.”* 笔者请学生仔细阅读这一自然段,并让他们仔细体会 *give her a hug - hold onto me tightly* 和 *give an old woman a little moment of joy* 这几

个词汇,读完之后同学们一致认为尽管(A)选项正确无误,也概括了上文,但是,毫无疑问(C)更好地反映了主题。类似这样的题目以后还会碰到很多,但是经过教师仔细的讲解和学生热烈的讨论,学生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就会使用正确的解题方法了。笔者也还趁热打铁,对这段中这几个词汇进行了拓展,补充了诸如“*Hold on a minute while I get my breath back. end with sb's remark*”等等,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这些短语的用法。

此种做法在阅读课的讲评课中对需要深层次理解的题目特别有效,教师要求学生坚持使用正确的推理方法,培养了他们做题时运用推理判断、缜密思维的能力。学生也反映在阅读讲解中这样的思维训练对于阅读理解有很大帮助。

6. 讲评后的纠正补偿。

如果讲评课结束后没有后续的练习与巩固,那再精彩的课堂也会是过眼云烟,消失在学生的记忆中。

学生在考卷中暴露的问题一般都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不大可能通过一节讲评课就夯实了。笔者在实践中要求学生准备“错题集”,要求他们养成收集错题的习惯并且经常拿出来复习回顾。

学生在课后忙着归纳收集错题,老师也不能闲着。这时,老师可以把这些典型错误再编排成不同的题型,放在日后的听写或者小测验中反复强化,帮助学生与“遗忘规律”作斗争,攻克顽疾。

总之,高三英语试卷讲评课是高三学生复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应该起到查漏补缺、提纲挈领的作用。教师在讲评过程中要力求精讲精析,抓住典型的错例,选择要点加以点拨,充分启发学生思考,对重要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归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解题水平和应变能力,讲评课的课堂教学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当然,一次考试,不仅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业绩,更能检测出教师教学的得失。教师在分析试卷的时候,还要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思想等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反思,找出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大学习研究力度,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推动教学,力争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 南山)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in Harmonious Society

CHENG Jian – jun WENG Ming – hui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njing , Jiangsu , 210013 , China ;*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Nanjing , Jiangsu , 210044 , China)

Abstract Differences are the basis of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society full of differences. At present , the tendency of enlarging the differences exists in some fields of social life. So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rmonious society and differences , constructing the difference controlling system based on social justice , and balanc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ctively at the most are essential to guarantee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n order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difference ; society full of differences ; harmony

Exploring the Chinese Knowledge Teaching Reform from Life Caring Perspective

CHEN Shang – da

(*College of Culture and Media , West Anhui University , Lu'an , Anhui , 237012 , China)*

Abstract Life caring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knowledge teaching under New Curriculum. Chinese knowledge is the media of unity of object and subject , and life caring is enthusiastically calling for student-based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rom the life caring perspective , the main content of Chinese knowledge teaching reform includes dialogue with text , dialogue with others , and dialogue with oneself. Enhancing goodness and rescuing fault are the core theory of it , which includes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wo-way communication , the problem situation in pursue of intellect , and the teaching wisdom of flexible action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life caring ; Chinese knowledge ; teaching reform ; enhancing goodness and rescuing fault

The Progress of Military Psychology

CHEN You – qing GENG Hai – yan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 210098 , China)*

Abstract Military need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psychology research. The lates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ainly embodied in military personnel selection , warfare stress , military ergonomics , morale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The major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s to make astronaut selection criteria , to help veterans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evaluation methods , to improve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military command system , to increase soldiers sense of organization identity , and to enhance military morale.

Key words military ; psychological warfare ; aerospace psychology ; military ergonomics ; military morale

Belles-lettres , Vignette and Essay

——Analysis of Zhou Zuoren's Literary Style Selection from its Naming

WANG Cheng – fa

(*Chinese Department , Anhui University , Hefei , Anhui , 230039 , China)*

Abstract Zhou Zuore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se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He is an important writer who takes prose as his most main literary style , and he has also expressed many quite influential opinions in the prose theory. But , the literary styles he advocated in the different times named as belles-lettres , vignette or essay , actually refer to the identical kind of prose , ESSAY. Zhou Zuoren's individual creation is precisely his prose theory concrete practice. His theories and works are all literary style selection based on rational determination.

Key words Zhou Zuoren ; essay ; literary style selec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 of Exploiting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CHEN Xiao – zi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Academic Journal ,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njing , Jiangsu , 210013 ,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0 years of new curriculum reform ,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resources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have already influenced Chinese teaching , but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resources to boost classroom teaching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Chinese teachers don't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xploiting these resources and they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four basic concepts for compulsory Chinese course from *Full-tim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ourse Standard (experiment draft)*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xploiting Chinese classroom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principle for its development so as to benefit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resources ; basic concept ; significance ; principle